

目 录

序	(1)
序章	(1)
第一章 大正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活跃的“温床”	(23)
一 激荡的大正时期	(23)
二 “欧化”与“反欧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34)
三 大正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的类型	(59)
小结	(68)
第二章 “国家主义及皇室中心主义思潮”与德富苏峰	(70)
一 德富苏峰的人生历程	(71)
二 青年时代德富苏峰探求的近代市民社会秩序与 独立人格的确立	(76)
三 人格的断裂与思想变异	(92)
四 断裂人格的虚假整合与“国家认同”	(111)
小结	(138)
第三章 “民本主义思潮”与吉野作造	(145)
一 吉野作造的人生历程	(146)
二 “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酝酿及独立人格的确立	(153)
三 “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台与保持人格的同一性	(165)

四 吉野作造的“明治文化研究”与人格的同一性	(180)
小结	(181)
第四章 “超国家主义思潮”与北一辉	(185)
一 北一辉的急进人生历程	(186)
二 北一辉的“国体观”与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	(192)
三 “革命的中国”与“革命的对外政策”	(215)
四 “国家改造”方案与“超国家主义”	(226)
小结	(240)
第五章 “无政府主义思潮”与大杉荣	(243)
一 大杉荣的叛逆人生历程	(244)
二 大杉荣的叛逆性格及其叛逆行动	(250)
三 大杉荣的叛逆哲学思想与无政府主义	(265)
四 大杉荣叛逆哲学的实践与悲哀	(280)
小结	(294)
第六章 “理想主义思潮”与武者小路实笃	(297)
一 武者小路实笃的多彩人生历程	(298)
二 边缘化知识分子的类型与武者小路实笃	(304)
三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	(310)
小结	(317)
终章	(319)
参考书目	(328)
后记	(341)

序 章

一

二战结束前的日本近代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明治时期、大正时期与昭和前期。从日本近代社会发展史的连续性来看，明治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期^①；大正时期是在国内外环境巨变的影响下，社会求变、人心思变以及重新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时期；昭和前期则是国家走向歧途的时期。从因果论的角度讲，昭和前期的误入歧途恰好是大正时期的“重新抉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见大正时期在日本近代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值得重视。

大正时期（1912年至1926年）在日本近代史上仅存15年，故有人将大正时期的文化表现视为“一朵美丽的谎花”^②。日本的一般民众也是将大正时期视为一个简单的中间过渡期^③。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大正时期是承接明治时期而来的，是

①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序”，第5页。

②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4页。

③ 松尾尊允：《大正德谟克拉西》，岩波书店1974年版，“前言”，第5页。

模仿欧美政体模式，进一步推进议会主义^①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大正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多种政治思潮的竞相迸发以及国民心态的危机等角度来观察，大正时期是“彷徨”的、动荡的、重新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历史时期。在以往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对明治维新及昭和法西斯战争进行研究的论文、专著较多，而以大正时期为中心展开研究的著述则很少。就大正时期在整个日本近代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言，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而且，为了考察日本政治思潮的历史连续性，必须对大正时期进行缜密思考与细致研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具有反作用。大正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多种政治思潮的并存，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例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阶级构成的分化。分化的社会各阶级有各种欲求，当某种欲求成为某一集团的共同倾向时，就形成了一种思潮。当这种思潮掌握了绝大多数民众，又能得到权力所有者认可的时候，阶级欲求便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这是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潮是关于建设国体、政体及社会的思想倾向，它具有超前性与滞后性的双重特点。各种政治思潮虽然都是社会改革、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的思想先导，但其具体性质直接关系到调整后的社会性质。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各时期的思潮与现代化的关系，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思潮是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大正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曾一度取得过胜利（出现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民众所期待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现代化进程；而在进入昭和初期后，“皇室中心主义”及“超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又迫使“民本主义”思潮逐渐褪色，

^①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41页。

从而割断了日本现代化进程，将国家引入法西斯战争的泥潭。那么，为什么大正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取得过胜利但又未能保持下去？这与大正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及各种政治思潮的变化及力量对比密切相关。乍一看来，从一个相对发达的民主阶段过渡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但这恰恰说明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的研究尚待深入。

诚然，统治阶级发动大规模战争是以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的变化为前提的。其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面对种种危机的挑战，可以有不同的对应策略。即是说，并非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也存在着和平的、依靠国家的内部调整来摆脱危机的对应策略。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是依靠政府力量进行经济调节，并对周边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战争的爆发，除了有经济根源之外，时代的氛围也与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针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不同思想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种种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潮并存并彼此交锋，力图成为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潮并影响政府，进而成为那个时期国民精神的统合力量。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 如果“歪理邪说”掌握了群众，同样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史来看，日本群众盲从对外侵略战争，就是“歪理邪说”掌握了群众的佐证。在这个意义上，制造“歪理邪说”的人就是罪魁祸首。

如所周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决定的因素”，而人则是一切生产力中的最活跃因素。例如，战争的参与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页。

者、国家建设的指导者、战争的指导者，都是人这一最具能动作用的实体。然而，是哪部分人起了主导作用？哪部分人的思想意识及行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方向？很显然，那绝不是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每一时期的权力所有者及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为权力所有者出谋划策，是权力者的“智囊团”。另外，还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不同时期活跃的各种政治思潮的载体。他们的思想左右着时代整体思潮的发展方向。

迄今为止，在有关日本走向法西斯战争轨道的原因探析中，经济危机是导致战争主要根源的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确，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代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经济变动及经济危机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其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短暂的虚假繁荣与经济萧条的频繁交替、政治上内阁更换频繁、外交上更加难以对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政治思潮的纷繁复杂及其交锋等等。日本的大正时期即是最好的例证。这正如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与经济状况相适应，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与不同的学派，如儒、墨、名、法、道、兵、纵横、阴阳等等。他们之间的争辩与讨论，带来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并且，这种交织复杂的思想又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外交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甚至，这种反作用有时会成为决定性因素的重要侧面。由此观之，为了全面地把握日本走上法西斯战争轨道的原因，有必要将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舆论导向列为研究的主题。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政治思潮的多样化，说明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要想达到社会价值观的相对一致，必然需要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争斗与“磨合”。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最活跃。他们参与辩论，组织运动，致力于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并且，他们力图在动态中保持社会的相对平衡。因此，从这

个意义上讲，探讨大正时期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十分重要。

大正时期是知识分子及政治思潮异常活跃的历史时期，按其政治思潮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六大类，即“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超国家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理想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等。从政治思潮、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及政治思潮对国家发展方向影响程度的角度出发，笔者将前五类思潮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五类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德富苏峰、吉野作造、北一辉、大杉荣及武者小路实笃等。“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暂未触及，拟在今后研究中主题讨论，相信不致影响本书所要解决的主题及结构的完整性。

如果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观察问题，那么毫无疑问，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掀起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运动高潮。继之，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是第二次民主运动的高潮^①。这两次运动，都以吸收欧美先进国家的民主制度为目的。从社会运动的整体性来说，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也只是大正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而且，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潮体现了社会运动各组成部分的大体要求。但是，这些运动以“欧化”^②与“反欧化”交织在一起

①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② 关于“欧化”的内涵，中日学者多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思潮。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汤重南先生认为，“欧化”运动开始于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鹿鸣馆”时代发展到极致（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9页）。明治时期的思想家陆羯南认为，“国内的近代化=欧化”。受到上述两种观点的影响，笔者从社会学角度给“欧化”下了定义，并认为“欧化”是增强社会现代性的动态的历史过程。

为特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法西斯战争爆发以前，日本近代史即是“欧化”与“反欧化”运动的矛盾斗争史。不言而喻，明治知识分子与大正知识分子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即是说，他们之中既存在力主“欧化”的知识分子，也存在提倡“反欧化”的知识分子。“欧化”与“反欧化”之间的争斗，反映了思想传统的连续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它们将国家引向何种发展轨道，与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

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大正时期是继明治时期进一步推进“欧化”的历史时期。“欧化”是一个过程，是一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欧化”就是现代化过程。那么，为什么用“欧化”概念而不用“现代化”概念？日本“欧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欧化”与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如何？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欧化”与“反欧化”运动中的社会作用如何？大正时期的不同阶段；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争斗与“磨合”的结果如何？哪种思潮曾经取得过胜利及哪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曾经成为主流思想？每类知识分子在大正时期的地位及特点如何？研究历史，关注现实，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与当前日本的政治思潮有哪些联系？知识分子的前瞻性与潜在的危险性如何？等等，都是本书应该给予回答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掌握大量的基础资料及相关的研究资料，并且需要对那些资料进行细密的梳理与分类。然后，还需要带着上述的问题意识进行缜密的思考，以求得出近于客观的结论。

大正时期是时代的转型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从大正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及国民心态等方面都可得到印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多种政治思潮的存在即是证明。社会意识又具有反作用，最终成为某一时期精神整合力量的思想即是象征。有时候，这种反作用大得不可忽视。因此，从政治思潮与知识分

子着手，可将大正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梳理清晰，并有利于抓住大正转型期的主要脉络。

大正时期是一个“彷徨”、动荡的时期，与当前日本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与日本当前某些政治思潮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当今的右翼思潮是对“皇室中心主义”思潮及“超国家主义”思潮的继承。因此，研究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

国内方面，在笔者所知的范围内，至今尚未发现以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为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但笔者发现一本以明治时期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即李永炽的《日本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台湾水牛出版社 1970 年）。作者在书中主要探讨了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以及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加藤弘之的早期思想和荒尾精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个案研究，阐明了日本在 19 世纪对欧洲民主的吸收状况，明确了 19 世纪末期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趋向。另外，关于不同个案人物，在国内虽然没有相关的研究专著，但是相关文章还能找到几篇。例如，关于对德富苏峰的研究，有汤重南先生的《从欧化风潮到保存国粹运动》（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作者主要阐明了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作为“反欧化”的先锋向“国家主义”转变的思想轨迹。关于对吉野作造的研究，有俞辛焯的《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近代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李玉的《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与大正民主运动》（《外国问题研究》1986 年第 1 期）、《试论日本的大正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俞先生的论文，以吉野作造对中国“五四”运动的

态度以及民本主义思想基础问题为切入点，对吉野作造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李玉先生的论文，对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容、阶级倾向及其在大正民主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与分析。关于对北一辉的研究，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将北一辉视为“民间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指出了北一辉“天皇观”前后矛盾性及欺骗性，分析了他在对外侵略上比之丰臣秀吉更具野心。盛邦和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主要探讨了“日本亚洲主义”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即由早期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进而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赵哲的《北一辉思想及其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影响初探》（《日本研究》1985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北一辉的社会观，论述了北一辉的政治观、经济改造思想和社会改造论，以及这些改造思想对法西斯运动产生的影响。汤重南与李玉在《太平洋战争新论》一书中也对北一辉及其法西斯主义思想进行了论述。关于对武者小路实笃的研究，刘春英的《“白桦”时代的武者小路实笃》（《外国问题研究》1984年第1期）一文，主要分析了武者小路实笃在1910年至1923年的作品及其思想。刘立善的《论武者小路的“妹妹”》（《日本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以武者小路实笃的五幕剧《他的妹妹》为主，阐述了武者小路的反战思想及人道主义精神。

国外方面，直接研究此题目的著述并不多见。但在金原左门编的《大正德谟克拉西》一书中，主要从知识分子与大正民主运动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知识分子的前瞻性、组织领导作用以及大正知识分子本身性格的转变。滨口晴彦著的《日本的知识人与社会运动》一书，是按历史的发展脉络来探讨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部力作。他从社会运动及其组织团体的角度出发，研究了

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加藤周一、久野收编辑的《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4·知识分子的产生与作用》（筑摩书房1959年）一书，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类型划分，然后在历史的变动中把握每一类型知识分子的特征。全书从“维新变革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写起，一直写到“战争（十五年战争）与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衍生史。坂本多加雄的《知识分子——大正昭和精神史断章》（读卖新闻社1996年），从精神的角度探讨了大正、昭和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涯及活动。在本书所选的个案人物中，除了北一辉外，该书对其他四位知识分子都有所触及。松田道雄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筑摩书房1965年）主要探讨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近代化中的作用，即“西欧派”和“国粹派”之间的论争与近代化的关系。松本三之介的《近代日本知的状况》（中央公论社1974年）一书中，有两部分论及了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小田实的《日本的知识分子》（筑摩书房1985年）一书，根据历史的发展脉络，探讨了“日本的近代化和知识分子的变迁”^①。此外，江口圭一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学生社1976年）和松尾尊允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岩波书店1974年）这两本著作，以大正民主运动为核心，对大正时期进行了总体上的描述。至于思潮，也主要以民本主义思潮为主。

对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文章，根据1975年至2000年的《杂志记事索引》记载，只有5篇文章。

由此观之，在日本真正以政治思潮与大正知识分子为题的研究著作及论文也不多见。这正说明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但是，针对本书所选择的5个个案人物，应该说研究资料并不少见。但由于条件的局限性，有些材料

^① 小田实：《日本的知识分子》，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7—35页。

在国内还难以找到。

对德富苏峰的研究。杉井六郎的《德富苏峰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 1977 年），是以青年时期德富苏峰为核心展开研究的力作。自 1975 年至 2000 年，有关德富苏峰的研究论文共有 59 篇。在此不一一列举。根据所找到的基础资料和研究资料，本书第二章主要分析了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双向性与单向性及思想变异的“双刃剑”问题，指出了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过程及表现，并阐明德富苏峰及其“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及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德富苏峰的思想成为军部法西斯主义及皇室和天皇制官僚集团的法西斯主义的助力。可以看出，德富苏峰是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牺牲品。

对吉野作造的研究，有井出武三郎的《吉野作造及其时代——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政治思想断章》（日本评论社 1988 年）一书。有关的研究论文共有 89 篇。第三章运用掌握的资料，借助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与“环境”的关系理论，分析了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潮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及收到的政治实效。从整体的心理结构来看，吉野作造属于合理推动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类型。他试图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引入日本的政治体系之中。但是，当传统的强大政治文化复活并发挥效能时，吉野作造的政治文化模式则逐渐让位。

对北一辉的研究，有宫本盛太郎的《北一辉研究》（有斐阁 1976 年），G.M. 威尔逊的《北一辉与日本的近代》（劲草书房 1989 年），冈本幸治的《北一辉》（密涅瓦书房 1996 年），长谷川义记的《北一辉》（纪伊国屋书店 1981 年），岩濑昌登的《北一辉与超国家主义》（雄山阁 1974 年）等专著。有关研究论文共有 77 篇。第四章梳理了北一辉思想的发展脉络，并指出了其思想的危险性。并且，运用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分析了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是如何巧妙地迎合了以下级

青年将校军官为首的部分民众的心理，推动日本民间法西斯化进程的。可以认为，北一辉的思想历程，说明日本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欧化”运动中的畸形发展。

对大杉荣的研究，有大泽正道的《大杉荣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相关的研究论文共有 45 篇。大杉荣的主要特点在于对整个时代的“叛逆”。大杉荣“叛逆”性格的形成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过程，恰好验证了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个体生活风格”的形成理论。正是由于他的叛逆性，传统的政治文化才会发动巨大的效能将“无政府主义”思想及运动扼杀。

对武者小路实笃的研究，共有论文 167 篇。由于条件的限制，上述的绝大多数论文在国内都难以找到。武者小路实笃等“白桦派”作家们的思想，代表了大正时期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思想及行动都表现出一定的边缘化倾向，失败是其归宿。

另外，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张分田的《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及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 1991 年）等著作，都给予了笔者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在以往与该专题相关的研究中，中日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虽存在以人物个案为对象展开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但是没有系统研究。即是说，没有对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进行系统研究，在考察人物个案时也没有将其置于整体思潮之中来加以把握。这是中日学界对该专题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

三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结合现代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研究手段，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产生的背景、知识分子的类型、每类知识分子个案代表的思想状况及社会作用进行分析。政治思潮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方向的复杂问题，并且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所以笔者力图从社会运动与社会体制的关系的角度，说明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及社会运动的功能。对人物个案进行研究时，自然会涉及日本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专门史。

研究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涉及到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欧化”、政治思潮、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欧化”的实质问题，知识分子在“欧化”与“反欧化”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所谓的“欧化”，就是非欧美国家以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为样板，致力于把本民族或本国也发展或转化成那样的国家或近似于那样的国家。“欧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充满着现代性因素的生长及其与传统因素的冲撞与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讲，“欧化”具有向现代转型的意义。那么，为什么用“欧化”这一概念，而不用“现代化”的概念呢？从历史发生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即18世纪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的长期结果，革命促进了几个国家进入国际领先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模仿和赶超的进程”^①。也就是说，“现代化”这一概念，原本起源于西欧，它是土生土

^①（德）沃尔夫冈·查普夫著，陈黎、陆宏成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长于欧洲的一个概念。而“欧化”概念则清楚地表明了亚洲，尤其是日本推动社会现代转型的特殊性。因此，可以认为分析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时，选用“欧化”概念比较合适。大正时期政治思潮是在大正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不言而喻，知识分子在这些思潮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效应。即“欧化”是现代化过程，政治思潮是“欧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手段与要求，知识分子是为完成“欧化”过程、为满足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的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

那么，日本“欧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简单说来，“欧化”实际上是日本社会系统在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上，仿效欧美先进国家，增强日本社会的现代性并使其发生转型的历史过程。其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较容易，文化结构的转型则步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结构的转型不只在于技术、制度与运作层面，更主要的是在于精神层面。然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只能通过其自身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纵观日本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并对之解读、消化乃至创新就是新的文化精神的创生过程。一个现代性充沛的社会，应该是吸纳了18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的社会，并且社会系统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结构”转型的结果就成了判断“欧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那么，我们又如何判断文化结构是否发生了转型？第一章提出了三个指标，即承担传播任务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的变化；传播手段、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及传播机构的出现；居于文化结构核心地位的教育体制的转型。前两者属于渐进的量变过程，后者则是量变的积累所带来的质的飞跃。

政治思潮是反映不同阶级及阶层从整体上对建立何种国体、

何种政体及何种社会的思想倾向。根据政治思潮与社会现实^①之间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保守的或反动的、革命的或改良的。如果从政治思潮与新社会构想之间的关系看，可将其分为科学的、合理的、空想的。例如，德富苏峰的“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属于保守类型，当然他是“反欧化”的。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属于反动类型的政治思潮，是“欧化”的畸形发展。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属于合理的改良类型，是推动“欧化”运动正确发展的指导思想。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是带有革命色彩的空想类型的思潮。武者小路实笃的“理想主义”也属于空想类型。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潮才是革命的且科学的，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没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至于大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用一句话概括，即推动与维护了社会整合。他们是凭借社会运动来推动或维护社会整合的。社会整合无非是社会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彼此适应与协调发展，以确保社会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重要手段。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结构时，在分析方法上，我们可以先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求从复杂问题表象的背后找出一般规律性的东西。例如，虽然社会结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立体结构，在对其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将其平面化，这样更容易发现事物变换的规律。

如果把社会结构比做是大的三角形，那么社会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便是三角形内部互相相切并同时与三边相切的三个圆，社会要想保持稳定，必须依靠三者之间的适应。当三者势力均衡且又处于比较适应的状态时，三角形就会存在，社会就稳定、繁荣。反之，当三者之间势力不均衡且彼此处于不适应的状态时，

^① 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比较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研究》，前野书店 1963 年版，“序”，第 6—7 页。

三角形就很难存在，社会就会发生动荡。这种适应性规定着社会的变化。诚然，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结构是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基础，但如果没有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对它进行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社会稳定。拿日本来说，明治社会整合的产物是政治上的君主立宪、经济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文化上的国家主义。大正时期社会整合的产物则是政治上的政党政治、经济上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和文化上的“理想主义”。进而到了昭和初期，社会整合的产物是政治上的天皇法西斯体制、经济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文化上的超国家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及他们发动的社会运动是社会整合的主要推动力量，只不过在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及采取的社会运动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在社会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管知识分子影响或参与的某一社会运动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它都会成为催促或推进社会整合的一种手段。关于社会整合，还可以认为：（1）社会价值观的相对一致性是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2）社会分工会带来社会秩序的重新调整，从而带来新的社会整合。（3）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及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手段。例如，经济发展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知识分子便发起社会运动，并使其组织化。但社会运动给政府（权力机构）带来的震撼程度将视以下情况而论：（1）权力强大到还没有什么社会运动的力量能威胁其存在时，政府即要强制取缔运动以确保社会一时的稳定与繁荣，从而起到维护社会整合的作用，但这只是暂时的情况。（2）权力的强弱程度适中时，会带来社会运动的部分要求或目标的实现。因而，其目标或要求会成为政府重新制定方针所要考虑的因素。然后，政府作内部调整，以求达到一种新的社会平衡。（3）当政府的权力已经衰微到一摧即垮的程度时，那时社会运动即会发动社会革命，由此而完成新的社会整

合。一个整合运动刚刚完成，新一轮的社会整合运动又重新开始。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失衡与整合的过程中发展的。在这一点上，进一步推进“欧化”运动的大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运动是引人注目的。

从上述对某些问题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中也可以发现，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南，结合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成果来阐述问题。但是，就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这一题目而言，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基本上有两种写作风格。其一，是对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进行总体分类，然后以每一类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整体为对象，不以其中的个案人物为代表进行研究及写作的方法。其二，与之相反，以每一类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个案人物为代表类型进行研究及写作的风格。笔者所采取的是后一种写作风格。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大正时期的整体把握，即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及国民心态的角度，探讨大正时期的特征；阐述大正时期“欧化”与“反欧化”思想的交锋，明治知识分子与大正知识分子在交锋过程中的作用；对大正时期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进行类型划分。第一章属于总论。从第二章至第六章，以五类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展开研究，分析他们在大正转型期的社会作用。第二章至第六章属于分论。终章综合分析归纳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与大正时期政治思潮的历史连续性。终章属于总论。可以说，本书采取了总论——分论——总论的结构。

四

根据中日学界对该专题的研究状况，本书首先对大正时期做了总体上的把握，并阐述了“欧化”、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社

会运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但由于材料的局限，有关理论阐述在具体资料的论据补充方面尚有大量工作要做。另外，在分论的各章中，对人物个案的考察与研究方法与以往的研究则多有不同。通过这种考察，一定程度地明确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性。与此同时，本书在阐述中进一步提出或澄清了若干理论问题，其中较大且重要的问题及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的含义及人格结构的理论性认识。知识分子的含义是判明某人是否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这是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只有研究对象清楚了，文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关于知识分子的含义，学者们的见解各不相同。有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这一定义的客观性在于，它指出知识分子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既要有专业，又要有关注社会问题的“良心”。例如，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所强调的即是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两个要素。再如，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也强调指出知识分子应具备的基本要素。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则将知识分子的含义概括得更为具体。现代知识分子不仅应该具备上述两个要素，而且还要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按英克尔斯的观点，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现代人格结构（详见第一章第二节）。

然而，有时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仅就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变化而言，存在着人格转换的单向性与双向性问题。即是说，单向性指人格由独立转变为依附，或人格由依附转变为独立；双向性则指人格的转换经历了由独立——依附——独立，或由依附——独立——依附的过程。本书的第二章，将知识分子的人格由独立转向依附的现象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将对断裂的人格进行整合但以失败告终的现象称为人格

的虚假整合。在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德富苏峰是人格断裂及对人格进行虚假整合的典型。与之相反，吉野作造在一生中，始终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性与同一性。所以，从知识分子人格的角度讲，吉野作造是最理想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第二，思想变异是一把双刃剑。当环境变化与外来思想进入时，“原初思想”就会受到威胁，就会发生变异。以德富苏峰为例，1875年以前，他接受的是汉学修养，后来他受到欧美思想的影响，开始了其思想的变异过程。这一过程往往又是以对“原初思想”的批判为前提的。不言而喻，思想的变异要比生物体的变异复杂得多。思想变异在带来推动社会合理发展因素的同时，也带来了将社会引向歧途的危险因子。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史上，福泽谕吉的思想曾发生过变异，首先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然后再转向主张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德富苏峰的思想变异，也有同样的经历。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福泽谕吉并没有融入到权力中去，即是说他保持了人格的相对独立。而德富苏峰则不然，他融入到权力中去，思想变异的同时亦发生了人格断裂。

第三，对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的认识与评价问题。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整体政治思潮中曾居于主流地位。由于他的思想代表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民本主义”思想能够团结民众。由于“民本主义”巧妙地回避了“国家主权所在”的问题，因而能避免与天皇制及明治宪法的正面冲突，其主张能够得到权力所有者的认可，所以“民本主义”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实效。另外，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及其实践过程，恰好验证了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与“环境”的关系理论。

第四，对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与评价问题。对“纯正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北一辉的评

价。可以说，正因为“纯正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才蒙蔽了多数民众。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中，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对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比较，从而指出其思想的荒谬性。

为了获取民心，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借用了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社会民主”成分。同时，他又将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引进来，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解释国际争端。在革命的手段上，他主张采取“议会斗争”，没有意识到应该发动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打破旧制度。因而，“纯正社会主义”思想充其量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由此观之，正因为北一辉学说的虚假性，后来才顺理成章地由“议会斗争”转化为“武装政变”；由自由竞争直接发展为对外侵略，对外战争，进而最后发展为“超国家主义”。

第五，对大杉荣思想特征的把握。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运动，虽然代表的是下层工人阶级，但就其分裂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讲，该思想及运动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危害。从大杉荣的思想特征而言，其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同心圆的不断向外扩展过程。同心圆的圆心是“自我”，围绕圆心的第一个圆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外围的同心圆是“工团主义”，“工团主义”外围的同心圆是“无政府主义”，最外围的同心圆是“社会的个人主义”。

第六，对“边缘化知识分子理论”的认识问题。萨义德认为，“流亡”是知识分子的最悲惨命运之一，“流亡”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表现形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特别强调两点：“因为流亡而不能适应，或者更中肯地说，不愿适应的知识分子，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乐，因而有一种近乎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

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萨义德看来，只要具备了上述的两个特点，就可以判断知识分子为边缘化知识分子。但是，细细品味一下，这两个特点不仅适合于“流亡者”，还适合于其他知识分子。例如，由于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想要将自己隐居起来的“隐士”或在隐居地创建“理想国”是属于一种类型。由于不满现实而自杀的人则属于另外一种。关于“隐士”及创建“理想国”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他们不能适应社会现实才宁可居于主流之外而不被收编。因此，反映在行动上，或是甘心过着“隐士”的生活，或是创建“理想国”，从而找到自己理想的“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那些自杀者之所以选择自杀，也是由于难以适应社会现实，又不肯被体制化，因此他们认为自杀是“自我解决”的最好方式。所以，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自杀者最理想的“安身立命”方式。

因此，在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中，白桦派文学家中的有岛武郎和武者小路实笃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另外两种代表。有岛武郎以“自杀”为安身立命的方式，武者小路实笃则以创建“理想国”为安身立命的方式。

第七，对传统政治文化及知识分子总体特征的评价。本书终章特别指出的几点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在大正时期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的争斗与较量中，近代日本社会传统政治文化往往会选择能为其服务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传统政治文化势力的根深蒂固及其势力过于强大虽不能将“欧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全部抹杀，但它却成为进一步“欧化”的绊脚石。例如，它可以发挥其效能让文化结构转型的结果发生畸变——让部分知识分子丧失“现代性的心理结构”；限制文化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甚至对教育机构的教育内容也横加干涉。再如，它会使社会结构三角形内部的实际内容发生转换，即由大正时期的结构转换为昭和前期的天皇制法西斯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皇室中心主

义、超国家主义”。另外，它还会选择某种思潮与运动，当然它也会扼杀某种思潮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无政府主义思潮及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及运动）。

通过分析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可以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概括为超前性与滞后性。而且，知识分子的思想又具有前瞻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具有潜在的危险倾向。

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今天，研究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有助于加深对大正时期的认识及对社会转型艰难性的认识。如所周知，日本的大正时期是进一步推进“欧化”过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现代性因素的增长及其与传统因素的矛盾与冲撞。矛盾冲撞的结果，或是社会彻底得到改变，或是“欧化”与“反欧化”相调和，或是“反欧化”势力过于强大将“欧化”势力扼杀。由此观之，日本的明治时期是“欧化”与“反欧化”势力调和（反欧化的传统因素保留很多）的时期，大正时期是“欧化”势力略胜于“反欧化”势力的时期，昭和初期则是“反欧化”的传统势力割断“欧化”历史进程，并发动法西斯战争的时期。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在大正时期的“欧化”与“反欧化”运动中，有的发挥了进步的、积极的作用，有的则起到了反动的、消极的作用。从中可以找出法西斯战争的思想根源，也可以找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思想的战前基础和战后右翼思想的历史根源。同时，从大正时期的成功与失败的交错中，可切身体会到社会现代转型的艰难性。鉴于国内有关研究的薄弱，愿以此为我国的日本史研究添砖加瓦。

第二，有助于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纠正知识分子潜在的危险倾向。鉴于知识分子既有前瞻性，又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我们在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在考察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时，更应该如此。另

外，在面临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必须依靠能合理引导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群，来推动社会结构的三个部分之间相互适应、协调发展，从而避免走弯路。

第三，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东亚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重任。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东亚的经济萧条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尤其在国际关系方面，东亚地区的日本与其他各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似乎已成为惯例，日本的某些政治家或右翼势力每隔一段时期，就要散布一些伤害东亚其他各国民族感情的言论。这无疑打破了原有的东亚地区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那么，为什么日本的政治家会如此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难道真的像有些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那些政治家或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无知而造成的荒唐结果吗？实则不然。可以认为，从意识形态与日本人的深层心理来看，是由于日本战败前盛行的“皇国史观”及“皇室中心主义”的阴魂仍然笼罩日本人的心头所造成的。国内外学者对“皇国史观”已有批判，但罕见对战前的“皇室中心主义”进行批判。战败前，在日本的思想界、舆论界大肆鼓吹“皇室中心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德富苏峰。其思想主张的影响至今犹存，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今天，东亚各国知识分子肩负着彻底批判“皇室中心主义”思想这一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



第一章

大正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 活跃的“温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精辟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是同期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该时期思潮的发生、发展、斗争、融合、消亡又极大地影响了时代的发展进程。研究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实际上，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大正时期的内外环境对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影响，又要具体分析大正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具体作用。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政治思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本章拟在评析大正时期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之前，首先对大正时期的总体特征即大正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进行一般阐述，然后再对整体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进行类型划分。

一、激荡的大正时期

这里所说的“激荡的大正时期”，主要是指以“大正政变”为发端的新时期，在外部环境与内部发展交互作用下，其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乃至社会价值观都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之中。可

以断言，大正时期是一个求变的时期，也是一个人心思变的时期。然而，一切变化的根本条件就在于时代的经济发展。即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上层建筑就会发生变化。当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大起大落为表现形式，就可以将这个时期称为“激荡的时期”。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讲，“激荡”时期来临前夕，社会就已经播下了动荡不安的“种子”。

日本是在国内外形势都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走向大正时期的。概括说来，当时的日本还没有从日俄战后的经济危机（1907—1908年）中摆脱出来。加之外债的问题，日本出现了国际收支严重恶化的局面。日俄战后，明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越发带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以扩充军备为主，严重地妨碍了产业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民主化的呼声高涨，各地的“商工会议所”发起了“反对增税”运动，国民对减税与政党政治寄予了厚望。与此同时，陆军要求增加两个师团，并要求扩大预算。当时的西园寺内阁因反对增设师团而招致垮台，继任的桂太郎内阁在民众“打破阀族、拥护宪政”运动的逼迫下，最终辞职。这就是历史上的“大正政变”^①。

正如“日比谷骚动”所显示的那样，民众与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之间的对抗局势逐渐形成。诸多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其佐证，如1906年东京市民的反对电车涨价运动、1907年足尾铜矿工人罢工、1908年的“赤旗事件”、1910年的“大逆事件”、1912年4月吴海军工厂工人大罢工以及同年6月富山县的小规模“米骚动”^②等等。但在治安警察法（1900年）的严格限制下，

^① 大久保利谦：《体系日本史丛书3·政治史Ⅲ》，山川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389页。

^②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岩波书店1969年版，第6页。

政府以“违法”为由，对此类运动（明治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其中，“大逆事件”最具代表性。在政治思潮上，由于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明治国家主义的地位亦发生了变化。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增强民众的“自我意识”，使其摆脱“天皇臣民”意识的束缚，从而确立独立的人格等问题。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初露端倪，以“天皇机关说”论争所代表的政治思潮发展起来。归纳起来，各种政治思潮关注的核心在于：“个人主义”是否应该受到重视，“天皇”的地位究竟如何，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更能适应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等。

1900年以后，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分割世界、重建世界秩序。与之相应，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已经发展为一个颇具实力的区域霸权国家。1895年占领台湾，1905年战胜强大的俄国，1910年又合并了韩国，日本已发展为帝国主义角逐者中的正式成员。在国际关系紧张局势下，以利益为重的各帝国，或是纷纷寻找、争取新的合作伙伴，或是设法维系老的合作关系^①。例如，曾为交战国的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东亚地区的权益，1907年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约。为了遏制美国在“满洲”的野心，1910年又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协约。与此相对，美国拉拢英、法、德三国组成“四国借款团”对中国实施贷款。日俄战后，日英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两国都怀着不同的目的勉强地维系着同盟关系。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日本与美英集团围绕争夺中国的冲突反而愈演愈烈。

上述的一切足以说明，大正前夕的日本国内外形势已经越来越难以对付了。而且，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一直贯穿整个大正时期。难怪美国史学家曾强调指出：“大正时期（1912—1926年）

^①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542页。

的日本面临着明治宪法带来的、结构内部发展和分化的压力的挑战。到了1920年，它面对着扩大工业化问题、群众参加政治的问题，以及介入国际上日益复杂的事务问题。用政治学家的话说，就是日本面临着迅速现代化的社会内部一体化的挑战。”^①

（一）大正时期的经济

言及大正时期的经济，无论谁都不能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关东大地震对它的影响。乘一战景气，日本的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变，即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这由各产业部门的产值变化直接反映出来。1914年，农业产值占45.1%，水产业产值为5.1%，矿业产值为5.1%，工业产值为44.5%。1918年，工业产值为56.8%，农业产值降为35.1%，水产业产值为3.8%，矿业产值为4.3%^②。同时，在国际信贷方面，日本由长期债务国变为债权国。从国家的综合实力来讲，这时的日本真正迈入了强国的行列。

自从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以后，日本就逐渐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可以说，日本经济的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过程息息相关。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表现为：由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起始，经过产业资本主义阶段，最终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既是生产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末，资本与生产出现集中，产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而在日本，早在产业资本确立之前，日本垄断组织就已出现，此即1882年日本纺

^①（美）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7页。

^②有泽广巳：《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织联合会的成立与 1890 年日本造纸联合会的成立。这是日本最早的卡特尔联合。但卡特尔组织普遍确立和充分发展却是在日俄战后的整个大正时期。我们又可以把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①：

(1) 从日俄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垄断组织确立期。

(2) 从大正九年到昭和初年——垄断组织迅速发展期。自日俄战争时起，在日本工业经济的发展中，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加之一战的景气，更加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以钢铁业为例，钢铁公司的数量由 1913 年的 21 个增加到 1918 年的 208 个。其中中小企业居多。生铁产量 1913 年为 25 万吨、1918 年为 50 万吨、1929 年为 109 万吨。钢材的自给率达到 90%^②。与此同时，造船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都得到了发展并在一战中奠定了基础。在工业整体急剧发展的过程中，生产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就业人数在 500 人以上的大企业的增加，说明了生产集中的速度。据统计，在 1920 年的时候，就业人数达 500 人以上的工厂不足全部工厂数的 1%，却占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量。1924 年，就业人数高达 1000 人以上的 200 家工厂的工人，占就业人数的 30%。

经济的发展及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直接带来了日本产业组织结构与日本阶级结构的变化。其表现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同时并存，资本家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经营组织的规模增大。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相应地要求增加各种各样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管理层职业人员。这样，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分化，导致阶级

^① 汤重南先生在《太平洋战争新论》一书中，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 19 世纪 80 年代垄断组织出现，日俄战后至一战期间的垄断组织迅速扩大，一战后日本垄断财政资本的确立。

^② 参见中村吉治编：《体系日本史丛书 9·社会史 2》，山川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34 页。

结构的变化。在大正时期，新中产阶级（所谓的“白领阶层”）这一新的利益集团产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是新中产阶级赖以存在的良好温床。新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大正时期明显的社会特征之一。

在整个大正时期，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相伴而生。资本多向 500 万元以上的大公司集中；一战后，资本总额的 50% 以上集中在这样的大企业中。1929 年时，资金 1000 万元以上、数量不足 1% 的大公司支配着社会上近 60% 的资金总额。相反，资金不足 10 万元的中小企业却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此外还广泛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个人企业。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从 1907 年到 1929 年，银行的资金储备由 222500 万元增加到 1437200 万元，增长了 6.5 倍^①。1920 年以后，卡特尔网络业已形成，垄断组织的另一形态财阀康采恩（如三井和三菱集团）开始出现。

由此观之，一战的爆发，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天佑良机”，加速了垄断组织的出现，促进了社会阶级的分层。另外，还引起了农村人口大批量地向城市流动。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经济的景气也被继起的经济危机所取代。凭借一战景气而昙花一现的公司纷纷垮台，许多公司走上衰败的道路。例如，大阪的石井木材商于一战时暴富，1922 年宣告商店倒闭。这说明日本的经济带有很强的投机性。不仅如此，在日本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的 1923 年，以东京、神奈川、千叶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发生了 7.9 级的地震。受害最重的是造船和机械部门，京滨（东京与横滨）地区约有 50% 的厂房倒塌或被烧毁。政府虽然发放了巨额资金和增加了公债，但却引起了通货膨胀。大正时期的经济在

^① 参见中村吉治编：《体系日本史丛书 9·社会史 2》，山川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35 页。

起伏跌宕的进程中，迎来了昭和时期：

（二）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方面。大正时期，内阁更换频繁，国民与国家的对抗，以及各种政治思潮的活跃都是经济变动的直接反映。

例如，前文提及的“大正政变”，是在以增加税收及增建两个师团为矛盾的焦点，民众发起第一次护宪运动，迫使桂太郎下台而促成的。继任的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因西门子事件^①的贿赂丑闻引咎辞职。1914年4月16日至1916年9月，大隈重信接任日本首相。他上台伊始，便声称要革除官僚、政党政治的弊病，实行为多数人谋福的“善政”。作为“善政”的具体展开，大隈重信内阁宣布对德开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推行全面侵华政策，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1915年5月9日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了除第五项外的全部条款。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日本经济，肥了垄断资产阶级。然而与之俱来的物价上涨、工人劳动强度增加，实际工资下降等等，却使一般民众深受其害。大隈没有兑现休养民力的、减轻租税的诺言，对战时恐慌无意采取解决对策，致使他再次失掉民心”^②。从根本上来说，他的失败仍在于国内的经济上。此后的寺内正毅内阁（1916年10月9日至1918年9月29日），因1918年7月开始的“米骚动”，招致全国上下发出“打倒专制政治”的呼声，而被迫下台。继任的原敬内阁，则是日本历史上第

^① 海军受贿事件，即德国西门子公司向日本海军高级官员行贿事件。1914年1月，事情败露。日本在野党以此责难内阁，2月10日发展为群众的倒阁运动。3月24日，山本权兵卫内阁总辞职。

^② 杨栋梁：《日本历届首相小传》，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一个“纯粹的政党内阁”。他的施政纲领，包括改善教育、整顿交通机构、充实国防和鼓励产业发展等四点^①。在对外政策上，原敬内阁的重点是确保日本在一战期间的既得利益，残酷镇压了朝鲜人民的“三一”运动。这说明日本的政党有与官僚逐渐合流的趋势。因此，民众对政党内阁越来越不信任，对原敬越来越反感。1921年11月，原敬被暗杀。后任的高桥是清内阁，因党内的纷争于1922年6月辞职。在元老松方正义的推荐下，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被指认担当首相。1923年8月，加藤友三郎病故，由山本权兵卫组阁。1923年12月27日，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在虎门袭击摄政（后来继承皇位的裕仁），山本权兵卫内阁引咎辞职。1924年1月组阁的清浦奎吾，在第二次护宪运动的冲击下，于6月垮台。紧接着，加藤高明组织了“护宪三派”^②内阁。在加藤高明的任期内，颁布了《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1926年1月28日，加藤高明因病去世。

由此观之，在大正短短的15年时间里，日本内阁更迭达10次（自第三次桂太郎内阁至加藤高明内阁）之多。平均一年多就更换一次内阁。这不仅充分说明大正政局的不稳定性，而且，还说明大正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外交是国家职能的一部分，它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其实际内涵是推行统治阶级的方针、政策”^③。国际形势的动荡，国内经济、政治的不稳定状态，使

① 朝尾直弘、鹿野政直等编：《岩波讲座·日本通史 第18卷·近代3》，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2页。

② “护宪三派”，是指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的联合，其党首分别是高桥是清、加藤高明、犬养毅。三派一致认为，应该“根据宪政精神建立政党内阁制度”。

③ 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2页。

得大正时期的外交也变化多端。例如，日本与中国、俄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一战前后，日俄共签署了四次日俄协约。这四次协约，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的。或是两国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是协议确保两国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利权，或是两国商定防止第三国在中国占有支配地位等。由此可见，日本的外交已经将中国看作是保护国或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从思想角度而言，山县有朋所提出的“东洋盟主论”^①是促使日本采取对俄媾和的指导思想。“大陆政策”^②则是具体实施指南。以一战为契机，日本对华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西原借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还出兵西伯利亚^③镇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都是“东洋盟主”思想的具体实践。有人曾指出：“外交思想一般指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家的思想，它具有比一般的政治思想大得多的现实可行性，……在涉及主权、领土之类的民族权益问题上，外交思想并不具有明显的阶级特色，外交思想具有较大的连续性。”^④如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是政府行为。因此，外交思想在国际关系紧张时，就会成为促成“举国一致”的精神力量。但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有合理与非合理之分。虽不能说知识分子就是外交政策及外交思想的指导者，但他们对其具有能动作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合理地推动外交政策的发展，反之亦然。在外交问题上，大正时期是“对外侵略”与“反侵略”思想激烈冲突的

① 米庆余前揭《日本近代外交史》，第146—147页。

② 米庆余：《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的特征》，载于《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227页。

③ 米庆余：《一战期间日本对华外交》，收入《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95页。

④ 陈乐民、周荣耀：《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时期。如吉野作造、大杉荣和武者小路实笃就力主和平、反对侵略；德富苏峰和北一辉或是为政府的侵略行为辩护，或是主张对外侵略。在日本强大的传统政治文化势力的影响下，最终力主“对外侵略”的思想占了上风，并在昭和初期整合了国民精神，使大部分民众盲从了战争。很显然，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则成为政府发动群众的有力工具。

（三）大正时期的文化及国民心态

如前所述，大正时期的经济、政治及外交，伴随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这种变化为现实基础，大正文化得到赖以滋生的土壤。

与明治时期的“国家主义”文化形态有所不同，大正时期的文化以提倡自我、注重个人、完善自我教养的“理想主义”为特色。仅就文化在观念层面的表现而言，大正文化包括“教养”观念的普及与发展；引进的德国理想主义成为哲学界的主流；以“自我”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等。如果从“社会文化系统”（指一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的总和。“系统”强调人们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是整合在一起的，并且互相发生影响）^①的角度来讲，大正时期又是大众文化确立的历史时期。大众文化，是与上述日本大正时期的经济、政治变动相适应的。

例如，在原敬内阁的施政纲领中，有一点是强调改善教育。1918年12月，原敬内阁发布了大学令、高等学校令，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增强了日本教育体制的现代性。另外，文化与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改变了原有单纯

^① 周蔚、许克谦编译：《人类文化启示录——20世纪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成果》，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的传播方式。除了报纸外，电影、摄影、唱片、无线电广播^①等立体性传播媒介的产生，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均等的“享受文化”的机会。在生活方式上，街头出现了“摩登女”与“摩登仔”类的青年男女；西服得到普及；针对工薪阶层的大众餐馆有所普及；针对中产阶级以上的美式“文化住宅”已经出现等等。这一切，与时代的整体状况是相适应的。

但是，大正时期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时期。如前所述，大正时期面临的课题也相当严峻。而且，在经济、政治波动的重压下，出现了“国民心态”的危机。所谓“国民心态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之总和”。^② 它包含两方面：其一是国民性，“即指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构成国民性主要特征的，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③ 也就是说，国民心态中有着民族文化的印痕。其二是社会心理，它在国民性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下形成。一个转型期社会的“国民心态”危机表现在：（1）物欲化倾向。国民自我意识的增强，以“自我本位”来考虑问题的人增多。作为个人的“立身出世”，他们更多地想成为暴发户。这一时期的流行语“成金天下”（靠投机来牟取暴利，短期内能迅速集聚财富而成为暴发户是谓“成金”）所概括的即是这一现实。（2）冷漠化倾向。善于投机的人一夜

① 参考武安隆：《大正至昭和初年日本大众文化的形成与生活方式的演变》，载于《日本研究论集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93页。

② 邵道生著：《转型社会国民心态探析》，载于《社会学》1995年第2期，第64页。

③ 李卓著：《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成金”，这些“成金”者挥金如土。在南博所著的《大正文化》中，有一幅漫画形象地表现了冷漠化的心态倾向。即在昏暗的房间里，有一“成金”者为了寻找他的皮鞋，以点燃纸钞来照明。与之相反，却有许多人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金钱至上的观念带来了社会人情关系的冷漠。(3) 世俗化倾向。大正时期是向大众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型期，大众化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国民心态的世俗化。这个时期色情文学的流行就是世俗化的象征。(4) 躁动化倾向。这是大正后期表现出的一种心态倾向。在“改革”、“解放”等口号的宣传、鼓动下，人们心绪躁动，行动更多地表现为盲动性。这种心态为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滋生准备了温床。

二、“欧化”与“反欧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所谓“欧化”，就是非欧美国家以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为样板，致力于把本民族或本国也发展或转化成那样的国家或近似于那样的国家。“欧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充满着现代性因素的生长及其与传统因素的冲撞与矛盾。同时，也包含着二者之间相互包容，乃至二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东亚各国，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欧化”意识逐渐成为各国知识精英的一种普遍心态。这一状况在中国和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诚然，“欧化”对东亚各国来说，并非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即是说，虽然“欧化”在日本历史的某一阶段具有向现代转型的意义，但是，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欧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或是一种手段，它不具有绝对意义。说不准哪一天亚洲民族或非洲民族的某些先进性方面在得到世界认可的时候，“亚洲化”或“非洲化”的观念或概念便会应运而生。在日本，具有向现代转型意义的大规模“欧化”运动主要发生在

明治维新以后，而明治、大正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是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以下，即试图分析“欧化”与作为日本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文化结构转型的关系如何？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并具体探讨在推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在“欧化”运动中的作用。

（一）“欧化”与文化结构转型

就日本而言，“欧化”实际上是日本社会系统在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上，模仿欧美先进国家、增强日本社会的现代性并使其发生转型的历史过程。其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较容易，文化结构的转型则步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结构的转型不只在于技术、制度与运作层面，更主要的是在于精神层面。然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只能通过其自身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纵观日本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并对之解读、消化乃至创新就是新的文化精神的创生过程。一个现代性充沛的社会，应该是18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被吸纳进来，并在此基础上社会系统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社会。

日本的“欧化”运动，与“开国”密不可分。关于“开国”的意义，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强调指出：“19世纪以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历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不能单纯用狭义的军事侵略来解释的性质，它包含着渗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全部领域的巨大力量。”^① 可以认为，

^① 丸山真男著：《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原序”，第6页。

1858年的《日美通商条约》是日本这个弱小国家被迫“开国”而加入国际社会行列的标志。如何应对欧美列强的挑战，不仅是日本而且是东亚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何以至此？是由于东西方国家的历史差异所造成的。有如所知，“现代化”始于欧美，然后向世界流播，其流播过程伴随“血与火”的冲突与交融。19世纪中期，在西方“炮舰”文明的胁迫下，中日两国为摆脱民族危机，纷纷选择了“欧化”。也就是说，对东亚诸国而言，如果不想灭亡就必须“欧化”。因而，“欧化”并非本意乃不得已而为之。“日本是在巨舰与大炮为前导的西方文明的威胁下，为免遭覆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日本的现代化也以追赶欧美国家为目标。”^①然而，从世界的相互联系性及世界发展渐趋一致的客观规律来看，“欧化”是东亚诸国缩短与欧美先进国家差距的理想途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欧化”又是东亚诸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规律的就是普遍的，就会具有共性。在中日两国，作为较大规模的“欧化”运动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是其表现。同时，在进行“欧化”选择的过程中，后进国家都表现出所谓的“目的意识性”^②——以欧美诸国为样板，有目的地设定国家目标，移入制度和技術。正是在这一意识的支配下，作为日本文化传统特色的实用性^③成了日本知识分子在选择和移入制度、技术时所遵循的原则。而“目的意识性”与实用主义原则实际上赋予了日本知识分子一种灵活多变的性格，并使他们在日本文化转型的过程中

① 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② 丸山真男著：《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③ 参考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出色地发挥了作用。然而，由于东亚诸国的具体国情不同，“欧化”在各国又具有特殊性。就中日两国的文化结构而言，由于日本是“并存型（什么都可以）”，而中国是“非并存型（非什么不可）”^①，所以直接影响到两国的“欧化”进程并使其呈现出特殊性。

“欧化”与文化结构转型的关系如何？可以认为，“欧化”是文化结构转型的目标，文化结构转型的结果则是判断“欧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而，探讨文化结构转型的含义就显得格外重要。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是否在发生转型？即判明文化转型的标准、尺度是什么？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指标：（1）承担传播文化任务的知识分子的人格转变。他们是文化结构中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2）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它是文化转型带来的当然结果。（3）文化机构的转型，主要体现为教育体制的转变。它处于文化转型的核心地位。前两者是文化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量的积累，后者则是文化结构转型的质的飞跃。

首先，看知识分子及传播媒介的转变。在“欧化”的历史过程中，对先进文化具有敏锐捕捉能力的知识分子或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推动社会现代转型的核心力量。但是，他们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也在发生转型，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那么，何谓知识分子？何谓现代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

^① 依田熹家著，卞立强等译：《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该书认为，日本文化的“并存型”是日本经常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则不然，由于存在“中华主义”，一旦落选的事物，很快就会消灭。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在二十世纪社会政治剧烈动荡的风云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集团中，有三种精英——知识分子、工业管理者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常常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早期统治阶级功能的继承者，并且成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创建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代表。”^① 在上述三者中，知识分子的定义最难，他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难判定的。但是，知识分子又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中，只不过他们在不同社会中的作用及社会意义各不相同而已。在西方的学术界，“知识分子”一词有其特定的涵义。余英时先生把它归纳总结为：“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② 这个定义表明判断是否为知识分子的两个必要条件即：一是看他是否活跃于某一专业领域；二是看他是否具有“社会良心”，是否具有关注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热情。这一定义因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所以借用此概念来展开以后的论述，相信或许可以免去争议。

至于现代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备上述两个必要条件之外，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从诞生的前提条件来看，丸山真男提出了“两种解放”作为判断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即“近代知识分子

^① 巴特摩尔著，尤卫军译：《平等还是精英》，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3 页。

^② 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自序”，第 2 页。

的诞生，首先是从身份制度的锚缆中解放出来；再就是从正统世界观的解释和授予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自由的知识分子诞生于这两重意义中。这个说法，不管翻开哪国历史，都基本上可以成立。”^① 但有相对自由、独立的、可以表白自己思想主张的言论机关也是造就现代知识分子的必要外部条件之一。不管其刊物是站在国家政府机关的立场上讲话，还是站在普通大众的立场上发言，具有相对独立和自由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赋予知识分子以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因此，就日本的情况来看，《学制》颁布以后，以福泽谕吉等人组织的最初的自由结社“明六社”及《明六杂志》的重要意义就不言自明了。作为判明日本文化现代转型的指标之一，“明六社”及《明六杂志》的出现标志传播媒介走向多样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报刊杂志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单纯地面对面的传播方式，它标志着传播方式的新起点。此后，各类报刊杂志大量涌现。到了大正时期，无线电广播、留声机、“活动写真”、电影的出现，构成传播媒介多样化的各个侧面。归根结蒂，这都是文化转型带来的当然结果。从知识分子引进兰学、洋学以破坏传统教育体制，创建思想团体及创办报刊杂志以改变传统的传播方式来看，知识分子推动了文化转型并增强了转型的外在特征。以福泽谕吉为例，他是绪方洪庵“适适斋”的门徒，在那里接受了现代意识的洗礼后设立了庆应义塾，为社会公众事业服务。此外，他还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观点并逐渐扩大了影响。1872年《劝学篇》的出版发行量多达十余万册，是其影响的最好证明。而且，《劝学篇》里的思想精华也为《学制》提供了基本精神。与此同时，他在人格上表现出了更多的独立性。

所谓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个人的道德、

^① 丸山真男著：《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第14页。

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总和,人格结构即由这几个因素组成。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态度。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不仅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上表现出充沛的现代性,而且活跃于其中的人必须具有“现代性精神”即现代性人格。美国的心理学家英克尔斯把人的“现代性的精神”归纳为四个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即他是参与型的公民,并有丰富的知识;他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即是头脑开放的人。”^①然而,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初期,别说国民整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向现代人格的转型,就连处于知识占有地位的知识分子的人格转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知识分子人格变化的反复及曲折,便足以说明人的现代化进程的缓慢与文化转型的艰难。

例如,“明六社”的大部分成员虽然和明治政府有种种关系,但“文明开化”与“启蒙运动”是其活动的主要领域,为国家大政方针积极献策是其主要职责。他们把“国家独立”与“自我使命”相认同,在“唤起愚蒙之沉睡,树立天下之模范”^②的实践中实现其自我价值。另外,指导明治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中多数人曾是幕府的官员或在幕府的机构任职(如在开成所或蕃书调所任职),曾对幕府有过一定程度的依附。然而明治时期,他们已经由人格上对幕府的依附转变为在精神上对天皇的依赖。他们有的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指挥国家的建设(如加藤弘之、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井上馨等);有的成为思想界的

^① 英克尔斯和史密斯著:《走向现代》,第13页。转引自(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译者前言”,第15页。

^② 李永炽著:《日本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8页。

代言人（如福泽谕吉），独立于政府之外。另一方面，除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少数知识分子外，他们大多与明治政府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那种纯粹的依附性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大都出身于幕末的下级武士阶层，但其人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便主张“平民主义”，为日本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确立寻找途径。他对社会问题抱有积极的热情，足以证明他具有极强的参与意识。在大江义塾时代，他视野开阔，涉猎的范围甚广，为他的主张提供了思想源泉。按他自己的话说：“依据斯宾塞的进化论、密尔的功利说、科布顿和布莱特等曼彻斯特学派的非干涉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及横井小楠的世界和平思想，构建了我的思想。”^①不言而喻，德富苏峰是一个愿意接受新思想、新经验的知识分子。并且，凭借新思想、新经验批判传统道德，以独立的身份在塾内及言论界发表意见。因而其精神是“现代性”的，其人格是独立的。但是，从明治中后期到大正时期，德富苏峰开始依附政界并为之服务。德富苏峰的行为表现即是其“现代性精神”的丧失及人格的断裂。再如，大正时期的吉野作造，以基督教博爱主义及人道主义精神来观察社会问题，以“民本主义”儒学概念来嫁接西方民主原理与现行政治体制。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以自己的思想言论指导大正民主运动，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与同一性。他以舆论参政与舆论干政的方式关注政体改革，从而引导国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吉野作造通过报刊、杂志及“演说会”向广大民众宣传自己的思想，《新人》、《中央公论》、《东京朝日新闻》等是其依赖的舆论阵地。他创办或直接参与的思想团体有黎明会（1918年2月）、东大新人会（1918年12月5日）及全国学生促进普选同盟（1919年2月11日）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所领导的大正民

^① 德富苏峰著：《苏峰自传》，中央公论社1935年版，第209页。

主运动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继续，又超越了自由民权运动。因为，大正民主运动是推动欧美政体模式在日本真正实践的历史过程，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吉野作造始终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与政界保持着距离。他以“民本”概念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并认为“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可以两立。他的参与意识、对信念的执着、观察问题的敏锐及其独立性，构成了其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因而，可以认为，吉野作造是大正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正是要仰赖这类知识分子。此外，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作家也是具备上述心理特征的典型。就武者小路实笃而言，他深谙罗丹艺术并对其崇拜挚深，他信仰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提出了理想的社会类型“新村”，并亲自实践之。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具有脱离日本实际情况的空想性，因而导致其“新村建设”失败。他虽然具备了英克尔斯所讲的“心理特征”，但他是一个位居体制之外的“边缘化”^①的知识分子类型。大正时期的大部分文学家属于此类知识分子。

由此观之，知识分子的确在思想、行动两方面影响着文化结构并推动其转型；反过来，在发生了现代转型的文化结构下又培育出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即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知识分子↔文化转型”。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效应。传播媒介走向多样化也是文化转型的主要标志。当这两个变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带来文化机构的转型。从而，促成文

^① “边缘化”是指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状况。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的“流亡”、知识分子建立“理想国”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杀是“边缘化”的表现形式。主要参考（美）萨依德著：《知识分子论（节选）》，收入林贤治主编的《读书之旅》，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7页。

化结构发生质变。

其次，看教育体制的转变。如果说日本文化现代转型的初步成果产生于“明六社”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文化转型的萌芽便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其具体表现是“兰学”的传播及兰学塾的出现。

日本最早的兰学塾——芝兰堂^①是打破传统教育体制、导入新型教育体制的最初尝试。它与以前的藩学校、儒学塾、寺子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幕藩体制下最早把西洋文化的先进知识引进日本教育体制的民间教育机构；它也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出反应的时代产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芝兰堂又是日本“欧化”运动的起点。这一机构虽然主观上不具有导入西方教育体制的意图，但客观上却成为当时教育体制的有意义的补充。继起的洋学塾虽然只重军事科学的研究，但客观上却继续破坏着传统教育体制和增强着新型教育体制。当时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洋学塾有象先堂与适适斋^②。这些新型民间教育机构已经全面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也表明民间教育机构之构成开始发生转变。至此，有必要对“转变”与“转型”的关系作一简要说明。“转变”是基础，“转型”则是其带来的结果。“转变”的因子积累到一定数量则会发生转型。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型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1853年的“培里来航事件”使朝野大为震惊。它唤醒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为了寻找摆脱来自外部环境威胁的途径，

^① 王家骅著：《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载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第137页。芝兰堂，是由前野良泽（1723—1803年）与杉田玄白（1733—1817年）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年）于1786年在江户创立的。

^② 象先堂由伊东玄朴创建，适适斋是绪方洪庵于1838年在大阪瓦町开办的。

幕府在教育体制上所作出的努力是设立藩学所（后改为开成所）^①。其主要目的是传授洋学知识、翻译西洋著作及外交文书。从规模、师资阵容及科目的设置看，它是政府主导下的第一个综合性洋学机构，也是“全国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亦堪称为“近代综合学府的雏形，幕末维新时期的人才摇篮”^②。与之遥相呼应，1858年，绪方洪庵的门徒福泽谕吉在中津藩（大分县境内）开设洋学塾。1868年（庆应四年），以“王政复古”为契机搬至芝新钱座，改设为庆应义塾。它是继承兰学传统而以欧美自由结社为典范展开研究的民间教育机构。可以认为开成所与庆应义塾便是以后日本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双轨并行制的端倪。至此可以说，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现代教育体制已初具规模。换句话说，由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体制的转型已经开始。

然而，日本大规模的“欧化”运动以及由政府全力指导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展开的。1872年文部省公布的《学制》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办学方针，即企图按欧美现代教育的模式来构建日本的学校教育。此后，1886年，森有礼主持了学制改革，颁布了《大学令》，进一步推动了教育体制的转型。1918年12月，原敬内阁发布了大学令、高等学校令，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增设了高等学校、农工商医学校、外语学校等

① 藩学所，于安政三年（1856年）建立在江户神田小川町。1862年移至神田一桥门外，改称洋书调所。1863年8月，又改称为开成所。所内教授由一流兰学家担任，至1866年，仅教授就有31人。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等后来的明六社成员大部分在其内。另有一般教员29名。从科目设置看，包括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物产学、器械学、测量学、活字术等。为了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还把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列为教学重点。

② 武安隆著前揭：《文化的抉择与发展》，第275页。

29所^①高校，并承认私立大学。至此，居于文化结构核心地位的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型任务基本完成。

综上所述，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型是在民间与政府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后来，由《学制》与原敬内阁的教育改革加以整合。然而，这些变化的思想根源则在于敏感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认知与兴趣。他们以“欧化”为目标，以“欧化”运动为手段，从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及公立、私立大学的创建等方面推动了教育机构的现代转型。

（二）“欧化”与明治知识分子

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大正时期的“欧化”运动是承接明治时期而来的。就明治时期而言，从整体上可将“欧化”运动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明治初年至明治十年，是介绍西洋思想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阶段；明治二十年代是对“欧化”的反思阶段；明治三十年代是社会主义初传日本及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阶段。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能量主要发挥在上述三个阶段。以下，以明治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治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其在“欧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具体分析明治知识分子的类型及特点。

如所周知，1873年（明治六年）由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树、森有礼等人组成了“明六社”，出版了《明六杂志》，开启了启蒙思想时代。他们主要引进了英法系统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德国的君主立宪主义。全面批

^① 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4页。

判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意识形态。^① 但是，大量引进西方思想必然造成多样化的欧洲思想与日本传统思想的矛盾与并存，即丸山真男所说的“精神的杂居性”^②。同时，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讲，有的思想并不具有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内在合理因素。因而，明治初期，对西洋思想的引进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流于表层的特点。也就是说，尽管许多思想有在当时引进的必要性，但不可否认其中大半是受西方社会风潮影响而引进的。因而，带有明显的盲目效仿的色彩。这是自由民权运动归于失败的精神要因，也是明治二十年代对“欧化”进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明治二十年代给思想界、言论界带来新思维的有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三宅雪岭和陆羯南的国家主义。正是国家主义在明治时期整合了纷繁复杂的思想界，并成为明治宪法体制的思想根基。领导明治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知识分子有内村鉴三、中江兆民、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等。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把“社会主义”的概念移植到日本本土，但因其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偏颇与不成熟，因而在政府的镇压下，他们领导的社会运动遭到失败是必然的。

明治二十年代，由于明治初期对欧美表层文化的吸收和引进而缺乏对欧美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的吸纳（其代表事例为“鹿鸣馆外交”），以德富苏峰为首的思想家开始对“欧化”风潮进行批判和反思。1886年，德富苏峰出版了《将来之日本》一书。德富苏峰从社会内在精神的层面，企图谋求“欧化”的主张。1887年1月，他设立民友社。2月，创刊《国民之友》杂志，面向青年展开广泛宣传。主张从国民的内在精神上，实行彻底的“欧化”，即他提出的“纯粹的泰西主义”。

① 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 丸山真男著：《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14页。

与德富苏峰对“欧化”的评价不同，陆羯南直接站在“欧化主义政策”的对立面，提倡“国粹保存与国民主义”。陆羯南是这一时期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吸收西洋文化会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危险有以下两点：“1. 丧失日本民族的个性。2. 资本主义经济的采用将导致军民抗争和劳资对立，破坏了国民内部的统一，无力对抗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①但针对“欧化”运动，他并不否定欧化本身。相反地，他认为“欧化”对于维护固有文化的持续发展是相当必要的。他在《日清欧化主义》一文中指出：“像现在的世纪，正处于西力东渐之日，东洋各国采用西洋文化来发展固有文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大势所趋。为了保住固有文化必须如此。”^②也就是说，陆羯南提倡“欧化”的基本前提是“只要不违背国民性”^③。他拒绝福泽谕吉的彻底的欧化主张及由鹿鸣馆外交所象征的官制欧化主义运动。他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发展，“欧化”不可避免，因而想通过“国家主义”把“欧化”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原本遵奉“平民主义”并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界、言论界引人注目的德富苏峰，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向国家主义、权力主义、帝国主义的转向。对于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德富苏峰的思想转向是倒退了。但是，他的转向是与当时日本居于主流地位的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思潮及德国式的君主立宪体制相适应的。

由此观之，自启蒙运动始，中经自由民权运动，再到官制的鹿鸣馆“欧化”运动，上述知识分子的种种思想主张，是在探索

① 武安隆著前揭：《文化的抉择和发展》，第354页。

② 转引自官本盛太郎编：《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坐标》，东京有斐阁1987年版，第71页。

③ 同上。

日本社会应何去何从、重新思索“日本民族欧化到何种程度将仍保留其民族的特色”的重大课题时，所作出的回答与应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欧化与传统”、“制度与精神”、“国权与民权”、“民主与专制”等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只有不是把“欧化与传统”极端对立起来，而是对其进行相互采择与融合的知识分子及其主张，与社会才是最为适应的。而且，他们的思想才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不管他的思想主张是超前的，还是滞后的。

在“制度与精神”层面，知识分子围绕“欧化与传统”的冲突也非常激烈。两次“德育论争”与“明治民法论争”^①，就是其最好体现。就明治民法论争而言，其争论的核心在于维护封建家族制度。争论的结果是，有关家族制度的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做了一些适应潮流的规定，“如继承明治维新以来‘文明开化’的成果，废除蓄妾制，给妇女以离婚的权利等等”^②。然而，一切思想界的波动也好，论争也好，最后都会在一个终极价值线上达成妥协。只不过是那些纷繁复杂的思想，在不断围绕着这一终极价值线上下波动而已。这与经济学上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原理相仿佛。前文曾提及，明治知识分子为把自己对日本的使命感与世界形势相结合而努力。他们的终极理念就是“富国强兵”。因此，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宫廷制度的构建以英国为样板；法制上以德国为样板；近代军队主要参照德、英两国；工业文明主要模仿英、德、美。但是，没有外交自主权也达不到“富国强兵”。因而，“修改不平等条约”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问题，自明治政府成立以来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但“西洋各国对日本政府说：你们想修改条约，就应该将日本变为

① 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第193、203页。

② 李卓著：《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同西洋类似的文明开化国家”^①。所以，有了1873年的允许基督教信仰自由；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1890年帝国议会的开设及《教育敕语》的颁发。最终把形式上的法制国家移植到日本社会中来。不言而喻，明治政府与明治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曾倾注大量心血。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由官制的“鹿鸣馆”外交到民间的“条约励行运动”，最终在1911年获得“修改不平等条约”成功。从而，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确立。这标志着明治知识分子使命的完成，也为明治时期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归纳起来，按思想来源可以把明治知识分子划分为以下几类^②：（1）福泽谕吉、森有礼、中村正直等，是接受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是庆应派和东大派的学者。（2）西村茂树、加藤弘之、伊藤博文，是接受德、奥国权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推动明治宪法体制确立的直接动力。（3）板垣退助、植木枝盛、中江兆民，是接受法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作为“欧化”的结果，他们把“自由”、“民权”的欧洲思想引入日本。（4）德富苏峰、内村鉴三、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片山潜，是接受美国基督教博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与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关系密切。（5）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是三宅雪岭、陆羯南。

在推进“欧化”的进程中，明治知识分子都企图在自己活动的领域中塑造日本社会的性格，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的共同

^① 京极纯一著：《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洋化》，载于中国日本关系史学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合编《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260页。

^② 参考大久保利谦、儿玉幸多、箭内健次、井上光贞编：《史料による日本の歩み・近代編》，东京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第168页。

特点：

其一，大部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格上的依附性很强。如加藤弘之、伊藤博文、森有礼等。他们是明治国家目标设定的强有力的指导者。

其二，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其终极理念是“富国强兵”、“自主外交”。

其三，妥协性与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德育论争”与“民法论争”的最终结果上。也就是说，不管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独立程度如何、依附程度如何，他们的思想主张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当权者和普通民众的认可，是其思想主张能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动力的关键所在。另外，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核心地位的思想与当时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适应度，也规制着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发挥。明治二三十年代，德国国家主义与儒家思想融合后，构成明治宪法体制的思想基础。它之所以能够整合明治国家，不仅仅是由于德国与日本具有相似的风土人情，还在于这种经过融合后的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是互为适应的。

（三）“欧化”与大正知识分子

人的思想、价值观念 and 态度决定了人的行为，反过来，行为又改变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态度。因而，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历史时期，推进“欧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行为表现亦会极其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把知识分子划分为若干种不同类型。以下，以大正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以大正的时代氛围为背景，来探讨大正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所投身的运动类型及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的去世，宣告一个时期的终结。夏目漱石在他的小说《心》中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时人对此抱有的感慨。他写道：“明治天皇驾崩了。那时，我觉得明治的精神

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① 这表达了人们对明治时期的结束所抱有的悲痛心情。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明治国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一种轻松感。这种轻松感来自于“富国强兵”目标的完成、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及有资格步伍于世界强国行列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完成。这种轻松感为大正知识分子充分消化明治时期“欧化”运动所留下的养料赢得了时间。

然而，大正时期也并不真正轻松。在大正时期，出现了前述的“国民心态”危机，但作为更深层次的“欧化”运动即大正民主运动才是大正时期的真实开端。在国际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大正知识分子进一步推进“欧化”运动并成为核心力量。伴随大正时期知识分子社会分工的明确化，知识阶层开始出现。尤其是1918年原敬内阁的教育改革而带来的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再次显示了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知识分子凭借各种报刊杂志进行宣传，在言论界切实地发挥着舆论监督、舆论参政的作用。至于他们的社会能量，则更多地通过组织、领导各种社会运动释放出来。他们频繁地活跃于社会，因而给人以“社会青年”的形象。

以“大正德谟克拉西”成为大正时期的流行语为标志，大正民主运动成为大正“欧化”运动第一阶段的主流。从整体来看，大正“欧化”运动包括大正民主运动、大正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无政府主义运动及马克思主义运动）、超国家主义运动、理想主义运动等等。反“欧化”运动，则是指潜在的“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运动。仅就大正民主运动而言，它与明治初年的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和战后民主运动都有所不同。“明治初年的

^① 《现代文学大系 14·夏目漱石集（二）》，筑摩书房 1964 年版，第 299 页。

民主运动可以说是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且在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和权力相关的官学者的相互提携下推进的”；“二战后的民主运动是在具有绝对权力的占领军与民众两相呼应的情況下开始的”；与上述二者不同，“大正民主运动的特点就在于它回避了与主权相关的天皇制问题，因而避免了有关天皇制争论的问题。它具有以民众的倾向为基础、助长其倾向并把它反映给当时政治的自下而上的性格”^①。也就是说，民众参政问题是大正民主运动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立宪主义”、“民本主义”等宪政思想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以1918年的“米骚动”为界限，大正民主运动逐渐为“改造”、“解放”口号下的社会运动所取代。后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近社会主义运动，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转而鼓吹超国家主义。

然而，活跃在上述运动中的大正知识分子，大都出生于明治时期。如吉野作造，1878年1月29日出生于宫城县。北一辉，1883年4月15日出生于新潟县。大杉荣，1885年1月17日出生于香川县。武者小路实笃，1885年5月12日出生于东京。他们都超越了明治时期的国家理性，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与大正时期相伴而行并塑造着大正时期。他们的活动以各自的思想为先导，以其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为各自的行动特色。概括地说是：吉野作造提倡“民本主义”、北一辉鼓吹“超国家主义”、大杉荣主张“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理想主义”。这五位思想家以自己的思想与信念为依据投身于社会运动中，从而增强了大正时期社会运动的多样性，同时也完成了他们自身的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此外，还有一位思想家值得一提，那就是与权力最为接近的德富苏峰。大正时期，他鼓吹“皇室中心主义”，完成了其思

^① 官川透、中村雄二郎、古田光编：《近代日本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63年版，第99页。

想由平民主义向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的转变过程。之所以提及德富苏峰，是因为昭和时期天皇制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实际是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与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拼合的产物。二者的主要区别仅在于：德富苏峰是体制内发挥作用的思想家、言论家，而北一辉则位居体制外鼓吹国家改造以反对现行体制。自然，二者之命运亦不相同。德富苏峰受到威权主义的保护，以至于如若国民对他有不敬之言，便被判为“国民不敬罪”^①。他被政府军部的中枢权力机构利用为向民众教化、使国民盲从战争的有力工具。北一辉则是位居体制之外、企图发动政变来达到改造国家目的的危险分子，因而被处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战期间“一切为了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在上述两位思想家那里都可以找到思想根源。

如前文所述，大正知识分子的“欧化”运动是以各种社会运动为其表现形式的。因此，大正知识分子的特色之一便是大正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的紧密结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但与社会结构、体制、权力相关，而且如果不是集团性的运动，就不能被称为社会运动。大正知识分子成功地完成了“大学与社会的联合”^②，增强了社会运动强调的集团性。若从社会运动和组织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作用发挥得是否充分，要看他们的思想是否被组织化了，还要看是否通过组织化把民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动了广泛的社会运动。为了扩大思想的影响，大正知识分子们所采取的另一手段是创办各种组织。那是“在思想追求

① 和田守、竹山护夫、荣译幸二：《近代日本的思想（2）》，有斐阁1979年版，第71页。一般说来，只有当国民发表对天皇不敬的言论时才被判为“国民不敬罪”。其代表性的例证是1891年1月9日的“内村鉴三不敬事件”。

② 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第58页。

现实化，并向运动转化的场合而成立的组织。因此，其组织可以说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思想”^①。大学普及会、大学研究会、黎明会、早大民人同盟等团体的成立，就是有力的证明。并且，黎明会等组织还把学生这一特殊的团体团结过来。因此，在思想—组织—运动的一系列的环节中，大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团体的重要性并完成了其与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作用。这就是说，能够完成思想—组织—运动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才能称得上真正地发挥了应有的社会作用。在这一点上，与明治知识分子、昭和知识分子相比，大正知识分子的社会性任务完成得最好。同时，大正知识分子的类型划分也可以以他们影响与参与的社会运动的类型为标准。

从社会运动类型的角度来看，社会运动按其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②：

其一，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变革体制本身，即进行社会革命。其主要手段是以革命夺取政权，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正末期，在“改革”、“解放”等呼声的感召下，大众开始接近社会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民本主义所回避的权力根源问题来推进社会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前文提到的山川均。当然还有河上肇、片山潜等人。在反体制的社会运动中，无政府主义也是反体制运动的重要倾向之一。不过，它否定集团统一行动，不主张以革命暴力夺权。因而，它没有起到政党的职能，只处于一种思想团体的状态。大杉荣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然而，并非一切反体制的社会运动都以全面变革体制为其目标，主

^① 滨口晴彦著：《日本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时潮社1980年版，第24页。

^② 参考似田贝香门、福冈安则等著：《日本的社会学10·社会运动》，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42—51页。

张对体制的某一部分进行变革的反体制、反权力的社会运动也属于这一类型。大正初年的民主运动及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特色就在于其反体制性。到了昭和初期，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则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不过，反体制运动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依靠工农联盟或者工人、市民与知识分子的结盟，这样才能带来权力的更替。

其二，体制内的社会运动。其主要目标在于改良。这种运动一般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种是在体制内部，即统治阶层中的当权者注意到体制的矛盾与破绽时，依靠其智囊团而推进的改良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运动就是其代表。大正时期，德富苏峰以“皇室中心主义”向国民展开的教化运动是又一典型。第二种是在被统治阶层内部。由于工业化，经济得到发展，可是下层人民愈益感到不安，加之受到文化生活差异的强烈刺激，他们以多种方式发泄不满和提出要求。如果其要求得不到解决，也会影响正常的统治秩序。如日俄战后，为了“一方面建设能够承担帝国主义国家重任的町村，另一方面对抗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变化，维持以国家主义和家族道德为中心的地方秩序”^①，政府利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农业家、僧侣、教员等，推进了农村和地方的改良运动。结果是以“国家的生活秩序来代替传统的生活秩序”^②，诞生了青年会、在乡军人会、报德会和产业组合等维护地方秩序的所谓“国家修养团体”^③。1917年工人因劳资纠纷加剧而在友爱会的领导下发起的“加薪运动”，也是发生在被统治阶层内部的社会运动的代表类型。其结果是，“加薪运动”带来了“1917

① 今井清一著：《日本近代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同上。

年3月日本制钢所宝兰工厂工人提高工资二成的胜利”^①。

其三，体制外的社会运动。它不具有直接的体制—反体制运动那样的阶级利害关系。因其目的多种多样，所以目标易分裂，运动本身易分解，且成员们易分散。其特征是，游离的性质轻易地被体制内的社会运动与反体制的社会运动所利用。学生运动是其典型。

就大正时期而言，居于社会运动主流的当然是上述的反体制运动。领导这些运动的知识分子自然可以被称为反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所抱有的使命感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变革国家的体制。因而有吉野作造的“民本论”，山川均的社会主义等主张。然而，这些主张之所以出现在大正时期，是因为以下两点是其依赖的基础。即：（1）大正时期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并出现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2）自日俄战争以来，民众的觉悟有所提高，“自我”意识增强。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众们追求的是“资本主义人类”^②的形成，即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因此，正如大正民本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大正时期把民众推上了历史舞台。“可是，在政治上提倡民本主义的大正民主运动的根源在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从尊重人类的精神出发，根据具体情况，不时地把神、专制君主、特权贵族、资本家及专制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科学主义、战争等作为侵害人类的敌人并与之斗争。”^③这种源于西欧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为政治思想上的民本主义提供根源，

① 今井清一著：《日本近代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7页。

② 官川透等编：《近代日本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63年版，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02页。

而且也为大正时期的文学与哲学提供了相同的思想基础。尤其是1910年创刊《白桦》杂志的“白桦派”作家们，鲜明地代表了大正时期人道主义的特质。武者小路实笃在这一领域中发挥着大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作用。1918年他的“新村”建设是其人道主义的最好体现。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大正知识分子发动的社会运动，成为大正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之一。同时，大正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塑造了自己的人格。因为思想是指挥行动的，行动是思想的外在表现。首先，“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的增长是赋予其人格走向独立的内在精神因素。其次，明治末期引入的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基督教的博爱主义及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给他们以很大影响。当这些多样的思想成为他们的信仰时，便转化为强大的力量，推动他们走向多样的社会运动。再次，他们更重视刊物与组织。他们更多地靠刊物来宣传自己的思想，靠组织来推进社会运动。第四，大正知识分子在充分吸收明治末期传入的“新康德主义”（德国）与实用主义（美国）的思想后，把“理想主义”作为自己观察问题的思想基础。按大井正的说法，“理想主义”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技术主义。如果新康德主义是逻辑上的技术主义的话，那么实用主义就是心理的技术主义。”^① 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大正知识分子在职能上与前一时期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大多成了“技师”、“解说员”。井上哲次郎的《国民道德论》最早地表露了这种“解释”技术的倾向。此后，大正时期的青年们“十有八九想成为有钱人”^②。为了迎合他们这种“立身出世”的理

① 宫川透等编：《近代日本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63年版，第163页。

② 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筑摩书房1978年版，第73页。

想，作为提供技术解释的“出世术”、“处世术”的著作不断问世。其共同点是“精神主义+技术”，不受强制性道德规范的限制。二是“自我主义（主观主义）”^①，认为大正人道主义即是“自我主义”的合理发展。三是“文化主义。新康德主义与实用主义所倡导的‘理想’与‘价值’，不具备实体而且也不必具备实体。追求‘理想’与‘价值’的本身就是理想与价值的最好体现。……在此，无论处于多么非文化状态，只要追求，追求本身就是伟大崇高的文化。”^②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及武者小路实笃就是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其运动的。

大正知识分子的另一特色，即在与民众相接触的手段上，与明治初期的知识分子相比，已经不是主要通过私塾或国家机关来完成，而是更多地依赖大学和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来完成启发民众的任务。如自1918年起，日本的出版业急剧膨胀。据内务省1922年5月调查的有关《最近出版物的倾向与取缔状况》记载，每月出版四次以上的报纸与每月出版三次以下的杂志的增加状况如下：报纸为1915年600种，1917年666种，1918年798种，1920年840种，1922年908种；杂志为1915年1040种，1918年1442种，1919年1751种，1920年1862种，1922年2236种；（主要论及思想及劳动问题的）单行本为1917年21种，1918年49种，1919年190种，1920年220种。^③这些是文化转型带来的结果，反过来它又是文化转型的标记。

① 官川透等编：《近代日本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63年版，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264页。

③ 金原左门编：《大正德谟克拉西》，第55页。

三、大正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的类型

如所周知，大正时期是一个求变的时期，也是一个人心思变的时期。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政治思潮竞相迸发，并与“欧化”与“反欧化”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多种政治思潮的并存，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同时，各种思潮与政府势力之间的较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较量，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与政治。本书拟从整体上对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进行梳理、分析以及分类，并据此对知识分子进行类别划分。从而，通过对每类知识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个案的研究，透视整个大正时期及社会。纵观大正时期，可以将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分为以下六大类。

（一）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思潮

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是明治二十年代出现的反对政府“欧化”政策的一股新思潮，由国粹主义、日本主义等思潮逐渐演变而来。其先驱者是西村茂树，他在《日本道德论》一书中，提倡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①。然后，由政教社^②的成员们加以扩大宣传。该团体批判政府的全盘“欧化”政策，斥责政府用《保安条例》对内实行镇压，主张基于本国立场考虑内外政策。就提倡发挥国民的优良品格而言，这种主张是进步的“民族

① 叶渭渠：《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② 政教社，明治中期以后的国粹主义文化团体。1888年由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发起成立。机关刊物为同年创刊的《日本人》，1907年改名为《日本及日本人》。1923年三宅雪岭退出，另办《我观》。此后，政教社与《日本及日本人》虽存在，但其思想传统已为右翼国家主义所取代。

主义”^①。与国粹保存运动相呼应，1889年政府颁布了帝国宪法，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明确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国体”，将“忠君爱国、举国一致尊奉为国民的道德主旨”。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带来了思想家的思想转向，德富苏峰即是代表，促使“国家意识”高涨。1897年，高山樗牛与井上哲次郎等人创建“大日本协会”，机关刊物为《日本主义》，大肆鼓吹“日本主义”。其主要思想包括崇拜祖国，以光明为宗旨，尚武^②等。因此，可以说，始于国粹保存主义，中经帝国宪法、教育敕语和日本主义，最后发展为“国家至上主义”。大正时期的国家主义及皇室中心主义思潮，是继承明治时期“国家至上主义”而来的思潮。可以说，它是站在与大正民主运动对立的层面上展开的。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与权力最为接近，自明治二十年代即非常活跃的思想家、评论家德富苏峰。此外，还有阿部充家。在大正时期，作为对“国家主义”思想的补充，德富苏峰还鼓吹“皇室中心主义”，完成了其思想由平民主义向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的转变过程。德富苏峰也由代表“平民”的利益，转而成为天皇势力、藩阀官僚势力的代言人。昭和时期，天皇制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实际是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与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拼合的产物。它是将民族引向歧途的精神力量。因此，此类知识分子以反动性为显在特征。德富苏峰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属于“体制内对外扩张型知识分子”。

（二）民本主义思潮

民本主义思潮，是大正德谟克拉西（指1912—1925年的民

① 叶渭渠前揭书：《日本文明》，第301页。

② 日本近代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5页。

主运动和民主思潮，始于第一次护宪运动，止于第二次护宪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它是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潮，在整个运动中发挥指导作用。它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映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等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民本主义”一词，在明治末期开始为人所使用。大正初期，茅原华山、井上哲次郎、上杉慎吉和大山郁夫等人^①，将其作为专门性的政治用语，并力图予以带有一种隐义解释。1912年5月27日，茅原华山在《万朝报》上发表《民本主义的解释》一文，认为“民本主义”是与“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人政治”等对立的政治思想。他还认为，“民本主义以民为主体，以理与军（理念与军队）为客体。军为民而设，非民服务于军”^②。他主张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来实现民本主义。可以说，茅原华山是首倡民本主义，并以先行者的姿态活跃于政治舞台的。

由于茅原华山提出的“民本主义”主张涉及到日本战前政治体制最敏感的部分，因此引起了思想界的争论。1913年，井上哲次郎在《东亚之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国民思想的矛盾》一文，针对民本主义是否危害宪法及君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就有“民为邦本，固本宁邦”之说。他将增进民众的福利、以人民为本的政治精神称作“民本主义”，民本主义可以调和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井上哲次郎在君权与民主的对峙中，将民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对策或调和矛盾的手段。

与此相反，上杉慎吉是站在主权论和国家主义的立场来论及

^① 参见拙文：《大正民本主义辨析》，载于《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第14页。

^② 古川哲史、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讲座8·近代的思想3》，雄山阁1976年版，第288页。

民本主义的。他在1915年5月发表的论文《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中，认为“君主道德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民本主义，日本历代天皇都注重民本主义。既然君主之道在于“民本”，所以不必将国家组织的形式以民主形式固定下来。上杉慎吉对民本主义的解释含糊不清，竭力将民本主义与天皇主权说相融通。

大山郁夫则在反对寺内正毅内阁所标榜的“举国一致”论时提倡民本主义。他认为，“真正的举国一致，是从国民利害的迫切意识中产生的，其意识又是通过普及国民的参政权以及使之承担管理国家的共同责任之后才得以形成的”^①。其民本主义论的核心内容包括批判寺内正毅内阁的非立宪政策；提倡扩大民众的参政权；主张实现议会政治。

虽然有上述众多民本主义论，但是，赋予民本主义以体现时代精神解释，并对“民本主义”系统地进行理论阐述的人，却是吉野作造。1916年1月，他发表了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将其政治理想概括为“民本主义”。他曾指出：“我主张近代政治的理想，在于保证最高最理想政治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因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重视民众的意向，所以我赋予其以民本主义称谓。”^② 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很快便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他凭借思想—组织—运动，掀起民众运动的高潮，在与政府势力斗争的实践中，使民本主义思想的大部分欲求得以实现。而且，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要求为二战后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战前基础。就“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及作用而言，它引导国家政治的良性发展，并证明在战前日本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吉野作造

^① 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Ⅰ》，法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

^② 三谷太一郎：《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第208页。

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是“反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三）超国家主义思潮

“超国家主义思潮”是在一战后，日本面临着殖民地人民（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反日浪潮、国内危机（1918年的“米骚动”及经济危机）以及整个世界进入了频繁的危机、冲突、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而出现的右翼思潮。它是日本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及各种势力在“改造”、“解放”的时代风潮中，纷纷做出反应与抉择，寻找对策与出路的时代情境下产生的。

日本的“超国家主义”，主要继承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宣扬天皇权威、力主对外侵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又不仅限于此。“超国家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喊出对国家进行“改造与革新”的口号，因此许多团体都是“革新”右翼团体。而且，这些新的“革新”右翼团体有“明确的主张与纲领”，某种程度上“注重组织与活动的群众性”^①。

1919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创建的“犹存社”右翼团体，是日本最早的“革新”右翼团体。1920年1月，北一辉从上海回到日本，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成为该社的领导人。“犹存社”的纲领主要有：“建设革命的日本；团结改造势力；解放亚洲”等^②。这个纲领已经将“国内改造”与“国际主张”连为一体。此后，形形色色的“革新”右翼团体纷纷成立。从大的系统来说，有经纶学盟系（以上杉慎吉为核心，主张

^①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②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增补版，未来社1996年版，第34页。

以“天皇主义”为指导，“彻底实现天皇政治”，实现“一君万民型社会主义”；自治学会系（鼓吹“农本主义”，维护天皇制和农村父家长制）；国本社系（“以法西斯主义官僚平沼骐一郎为中心，以军阀、官僚、财阀代表及少壮将校和在乡军人为骨干，极力推行国粹主义运动，企图从精神上改造国家”）^①；军部系（包括一夕会、樱会、天剑党、王师会）。然而，在上述一切法西斯团体中，只有北一辉提出了最完备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并成为“超国家主义思潮”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他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他的“改造法案大纲”被视为法西斯主义圣经。他将“君民一体”、“家族国家化”、“国家的天皇”、“国民的天皇”等观念融合起来，企图达到改造近代日本天皇制，确立极权主义统治^②的国家。他的思想与前述的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在推动日本向法西斯主义道路迈进的历史过程中，成为国民精神的整合力量。并且，这种右翼思潮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国民思想。对此，我们应该彻底地加以批判。

（四）无政府主义思潮

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一种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主要代表有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该思潮宣称一切权力是“屠杀人类智慧与心灵”的罪恶，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社会的最高理想在于无秩序与无政府的结合。列宁批判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

①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① 明治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初传日本；明治末期，明治社会主义运动便遭受挫折。伴随社会主义思想的流入，“革命的工团主义”也为一些日本的思想家所接受。日本明治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幸德秋水，在1905年2月至7月坐牢期间接触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以后，他由社会主义者转向无政府主义者。他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反对堺利彦的“议会政策”。二者的对立意味着此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幸德秋水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实现一个不为武力、权力所强制之万人自由之社会”^②。因1910年的“大逆事件”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明治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严冬时代”。大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大杉荣。1912年9月，由大杉荣和荒畑寒村等人创刊的《近代思想》，打破了因“大逆事件”带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尴尬局面，也为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鲜空气。一战期间，《新社会》杂志刊载了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文章及评论，大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山川均、片山潜、河上肇等人都为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做过很大贡献。一战后，在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然而，以大杉荣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开始向龟户工人区转移，真正地走上与工人结合的道路。但是，大杉荣攻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充分地伸展自我，主张彻底贯彻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从而，分裂了社会主

①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收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289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义运动，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性与战斗力。1923年9月，大杉荣死于白色恐怖。此后，激进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逐渐消失了。这种思潮分散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使工会组织处于分裂状态，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其负面影响值得批判。

(五) 理想主义思潮

所谓“理想主义思潮”是以“理想”为课题与目标、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思想倾向。“理想”一词是明治十年以来的“译语”，“理想主义”则是大正时期的产物。其理念超越现实，未必能实现。在谈及大正时期的各种政治思潮时，“白桦派”作家们所提倡的“理想主义”思潮也不可忽视。这一思潮不仅打破了明治末期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沉闷局面，而且发起了以现代人生哲学为内容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运动。武者小路实笃是白桦派的领袖，他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类知识分子主张宣扬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思想，力图以此来改良社会与人生。他们注意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阶级分化，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审视社会，并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主要的代表除了武者小路实笃外，还有有岛武郎等人。他们所宣扬的是“超阶级的人类爱”，并以此想要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在寻找新社会问题上，武者小路实笃发起了“新村建设”运动，并在日本与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新村建设”运动，从寻找理想社会模式及安身立命之地的角度讲，比有岛武郎的“自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具有排他性与非现实性的特点，其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六) 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

前文曾提及，明治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初传日本。后来，逐渐

形成为一股与政府势力抗衡的政治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片山潜等人。1910年的“大逆事件”招致政府的残酷镇压，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严冬时代”。进入大正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又一度活跃，并在具体实践中逐渐分为两派。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整个世界开始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战后，在思想界言论界出现了对社会问题关注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杂志《社会问题研究》。2月，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在大阪成立。随后，《我等》、《改造》、《社会主义研究》、《解放》^①等相继创刊。这些杂志主要以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适应这种世界潮流的进步思想。他在大正中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及中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却是在昭和初期。即是在说，他投身于社会运动是在昭和初年。因此，从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及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来看，本书不以片山潜及河上肇为知识分子的人物个案代表来加以分析。那么，或许有人会问，你将最能说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过程的、最集中精力移植马克思主义的山川均做何处理？确实如此，无论从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及知识分子的关系而言，还是从知识分子与日本国内情况结合的紧密程度来讲，山川均都是不可回避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但是，有关山川均的基础资料与研究资料在国内很难得到。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囿于材料的局限性，可以将山川均留待以后有关资料齐全的时候，再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另外，从大正时期

^① 小山弘健、岸本英太郎：《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青木书店1959年版，第200页。

各种政治思潮的力量对比、引导时代发展的力度来讲，暂时将其略去，并不会影响文章的整体性。而且，也不会影响本书想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本书的重点，是对上述前五种政治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人物（德富苏峰、吉野作造、北一辉、大杉荣和武者小路实笃）进行研究。以求探明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在大正时期的地位及社会作用。同时，通过个案研究来反窥整个大正时期，以求对其进行准确的分析与评价。

小 结

综上所述，在动荡的国际形势的包围下，大正时期的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外交及文化上，较之上个时期更为不安。甚至还出现了国民心态的危机。与之相应，在探索国家的具体发展方向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便应运而生。如前文所述，按实质内容，可将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分为六大类型。按各种政治思潮及其运动与当时的政治体制的关系，可将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反体制与体制外三种类型。就各种思潮及其知识分子与社会现代转型的关系而言，可将知识分子分为“欧化”与“反欧化”两大类。“欧化”与“反欧化”的矛盾冲突，真正体现了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现代化的特殊性。

19世纪中叶，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向欧美诸国“看齐”，在国内掀起“欧化”运动，使得“欧化”成为日本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当然，“欧化”必然触及日本社会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上的模仿较为容易，文化结构上的模仿则相对困难。如果从文化结构转型的萌芽期即18世纪晚期算起，日本文化结构的现代转型用了长达百余年的时间，终于在大正时期初步完成。在这一转型的过程

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最能动、最活跃的地位。他们是调整与修正居于文化结构核心地位的教育体制的主体力量。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知识分子眼界的拓宽以及参与社会运动，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即由江户时期对幕府的依附性格转变为明治时期精神上对天皇的依赖，继之转变为大正时期的基于“个人主义”、“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的人格。而且，在大正时期，日本的知识分子以相对独立的人格为前提，根据自己的信仰与理念宣传思想，创办组织，推进社会运动，从而使社会结构在动态的过程中保持了暂时的稳定与平衡。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大正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既有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奠定基础的合理成分，也有把日本引入法西斯轨道的危险因素。这是我们研究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思想史时要特别予以注意的。



第二章

“国家主义及皇室中心主义思潮”与德富苏峰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是判明文化转型的指标之一。知识分子人格变化的错综反复则是文化转型步履维艰的一个佐证。在明治初年曾接受欧美自由思想的德富苏峰，到了明治中后期，其思想主张从“平民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他还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言论界的记者变为政客，与松方正义内阁、大隈重信内阁和桂太郎内阁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人格变化这一角度看，可以认为德富苏峰的这一转变是其人格的断裂。进入大正时期以后，社会价值观进一步多元化，敏感的德富苏峰也感受到了这一变化。但由于其社会观和道德观的局限，他把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视为大正时期国民整体的“意识危机”。因而，德富苏峰开始以貌似超然的态度与寺内正毅内阁保持距离，并企图以“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与“国家认同”的理念来整合日本的意识形态和追求“世界第一等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进行了自我人格的虚假整合。纵观大正时期以后德富苏峰的思想与行动，他一直在为皇室及军部势力效力，为推动天皇法西斯体制的形成贡献力量。

本章主要探讨德富苏峰“皇室中心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及行动，以说明大正时期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及作用。以

下以思想、人格、行动互为联系三条主线来展开论题。为了清楚地把握其思想变化的轨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德富苏峰在明治时期的思想与活动。

一、德富苏峰的人生历程

德富苏峰的生活历经明治、大正与昭和前期三个时期，并在三个时期始终处于言论界的核心地位。但是，每一时期，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都以发生很大的转变为特点。例如，明治前期，他主张全面“欧化”，提倡“纯粹泰西主义”，行动上远离权力，欲以“平民主义”确立日本的近代市民社会秩序。明治中后期，他转向“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向权力靠近，推动国家向战争的轨道迈进。他的思想转变不仅是其人格断裂的真实写照，也是其思想的变异。大正时期，他与政界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试图以“皇室中心主义”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求达到“举国一致”，以“国家认同”理念来追求日本极欲获得的国际地位。德富苏峰还试图以“皇室中心主义”与“国家认同”理念整合其断裂的人格，结果以失败告终。至昭和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富苏峰的言论主张便完全为日本的法西斯战争服务了。因此，可以说德富苏峰断裂的人格至死也没有得到弥合。如果从思想与行动变化的统一性的角度考察，德富苏峰的人生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阅读儒典、接受汉学

德富苏峰，1863年（文久三年）1月出生于肥后国上益城郡益城町字杉堂村（今熊本市秋津町）的开明豪农家庭。幼时从其母学习唐诗、《大学》、《论语》等。1870年，入元田永孚的元田塾，接触到儒学的基本经典。1871年，元田永孚作为明治天皇

的侍讲赴东京后，德富苏峰转入兼坂塾。在那里，他接受斯巴达式的严格教育训练，深受兼坂塾的“自治”生活态度与“平民化”^①生活方式的熏陶。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四书五经、《左传》、《史记》、《国史略》、《日本外史》、《唐宋八家文》、《资治通鉴》等书籍，培养了深厚的汉学功底。德富苏峰以儒学为手段鼓吹战争的思想根基，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二）力主“欧化”、重建社会

自1875年入熊本洋学校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是德富苏峰接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思想以及斯迈尔斯的自助论思想的时期。其行动表现为大力宣传“平民主义”思想，力图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1875年入熊本洋学校，受小崎弘道与美国退役炮兵大尉简斯的影响，他初次接触到西方的学问与基督教。1876年入同志社英学校（同志社大学的前身），在新岛襄的门下就读。1877年受《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福地源一郎的影响，立志当一名记者。与此同时，他熟读了福泽谕吉的《劝学篇》。1880年5月，从同志社英学校退学。6月，来到东京。10月，回熊本。之后，以相爱社成员的身份参加自由民权运动^②。他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为之服务，则始于1882年开设大江义塾。他企图以私塾为教育机构来传授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知识，以求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1884年，他发表《论明治二十三年以后政治家的资格》，受到田口卯吉的赞扬。1885年发表的《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一文，引起舆论界对他的注意。1886年出版的《将来之日本》，表明他试

① 参考花立三郎著：《德富苏峰与大江义塾》，ペリかん社1982年版，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9—20页。

图以“自由主义”、“平民主义”以及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来建立近代市民社会秩序。1887年1月，他创立民友社，2月创刊《国民之友》，自任社长及总编。这是他的记者梦得以实现的标志。同年4月，他发表了《新日本之青年》。后来于1916年发表的《大正的青年与帝国的前途》就是在上述《将来之日本》与《新日本之青年》的基础上写成的。1890年2月，他创刊《国民新闻》，主张“自由”、“和平”、“进步”，从而逐步确立了在中央舆论界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他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是“纯粹泰西主义”，他所主张的“平民社会”是其近代市民社会秩序构想的具体内容。

（三）思想转变、人格断裂

从1894年到1929年，是德富苏峰的思想由“平民主义”转向“帝国主义”、人格亦发生了断裂并试图进行虚假整合的历史时期。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2月，德富苏峰发表了《征讨清国的真实意义》与《大日本膨胀论》，显示其思想开始转变。1896年游历欧洲。1897年8月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始向“力的福音”^① 归依。1901年桂太郎内阁成立，德富苏峰与桂太郎约定做桂内阁的外援。1910年接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委托，担任《京城日报》总监。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乃木希典大将殉死，德富苏峰著文《心事分明》对其加以赞扬。与此同时，德富苏峰计划撰写《明治天皇御宇史》，后来的《近世日本国民史》是其具体实践。同年12月，第三次桂内阁成立，护宪运动席卷全国。1913年1月，桂首相欲组建新党，苏峰受命起草立宪同志会成立宣言。并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水到渠

^① “力的福音”即认为力是竞争获胜的重要手段，因此把它视为自己的信仰。

成》、《勇往论》及《新局面》等文，鼓吹桂内阁的合理性。2月，由于政府强迫第三次议会休会，愤怒的民众包围了国会大厦，并袭击和烧毁了“桂的御用新闻”国民新闻社。桂太郎被迫辞职，并于10月去世。12月德富苏峰出版了《时务一家言》，开始疏远政界以弥补其断裂的人格。他指出：“所谓‘一家言’，是指与政党无关、与团体阶级亦无关，只是一名记者的意见而已。”^① 1918年爆发全国性的“米骚动”，寺内正毅内阁被追究责任。德富苏峰以此为契机，辞去《京城日报》总监的职务，并断绝了与寺内正毅的关系，再次试图弥补其断裂的人格。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正值《国民新闻》第1万号出版发行，作为纪念，德富苏峰设立了财团法人国民教育奖励会。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国民新闻社、民友社出版部及印刷品被烧毁。这一年也是德富苏峰的花甲之年，于是建成青山会馆以为纪念。德富苏峰在谈及修建会馆的目的时指出：“建造会馆，使之成为事实上的平民大学及社会教育的本部。并以此为据点，把我平生信奉的思想主张向一般民众普及。”^② 1926年，国民新闻社新社落成，经营权委任给出资者根津嘉一郎。1929年，由于德富苏峰与根津嘉一郎的不和，德富苏峰退出国民新闻社。此后，他便与政府和军部步调一致地为日本国家主义的急剧膨胀进行舆论宣传。这一时期，德富苏峰将其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具体内容置换为在“国家主义”及“帝国主义”指导下的“武备社会”。其思想倒退了，其人格断裂了。其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的手段是：与政界保持距离；言论上标榜独立；以所谓的“爱国心”、“皇室中心主义”及“国家认同”来追求国家的发展及整合其断裂的人格。然而，德富苏峰的人格整合是虚假的，以失败告终。这一时期，他

① 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281页。

② 德富苏峰著：《苏峰自传》，中央公论社1935年版，第477页。

所发挥的社会作用，表现为他是政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

（四）鼓吹战争、效忠皇室

从1929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是德富苏峰为法西斯战争服务的时期。1929年1月退出国民新闻社的德富苏峰，于3月接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邀请入社。年底，他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与东京日日新闻社设立的东亚调查会的顾问。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1933年3月，他出版发行了《公爵山县有朋公传》。1935年7月，出版《苏峰自传》。1938年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把日本的对外侵略美化为是“皇道”的具体实践过程。1939年2月，出版《昭和国民读本》，以此教化民众，使其盲从战争。发行3个月，销售量超过50万本。1940年2月，出版发行《满洲建国读本》。9月，与头山满和松井石根联合向近卫文麿首相提出“即时缔结三国同盟建议书”。1941年10月，发行《皇道日本之大道》。12月，日本发布对英美宣战之布告。同时，他在东京各报社联合主办的国民大会上，以“兴亚的警钟”为题，做了演讲。1942年5月，大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9月，发行《兴亚大义》。12月，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该组织是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大政翼赞体制”在思想统制上的主要组成部分。1943年4月，被授予文化勋章。1944年2月，出版《必胜国民读本》。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德富苏峰不得不离开每日新闻社，辞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职务。12月，他被指控为甲级战犯。在战争期间，德富苏峰是文化统制管理的急先锋。德富苏峰在昭和初期的思想言论及行动再次证明了其对断裂人格整合的虚假性。

1946年2月，德富苏峰被认定为战争的指导者而开除公职。

1948年7月，出版《败战学校·国史的悲哀》。1952年4月，他完成《近世日本国民史》第100卷。9月，出版《胜利者的悲哀》与《读书九十年》。1957年德富苏峰在热海邸宅逝世，终年94岁，结束了其思想多变的一生。

二、青年时代德富苏峰探求的近代市民社会秩序与独立人格的确立

青年期德富苏峰的思想是在对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治初期，“明六社”成员发起了日本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之相呼应，在“文明开化”政策的指导下，明治政府大力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但是，政府的“欧化”政策带来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激烈冲撞，其运动表现出流于表层的特点（1883年开始的鹿鸣馆外交即是例证）。到了明治二十年代，在对明治初年的“欧化”政策进行反思的具体实践中，青年德富苏峰的“纯粹泰西主义”思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他根据自己对时代的判断，以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为己任，欲以“纯粹泰西主义”全面推进“欧化”运动。他的“纯粹泰西主义”与明治初期的“贵族欧化主义”不同，是以“平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最终，他提出了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理想模型——“平民社会”。与德富苏峰思想上的“纯粹泰西主义”和“平民主义”相对应，他行动上远离权力的，他的人格则表现为独立性。

青年期德富苏峰的思想也是围绕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而逐步形成的，其思想形成深受斯宾塞、曼彻斯特学派及斯迈尔斯的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下，青年德富苏峰在明治二十年代提出了“平民主义”思想。他的“平民主义”思想涉及的范围甚广。可以说，它是贯穿其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思想基

点。它渗透到社会道德、人的品行、经济发展、国民的教育及生活、政治结构等有关国家发展取向的诸多方面。下面从经济、精神、教育以及道德层面来阐述青年德富苏峰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主张与平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时分析其独立人格的确立过程。

（一）经济交往中的“随意结合”

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思想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如他在兼坂塾时就受到“自治”与“平民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将其思想系统化则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大江义塾时代。在那里，他首先接触到曼彻斯特学派^①的自由主义经济学。

明治初期的“欧化”政策带来了日本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上的调整，同时也引发了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争辩。针对这种情况，德富苏峰企图把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观念吸收进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从而创建新的社会秩序。1882年德富苏峰赴东京见到了好友马场辰猪，从他那里得到了《科布顿传》，开始了解曼彻斯特学派，并很快地吸收了该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思想。科布顿（Richard Cobden）为维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和平扩张贸易，尽力促使英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缔结商约。德富苏峰对曼彻斯特学派主要思想的吸收是以寻找建立文明社会秩序的途径为目的的。在大江义塾期间，他于1883年发表的《自由贸易及基督教》一文中提出了“随意结合”观念。在德富苏峰看来，“随意

^① 19世纪上半期英国部分产业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以科布顿（1804—1865年）与布莱特（1811—1889年）为代表，以曼彻斯特商会为中心组成“反谷物法同盟”，主张自由贸易，废除谷物法和保护关税等，以满足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

结合”应是经济交往行为的精神准则。在那里，德富苏峰是在否定“强迫结合”的社会秩序组建原理的前提下，从经济学的角度为社会秩序的重构寻找途径并为国家利益考虑的。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他首先把构成国家的国民个人的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随意结合”概念，最初只是个人与个人的接触原则。例如，甲方的产品由甲方定价，乙方如果需要该产品且认为其价格合理，就会实现交换从而完成一次所谓的“随意结合”。不过，“随意结合”背后所暗含的理念则是“自由”、“互利互惠”。受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主义的启示，德富苏峰确信，处于自由竞争下的经济交往行为可以调整自我与他人的利益关系，并使之共存。因而，他的“随意结合”，最初表现为经济交往上的“自爱主义”信念，其本质在于“利己、不损人”^①。然而，经济交往行为的特色在于“利己”，并与“利他”相对立。德富苏峰是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对立而力求“利己”而“不损人”呢？他指出：“宜把‘损得’二者作为行为的标准。”他寄希望于经济交往行为主体间妥善处理彼此的“损得”，并使“自我与他人利益”相调和。也就是说，甲方与乙方在进行“随意结合”时，甲方欲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扩大到尽可能大的程度，而乙方也想尽办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扩大自己的利益。因而双方宜在“损得”上做出让步，在“利己利他”的结合下，完成双方的接触。于是，德富苏峰设想出“等价交换”的原则，并对其理由叙述如下：“如无购买者，何以卖？如欲卖东西，必须卖者高兴才卖。如欲卖高价，必须买者喜欢才买。故，经济世界唯自爱而已。然为爱己则必须爱他。造化之手段愈出愈妙。”^② 不过，

① 参考和田守：《年轻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与平民主义的特质》，收入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 523 页。

② 同上。

对于“等价交换”的“等价”尺度问题，他并没有谈及。因此可以认为，德富苏峰的“等价交换”原则是在调节双方“损得”利益下的“虚拟的等价交换”^①。接着，德富苏峰又把“随意结合”概念推广应用到“人类的结合”即“社会秩序”的组建方式上。这就不仅包含着经济上的等价交换原则了，还包括了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的国际协调理念。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德富苏峰的“随意结合”观念，虽来源于曼彻斯特学派，但又对它做了发展。其主要内涵似应包括以下几点：个人与个人因经济利益接触时应遵循的原则；人类互相接触时应遵循的原则；接触的前提是平衡“利我利他”及双方的“损得”；相互接触的尺度及“等价交换”；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协调理念。尽管德富苏峰在谈及平衡经济交往中双方的“损得”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交换尺度，但他把“随意结合”作为重建社会秩序原理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从这一概念可以推导出“自由”、“协调”、“平等”、“和平”等观念。即是说，无论是个人接触还是社会性的人类接触，都必须以双方同意的“意志自由”为前提。而“意志自由”，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平时所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发挥“意志自由”的最好体现。

（二）“意志自由”、“人的自然属性”及“良心”

为了构建以“随意结合”为秩序原理的理想社会，高扬精神与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德富苏峰主张唤出人类心灵深处的“意志自由”、“人的自然属性”及“良心”，来构建“随意结合”之社会秩序的精神层面。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德富苏峰于1884年撰写的《自由、道德及儒教主义》一文中。在文中，他把日本的国

^① 由于只是提出“等价交换”的概念，没有指出明确而合理的“等价尺度”与等价的具体原则规定，因而笔者将其视为“虚拟的等价交换”。

家前途寄托于来自西欧的“自由精神”之上，并指出与西欧的自由精神相适应，必须抛弃传统的道德观。他认为道德与自由精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日本道德状况的危机，其缘由不在于背叛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在于日本国民“自信力的丧失”，即“丧失了用自己的责任限制自己行为的内在标准”^①。德富苏峰分析当时社会道德真实状况时说：“从极端束缚的世界产生出极端快乐的世界，因而人心放逸，流于文弱，失严谨之美德，无所信，无所守，无所畏，无所尊，众难塞胸，群疑满腹，以至于人生的重要问题止于一疑一笑之间。”^②那么，怎样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及克服社会道德的失范现象呢？德富苏峰进而主张“意志的自由”，主张充分发挥“人的自然属性”及“良心”，来推动“失范社会”向西方“自由世界”的道德过渡。他指出：“如果没有意识到意志的自由，就难以发挥职分的观念。如果没有意志的自由，人就如同没有灵魂的物体。”^③在这里，德富苏峰把“意志自由”视如人类的灵魂，视为人类完成分内职务的心理依据。然而，“意志自由”必须“依据人类的自然属性来行使”。其中，“人类的自然属性”又包括“爱自己的生命”、“趋利避害”、“发挥自己的诸能力”之特性等。此外，人类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特性，即德富苏峰所谓的“良心”。他把“良心”说成是“人的自然属性”中应首先具备的道德资质。“良心”是指“自觉辨别善恶的能力”。于是，德富苏峰把自由地发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确立理想道德的捷径和最佳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大江义塾时期的德富苏峰对社会问题是抱有浓厚兴趣的，并身体力行地为社

① 参考坂本多加雄著：《市场、道德、秩序》，创文社1991年版，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60—61页。

③ 同上书，第58页。

会病理寻找治愈的良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德富苏峰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从上述论说观之，德富苏峰基于人类“自爱”与“爱他”精神提出“等价交换”的原则欲以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又以“意志自由”等观念来构建“随意结合”之社会的精神层面，实际表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化激荡的历史时期，在面对社会“失范”现象时所做出的个人思考与探求。关于社会的失范现象，德富苏峰在后来的《新日本之青年》开篇部分便谈到：“明治的世界是批评的世界，是怀疑的世界，是无信仰的世界。”^① 其中他特别强调其“无信仰状态”。他认为：“由专制世界向自由世界过渡”时，“无信仰，无主义，失范”是必经的历史过程。所以，他不仅关注当时的社会状态，还力图以自己所信奉的“道”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正如余英时在其名著《士与中国文化》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礼坏乐崩’之余，人间性格的‘道’是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其最主要的任务。但是‘道’的存在并不能通过具体的、客观的形势来掌握。它既不化身为人格性的上帝，也不表现于教会式的组织；而只有靠以‘道’自任的个人——知识分子——来彰显。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② 这里提到的“道”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都必须遵守的通则，即今天所讲的“合法性”。德富苏峰也在探求近代日本应遵循的“道”即其合法性，不过，他是在批判明治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复兴儒学以求道的同时，把自己的“求道”方向转向了西方的“自由世界”。在德富苏峰看来，西方的自由之道要远远优越于儒

① 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筑摩书房 1978 年版，第 6 页。

② 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2 页。

教之道。因而，在“自治”、“自由”、“平等”思想的支配下，德富苏峰在行动上亦表现出独立性。不难看出，青年期的德富苏峰是站在远离权力的位置，提倡自己思想主张的。按英克尔斯的“现代性精神”的心理特征分析，当时的德富苏峰具有强烈关注社会问题的热情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他努力为社会寻找合理秩序的途径并接受西方的新思想使之完善，从而批驳了传统的道德规范；他开设大江义塾，广收学员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也说明他对自己个人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这些都证明青年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是独立的。

（三）“知德一途之教育”

在继续为“随意结合”寻找合理途径的过程中，德富苏峰又把目光转向了教育。他提出所谓“知德一途之教育”，企图以此来培养国民的“意志自由”。理亦如此，一个时代的自由精神应是自由的社会秩序确立的必要条件，而自由精神——“意志自由”的培养又要仰赖于教育。于是，德富苏峰针对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社会的“知、德”状况，提出了“知德一途之教育”的主张。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一文中，围绕“维新前后的学问及教育的变迁”谈到了当时的“知、德”状况，即“儒教主义”的“专制命令式”的教育已被打破，正转而提倡“自由询问式”的教育。然而，在德富苏峰看来，当时日本社会的知德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或应该说是处于混乱状态、无信仰状态、无所适从状态。这种混乱状态外在表现即是当时出现的三种教育思潮，即“复古主义”、“偏知主义”和“折衷主义”的竞相并发。要克服这种混乱状态，德富苏峰首先要批判这三股思潮。

首先，在批判“复古主义”思潮时，他尖锐地指出：“复古主义乃复燃封建时代之教育。欲以论语、孟子……古事记、令义

解取代表考利^①、斯宾塞之撰述，以吾邦之历史、汉学取代物理、植物、博物、化学、经济、心理、哲学等学问。以忠信孝悌之教义取代职分、自由、自动、独立、劳作、刚毅等箴言。即除与今日世界适应之教育，以封建教育代之，复燃旧古时代。”^②德富苏峰对此加以驳斥道：“今日提倡复古，岂非痴人说梦？欲变明治人民而为封建臣民，可行乎？吾闻三尺小儿可变为六尺男儿，然未闻六尺男儿变回三尺小儿。”^③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复古主义”是违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其次，德富苏峰对“偏知主义”展开了批判。“偏知主义”主张“教育的目的是教给人们获取生活的途径与方法”，认为“道德教育的本身并不重要”。德富苏峰对这种“偏知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明治政府表面上的“欧化”政策的。由于“偏知主义”带有明显的“欧洲科学万能主义”的色彩，它只在知识上接受欧洲文化，而在精神上却难于接受欧洲文化的本质性内涵，因而常常会陷入怀疑论。因而，由于“偏知主义”的“知识状况”只限于教给人们如何致富的知识，使人容易变为“金钱的奴隶”。“偏知”是与德川时代的“偏德”相对峙的，往往忽视道德建设，从而带来了“淫逸放荡、骄奢、懒惰”以及“品行不端，行为不检，道德不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德富苏峰说：“今天的大趋势在于生活的、偏知的、怀疑的”倾向，“由于是生活的才变得偏知的，因偏知的才变得怀疑的；复因怀疑的又变得偏知的，偏知的又变得生活的。……学问及教育的目的在于完善人性。欲使人性完善只有依靠知德一途之教育。欲依靠知德一途之教育，则必

① 麦考利（1800—1859年），英国历史学家与政治家。

②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32页。

③ 同上书，第34页。

须基于真理之探索”^①。即是说，摆在德富苏峰面前的教育课题是：要对国民进行知育教育但又不是单纯地为了满足物质欲望；要对国民进行德育教育，应强调人类是“自由”的主体，但自由又是在“自律”下的“自己支配自己”。所谓“自律”是存在于“人的自然属性”中的道德因素。它的内涵是“职分”与“内在的义务情感”，诸如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忠烈爱国的民族主义等与生俱来的本性。不言而喻，德富苏峰欲在“自律”的前提下培养国民的自由精神，进而在自由精神的前提下培养明治青年的人格。他的教育思想来源于斯宾塞的启示。例如，德富苏峰在《新日本之青年》中，引用斯宾塞的观点：“完善自我是教育的本质。”只有个体得到完善之后，社会才有望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得到完善。德富苏峰将福泽谕吉视为“偏知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福泽谕吉所主倡的“实学”^②视为“偏知”的学问，将福泽谕吉的“争利就是争理”^③视为“拜金主义”的思想根源，并大声疾呼“天保老人”宜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福泽谕吉也重视国民的道德。例如，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中，提倡“道德论”，即他的“智德”观。他认为“智”是指“智慧”，

①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 50 页。

② 实际上，福泽谕吉“实学”的基点是“有形的物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它不但重视学问与生活的结合或学问的实用性，而且，还带来了“学问”本质结构由“伦理学向物理学的转型”。参考铃木正、卞崇道等著：《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6—97 页。

③ “争利就是争理”的思想，实际是从伦理学上将追求利益合法化。从 1868 年起，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开始收取学费。因此，他多次被非难为“拜金主义”。参考鹿野政直著，卞崇道译：《福泽谕吉》，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89—91 页。

“德”是指“道德”即人们“内心的准则”。兼备二者的人才能堪称“完人”。福泽谕吉还认为“智慧”的作用大，“道德”是依靠“智慧”不断发挥其作用的。^①即是说，福泽谕吉也是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由此观之，德富苏峰对福泽谕吉的批判或许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尽管如此，德富苏峰敢于向权威挑战及独立不羁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德富苏峰以“天保老人”与“明治青年”相对立，把“贵族的欧化主义”与“平民的欧化主义”对立起来，用“东洋”与“西洋”相对立的思维范式观察社会问题和发表见解，引起了当时社会人士的普遍关注，并抓住了当时社会青年的心理，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来。

再次，他还批判“折衷主义”。“在知育上，以泰西之新主义发挥之，在德育上，以东洋之旧主义鼓舞之，望天下青年变为知德完美且有教养的人民。此乃折衷主义大意。”^②这一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文部省的官员。德富苏峰认为：折衷主义实际与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思想内涵相同。它一方面“以泰西的新主义奖励教育”，另一方面，“靠东洋之旧主义鼓舞道德”。德富苏峰认为这种“折衷主义”之本质是维护专制制度，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他指出：“东洋的学问是秩序的学问。从学术上看，无半文价值。若从政治上及道德上看，它是秩序的教典。”而“秩序的就是专制的，复因专制的而变得更为秩序的”，而且“专制式的命令与自由询问式的教育是难以两立的”。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德富苏峰提倡“纯粹泰西主义”，引入“泰西自由主义的道义法”以完成青年的“知德一途之教育”。从而，在“自营自活”的生活态度中培育“明治青年”的文明精

^① 参考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81页。

^②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37页。

神，使其完成由“叩头型”向“力作型”^①人格的转变。实际上，这是德富苏峰所追求的“平民社会”的理想人格。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期的德富苏峰不但以独立自主的态度观察社会问题，积极寻找合理的社会秩序构建模式，而且他还号召明治青年远离权力阶级靠自主不羁的劳动来获取生活的自由。

归纳起来，德富苏峰所提倡的“知德一途之教育”的内涵似应包括以下几点：知育与德育同时进行；在知育与德育上模仿欧美，欲求在日本确立“泰西文明”；以泰西社会的道义法为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亦即德富苏峰提出只有“泰西的道义法”才能与知识的进步存在。“泰西的道义法”又是指斯迈尔斯的“自助论与品行论”，“勤奋”、“忍耐”及“节约”是其主要“德目”。不难看出，青年期德富苏峰论及的“知育”更多地是指与物质、生活及技术层面相关的知识教育，而“德育”则是指纯精神的个人内在修养上的道德教育。其实，二者的关系应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如何，要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人的现代化则要看人是否掌握了现代性的生存手段与是否具备了现代性的道德修养。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知德一途之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四）“平民社会”、“平民道德”及“平民主义”

《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一文发表并引起舆论界的注意后，德富苏峰举家赴东京，开始了真正的记者生涯。与此同时，他更为系统、更为理性地思考问题与观察社会并完成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体系。有如所知，提倡“平民主义”是青年期德富苏峰思想完成的主要标志，其思想来源有基督教的成分，有

^① 所谓“叩头型”即指在封建社会的道德指导下，对主君叩头称臣型；“力作型”即指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独立不羁自由人”型。

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也有来自斯宾塞^①的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启示。如果说，经济交往中的“随意结合”、精神上的“自由的意志”等是德富苏峰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初步理论的话，那么“纯粹泰西主义”、“平民主义”则是对该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平民社会”是其提倡的理想的近代市民社会秩序。所谓的“平民社会”应该是以“市民”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一理想社会中，“市民”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经济交往中的利益“损得”能得到相应调整；道德上以“泰西主义的道义法”为准则，可协调好“自由”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既重视物质文明又重视精神文明；外交上可实现国际协调及和平主义。德富苏峰的这种理想社会模式集中体现在《将来之日本》一书中。他在该书的“总论”中，从维持一国的生活手段入手，提出“生产机构”与“武备（军事）机构”这样一对概念。他指出：“生产机构形成内部供给，军事机构防御外部干扰。孔子所谓足食足兵是也”^②，两者不可或缺。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也是两种手段并存。不过，古代社会的两种手段是同一的，兵农合一 是其最好体现。但伴随社会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加强，实行了兵农分离的政策，“生

^① 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曾任《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1853年接受其叔父遗赠后，辞去公职，专事著述。倡导综合哲学、普遍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认为人类社会与国家是生物有机体，是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不可知论，宣称：“理性只能认识相对的东西，事物的本质是无法认识的，任何想要突破人类主观经验界限的企图都是形而上学。”在美学上，既拥护康德的纯粹美学说与席勒的游戏说，又提倡有用即美。在教育上，主张重视自然科学并大量建立教授自然科学诸如数学、机械学及经济学与现代语文的普通中学。主要著作有《综合科学》、《社会静态学》、《社会学研究》（严复摘译名为《群学肄言》）、《自传》等。

^② 隅谷三喜男编：《日本的名著40·德富苏峰·山路爱山》，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73页。

产”与“军事”始成为维护一个国家的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两种手段。然而，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都会采取不同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因而，该社会性质要根据哪一种手段占主导地位而定。在“军事社会”中，其社会秩序是“强迫的结合”，社会结构中只存在“主人与奴隶”。且，“权威即命令”，争斗是其本性，暴力是其法则，不平等是其真理，因此，“军事社会”的现象即是“贵族的现象”。与之相反，在“生产社会”中，其社会秩序是“自由的结合”，社会结构中只有同胞兄弟。且，“权威即契约”，和平是其本色，正义即是法则，平等是其真理，所以，“生产社会”的现象即是“平民的现象”。^① 德富苏峰这种对社会结构进行划分的思想，主要来自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启示。因为“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的方向是结构层次上的社会异质性的扩大和功能层次上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的增强。也就是说，在社会较为原始的阶段不存在结构分化现象，因此社会各部分是彼此等质的，结构上等质的东西在功能上也难以分化，因而它们彼此间是互相独立、互相分离的；反之，在社会较为发达的阶段，结构开始分化，各部分彼此成为异质性的东西，结构异质的东西在功能上也是分化的，因而彼此间不能相互代替，而是相互依存的”^②。即是说，“生产”与“军事”在一个国家也并非极端对立，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军事”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德富苏峰认为由“军事社会”向“生产社会”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在

① 隅谷三喜男前揭：《日本的名著 40·德富苏峰·山路爱山》，第 77—78 页。

② 富永健一著，严立贤等译：《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6—157 页。

“生产社会”中，以“贸易主义”来调节“彼我之利益”^①，并使之共存，因而，“生产社会”中的“军事”不是暴力性质的，而是该制度体系中的一个合理的存在。

在书中，德富苏峰强调指出：“吾人断言：尽管将来之日本事务繁多，但其第一急务在于维持一国之生活。尽管生活手段很多，但毕竟在于武备、生产两大主义。且，手段的不同直接关系到一国之风气、品格、制度、文物、政治、经济、教育、文明等。”^②在此，他注意到生存及生存手段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那么，日本的生活应该在何种主义下才能得以维持呢？他说：“首先，要看世界情况，世界的情形实际在于生产。其次，要看天下大局，天下大局在于平民主义。”进而，他提出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吾人断言：我国宜成为生产的国家。遵从生产机构发展的必然原理，按照自然规律，宜成为平民社会。”^③这就是德富苏峰所提倡的“平民主义”。就个人的角度来谈，他站在“平民社会的个人”的立场，主张建设明治二十年代日本的应该是取代“天保老人”的“明治青年”，并鼓励他们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来推进“欧化”运动。他在《新日本之青年》中指出：“物质文明只有依靠精神文明才能得以维持。即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存在的原因，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存在的原因。所以，如果要在我国扶植泰西文明，首先不可不识破它的真面目。要识破它的真面目，首先不可不注视它的精神文明。原因是两个文明看似矛盾对立，实则犹如电的阴阳两极相互吸引。……啊，我们的好青年，你若一步转进泰西个体生活的社会，愿你第二步

① 参考坂本多加雄前揭：《市场、道德、秩序》，第72页。

② 隅谷三喜男编前揭：《日本的名著40·德富苏峰·山路爱山》，第180页。

③ 同上。

再转进泰西的道德社会。你若渴望物质上的文明，应再放眼于精神上的文明。”^① 这是德富苏峰力图从社会内在精神的层面上谋求“欧化”的主张。在这里，虽然德富苏峰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把二者都视为文明社会的必备条件，但就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而言，他还是主张首先应着眼于西欧的“精神文明”，在精神文明中又尤其重视国民的道德建设。此外，德富苏峰又欲在伦理道德上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重建寻找合理的依据，于是，与“平民主义”相适应，德富苏峰提倡“平民道德”，并企图以信仰的力量强化道德。他说：“信仰是力量，小草的信仰可移泰山、可翻沧海。信仰所向，天下无敌。”^② 由此呼唤出他所谓的“高尚的道德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平民社会的道德，其枝叶虽显在于近乎生活的表面，但其根茎却深藏于人类职分的观念中。”^③ “不学事业，而学其心术。不看其物质现象，而看其精神现象。泰西文明的外形以金钱可以购买，但其内部的文明必须以泪购买。”^④ “平民道德”的根底存在于“人的自然属性”之中，亦即人类职分的观念中。因而，德富苏峰的“平民道德”的实质是“纯粹的泰西文明”，它包括基督教的博爱主义、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以及社会契约的思想。

至此，可以说青年期德富苏峰的思想已大体完成。“平民主义”是青年期德富苏峰思想的总结及必然归趋。具体说来，所谓“平民主义”的要点包括：提倡建立“平民社会”；主张“平民道德”；依靠“生产”来获取生活的自由；推行“和平主义”。他的“平民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将来之日本》和《新日

①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 12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13 页。

④ 同上书，第 14 页。

本之青年》中，并由此奠定了苏峰在舆论界的地位。也是以此为契机，德富苏峰举家赴京。他写道：“我不是长久呆在乡下的人。逐鹿中原的时机正在到来。”^① 德富苏峰凭其敏感欲“逐鹿中原”而来到东京，并于1887年1月设立民友社。2月，创刊《国民之友》杂志，面向青年展开广泛宣传。民友社与《国民之友》被评价为“第二个明六社”和“第二个明六杂志”，可见其影响之大。但《国民之友》先进于《明六杂志》之处在于：作为“欧化”的一个侧面，它把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亦介绍过来。这也改变了原来以大江义塾为媒介的、单纯的、面对面的传播方式。这一时期，他以独立的记者身份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这可以说是德富苏峰理论的实践途径。其思想及行为有力地推动着日本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尤其是文化结构的转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青年期的德富苏峰一直在为日本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确立寻找途径。他对社会问题抱有积极的热情，足以证明他具有极强的参与意识。大江义塾时期，他视野开阔，涉猎范围甚广，为他的主张提供了思想源泉。按他自己的话说：“依据斯宾塞的进化论、密尔的功利说、科布顿、布莱特曼彻斯特学派的非干涉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及横井小楠的世界和平思想，构建了我的思想。”^② 不言而喻，德富苏峰是一个愿意接受新思想、新经验的知识分子，且能凭借这些新思想、新经验批判传统道德，以独立的身份在塾内及言论界发表意见。按照英克尔斯的理论，这一时期的德富苏峰，无论从思想观念、态度，还是从行动表现来看，都堪称人格上独立的知识分子。另外，青年期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有些在今天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例如，文中所谈到的有关德富苏峰的由“随意结合”到“平民社

① 德富苏峰前揭：《苏峰自传》，第217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会”的秩序原理，有关“自由”与“道德”、“自由”与“自律”的关系的主张以及“知德一途之教育”即是如此。

三、人格的断裂与思想变异

甲午战争前后，原本遵奉“平民主义”并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界、言论界引人注目的德富苏峰，在思想上开始向“国家主义、权力主义及帝国主义”转变。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甲午战争的态度上。他指出：“我国之所以采取此种方法（战争），目的在于日本国的对外开放。对他国发动战争，目的在于给予世界上的愚昧以一大打击，把文明的荣光注入到野蛮的社会中去。”^① 1894年12月发表的《大日本膨胀论》还指出：“此书论及征清问题，占十之七八。然讨论征清问题，目的在于论述大日本的膨胀。即是作为大日本的膨胀问题而论及征清的。有征清未必有膨胀，有膨胀才有征清。”^② 看来德富苏峰是支持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的，这足以证明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至于向国家主义的转变，则是通过1893年对外强硬派的“严厉取缔条约运动”^③来实现的。德富苏峰以争取“自主外交”为标榜参加了这场运动。后来，他在《平民主义与国民的精神》一文中指出：“在国民意识的支配下，有国民，没有华族、士族、平民。然国民的精神岂非平民主义？与国民共同经营、管理国家

① 德富苏峰：《战争与国民》，转引自和田守、竹山护夫、荣泽幸二著：《近代日本的思想（2）》，有斐阁1979年版，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③ 1893年，对外强硬外交论的反政府联合派（由国民协会、大日本协会等六派联合组成）在与政府斗争时所发起的运动。主要目标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严厉取缔外国人在条约中享有的优惠权，致力于国民的统一与国家的发展。这一运动激起日本国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的国民之运动即是平民主义的显现。”^① 这样，他便完成了“平民”概念向“国民”概念的暗转与融合。同时，也实现了“平民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换。1897年，他就任松方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因而，时人骂他为“变节汉”。

德富苏峰的思想转变带来其人格的断裂。自1897年任官职起，德富苏峰便与政界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德富苏峰变为“御用记者”，其主办的《国民新闻》则变成了“御用新闻”。虽然在1913年的《时务一家言》中，德富苏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继续标榜独立，但也改变不了其人格的依附性与“帮忙奴才”的性格。本节将以青年期的德富苏峰与甲午战后的德富苏峰相比较，以探讨德富苏峰的人格发生了怎样的断裂？以及其人格的断裂与思想变异之间有何关系？

（一）人格的断裂及其外在表现

提及知识分子的人格，或许人们马上会想到独立人格与依附人格这相互对立的两者。所谓独立的人格，独立于谁才能称其为独立？所谓依附的人格，依附于谁才能称其为依附？对两者的判断主要依据知识分子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定。即是说，独立于政界及权力，或参与政治但并未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独立。与之相反，向政界及权力靠拢，或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依附。然而，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或依附人格都不是皆然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时代变化，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亦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带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有的知识分子在人格转换中会表现出人格转换的双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后来再由依附人格转换为独立人格。有的则表现出单向性，即只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人格转换具双向性者，将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战争与国民》，第36页。

会表现出人格由断裂到整合的过程。仅具单向性者则不具备这样的过程，或许亦试图整合但以失败告终。笔者将知识分子的人格由独立转向依附的现象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并将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却未获成功的现象称为人格的虚假整合。

可以认为，知识分子的人格断裂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被政治权力所吸收，失去了人格独立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及关注社会问题是其“社会良心”的最好体现。他们参与政治，并不影响其独立性或其独立人格。但如果他们被整合到政治权力之中去了，那么他们将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政治立场^①，随之即丧失了独立人格。(2) 丧失了思想上的进步性与独立性。即如果他的思想主张时时在为当前的政府辩护（尤其是在政府的行为将导致本民族走向险途时），这可视为其人格断裂在思想上的表现。(3) 对传统思想的“恶用”及扩大其宣传力度。在1897年德富苏峰就任松方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前后，即发生了上述人格的断裂。

虽说德富苏峰的人格断裂以1897年的任官为标志，但是导致其人格断裂的因素早在甲午战争前后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德富苏峰的人格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断裂及断裂的外在表现如何？这是一个需要与青年期德富苏峰的人格对照起来才能说清的问题。

德富苏峰历经大江义塾时期及民友社的初期，最终完成了其“平民社会”的近代市民社会秩序原理。在这一过程中，德富苏峰先在故乡开设大江义塾，远离权力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后来，他赴东京创立民友社及创刊《国民之友》杂志，虽然变换了传播方式，但他仍然以独立的身份发表言论。《国民之友》是使

^① 参考陶东风著前揭：《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导论”，第17页。

德富苏峰由以成为“天下立言家”^①的宣传阵地。德富苏峰亲自为其执笔并将其编辑权完全置于自己手中。青年期德富苏峰人格的独立性还可以从他的自传中得到印证。在自传中，他谈到：“我原来就喜欢政治，政治是我的生命。但是，当初毫无当官的意欲。简单地说，当初既不想成为大臣，也不想成为议员。只想以自己的想法来运营政治并对其进行指导，除此之外，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因此，著述及刊行杂志的目的不在于卖书赚钱，亦不在于独霸文学界。如果我的书籍及杂志得以畅销，我的名字也因此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那也只不过是以此把我的志向推广到天下。”^②由此可见，青年期德富苏峰的想法是单纯的，其具体活动是远离政权及政界的，反映其人格是独立的。

与青年期德富苏峰的独立人格相对照，明治中后期的德富苏峰的人格逐渐走向断裂。其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德富苏峰主张《国民新闻》政治化是其向政界及权力靠近的第一步，也是其人格走向断裂的最初标记。

1890年2月1日，《国民新闻》第1号出版发行。当初，德富苏峰发行《国民新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良，为了把《国民新闻》变为“变革的震源地”^③。“当时我热心的是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和宗教改良。其中，政治改良是我所最热心的。”^④那时，德富苏峰把政治改良的主要着眼点放在打破藩阀政府上。1891年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成立，德富苏峰通过农商大臣陆奥宗光获取了内阁的内部消息，刊载这些消息为《国民新

① 杉井六郎著前揭：《德富苏峰的研究》，第132页。

② 德富苏峰前揭：《苏峰自传》，第225页。

③ 有山辉雄著：《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第56页。

④ 德富苏峰前揭：《苏峰自传》，第265—266页。

闻》的政治报道增彩许多。同时，他亦执笔撰文支持陆奥宗光，《国民新闻》的立场发生微妙变化。1893年，自由党逐渐接近政府，德富苏峰曾对其进行批判。4月，德富苏峰在《国民新闻》撰文批判自由党党员星亨，这引起了星亨的不满。于是，星亨攻击民友社，称其为自由党的敌人。这一事件不但是《国民新闻》的言论介入党派纷争的开始，也成为自由党内的“民党联合派”与“接近政府派”分裂的主要原因。在1896年《国民新闻》的元旦号上，德富苏峰撰文对明治二十年代的《国民新闻》的活动进行总结，并强调指出明治二十年代《国民新闻》的政治主调尚不突出。它主要是以“平民主义”把上述诸种“改良”统一起来，依然表现出立场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德富苏峰逐渐使报纸版面的内容转向以政治为主。因而，《国民新闻》逐渐政治化了。这主要由于德富苏峰想成为众议员候选人的强烈意欲，以致使他的政治活动逐渐丧失“平民”色彩，并越来越靠拢党派，越来越想成为政治家。可以说，将《国民新闻》政治化的活动视为德富苏峰人格走向断裂的最初标记是恰如其分的。

其次，1897年德富苏峰出任松方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由此得以靠拢权力，人格亦发生断裂。

原本德富苏峰创刊《国民新闻》的主要目标是进行政治改良、打破“藩阀”政治，为什么以后他又要与藩阀政治家们接触呢？这其实是德富苏峰对“道理”与“力”的关系重新认识的结果。他认识到，独立的记者大脑中只有“道理”，如果对其“道理”进行宣传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道理”就会变成“力”。德富苏峰还认为，“力”与“道理”二者并非对立而是表里一体的。那么，新闻言论的主要作用便是通过舆论宣传将“力”道理化。即是说，舆论宣传很有可能将非合理但本身强大的“力”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理”。当然，它要在新闻舆论对国民意识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才会得以完成。于是，德

富苏峰决心向“力”倾斜。另外，1896年德富苏峰出游欧美后，对欧美列强实力的认知亦进一步增强了其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关于他出游欧美的主要目的，在1896年5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的《关于游历欧美，告江湖诸友》一文中有所表露。该文指出：“我最初相信甲午战争是大日本国运的一大转机。大日本是世界均衡的要素之一。我国宜介入世界政局，拥有处理国际事物的发言权。简言之，趁维新开国进取之势，引导国民的生活进入世界的生活。因此，让世界了解大日本的同时，有必要让大日本了解世界。”^①由此可以看出，游历欧美是德富苏峰受“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影响，其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行动表现。他游历欧美追求的是世界各国对日本国际地位的认可。同时，游历欧美的目的还有考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状况以及与欧美各国的报界人士拉关系的意图。关于这一点，在德富苏峰以后谈及有关日俄战争中的言论统一问题时，表达得更加明确。德富苏峰强调：“我认为最为必要的是：第一，在国内鼓吹举国一致的精神，形成当局的后援力量，并鞭策政府当局达到其目的；第二，使第三国（交战双方以外诸国）对我国报以充分的理解与同情。”^②而这次游历欧美，不仅使德富苏峰了解了西方社会的实力与权力现状，而且还使他认识到西方国家基本是凭“实力”来说话的。西方国家普遍认可的是“强权即公理”，这更增强了德富苏峰向权力靠拢的决心。于是，在1897年回国后不久，德富苏峰便在当时藩阀势力强大的社会状况下，暂时搁置了“道理”，而去依附“权力”。由于德富苏峰与自由党之间的关系已恶化，所以他选择的依附对象是与伊藤博文、自由党一派相对立的藩阀政治家

^① 德富苏峰著：《关于游历欧美，告江湖诸友》，转引自杉井六郎著：《德富苏峰的研究》，第257页。

^② 德富苏峰前揭：《苏峰自传》，第389页。

与贵族院议员。其中，藩阀政治家有大隈重信与松方正义，贵族院议员有近卫笃磨与二条良基。他的“打破藩阀”逐渐缩小为只反对伊藤博文内阁及自由党。《国民新闻》所主张的“批判藩阀政治”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当时德富苏峰追求“政治权力”的具体方法有二：“其一是把报业的经营规模推向全国，其二是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或秘书。”^①此后，德富苏峰的政治活动就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的。1897年的任官不过是此方法的具体实践。尽管德富苏峰任职不久便辞去该职务，但不言而喻，与大江义塾时期及民友社初期的德富苏峰相比，其人格已由独立转换为依附，发生了明显的断裂。

再次，德富苏峰与山县派藩阀势力的合作，是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集中表现。

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后，德富苏峰在舆论上支持山县有朋，即是其人格断裂的佐证。1898年10月，第二次山县内阁（第一次山县内阁是于1889年12月组建的）成立。山县内阁面临的主要课题是甲午战后的处理及战后经营，他采取的手段是增加税收和扩充军备。对此，德富苏峰在言论上予以支持。其言论活动与青年期所提倡的“平民社会”的理想显然是相违背的。青年期德富苏峰主张的“平民社会”的主要内涵是提倡“生产”，反对“武备”；提倡“和平”，反对战争。而这时，则由提倡“生产”转变为对政府的扩充军备政策进行辩护。这也是德富苏峰权衡“道理”与“力”的关系而服膺“力”的逻辑的表现。同时，反映了德富苏峰向权力的进一步靠拢及人格的断裂。

1901年桂太郎内阁成立，德富苏峰与桂太郎约定作桂内阁的外援。至此，他完全变为一名“御用记者”，《国民新闻》则变成“御用新闻”。在1905年的“日比谷骚动事件”中，国民新闻

^① 有山辉雄前揭：《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第62页。

社遭到群众袭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民众对德富苏峰向权力靠拢的一种惩罚。

以上，主要考察了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状况。这一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主要特点是向“权力”靠拢，担任内阁的“智囊”和“秘书”，为内阁辩护。下面以大正时期为中心，考察该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状况及特点。

首先，德富苏峰就任《京城日报》总监，充当殖民统治的打手，带来其人格的断裂。

1910年9月末，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委托，德富苏峰赴汉城参与制定朝鲜的新闻政策，同寺内正毅合作。这时他已把东京的国民新闻社视作“总社”，而把朝鲜的京城日报^①社视作“分社”。《京城日报》是日本在朝鲜设置的殖民地统治机构总督府的机关报。朝鲜总督府是带有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殖民统治机构。德富苏峰就任其机关报的总监，实际上成了殖民统治的打手。他的这一举动与其青年期主张的国际协调秩序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由此观之，德富苏峰已经被政府完全融入其殖民地的统治权力及政策中去了。此后，德富苏峰继续在政治与报业活动两个方面为政府服务。而他的报业活动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他以汉城的《京城日报》与东京的《国民新闻》为舆论阵地，为政界权力人物张目与辩护。尤其是他对《京城日报》的经营态度及运作方式，不但反映了《京城日报》的性质，而且也反映了其人格的断裂。

1910年10月1日，寺内正毅总督与德富苏峰总监签订了《关于新闻整理合同书》，共由19款组成。其中有一条款规定：“京城日报以总督及总督府为本位，为完成其施政目的而尽

^① 《京城日报》，1906年创刊于朝鲜的汉城，为韩国统监府和此后的朝鲜总督府的机关报。

力。”^① 他们把《京城日报》的性质，确定为殖民政府的机关报。其所需资金虽由总督府承担，而编辑、经营、人才供应，则由国民新闻社承担。

1913年，寺内正毅以甲方的身份、德富苏峰以乙方的身份，就《京城日报》的组织形态又签署了《有关合资公司京城日报社合同书》。它规定报社的经营形态为股份公司。其第二条规定：“合资公司京城日报社的资金为7万元，其中乙方出资1万元，甲方出资6万元。”^② 从合同书的内容可得知，德富苏峰经营《京城日报》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总督府。而资金上的依赖与人格上的依附是相对应的。这进一步加强了报社与总督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德富苏峰便往来于东京—汉城之间，从事报业及政治活动。在东京，他的《国民新闻》以日本政府的机关报自居；在汉城，他的《京城日报》则成为总督府的机关报并对总督府负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日本参战前，东京的德富苏峰与汉城的阿部充家联手^③，强化了战时的报道体制。例如，在日本对德开战是否具有可能性的问题上，《国民新闻》认为是可能的，并积极给予支持。关于这一点，可从国民新闻社常务理事给京城日报社社长的书信中得到印证。信中指出：“有消息说，战争已波及到东京。陆军已出动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被派赴青岛，1个师团被派赴北京、天津、广东、福建及长江

① 柴崎力荣：《德富苏峰与京城日报》，收入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1983年10月号，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③ 阿部充家，原为国民新闻社副社长。1914年8月，被德富苏峰派往朝鲜汉城担任《京城日报》社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了德富苏峰（东京）——阿部充家（汉城）的战时报道体制。1918年6月，德富苏峰辞去《京城日报》总监职务后，阿部充家亦离开京城日报社回到东京。

沿线。我报社（指国民新闻）主张发行新公债予以支持。”^① 德富苏峰的态度就是《国民新闻》的态度。由此可见，德富苏峰是支持日本参战的。再如，1914年11月7日，青岛陷落，日军占领胶州地区。阿部充家派《京城日报》的记者前往青岛，并强调指出：“如果以记者身份难以进入青岛，就以少将之随从人员的身份进入青岛。如在一定时期内不允许通信，则可率先潜入青岛做实地考察，并将亲眼目睹之对青岛的整顿情况留待允许通信以后发回京城日报社，以便使其（指《京城日报》）在执笔上占有优势。”^② 这段话说明《京城日报》对战争也是支持的。它把报业生命与殖民统治的具体经营活动连接起来，以求在获取信息方面战胜其他报社。因此，这种联合报道体制反映出《国民新闻》与《京城日报》都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侵略色彩。处于报社总监地位的德富苏峰左右着两家报社的言论倾向，成为日本殖民政策的言论支持者。同时，他的言论取向再次证明了其人格是断裂的。

其次，德富苏峰被选为贵族院议员，是其直接参与权力的最好证明。

1911年8月，第二次桂太郎内阁辞职前，德富苏峰被选为贵族院议员。这是德富苏峰攀附权贵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德富苏峰已成为一个地道的政治活动家。1912年12月，第三次桂内阁成立，德富苏峰及《国民新闻》实际代表了桂太郎的政治立场。关于德富苏峰与桂太郎的关系，从其把桂太郎定位为第一，把《国民新闻》定位为第二就可以得知。德富苏峰已成了桂太郎的“分身”^③。

① 引自柴崎力荣前揭论文，第76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参考有山辉雄前揭书：《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第180页。

再次，德富苏峰为寺内正毅内阁辩护，更清楚地表明了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1916年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当时许多家报社联合批判寺内内阁的成立是“官僚阀族的再现”，要求实行宪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新闻》却强调首相的任命权在天皇手中、“立宪政治以民意为重”及“政党不是国民唯一的代表者”等，为寺内正毅内阁进行辩护。很明显，德富苏峰是以“大义名分论”为依据阐述寺内正毅内阁的正当性。在利用“大义名分论”方面，他又表现出回归儒学的特色。

最后，大正中后期的德富苏峰，从1918年与寺内正毅内阁断绝关系后，便集中精力撰写《近世日本国民史》。此一时期苏峰的断裂人格的表现是向国民进行教化，实践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及“国家认同”理念，推动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前进。

大正时期的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外在表现如上所述。其主要特点是德富苏峰直接参与并策划了殖民统治的新闻政策，他是帝国主义者；通过与藩阀势力建立合作关系，他的政治活动与内阁首相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直接参与政权；利用传统儒学中的“大义名分论”为内阁进行辩护，利用“皇室中心主义”教化国民。

此外，有必要简单提及昭和初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断裂状况。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1938年他发表了《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1939年2月出版《昭和国民读本》，重新阐释儒学，欲以此教化民众，使其盲从战争。1940年9月，他与头山满和松井石根联合向近卫文麿首相提出“即时缔结三国同盟建议书”。1941年10月，他出版发行《皇道日本之大道》。12月，日本对英美宣战。同时，在东京各报社联合主办的国民大会上，苏峰以“兴亚的警

钟”为题，做了演讲。1942年5月，大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在对国民进行文化统制管理上，积极配合政治权力。12月，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昭和初期德富苏峰的活动特点是公开鼓吹对外扩张，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统合国民思想的急先锋，已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二）德富苏峰的思想变异

思想是先导，思想支配人格。在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人会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倾向。然而，思想的形成又源于对时势的感知与认识，思想的变化也是一样。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转变，与他对国内外形势的重新估量有关，与他在追求“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方面的思想危机也有关。“认同”是英文中的“Identity”。“自我认同”即是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问题的答案。对这些问题回答得不好，就会出现所谓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异质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往往易于产生认同危机，或一个群体内部的认同的分裂。”^①如将“认同”概念推而言之，则可以应用到“国家认同”上。所谓“国家认同”即自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它从哪里来？它将往何处去？德富苏峰是以追求“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为己任来展开其活动的。诚然，异质性的文化并存及冲突的状况，以及国内外环境的瞬息万变都会影响到个人的认同观。德富苏峰的思想变异，是其“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危机的集中表现。其思想的变异与上文提到的人格断裂又是相对应的。

^① 陶东风前揭书：《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导论”，第9页。

思想的变异^①是一把“双刃剑”。所谓的“双刃剑”是指思想的变异可能具有带来推动社会前进的合理因素，同时也具有把社会引向险途的危险因子。例如，德富苏峰在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思想的进步方面时，也吸收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反动思想因素（即经济上对外侵略的经济民族主义）。但一般说来，当“双刃剑”的一侧面是合理的，并居于思想家思想变异过程的主流地位时，其思想就会推动社会进步。相应地，思想家的人格也是独立的。反之，当“双刃剑”的另一侧面即非合理侧面居于主流地位时，其思想就会阻碍社会进步，甚至有把社会引向歧途的倾向。相应地，思想家的人格则以断裂为显在特征。

德富苏峰的思想由接受儒学影响转向接受西方思想是其思想的第一次变异，这次变异过程已经为下一次的变异打下了基础。即是说，在第一次思想变异的过程中，德富苏峰在把西方先进思想吸收进来的同时也将其保守甚至反动的思想因素吸收进来。因此，其思想的第二次变异，就是以那些反动的思想因素为基础而展开的。在本章第二节曾论及青年期德富苏峰的思想形成，是以他提出“平民主义”及构建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平民社会”为标志的。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是来自斯宾塞的启示，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转

^① 变异，原本是生物学上的用语。是指同一起源的个体间的性状差异。环境相同而遗传不同时，会出现变异；遗传相同而环境不同时，也会产生变异。前者称遗传变异，后者称非遗传变异或环境变异。日常看到的变异可属两者之一，或者为两者的总和。在生物进化上，只有遗传变异才是自然选择的材料。笔者将与“原初思想”的脱离称为思想变异。当环境变化与外来思想进入时，“原初思想”就会受到威胁。以德富苏峰为例，1875年以前，他接受的是汉学修养，后来他受到欧美思想的影响，开始了其思想的变异过程。这一过程往往又是以对“原初思想”的批判为前提的。不言而喻，思想的变异要比生物体的变异复杂得多。

变。他由提倡“生产社会、和平社会”的社会秩序，转而主张构建“武备社会及暴力社会”的社会秩序。在斯宾塞看来，武备社会是低层次的，它将逐渐地、缓慢地在几经犹豫以后转向工业社会。武备社会又是原始的、非文明的社会形式，生产社会才是文明的和继续向文明社会前进的社会形式^①。按照这种思路思考下去，再由生产社会转向提倡武备社会，无疑是落后的、野蛮的、保守的。因此，德富苏峰的思想转向带有明显的保守后退倾向。明治中后期以及大正时期，德富苏峰思想变异的具体表现大体如下：

首先，提倡“弱肉强食”的文明论是其思想变异的最初表现。

德富苏峰的人格断裂并非突如其来。对国际社会“实力”的重新认知及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吸收是其思想变化的根基，游历欧美的真实感受更增强了其转变的信心。德富苏峰最初的思想转变仍以“平民主义”为坐标，主张对外扩张是其转变的显在特征。其对外扩张思想可以说是德富苏峰发挥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虽主张自由贸易主义及和平主义，但为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又不否认经济上对外侵略。这为后来苏峰的武力侵略思想种下了祸根。也就是说，德富苏峰的思想变化不但没有完全脱离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反而企图以其为媒介来达到向“对外扩张”思想的合理过渡。如前所述，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曾提倡“随意结合”、“等价交换”的文明论及“利我利他”的“国际调和秩序观”，但在甲午战争前后，他的文明论及国际秩序观逐渐发生了转变。其思想变异的痕迹，在他 1890 年发表的《日本人种的新

^① 参考王养冲著：《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 页。

故乡》中就有所表露。德富苏峰在文中指出：“今日并非以武力征服天下之日，乃以人种并吞天下之时。作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宜利用增殖的人口，向整个世界寻求我帝国的版图。”^①这是后来德富苏峰鼓吹“日本膨胀”的思想基础，也是德富苏峰思想变异的结果。他积极支持对清政府开战，通过把日本美化为“文明的带路人”、“光明的使者”，来充实其“弱肉强食”的文明论，并以“大义名分”的思想鼓吹“对清开战”的正当性。后来，德富苏峰在《时务一家言》中强调指出：“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是国家的一个转机，也是我思想的一大转机。我日本帝国的帝国主义以此为发端。”^②在文中，他还认为：“弱势的道理会败给强势的无理。如欲实行道理，必须具有能实行之的实力。即是说道理不是自动实现的，须借助他力才能发挥其妙光。因此，我归依力的福音。”^③这时他已抛弃了“和平手段”，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战争手段。同时，他还把生物进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淘汰”原理引进他的文明论中，认为“人类进化以争为原则，以和为变则”^④，主张领土扩张与军备扩张。由此可见，德富苏峰的文明论已由“和平的”文明论及“平民主义”的社会秩序观转变为“弱肉强食”的文明论及追求“帝国主义”的社会秩序观。

其次，回归儒学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表现。

1898年2月，德富苏峰发表了《读论语》。他把《论语》评价为天下的“至文”。他对“礼”也有自己的评价。他说：“他

① 德富苏峰著：《日本人种的新故乡》，转引自和田守等著：《近代日本的思想（2）·德富苏峰、大杉荣、尾崎行雄》，第35页。

②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收于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7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292页。

(孔子)多次谈到礼。所谓礼者何也?乃社会秩序也。秩序如何维护?曰:在于不践越人们的界限。”^①这是德富苏峰转向儒学而寻求维护社会秩序力量的标志。后来,他以此为基础对“忠君爱国”、“大义名分”、“皇室中心主义”及“家族”等观念也进行了再阐释。在整个大正时期,德富苏峰回归儒学以对其“恶用”为特征。上文曾提及,思想独立性与先进性的丧失以及对传统思想的“恶用”,都是知识分子人格断裂在思想上的表现。即是说,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与其思想的变异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在不同阶段,知识分子人格断裂的表现与特点有所不同,思想变异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再次,在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思想变异以彻底批判西方先进思想为前提。

“思想中毒”的观点是德富苏峰在对西方思想重新认识时所提出的。在1916年发表的《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一文中,德富苏峰在对曼彻斯特学派进行再评价时指出:“曼彻斯特思想是从英国人的常识及英国的国情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拥有世界性的殖民地、世界性的帝国、世界性的资本、世界性的商业、世界性的海军的国家,如果将其(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扩展则变为世界同胞主义,如果将其收缩则变为个人独尊主义。……然我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正处于国民自觉之际,追随这种说法,使自觉心再度沉睡,多少会阻碍国运的发展。”^②其义暗指,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亦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主张。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也应该有与日本国情相适应的思想主张。因此,德富苏峰把明治年间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引进与吸收视为“思想的中毒”。所谓“思想的中毒”是就大正时期的青年们对明治初期引进的西方个

^① 坂本多加雄前揭书:《市场、道德、秩序》,第87页。

^②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149页。

人主义、边沁与密尔的功利主义及曼彻斯特学派思想的吸收状况而言的。德富苏峰认为，大正青年的国家及爱国观念的淡薄是明治时期的“思想中毒”带来的直接恶果。他形象地把这种状况比喻为“父母的因果，报应在子女身上”^①。这与青年期的德富苏峰的“纯粹泰西主义”思想主张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德富苏峰认为大正时期日本的具体国情是：国民在思想意识上开始“自觉”，唤起“自觉心”宜成为其主要职责。这时的德富苏峰认为明治维新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就其带来思想界的混乱状态而言，其毒害很大。主要表现为国民思想的根底发生了动摇。按照德富苏峰的思路，大正时期的青年实际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德富苏峰是以唤起大正青年的“自觉心”为己任的。

从德富苏峰主张“纯粹泰西主义”转变到他将国民吸收“泰西思想”视为“思想中毒”，可知一种新思想在人的大脑中生根是十分困难的。一种外来思想要想在陌生的社会里发展为该社会的主流思想，则更是难上加难。当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期时，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再次证明了处于精神层面的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即是说，在旧信仰消失而新信仰尚未确立、旧有观念被破除而新观念尚未形成的社会情境下，对外来思想的狂热崇拜不过是人们在思想上或信仰上寻找归属的一种选择。当这种外来思想短期内难以整合混乱的思想界，甚至使思想界更加混乱时，回归传统的思想便会及时抬头。回归传统往往又是以极力诋毁外来思想为前提的，即便外来思想是先进的。德富苏峰认为时人对欧美进步思想的吸收是“思想中毒”，就是其诋毁进步思想的表现。这只能证明他的保守、落后性。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对“苏峰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波动应予足够的重视。

^①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 149 页。

另外，在德富苏峰看来，“功利的个人主义”亦是带来“思想界混乱状态”的思想因素之一。因此，他对“功利的个人主义”也进行了批驳。他把欧美的“功利的个人主义”蔑称为“浅薄的功利主义”。并把时人对它的信仰与吸收说成是“利己主义的中毒”，把“利己主义”说成是“利己宗”。也就是说，德富苏峰把“利己主义”也视为“宗教”的一种，并进一步指出：“利己宗一变而为拜金宗或非爱国宗、非国家宗、非忠孝宗，并非不可思议之事。我并不认为引进欧美浅薄的功利说是明治社会的病根。在旧社会瓦解之时，即便没有引进的思想，也一定会出现思想界的混乱状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引进的思想会使思想界的状态更加混乱，会使日本之国民忘掉其本分。”^①由此可见，德富苏峰虽认为新思想的流入未必是造成思想混乱状态的根源，但又认为，它是混乱状态的“助长剂”。当德富苏峰认为整个社会处于“思想的中毒”状态时，就会与他原来所接受的思想作一了断。因而其思想主张的变化过程，即表现了德富苏峰的思想与欧美思想相脱离的过程。至此，他在吸收西方思想时的先进性已荡然无存。

《将来之日本》与《新日本之青年》是青年期德富苏峰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1916年的《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是对两者增订修改后写成的。可以说，这是德富苏峰思想变化的又一佐证。按日本学者隅谷三喜男的理解，如果把甲午战争前后的思想转变视为德富苏峰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化”的话；那么，《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所表现的则是其思想的“第二次变化”。两次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变化虽然转向提倡“军事社会”，但德富苏峰并没有完全放弃“平民主义”、“生产主义”与“和平主义”。与之不同，德富苏峰思想的“第二次变化”则是与

^①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155页。

“他的思想出发点彻底脱离的过程”^①。即是说，其思想的变异使其彻底抛弃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我认为，隅谷三喜男的“两次变化说”应该是上文谈到的德富苏峰的第二次思想变异过程中的两个主要阶段。此后，德富苏峰便在传统儒学思想中寻找整合国民精神的动力，并“恶用”儒学鼓吹对外扩张，使民众盲从地走向战争的深渊。

上述论说表明，德富苏峰思想的第二次变异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以西方思想中反动的、非合理的思想因素为基础开始演变；其次，重释儒学企图寻找重构社会秩序的途径；再次，彻底脱离西方先进思想；最后，“恶用”儒学并加大其宣传力度。直到二战结束，德富苏峰在政治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以儒学为思想工具，充当政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

如前所述，1897年德富苏峰跻身于政界，向权力靠拢，与知识分子人格断裂表现的第一点相吻合。德富苏峰的思想由提倡“生产社会”转而主张“武备社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保守、倒退倾向，并逐渐地丧失了思想的进步性。这与知识分子人格断裂表现的第二点相符。至于上述的第三点在德富苏峰身上则体现为其对儒学传统的再阐释。他不但对《论语》进行了再阐释，后来，他对“忠君爱国”、“大义名分”、“皇室中心主义”及“家族”等观念也进行了再阐释，并对传统儒学加大力度进行宣传。因此，可以说，德富苏峰是知识分子人格断裂的一个典型。

^① 隅谷三喜男编前揭：《日本的名著 40·德富苏峰·山路爱山》，第 36 页。

四、断裂人格的虚假整合与“国家认同”

知识分子与政界之间的关系，是其人格外在表现的重要侧面，也是判断知识分子是否位居体制之内的重要标准。如前所述，明治中后期到大正时期，德富苏峰与政界频繁接触并靠近权力或直接参与政权，带来其人格的断裂。但是，当他的行动遭到非议及责难时，德富苏峰又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标榜人格独立，试图对其断裂的人格进行整合。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采取的整合手段及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就其大正时期的整体活动来看，德富苏峰对其断裂人格的整合又带有明显的虚假性。本节拟就大正时期的德富苏峰如何对其断裂的人格进行整合及其整合的虚假性予以探讨。

（一）行动上对断裂人格的整合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是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而再由依附人格向独立人格的转换，则需要知识分子对其断裂人格进行弥补与缝合。这一过程是知识分子对断裂人格的整合过程。整合如获得成功，就会完成人格的双向转换。整合失败，则人格的整合就带有明显的虚假性。德富苏峰对自我人格的整合以失败告终，因而，他对自我人格的整合就是虚假的。

关于德富苏峰对自我人格进行整合的途径，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由于德富苏峰对权力的接近或直接参与权力是其人格断裂的突出表现，因而要想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他必须处理好自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试图远离权力与政界是德富苏峰对其断裂人格进行整合的途径之一。

如前所述，德富苏峰是在 1897 年跻身于政界，任松方内阁的敕任参事官的。但不久他便辞去了这一职务。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松方正义首相与大隈重信外相之间的矛盾，导致大隈重信辞去外相、松方正义内阁总辞职。当时，德富苏峰不得不辞去官职，还没有与政界及权力拉开距离的意欲。至 1898 年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时，德富苏峰仍对其政策给以言论上的支持。1901 年桂太郎内阁成立，德富苏峰又与桂太郎约定做桂内阁的外援。1911 年他担任贵族院议员，再度接近权力。1913 年国民新闻社第二次遭到袭击以及桂太郎的去世，使德富苏峰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他从政界引退并结束了所谓的“政治家时代”。德富苏峰在 1913 年发表的《时务一家言》的开篇便标榜独立。这是德富苏峰第一次主动放弃权力及远离政界的行动。

德富苏峰第二次声称独立的行动是 1918 年辞去《京城日报》总监的职务，从而与寺内正毅断绝关系。这是德富苏峰欲与政界及权力拉开距离的又一举措，它的影响要远大于第一次。因为，《京城日报》带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所以，德富苏峰辞去《京城日报》总监的职务，就是要显示自己将从充当殖民地人民刽子手的境遇中解脱出来。

其次，德富苏峰放言舆论界，确认自己的记者身份，企图以此来弥补其断裂的人格。

与他从政界引退的举动相对应，德富苏峰于 1913 年发表了《时务一家言》，标榜自己将不偏不倚地以言论人的独立身份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这也表明德富苏峰在对自己此前接近政界及参与政权的行为开始反思。是什么原因迫使德富苏峰进行反思呢？其一，国民新闻社第二次遭袭击给予德富苏峰以很大的精神打击。他在自传中指出，“此事件让人想起就不寒而栗”。其二，对政界的再认识，使德富苏峰产生了失望情绪。因而，他欲把政界的权力争夺当成过眼烟云，找回 1884 年以“记者”的身份初来东京

时的心境，为社会做贡献。因此，《时务一家言》发表后，德富苏峰马上受到舆论界的好评。1916年，德富苏峰出版专著《大正政局史论》及发表《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指出大正政局的弊病及令人担忧之处，并说明了大正青年面临的课题及具体的重任。

1917年3月3日，德富苏峰以《国民新闻九千号》为题发表社论，强调《国民新闻》的基调是代表日本帝国，以日本国民为唯一的伙伴。其义暗指，德富苏峰要把《国民新闻》从藩阀官僚等特定政治势力的言论机关转变为以帝国的整体利益为重的“帝国的言论机关”。其中的藩阀官僚，在当时就是指寺内正毅。即就是说，以后的《国民新闻》言论将不对内阁负责，而是对整个帝国负责。即其言论立场是“基于帝国，独立不羁”^①。这为1918年德富苏峰辞去《京城日报》总监之职及与寺内正毅内阁断绝关系奠定了基础。

再次，追求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及“国家认同”，声称自己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至上利益而思索与行事的。

德富苏峰认为，只要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行事的出发点就可以弥缝断裂的人格。在这种意义上，“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亦成为德富苏峰对自我人格进行整合所采取的手段。从时间来看，这主要是在1918年辞去《京城日报》总监职务之后。具体活动是自1918年起，德富苏峰开始了《近世日本国民史》的撰写工作。撰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人寻根，为日本民族寻根。

（二）思想上对断裂人格的整合

如前所述，德富苏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自我人格进行整

^① 参考有山辉雄前揭书：《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第196页。

合的手段亦不同。相应地，他对自己的思想亦试图进行整合。前文曾提及，德富苏峰的自我人格断裂在思想上表现为丧失了思想的进步性与独立性。对这种思想进行整合亦成为德富苏峰对自我人格进行整合的重要侧面。大正时期，德富苏峰进行思想整合的主要特点是以其思想变异中的反动的思想因素为起点而展开的。以下，以德富苏峰观察大正社会时的思想主张为依据，探求其思想整合的过程。

首先，指出大正时期的弊病是“国家无根本之经纶，国民无中枢之志趣”。

德富苏峰在大正时期的活动，与其思想变化密切相关。其变化的思想，自然部分地来自他对社会现实的独特诠释。诸如“大正政变”、大正初年的内阁更迭、“宪政运动”等历史事件，都催促德富苏峰对新时期做进一步的思索。以德富苏峰观之，大正时期是处于“国家无根本之经纶，国民无中枢之志趣”^①的所谓混乱状态。德富苏峰力图为思想混乱的大正时期树立“国家根本之经纶，国民中枢之志趣”，以求整合自己与国民的思想。

何谓“根本之经纶”？“经纶”乃国家大政方针。何谓“中枢之志趣”？“志趣”乃国民精神。在德富苏峰看来，大正时期的弊病即在于“精神界的土崩瓦解”。这是德富苏峰对大正时期所抱有的危机意识的集中表现。其实“精神界的土崩瓦解”正是思想多元化带来的结果，也是“精神的杂居性”^②所带来的主流精神丧失的具体表现。对此，德富苏峰也有所注意。他指出：“日本国民不是思想上卓绝的国民。独自创造不是大和民族的长处。所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植手通有编前揭：《德富苏峰集》，第283页。

② 丸山真男著：《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14页。

以，其思想极易受到引进思想的影响并非始于今日。我在思考，日本是如何接受佛教思想的？如何接受孔孟思想的？如何接受程朱或王阳明思想的？进而，又如何接受密尔、斯宾塞的思想的？今日，日本青年是世界所有危险思想的储藏所，绝非不可思议之事。”^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德富苏峰把引进的密尔、斯宾塞思想也一并归到了所谓的“危险思想”之中。这表明德富苏峰在与西方思想告别。针对思想界的混杂状态，德富苏峰试图以“忠君爱国思想”来整合他自己的思想并整合纷繁复杂的思想界，从而为国民精神再次提供元气。即是说，德富苏峰为追求日本整体国民的“自我认同”在做思想上努力，力图使日本国民明白自己到底是谁？自己从哪里来？自己要到哪里去？那么，德富苏峰所谓的“非危险思想”又指哪些呢？那主要是指以“忠君爱国思想”为基础的“皇室中心主义”（关于皇室中心主义，后面还要详细展开）思想。即他的“自我认同”思想包括：日本国民宜是“皇民”，“皇民”是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下的大和民族的延续，目标是追求“世界第一等国”的国民身份。为了追求此一身份，德富苏峰鼓吹国家向外扩张。因而，德富苏峰又提出“尚武之精神”。他指出：“我大和民族。作为落后的民族，得以与白种人抗衡的条件之一，唯在拥有较其更多的朴实刚健。”^②他是在与白种人相比较的意识支配下，以“朴实刚健”来与其提倡的“尚武之精神”相连接。他认为，作为个人，不可缺少“尚武之精神”，不可具有“文弱之恶习”。所以，德富苏峰主张军队向国民开放，让国民参军，以此培养国民的“尚武之精神”。然“尚武之精神”又在于“输出勇气”，亦即“大和民族向海外发展”。且，“尚武之精神”不能只等待来自外部的煽动，必须来自内在的修养。因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第284页。

② 同上书，第320页。

此，德富苏峰认为，培养“尚武之精神”宜成为“青年精神修养”的关键所在。在此，“大和民族的海外发展”就成为德富苏峰主倡的“国家之经纶”的重要侧面，“尚武之精神”则成为“国民之志趣”的重点。这就是在大正时期思想界的混乱状态下，德富苏峰为自己和日本国民寻求思想上的“自我认同”而开出的“药方”。

其次，追求“中枢民族”之目标与归依“力的福音”。

在上述对外扩张思想的指导下，德富苏峰又把目光由个人转向整个民族，并提出了所谓的“中枢民族”的观点。“中枢”乃“核心、骨干”之意。在此，首先有必要对“人种”与“民族”的关系做一说明。除去单一人种构成的民族外，大部分民族是由不同人种在长期磨合中融合而成的，这样的民族又是以某一人种为核心的。在德富苏峰看来，这一核心人种，即他说的“中枢人种”或“中枢民族”。德富苏峰论及该问题的出发点，仍然是以欧美诸国为参照系。例如，他在谈及俄国时，认为俄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占有欧亚大陆一半的帝国，就在于斯拉夫人是其“中枢人种”。再如，德国的统一是以日耳曼人种为基础而完成的。大英帝国包括世界上的所有人种，其“中枢人种”则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世界的大帝国与中枢民族决非互不相容，实乃因此才得以成就世界的大帝国”^①。在谈及美国时，德富苏峰强调，美国虽然人种混杂，但其“中枢民族”仍是以盎格鲁—萨克逊人种为基础的。德富苏峰在对上述国家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时指出：“把国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其基础极为薄弱，难免动辄有土崩瓦解之危险。如建立在各民族的实力相当、不分伯仲的基础上，则有动辄相互倾轧、彼此冲突，甚而危及国家之忧。因此，日本帝国为谋求其将来之发展，须巩固其骨干的大和民族的团结，并培养其势力。如无视大和民族以求日本帝国之扩大，比拔掉基石、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第335页。

除掉族根还要愚蠢，只能招致自身的灭亡。”^① 基于此认识，德富苏峰对“大和民族的中枢”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以大和民族为中心，决不是排斥他民族。既然大和民族原本就是混合人种，因而与其他人种混合也无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我同化彼，还是彼同化我。欲以我大和民族为中枢民族，必须以大和民族来同化他民族。”^② 这里的“他民族”是指“朝鲜人与台湾人”。从德富苏峰的上述言论，不难看出，他是以大英帝国为理想模型来构建日本帝国的；是以“民族同化”为手段来追求“中枢民族”之志趣的。其思想再向前迈进一步，便转化为“东亚共存共荣”的思想。由此可见，他的思想中孕育着“大东亚共荣”思想的因子。

那么，德富苏峰想以何种途径来实现其“民族同化”的愿望呢？他主张以充实民族之“力量”的手段来实现。德富苏峰从民族发展的角度对所谓“力量”做如下解释，即“民族的觉醒是力量，民族的活力是力量，民族的一致也是力量。使这些力量得以发挥，乃大和民族当前之天职。”^③ 可以说，“民族的觉醒”是“民族活力”的前提。而只有当一个民族具有了“活力”之后，才容易达成“民族的一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德富苏峰认识到这些，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激发民族“觉醒”与“活力”方面，德富苏峰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处于教育的第一阶段，军队教育是第二阶段。接受这两个阶段教育的大和人民，“和平时是忠良的市民，一旦有缓急，在至尊的军旗下，则为护国之干将”。^④ 这是其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第335页。

② 同上书，第335页。

③ 同上书，第336—337页。

④ 同上书，第335页。

“全民皆兵”思想的表露。而他所谓的“民族的一致”暗含着“民族整合”的思想。“民族整合”，不仅意味着各种族间的“异质性与不平等性”^①的逐渐消失，还意味着各种族在思想上的相对统一，即形成我们平时所谓的“民族之灵魂”。而激发民族的活力，达成民族的一致均需要靠“自力”而非“他力”。正如他自己所说：“本文的趣旨虽长，但其归宿不外是宣传力的福音。”^②德富苏峰虽然在《时务一家言》的开篇谈到想要以独立的身份发表言论，但在文章的结尾处却又指出其撰写《时务一家言》的目的在于宣传“力的福音”，依然可见其对“实力”乃至“权力”的崇拜。即是说，德富苏峰以《时务一家言》来整合其思想的结果不过是重新阐释了“力学”关系。

再次，对“忠孝主义”的再阐释。

那么，德富苏峰认为宜以何种思想来整合当时极其复杂的思想界呢？他回归到儒学的“忠孝主义”上来。德富苏峰首先批判了政府领导人复活“忠孝主义”的政策，即他认为政府复活“忠孝主义”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在于：“其复活政策不是拥护日本帝国，而是以它来拥护萨长藩阀。不是以帝室的尊荣与国家的昌盛为目的，而是把它当作官权万能的手段。”^③因此，政府复活“忠孝主义”的政策，招致了世人的“冷笑”。但是，德富苏峰并不反对“忠孝主义”。他的这段话已经指出，“忠”的对象应该是“日本帝国”，“孝”的对象应该是“皇室”。德富苏峰认为对“忠孝主义”的应用，必须随时势而变化。即在新时代宜具有顺应新

① 参考范伟达、朱红生等著：《多元化的社会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②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336页。

③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155页。

时代的“忠孝主义”。他认为只有通过 1890 年颁发的《教育敕语》才能看到“忠孝主义”的真谛。德富苏峰认为，德川治世三百年，是以“忠孝”为核心的禁锢主义贯穿始终。明治维新在某种意义上是反禁锢主义的。如今，再次以旧时代的禁锢主义来组建社会，以原有的“忠孝主义”来灌输给明治时期的人们，其遭到冷遇在所难免。^①因而，德富苏峰强调“按时代的要求”来复活“忠孝主义”。如前所述，德富苏峰著述《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一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6 年。他所说的“按时代的要求”自然也包括这一特定的战争年代的要求。其“忠孝主义”也应该是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的。这样，德富苏峰的“忠孝主义”必然带有对外扩张的色彩。

德富苏峰对“忠孝主义”的再阐释，是其思想与西方思想相脱离的结果，同时也是德富苏峰为日本国民进行“自我认同”所提供的道德依据。德富苏峰的“忠孝主义”是在为日本国民“寻根”。此时，在国际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时期，德富苏峰提倡“忠孝主义”，实际是“恶用”了传统的“忠孝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德富苏所试图进行的思想整合是以非合理的反动思想因素为基础的。

最后，不断充实“皇室中心主义”。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在对自己的思想及整个日本国内思想界进行整合时，提出了“皇室中心主义”。实际上，他的“皇室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涵有一个不断充实的过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思想的产生应该是以解决时代的某一任务为己任的。即是说，思想具有时代的使命感。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大正年间的著述中（《时务一家言》、《世界的变局》、《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等）。其实，大江义塾时期

^① 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 156 页。

的德富苏峰就已经注意到皇室对日本的重要性。那是他在反对并批判当时的有司专制的寡头政府时，所提出的思想。他认为日本国的三根支柱是天皇及皇室的尊荣、扩大自由民权及日本国的独立。可以说，这是他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原型。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的增大，单靠国家干预与社会立法已经难以阻止与调和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德富苏峰的社会认识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德富苏峰重新探讨了皇室的存在价值。在1908年改订版的《吉田松阴》一书中，他对“皇室中心主义”做了如下解释：“皇室是大和民族的主干，我大和民族是其枝叶。日本国是其家族（皇室家族）的扩充物。天皇既是日本国民的元首，又是大和民族的家长。支那圣人的君即父思想，在我国是普通的事实。因此，皇室中心主义不是由逻辑演绎出的事实，而是由事实归纳出的逻辑。”^① 德富苏峰把儒学中的“君即父”的思想观念引进来，借以解释他所主倡的“皇室中心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说，他的“皇室中心主义”有回归儒学的意味。

伴随国际形势及国内政局的变化，德富苏峰不断赋予“皇室中心主义”以新的内容。例如，在1913年撰写的《时务一家言》中，德富苏峰认为日本的帝国主义是以大和民族为本位的帝国主义，平民主义是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平民主义，而连接帝国主义、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正是“皇室中心主义”。从国家的角度来观察，德富苏峰认为国家之元首在皇室。从民族的角度来观察，民族的首长在皇室。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的主干在皇室。他认为“皇室中心主义”可以把所有的主义、主张都包

^① 德富苏峰著：《吉田松阴》（1908年改订版），收入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581页。

容进来。^①不难看出，德富苏峰已经赋予“皇室中心主义”以“万金油”般的特性。德富苏峰还进一步指出：“我国民的举国一致只在于以皇室为中心的举国一致。……尤其现在，我日本社会变为世界思潮的汇合地，一切新奇思想、危险思想、破坏思想正在酝酿。但根本思想仍然是皇室中心主义。”^②很显然，德富苏峰把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多元思想均视为“新奇的、危险的、破坏性”的思想了，并从这一认识上的紧迫感出发，提倡“皇室中心主义”。即是说，德富苏峰是力图把“危险的思想”纳入合理的发展轨道而提倡“皇室中心主义”的。他提出，帝国主义应该是“皇室中心主义的帝国主义”，平民主义应该是“皇室中心主义的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皇室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样，无论思想多么“新奇、危险和具有破坏性”，只要它将天皇及皇室的尊荣放在第一位来考虑，那就不会给国家及社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德富苏峰欲以“皇室中心主义”思想为根本，来调和与融通其他思想。由此观之，可以看出德富苏峰的思想深处也存在着异质的多样性。因此，西洋文化思想的引进，不仅使日本社会变成了丸山真男所强调的“精神的杂居”地，而且还带来了每个人的思想来源的多元化。当然，德富苏峰也不例外。然而，德富苏峰的思维方式却是二元的。如前所述，德富苏峰把“东洋”与“西洋”、“平民主义”与“贵族主义”对立起来考虑问题。一战期间，他又把“皇室中心主义”与欧洲国家的某些思想对立起来考虑问题。例如，在1915年撰写的《世界的变局》一文中，德富苏峰指出：“吾人不必学习英国式的个人主义，不必模仿德国式的军国主义。我日本帝国有顶天立地的皇室中心主义。以它统一大和民族、振兴大和民族，以它在平时与非常时期鼓舞国民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第329页。

② 同上。

之斗志。因此，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以它来发挥日本帝国之国威。进而换言之，把英国的个人主义、德国的军国主义都作为我皇室中心主义的要素之一，采择其长处。”^①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德富苏峰“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膨胀”色彩。所谓“膨胀”，是说他的“皇室中心主义”不仅扩大了思想内涵，而且还欲以此为对外扩张的思想工具。在此，德富苏峰首先以“皇室中心主义”来强调日本国体的特殊性。其次，他欲把“皇室中心主义”作为整合民族、振兴民族及鼓舞国民斗志的思想工具，以它来追求“世界第一等国的国际地位”。再次，他以吸取英国及德国的思想来充实“皇室中心主义”。其“皇室中心主义”的“膨胀”色彩，显而易见，是德富苏峰试图解决时代任务的具体表现。

随着时代的变化，德富苏峰注意到思想界的变化，并企图为日本社会寻找他认为合理的、应位居主流地位的思想。这一过程不仅是德富苏峰对多元化思想界的“清理”过程，也是对其本身的多元异质思想的“清理”过程。此外，从思想、人格及行动的互动关系看，德富苏峰的思想异化带来了其人格外在表现的异常，行动则表现为与之相应的倾向。从“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德富苏峰的思想、人格及行动变化的真实性，同时又可以看到德富苏峰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的思想表现。

1916年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一文。在“大正的日本”一节中，他把“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内核——“忠君爱国”奉为“宗教之上的宗教，哲学之上的哲学，学问之上的学问”。德富苏峰提倡：“作为日本国民，不管是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世界的变局》，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578页。

谁必须具备这一日本魂，然后再按其所好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① 德富苏峰已充分意识到信仰的力量。他相信信仰的力量之大“可移泰山、可翻沧海”。因此，德富苏峰欲把“忠君爱国”及“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并想让日本国民像信仰宗教一样信仰“皇室中心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对“忠君爱国”思想作了“膨胀”的宣传，提倡所谓“积极的忠君爱国”。他指出：“我对大正青年的期望不只是忠君爱国，还宜是积极的忠君爱国、膨胀的忠君爱国、进取的忠君爱国。……忠君之第一义就在于把皇威布于四海，把皇泽披及八荒。爱国之第一义在于把大日本帝国建成世界第一等强国、雄国及正善之国。”^② 这样，德富苏峰很自然地把“皇室中心主义”与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连接起来。

后来，在二战期间，德富苏峰又把“皇室中心主义”规定为“日本学”的基本格调。他把《神皇正统记》作为“日本学”的首选教科书。由于该书阐述了日本之国体，明确了“皇室中心主义”之要领，所以德富苏峰把它尊为“日本精神的结晶”。同时，他还对传统儒学中的“和”的概念也做了系统的重释，把“和”的思想与“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结合起来，酝酿出他的“八紘一字”思想。他认为：“正如个人有个人之性格，各国家也有国家的特殊性格。……日本国家性格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和字。即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开篇的第一句‘以和为贵’之和字。和之一字，如将其扩充则变为八紘一字之皇谟、天业恢弘之圣猷、开拓万里之波涛、置国家于富裕安泰的圣诏。……和决非柔弱。和乃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之和。和是包容，和是协同，和是

^① 德富苏峰著：《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收入神岛二郎编前揭：《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 284 页。

^② 同上书，第 285 页。

同化，和是感化爱育。”^① 他是以传统儒学的“和”为装饰品，而鼓吹对外扩张的。“开拓万里之波涛”就是海外扩张的代名词。“和决非柔弱”，与其主张的“尚武之精神”相融通。“和是包容”则主要是要其他民族宜包容日本的对外政策。“和是同化”则是日本民族对他民族的同化。德富苏峰的“八紘一宇”思想与以后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同出一辙。

如上所述，德富苏峰“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及思想内涵的不断扩充，是其追求“国家认同”在思想上的表现。同时，德富苏峰还以“皇室中心主义”为思想前提来划分国际上的敌友，在国际社会中寻找伙伴。例如，在《昭和国民读本》中，他指出：“我国既有敌人又有朋友。我同行国之德国与意大利都具有伟大历史，都具有与本民族相应的特殊文化。我们不仅在防共这一点上相互合作，而且还以三国特殊的文化为基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斟酌，以求各自文化的发展与提高。……因此，三国防共协定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② 这还表明德富苏峰力图从“文化认同”^③ 的角度为其“皇室中心主义”寻找根据。

（三）人格整合的虚假性

本章第三节提及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断裂有三个方面的集中表现，因而，对其断裂人格整合的效果如何，就要看对这三个方面

① 德富苏峰著前揭书：《昭和国民读本》，第76—77页。

② 同上书，第298—299页。

③ 所谓的“文化认同”即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指出：“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弥补与缝合的程度怎样。对这三个方面弥补得好，整合就是成功的，人格走向独立。反之，整合就是失败的，人格的整合就是虚假的，人格仍然处于依附状态。其实，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仅应该具备英克尔斯所提出的四个重要的“心理特征”，而且，从历史—政治角度来看，要想保持“独立人格”，还必须具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即许纪霖所强调的“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批判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或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①。大正时期的德富苏峰所缺少的，正是这种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

大正初期，桂太郎去世以后，德富苏峰便结束了其所谓的“政治活动家”时代。在其发表的论文中也多次表现出想要独立的意欲。但就其实际的活动来看，其标榜的独立带有明显的虚假性。

首先，在1913年，德富苏峰虽远离政界，并以《时务一家言》放言舆论界标榜独立。但他仍然把《京城日报》与《国民新闻》作为舆论阵地，把报业活动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其标榜的人格独立则明显地具有虚假性。

为什么说这是虚假的？因为从上文论说可知，《京城日报》是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加之，当时《国民新闻》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浓。德富苏峰一方面标榜独立，另一方面又加紧与政界的联系，并充当政府殖民侵略的急先锋。德富苏峰不过是在标榜独立的“幌子”下，更为隐蔽地参与政界的具体活动，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其人格依旧是依附于权力的。在这个意义上，

^① 许纪霖著：《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德富苏峰对自我人格的整合是失败的，是虚假的。尤其不可忽视的是，1910—1918年德富苏峰的活动主要在政治活动与报业活动两个层面上展开，而且报业活动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桂太郎死后，德富苏峰与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的关系更加密切。这可以从德富苏峰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文书中找到线索。这一时期，德富苏峰依附于现实的政治势力而从事报业活动，因此，他不具备独立的人格精神。即是说，德富苏峰试图标榜独立以弥补人格断裂表现的第一方面以失败告终。他已被融入到政权中去了。

另外，德富苏峰虽否认自己的政治家身份，重新确认其记者身份，但他未能脱离政治。他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宜具备三个主要条件，即“忍耐力、金钱和地盘”。德富苏峰所说的“地盘”是指：“藩阀、军阀、财阀、学阀或闺阀（即以妻室为中心的裙带关系）”^①等。能够据有一方者，才可谓具有“地盘”。德富苏峰试图以自己不具备所谓的三个条件，尤其是“地盘”这一条件，来否认自己的政治家身份，并用以说明自己已经脱离与权力的关系。在此，德富苏峰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部门——报业机构。如果也以“阀”来划分的话，那么就《国民新闻》及《京城日报》的影响力来看，应该说德富苏峰是“新闻阀”的主要代表。他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是以经营报业为纽带的。而且，从《京城日报》是朝鲜总督府机关报及《国民新闻》的政治化两方面来看，很难说德富苏峰就是一个单纯的新闻记者。所以，他否定自己的政治家身份亦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他对自我人格的整合是虚假的。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富苏峰承担《京城日报》与《国民新闻》的联合报道任务，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护并为之服务。这再次证明了德富苏峰对其断裂人格进行整

^① 德富苏峰前揭书：《苏峰自传》，第418页。

合的虚假性。他已变成为战争服务的记者，已经丧失了真理认同上的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也不是依据内心的准则而行动，所以，1913年德富苏峰宣布独立，只能是虚假的。

其次，虽把“皇室”作为最高的“精神权威”，把“国家认同”作为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反映在人格上依旧是断裂的。

1918年德富苏峰断绝了与寺内正毅内阁的关系，试图重新恢复独立记者的身份，但从其以后的具体活动来看，他对自我人格及思想的整合都是虚假的。因为1918年以后，德富苏峰对自我人格的整合并未弥补与缝合上述的人格断裂表现的第二（丧失了思想的进步性独立性）和第三（“恶用”传统并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方面。与之相反，他反而在第二和第三方面走得更远。即他丧失了思想上的进步性与独立性，他的思想主张时时在为当前的政府辩护（尤其是在政府的行为将导致本民族走向险途时），并时时为政府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这充分表现在德富苏峰对“皇室中心主义”观念的极力推崇及不断充实上。“皇室中心主义”是德富苏峰试图整合自我思想及整个日本思想界的工具，它又是德富苏峰“恶用”传统思想及扩大其宣传力度的表现。

在大正的时代氛围下，德富苏峰追求的目标是“国家认同”，采取的手段是回归儒学。“皇室中心主义”是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的主要思想主张。这一思想连同前文提及的“忠孝主义”以及“大义名分”的思想，是德富苏峰所寻找的国家合理存在的精神归宿。“忠孝主义”与“大义名分”思想不过是“皇室中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不难看出，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有为日本民族“寻根”的意味。虽然，其中也包含着国民“自我认同”的因素，但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问题上，“个人”宜服从“国家”，“自我认同”宜服从“国家认同”。所以，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更多地是与“国家认同”相结合。即

“日本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国”从哪里来？它又要到哪里去？在这个意义上，“皇室中心主义”与“国家认同”不只是日本国民单纯的精神上的整合力量，它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取向的指导思想（德富苏峰在大正中后期的诸种主张的本意即在于此）。但就其作为德富苏峰人格整合的工具来看，不仅整合没有成功，反而还带来了其人格上的更大的断裂。因为大正中后期的德富苏峰，已将其所依附的对象由原来的藩阀势力置换为“天皇”。把“天皇”作为其赖以依傍的“精神权威”，只能说明德富苏峰进一步丧失了独立精神，并带来其人格的更大的断裂。

（四）追求“国家认同”的实质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把“国家认同”作为其追求的理想目标。即要完成国民对民族起源、国体、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认识的“举国一致”；在国际上追求“世界第一等国”的国际地位，力图得到欧美列强的认可，并与之共同处理国际事物。那么，德富苏峰是如何以它来整合民族的？即是说，他是如何追求“国家认同”的理想目标的？简单说来，德富苏峰是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来追求“国家认同”的。其“国家认同”又以“皇室中心主义”为指导思想。如前所述，德富苏峰曾试图以“皇室中心主义”来整合其思想、人格及日本思想界。追求“国家认同”又是“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过程。因而，“皇室中心主义”的性质直接影响到“国家认同”的本质。就德富苏峰欲以“皇室中心主义”与“国家认同”整合自我人格而言，其整合活动是失败的，是虚假的。他还“恶用”传统，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推动国家进一步对外扩张。在这个意义上，德富苏峰的“国家认同”活动带来了其人格的更大断裂。

首先，德富苏峰在内部追求“国家认同”的活动表现如下：

第一，对国民展开教化运动。其主要表现为德富苏峰强调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日本的危机感，从而对国民进行形势危机之教育。他要求国民宜具有为“日本帝国”的“献身精神”。前文曾提及，在大正时期，国民心态危机的表现之一是“粗俗化”倾向。当然，德富苏峰也注意到这一倾向。因此，他提出应从“国民精神”及国民的伦理上对国民进行再教育。在《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一文中，德富苏峰指出：“我帝国的一大病根就在于国家无理想，国民无志向。”^① 在《国民思想问题》一文中，德富苏峰谈到：“我日本国民的现状是惰性十足，不思政事。其可忧患之处在于奢侈淫逸、荒唐无度。”^② 德富苏峰在《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一文中所说的“沉溺的青年”，即指这一类型的人们。因而，对大正青年进行伦理及道德教育便成为教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再教育的宗旨即是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与“皇室中心主义”思想。企图以此来把“沉溺的青年”从“私欲横溢”的陷阱中解救出来。此外，针对1918年爆发的“米骚动”，德富苏峰曾在《国民新闻》上匿名发表了4篇社论。其中，他把“米骚动”看作是社会一阶级集团追求“私欲”而带来的“混乱”。他还认为“君德”如“膏油”，如果将其注入到人民之中，则会使各机关、各阶级的相互抵触、冲突、倾轧变得圆满及平滑。他试图以“皇室中心主义”来调整“混乱失序”的社会，重新使之走向秩序化。所以，德富苏峰提出“以皇室中心主义为经，以平民主义为纬”。即以“平民主义”把广大民众包容进来，再把他们引向“皇室中心主义”。这即是其所提倡的“皇室中心

① 德富苏峰著前揭论文：《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280页。

② 德富苏峰著：《国民思想问题》，发表于1918年5月7日的《国民新闻》。转引自有山辉雄著：《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第199页。

主义的平民主义”。从而，使国家、政治及生活伦理以“皇室中心主义”融通起来并使之形成有机的一体，以便进一步把个人的能动性转化为“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能量”^①。

第二，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自1918年7月1日连载《近世日本国民史》起，德富苏峰便把撰写历史作为自己“晚年之天职”与“毕生之事业”。其撰写历史的主要动机是想要在大正时期的国民中培养“明治中兴之精神”。德富苏峰认为从历史中可以寻找到“明治中兴之精神”的源泉，即他认为“明治中兴之皇谟渊源于织丰时代”。在他看来，“织丰时代”是以皇室为中心统一国家，并将其势力向海外发展的时代。所以，他把“织丰时代”的历史作为向国民进行教化的最好的历史教科书。他进一步指出“皇室中心主义”是“大和民族的精神食粮”、“大日本帝国兴隆之泉源”。为了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1919年12月，作为《国民新闻》1万号的纪念事业，德富苏峰创办了“财团法人国民教育奖励会”。1923年又建成青山会馆，德富苏峰以它为“平民大学”向国民展开教育。1925年5月，德富苏峰在青山会馆开设了第一次“苏峰历史讲座”，做了题为《历史及历史学家》的演讲。在1926年4月的第二次讲座上，德富苏峰以《历史学家赖山阳》为题，做了演讲。德富苏峰欲在历史中寻找民族根性，并教化民众。

第三，德富苏峰重释“民本主义”与渐进的“普选论”。这是德富苏峰对时代风潮所作出的反应。当时，“民本主义”思想是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它的主倡者是东大教授吉野作造。

^① 德富苏峰在《国民新闻》上发表的4篇社论分别是：1918年8月15日的《追究内阁大臣的责任》、1918年8月16日的《社会危机》、1918年8月17日的《发扬君德》及1918年8月18日的《先决问题》。参考有山辉雄著：《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第199、225页。

德富苏峰对“民本主义”^①进行再评价时指出：“社会上之言论人动辄以民本主义论及近世思想。我帝国之历史，实以民本主义贯穿始终。……此主义实乃我皇室列圣相传之根本主义，并在孝明天皇、明治天皇时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民本主义乃人君天职之真谛。”^②其意在指出，日本自古以来就具备“民本主义”之传统，“民本主义”实是“君德”的显现。既然主君能以“民”为“本”，那么“民”就应该以对主君“尽忠尽孝”为己任。这样，德富苏峰很自然地把“民本主义”思想与民众的“尊皇精神”结合起来，把“民本主义”思想轻松地吸收到他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中，并为其追求内部的“国家认同”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另外，德富苏峰也注意到大正时期民众要求“普选”的潮流。对此，他提出了渐进的“普选论”及“皇室中心主义的普选论”。这也成了德富苏峰追求内部“国家认同”的重要侧面。他认为到明治末期，虽出现了选举权逐渐下移（即不断向下层民众扩展）的喜人现象，但是，这还不够，还须普及政治教育及彻底调和各阶级的冲突作为实现普选的前提条件。因而，他主张，“普选”的实施要渐进。这实际表现了他对“民众”的不信任态度。早在大规模“普选”运动还未抬头之际，《国民新闻》就刊载了主张“普选”的文章。德富苏峰在1913年撰写的《时务一家言》中，就曾指出“阻塞民心比阻塞河流还难”^③。所以，为

① “民本”思想主要是来自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尚书》、《论语》、《孟子》中的“民本”是指政府在施政时要以老百姓的要求、意愿为出发点，即顺民。与民主学说中的人民主权或多数人的统治无关。即是说，“民本”不要求进行多数人的统治。

② 德富苏峰著前揭论文：《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144—145页。

③ 德富苏峰著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第331页。

了预防“重大祸乱”的发生，他主张让民众参加政治，借以疏通民心，对国民因势利导。他所谓的“重大祸乱”是指多样化的民众意识给社会带来的混乱状态。那么，如何才能把国民之纷杂之意识引向合理的方向？他认为，一在于教化国民，二在于以“皇室中心主义”为中心，实施“普通选举制度”。在1919年12月6日，《国民新闻》发行1万号之际，德富苏峰撰文主张以“普选”来防止“危险思想”。与此同时，设立了“国民教育奖励会”。可见，德富苏峰是在“普选与国民教育”表里一体的情况下来宣传其主张的。但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皇室中心主义”。即是说，德富苏峰提倡实施“普选制度”是在制度体系上推进“皇室中心主义”的策略。所以，他的“普选论”是“皇室中心主义”的“普选论”。

上述论说表明，“天皇”是德富苏峰依赖的“外在精神权威”，是其判断一切的标准。他以“皇室中心主义”来整合自我人格，以“皇室中心主义”教化民众并整合民众的思想意识，以“皇室中心主义”来整合日本的“政治系统”与“制度系统”，以求完成内部的“国家认同”。就其不是依据自己的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这一点来说，德富苏峰仍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因而，德富苏峰在追求日本内部“国家认同”的具体实践中对自我人格的整合只能是虚假的。其变异的指导思想带有浓重的“回归儒学”色彩。

其次，德富苏峰追求外部“国家认同”的活动具体如下。

德富苏峰在以“皇室中心主义”来统一国民思想、追求内部“国家认同”的同时，也追求“世界第一等国”的国际地位，即所谓的外部“国家认同”。

第一，主张打破“白阀”。德富苏峰把白种人视为与日本的“藩阀”同样的专权势力。因此，他主张要像打破国内的“阀族”势力那样打破白种人对世界的“专制”，即“打破白阀”。这里

存在着德富苏峰观察问题的“二元化”思维模式。即日本国有“藩阀”，世界则有“白阀”。在追求国家发展并追求国家的内外认同上，不仅要打破国内的“藩阀”，也要打破国际上的“白阀”。德富苏峰在1913年5月发表的《白阀》一文中指出：“世人只论及藩阀、学阀、财阀、军阀、党阀以及闺阀（依裙带关系而形成的派阀），但还未论及白阀是什么？”^① 德富苏峰以此唤起世人对“白阀”的注意。在《时务一家言》中，他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所谓打破白阀之意何也？打破其阀是也，并非打破白人。……盖东西文明之融合、黄白人种界限之扫除，皆始于彼我平等之交往。打破白阀乃第一步。合作、提携须待平等交往以后。若未及平等交往，则合作非合作，实乃降服。提携非提携，乃服从是也。”^② 另，“我所谓的打破白阀，不是向白人挑战而是使日本国民之人格得到彼等之承认。”^③ 因此，德富苏峰视“打破白阀”为追求世界第一等国的国际地位的必经阶段。从时代背景来看，德富苏峰的“打破白阀”实有排外的意图。正当国内护宪运动高涨之时，德富苏峰以“皇室中心主义”强调日本国体的特殊性，对“拥护宪政”有他自己的阐释。即“所谓宪政是依宪法行使的政治。所谓宪法者何？非美宪、非英宪，乃日本帝国宪法是也。”^④ 不难看出，“打破白阀”的深层内涵还应包括打破日本国民欲在日本实施美英式宪法及宪政的迷梦。即想要在为宪政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式上来打破“白阀”的优越地位，使世人认识到日本的宪法是独特的，也有为

① 德富苏峰著：《白阀》，和田守等著《近代日本的思想（2）·德富苏峰、大杉荣、尾崎行雄》，第61页。

②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时务一家言》，第332页。

③ 同上书，第333页。

④ 同上书，第321页。

他民族提供借鉴的可能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打破白阀”是德富苏峰的内部危机感在外交上的一种表现。他企图以“打破白阀”缓解令人担忧的“护宪运动”及日益高涨的“德谟克拉西”运动，并使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打破白阀”应具备哪些必要条件呢？他认为：“首先，自己要具备强大实力。第二，把实力善用于正义公道之上。”^①这是德富苏峰在《时务一家言》中所提倡的“向力的福音归依”的思想根源之一。德富苏峰抛弃和平论转而提倡“实力论”，先前的进步性丧失殆尽，再次证明了其人格的断裂性。因此，可以说他的“打破白阀”论暗含着使日本走向权力世界，并成为他民族榜样的强烈意欲。

第二，鼓吹“亚洲门罗主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对外关系方面，大正后期的德富苏峰思想转向主张“亚洲门罗主义”。当时，在日本之外有美国的“泛美主义”及“门罗主义”，与之相对，大正后期，德富苏峰则提出了“亚洲门罗主义”。这是德富苏峰“二元化思想模式”在对外关系上的又一体现。如果说“打破白阀”有期待得到西欧列强认可的来自外部“国家认同”的意欲，那“亚洲门罗主义”则有以日本为亚洲之盟主与欧美列强对抗之意图。

“亚洲门罗主义”即“亚洲的事物由亚洲人处理”之主义。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打破白阀”的基础上，与欧美列强相抗衡，并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二是在“东洋自治论”的美名及在将“皇泽”披及东亚各国的幌子下，对东亚各民族进行侵略。例如德富苏峰在《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中指出：“如果除日本国民之外，便无能够承担此任务的民族，那

^① 参见有山辉雄著：《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第299页。

么亚洲门罗主义即是由日本人来处理亚洲事物的主义。”^① 并且，德富苏峰把“亚洲门罗主义”视为“帝国之使命”。关于实施此使命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实施亚洲门罗主义的首要条件就在于：必须具备受其他东洋人种之尊敬、使白色人种畏惧的地位。”^② 这充分表明，德富苏峰既期待得到欧美列强承认日本是“文明的世界一等国”，又欲使作为“宇内共通之文明”的“帝国主义”正当化。德富苏峰是在既依存又对抗的国际关系的双重性中，追求“国家认同”及日本帝国的“膨胀”的。德富苏峰的“亚洲门罗主义”所起到的作用，是在“恶用”传统的前提下，推动国民及国家走向战争。因此，就“亚洲门罗主义”所带来的德富苏峰人格的进一步断裂来说，德富苏峰前此对自我人格的整合带有明显的虚假性。

第三，反对“美化”，抵制“赤化”。

从上文所提到的德富苏峰的心理期待可以得知，他对欧美列强具有很强的依附心理。他的依附心理有两个方面：得到欧美的承认；与欧美对抗，强调日本帝国的独特性。对欧美列强的恐惧及其带来的过激言论是其依附心理的极端表现。即是说，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是在国际关系既有依存又有对抗的双重性的认识的基础上，来展开其言论活动的。

如所周知，大正中后期正是一战结束及战后处理的历史时期。“国际和平”、“国际协调”一时间成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新取向。此外，还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此后重建国际关系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

① 德富苏峰著：《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第 230 页。

② 同上书，第 230 页。

“十四点原则”^①，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此时的“和平”、“国际协调”及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等思想主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德富苏峰把国民思想受其影响的种种迹象概括为“美化（美国化）作用”、“赤化作用”的外在表现。在《国民自觉论》中，德富苏峰指出：“所谓美化作用，是指在精神上变成美国人。即把美国作为日本人的理想故乡。……美化作用有种种倾向。或醉心于美国的富强，或以美国为理想之国度，或以美国为文明之发源地。总之，即崇拜美国。”^②其中，日本国民对金钱的崇拜是最危险的。他强调指出：“美国式拜金主义是最危险的。……美国崇拜、金钱崇拜、物质崇拜、成功崇拜都是一体的。日本美国化的意义即是日本物质化、利己化与金钱万能化。”^③所谓“赤化”即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国民意识中的渗透，并使之呈现出共产主义的倾向。德富苏峰担心的是在“美化”及“赤化”的影响下，会丧失日本固有的“皇室中心主义”的观念。因此，他企图以“国民自觉”的论说来唤起日本国民的“觉醒”。德富苏峰强调“尚武之精神即国家之元气”，还提倡“国民皆兵”的思想。其依据是他所提倡的

① 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其主要内容：第一，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第二，抵消并消除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第三，要求在给欧洲及近东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受到列强保护、实行门户开放原则的保护国。第四，处理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参考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② 德富苏峰著：《国民自觉论》，神岛二郎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德富苏峰集》，第353—354页。

③ 同上书，第354页。

“举国上下只应返回五条誓文”。他说：“目前，丝毫没有必要再确立国家之大政方针。我认为举国上下只应返回五条誓文。全民皆兵包含于其中，普通选举包含于其中，废除特权阶级在于其中，而且，皇室中心主义亦在于其中。”^① 这是德富苏峰在思想、文化上，与欧美列强对抗的武器，也是其在追求“国家认同”上，为日本国进一步走向“膨胀”所找到的政策依据。在重建国际关系的新形势下，“恐美恐俄”的心理是日本对欧美既依存又对抗的根源。这集中反映在德富苏峰反对“华盛顿会议”的舆论宣传上。例如，他对美国式的“和平”进行了攻击。他宣传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条约，与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具有相同的性质。并在1922年《国民新闻》的元旦号上，刊载短文《卧薪尝胆》作为“新年寄语”，企图再次煽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他就1924年美国制定的加州移民法问题，在《国民新闻》上做了蛊惑性宣传。第一，移民法是“对我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其“不在于利害，而是与我国的脸面相关”。第二，据此，可以揭穿美国“正义人道”之假面，使其暴露出“帝国主义”之真实本质。第三，移民问题不只是“美国对日本的问题，还是美国对有色人种的问题”。第四，“国际关系的结果是力与力的角斗”。第五，“美国化会给日本带来危险”。^② 德富苏峰在重建国际秩序的强烈意欲支配下，推动着日本帝国向战争的道路迈进。德富苏峰“反美反共”的主张是其对美苏既想依存又存恐惧的极端表现。可以说，近年来，石原慎太郎的“反美反华”言论即是出于相同的心理。当他们对其他民族既想依存又存恐惧的时候，往往容易走向极端。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潜在的危险倾向就会暴露无遗。尤其，在国际关系相对紧张的历史时期，这种

① 德富苏峰前揭论文：《国民自觉论》，第380—381页。

② 参考有山辉雄前揭书：《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第317—318页。

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上述论说表明，不管德富苏峰在整合其断裂人格时采取何种手段，都没能使其彻底地与政界及权力或威权脱离关系，都没有使其思想再度沿着先进的方向发展，都没有使其停止“恶用”儒学。也就是说，从德富苏峰对自我人格进行整合的过程来看，他对作为人格断裂表现的三方面的弥补与缝合所收到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以彻底失败告终，因而只能说是虚假的整合。不仅如此，德富苏峰还找到了更具“威权”的外在精神权威“天皇”作为依附的对象，因而带来了人格的更大断裂。

小 结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试图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行为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功能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系统由四个亚系统组成，即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整合）系统^①。在功能上，虽然各具独特作用，但其中一个子系统与其他三个子系统密切相关，紧密相连。他还认为，四个功能亚系统是通过一系列的输入输出（即所谓的“投入产出交换”^②）均衡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系统与制度系统又属于政治领域的不同侧面。政治系统的重点在政府、政治权威与权力，制度系统主要指在法律体系中形成的制度化规范或社会规范、道德规范。“权力来自政治系统对社会的产出，共属或团结性来自整合（制度）系统对社会的产出”，“政治系统为了达到社会特定的集体目标，就要发挥动员其社会

① 参考（美）帕森斯著：《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② 帕森斯前揭书：《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第133页。

的精神的、物质的资源之功能；制度系统则要发挥使单位相互间的合作制度化的功能”^①。笔者认为，帕森斯的理论对于分析近代日本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思想、人格及行为表现，说明他是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至于德富苏峰在大正时期的作用，可以认为他是政治领域中政治系统与制度系统的“中介物”。德富苏峰的作用表现为，为树立领导者的美好形象而进行蛊惑性的宣传，以便使其获取更多的支持者。他在政治层面主张“皇室中心主义”，并以办报刊、设立青山会馆等形式向大众进行宣传、教化，他不是一个不依附权力的纯粹的新闻记者。

之所以说德富苏峰是政治系统与制度系统的“中介物”，是由于在大正时期，他以“大义名分”、“忠君爱国”、“皇室中心主义”等言论为桂太郎内阁、寺内正毅内阁进行辩护，并将其由制度系统输入到政治系统中去。其对应的输出则是整合力，即民众的共属意识及凝聚力的产生。另外，整合力还表现在政治系统与制度系统之间的交换——领导与支持的均衡上。在大正时期的日本，则表现为接受皇恩与对天皇制政府的无条件服从之间的交换。但为了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多元化的思想相抗衡，德富苏峰有意夸大“忠君”观念，把它再度^②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同时，也把它作为对外扩张的有力工具。德富苏峰在政策上所作的舆论支持，则是主张返回“五条誓文”。在这个意义上讲，德富苏峰的确充当了政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

^① 参见（美）罗博特·贝拉著，王晓山、戴茸译：《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8页。

^② 为什么说是再度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呢？是由于“德川时期的日本忠诚观念高度地输进了政治体系中”。参见（美）罗博特·贝拉著：《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第27页。

另外，说德富苏峰是政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还表现在德富苏峰与军部^①的关系上。德富苏峰的言论，诸如“尚武之精神乃国家之元气”、“国民皆兵”等思想主张，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作为其相应输出更加完善了军部体制，并使其沿着超越政府而独自决断走向战争的方向迈进。

有如所知，明治政权建立之时，最初的军队及军事制度即是“御亲兵”。1882年1月，由天皇颁发了《军人敕谕》，开篇说：“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故朕视尔等为朕之肱股，尔等宜视朕为首领”^②。正由于天皇是唯一的国家统治者，所以军队也是天皇的军队。这样，从一开始军队就是与民众相分离的。1878年的统帅权的独立、参谋本部的设立及参谋部部长的“帷幄上奏”权，都使得“军部”向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道路更前进一步。因此，日本战前的“军部”，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军队的意义完全不同。这与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对“强兵”政策的过大宣传有关。加之，“苏峰类”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言论宣传更助长了军部的嚣张气焰。甲午战争以后的德富苏峰的思想、人格及行动表现是其最好的证明。在《大日本膨胀论》中，德富苏峰为甲午战争进行了辩护。在《时务一家言》中，他的思想归宿是对“力”的崇拜，并强调在“皇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注重民族的凝聚力与团结力。在1922年的《国民自觉论》中，德富苏峰强调“国民皆兵”、“把军人之教养

① 所谓的“军部”不只意味着是国家机构的军事部门。这一军事部门是以陆军的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陆海军两省为中心，从政府、议会与国民中独立出来的政治势力。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其政治势力得到加强。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后，陆海军军人、国民则把对国家大政实施独裁的陆海军称作“军部”。

② 井上清编：《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岩波书店1969年版，第351页。

普及到民众中间去”等。在昭和年间，德富苏峰作为言论界的“重镇”与政府、军部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军部法西斯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德富苏峰于言论界进行蛊惑宣传，作为其相应的输出，调动起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大部分民众盲从军部法西斯战争体制。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德富苏峰就是一个政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由此，他本人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例如，清泽冽在《黯黑日记》（1944年的记载）中，记载道：“‘不敬罪’在我国有几个。（1）皇室、（2）东条首相、（3）军部、（4）德富苏峰——不允许国民对他们进行丝毫的批判。”^①看来，德富苏峰的地位几与皇室、首相、军部相等同，但实际上，政府与军部中枢是把德富苏峰作为“面向国民的一张面孔”^②来加以利用的。

不言而喻，德富苏峰所代表的是日本近代的一类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他们趋近政权或直接参与政权，并参与政策的制定。（2）“国家对外扩张”是“苏峰类”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因而，这类知识分子是民族沙文主义、大国强权主义的忠实主倡者。（3）利用传统价值观，以“恶用”传统思想为特色，以“皇室”为他们所依傍的“精神权威”。例如，德富苏峰重释《论语》，提倡“忠君爱国”，宣扬“皇室中心主义”，可以说是日本传统文化在其思想中积淀的结果。不过，大正中后期的德富苏峰赖以安身立命的已不是自中国引进的原始儒学，而是经他一变再变的变质了的儒学。他对儒学的重释与宣传，是以其“对外扩张”意识为前提的。他主张使国

① 清泽冽著：《黯黑日记》，桥川文三编辑、解说，评论社1995年版，第304页。

② 和田守等前揭书：《近代日本的思想（2）·德富苏峰、大杉荣、尾崎行雄》，第71—72页。

家强大，因而利用“儒学”。在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德富苏峰是一个“恶用”儒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类知识分子虽未武装到牙齿，但是，十分危险。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历史时期或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对这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宜特别加以警惕。(4) 此类知识分子是加固传统政治文化的有利武器，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牺牲品。这类知识分子是“体制内对外扩张型知识分子”。

以上，论及了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作用及“苏峰类”知识分子的特点。如果仅就德富苏峰的思想、人格、行动的互动关系而言，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的合力，决定着行动力量。进步的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及其二者的合力会给社会带来正面效应，与之相适应，知识分子的人格多表现为独立性。相反，落后的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及二者的合力会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与之相适应，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依附性的。这里存在着“进步”与“落后”、“独立”与“依附”、“正效应”与“负效应”的“二元对立”。在整个大正时期，德富苏峰在思想、人格及行动上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他的思想是变异的，人格是断裂的，这决定了其行动是给社会带来危害的。

如本章的第二节着重分析了青年期德富苏峰的“平民社会秩序观”的形成过程及其独立人格的确立过程。德富苏峰“平民社会秩序观”的形成过程是其思想的第一次变异过程，即以欧美的先进思想为出发点，与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汉学思想相脱离的过程。与吸收先进思想相对应，这时的德富苏峰的人格尚表现出相应的独立性，其主张及行动还能引导社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然而，思想变异是一把“双刃剑”。在德富苏峰思想的第一次变异过程中，他不仅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思想，而且还吸收了西方思想中为发展民族经济而主张对外扩张的反动的思想。其思想的第二次变异就是以这种反动的思想因素为出发点的。表现在具体行动

上，德富苏峰在明治后期向政界及权力靠拢，带来其人格的重大断裂。在整个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及行动则主要是为国家的对外扩张服务。（详细论述见本章第三节）当德富苏峰向权力靠拢之举动受到舆论界的非难时，他便远离政权并放言舆论界标榜自己的独立。但从其具体活动来看，他标榜的独立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他对自我人格的整合也是虚假的。仅就其“恶用”传统并加大其宣传力度、并时时为政府服务来看，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详细论述见本章第四节）

其次，德富苏峰的思维模式是“二元”^①的。例如存在于德富苏峰思想中的“贵族与平民”、“封建与近代”、“武备（军事）与生产（工业）”的“二元对立”及后来的“白阀与藩阀”、“美洲门罗主义与亚洲门罗主义”、“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的“二元对立”。在德富苏峰头脑中，就连日本也有两个。即如清泽冽在其《黯黑日记》中所指出：“隔了很久读《改造》，其中有德富苏峰的刊头论文。不管时局是悲观、乐观，对此加以论之。且，他把日本的近况抨击为‘不热情’、‘形式主义’。在他的头脑中存在着两个日本，即神国日本与堕落日本。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堕落是由于西洋个人主义影响的结果。”^②从清泽冽的分析来看，德富苏峰对个人主义思潮是抱有恐惧心理的，他欲以“皇室中心主义”思想抵制甚至扼杀“个人主义”思潮。于是便有了“皇室中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虽说德富苏峰的思维模式是“二元对立”的，但他的思想来源则是多元并存的。有儒家思想、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基督教的思想、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等。他的思想的变异过程亦先后经历了脱离传统的儒家

① 参见隅谷三喜男前揭书：《日本的名著40·德富苏峰·山路爱山》，第17页。

② 清泽冽前揭书：《黯黑日记》，第304页。

思想，转而主张欧美式的“平民主义”；再脱离“平民主义”转而“回归儒学”，在儒学中重新获取国家对外扩张的能量。在国际舞台上，德富苏峰以再阐释儒学时所提倡的“皇室中心主义”来追求“自我认同”、“国家认同”及“文化认同”的内在统一。按隅谷三喜男的说法，德富苏峰之所以没有受到任何的心理障碍而完成其思想的变异过程，就在于德富苏峰思维模式的“二元化”。



第三章

“民本主义思潮”与吉野作造

在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中，“民本主义”思潮属于合理的、改良性质的思潮。它的主倡者是吉野作造。与德富苏峰相反，吉野作造始终站在体制之外坚持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动日本的政治结构向良性方向发展。从人格的角度来看，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并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人生。他关注国内的政治状况及社会状况，但又远离权力的中心。他撰文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原理和国家观，明确了民主与政治改革的关系，论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政治问题。他观察本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运转实态和民众运动的实际状况，并对这种状况进行相对客观的分析，然后提出了“民本主义”。他的“民本主义”代表了大正时期大部分中小工商业者和广大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因此，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同时，吉野作造通过“民众运动”这一主要的手段，将广大民众的要求（按伊斯顿的观点，民众的政治要求属于将环境因素向政治体系输入的类型之一）输入到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去。然后，再通过“民众运动”迫使政治体系的核心，即政府、政治权威与权力的所有者们对其要求进行综合整理。最后，使得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结构作相应的调整，使其政治结构或以新的组织形式、或以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制度及法规的形式输出到环境中去。这

样，就完成了—次“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转换及输出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政治层面的表现就体现了“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只要存在着阶级，那么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转换及输出就不会停止。

就大正时期政治结构的调整状况——即政党内阁制、普选制的实现而言，吉野作造及其所领导的“民众运动”的政治要求基本实现。在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要求的过程中，吉野作造并没有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始终保持着人格的同一性，并将自己的独立人格统一到生命最后。本章将探讨吉野作造在推动日本“政治体系”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如何维护了人格的独立性与同一性，推动“政治体系”作调整的主要手段如何，以便探明吉野作造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在大正社会转型期的作用及特点。

一、吉野作造的人生历程

吉野作造既是一位政治学者，又是一位政论家，并且是特别注重其“发言的政治效果的政论家”^①。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在接受老师的指导和自己亲自参与民众运动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既有指导日本内政改革的思想，也有指导日本外交政策的构想。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他的“民本主义”思想也不断完善。根据吉野作造对“民本主义”思想的完善及其推动政治结构发展的具体过程，可以将其人生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 松尾尊允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筑摩书房 1976 年版，“解说”，第 467 页。

(一) “民本主义”思想的酝酿

在学问上，吉野作造的老师小野塚喜平次给他很大影响。例如，小野塚喜平次反对将政治视为“为政者之术”，主张将政治视为“国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并将“Democracy（日文中的デモクラシー）”一词译为“众民政治”^①。吉野作造接受了这一想法，并将“Democracy（日文中的デモクラシー）”一词译为“民本主义”。在信仰上，吉野作造曾经在浸礼教会接受洗礼，后来加入海老名弹正的本乡教会。他为海老名弹正的自由神学所吸引，并受安部矶雄、木下尚江等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增加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心。1915年，“民本主义”的大体框架已经形成，吉野作造在《欧美宪政的发达及其现状》一文中初次使用了“民本主义”概念。同时，吉野作造确立了独立人格。

吉野作造，1878年1月29日出生于宫城县志田郡古川町的一个中小工商业者家庭。1884年，吉野作造上小学。1898年7月3日，在仙台的浸礼教会接受洗礼。那时，与铃木文治相识。1900年9月，吉野作造中学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学习。后来，转入牧师海老名弹正的本乡教会。1901年9月，他听取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讲座，又醉心于一木喜德郎^②的法学。11月，在好友小山东助的引导下，吉野作造对社会主义产生了

① 松尾尊允编辑前掲书：《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解说”，第461页。

② 一木喜德郎（1867—1944年），官吏，法学家，静冈县人。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毕业，进内务省任职。1893年兼任帝大教授。1900—1917年任贵族院议员。从1901年开始，在大学教授行政法、宪法及国法学。曾任桂内阁的法制局局长。多次就任内务大臣。1934年任枢密院议长。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发生后，因他是美浓部达吉的老师，所以他于1936年辞职。

兴趣，接近安部矶雄与木下尚江等人。1904年7月，吉野作造从政治系毕业，进入研究生院学习。9月，发表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基础》一文。1905年1月，他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在文中，吉野作造提倡“主民主义”。2月发表了《何谓“国家魂”？》、3月发表了《答木下尚江君》等文章，同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非战论”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并阐述自己的国家观。9月，吉野作造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一文。在海老名弹正的影响下，他曾认为“日俄战争”是一场“义战”^①。1906年1月，吉野作造到中国，担任袁世凯（当时的直隶总督）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7年9月，他担任北洋政法专业学堂的教习，李大钊就是他的学员。1909年1月，他回国任东京大学的副教授。1910年4月，吉野作造为了研究政治史与政治学赴欧美各国留学。在欧洲，他亲眼目睹了工人党领导的示威运动，实地考察了欧洲的普选沿革，学习了英国缩小上院权限的问题。这一切都为吉野作造以后提出“民本主义”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1913年7月3日，吉野作造返回日本。1914年4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评价了民众的势力，增强了对民众的信任感。7月，他晋升为教授。1915年6月15日，吉野作造组织“大学普及会”，发行了《国民讲坛》杂志。6—7月间，他在《国民讲坛》上发表了《欧美宪政的发达及其现状》一文。在文中，他将自己的思想概括为“民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吉野作造曾一度支持大隈重信内阁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这足以说明，虽然吉野作造在政治上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有关外交问题的认识上仍表现出一定的落后倾向。

^① 松尾尊允编辑前掲书：《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解说”，第462页。

（二）“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实践

如上所述，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他在“政治体系”外部环境（国内环境与国外环境）的亲身实践与观察思考中逐渐形成的。经过这样的充分准备后，1916年1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吉野集中地论述了“宪政”及作为宪政精神基础的民本主义及议会政治等问题。这样，其相对系统的“民本主义”理论体系就形成了。同时，这一理论体系直接反映了吉野作造意欲改革“政治结构”的设想。为了使改革设想变为现实，吉野作造热心地投入到大正民主运动中去，并以“民本主义”指导运动。此外，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曾经通过演讲的形式与不同政见的人进行辩论，维护“民本主义”思想。他还曾经参与创建团体组织，为其成员制定行动纲领。一战后，面对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吉野作造对自己的“民本主义”理论体系也做过策略上的调整，使其更加注重实际内容。吉野作造上述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让民众认可自己的思想主张，让居于“政治体系”核心地位的统治阶级接受其改革“政治结构”的设想。其结果，吉野作造成功地推动了“政治体系”内部“转换”过程的完成。1924年加藤高明组织的“政党内阁”与1925年颁布的《普通选举法》是“政治体系”对环境的“输出”。在推动“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转换—输出”的具体实践中，吉野作造保持了人格的“同一性”。

1916年1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一文，使他一跃成为论坛的宠儿。3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混乱》一文，在文中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形势

进行了预测。1916年3月27日至4月19日，吉野作造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旅行，考察了日本在两地的殖民政策。6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考察满韩》一文，批判了日本的殖民政策。至此，在“政治体系”的国内环境方面，吉野作造提倡“民本主义”，努力将“以民为本”的要求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在“政治体系”的国外环境方面，吉野作造通过考察中国与朝鲜，开始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努力探索日本与中国、朝鲜的友好外交政策。通过这三篇文章，可以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论”^①所涉及到的对内对外的基本理念大体形成。

1917年4月，吉野作造著文《俄国的政变》，支持俄国的“二月革命”。8月，吉野作造出版了《中国革命小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坦率地讲解了中华民族复兴国家的努力，也说明了他本人敬佩中华民族的缘故^②。1918年1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民本主义的意义及再论完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一文。在该文中，吉野作造对“民本主义”做了战略上的修改。4月，他著文《所谓出兵论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吗？》，以批判“西伯利亚出兵论”。10月，以吉野作造为中心，赤松克麿、宫崎龙介等人组建“普选研究会”，后来的“新人会”是以它为前身而组建的。11月23日，吉野作造与“浪人会”在神田南明俱乐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并获胜。12月23日，吉野作造与福田德三组建了“黎明会”。1919年1月，吉野作造执笔撰写《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顺应政策和对应政策》。吉野作造认为，

^① 松尾尊允编前揭书：《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解说”，第468页。

^② 吉野作造著：《中国革命小史》中的“序”，收入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太三编：《吉野作造选集 7·中国论（一）》，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3页。

为了日本帝国将来的发展，日本必须顺应世界的大潮流。所谓的世界“大潮流”，即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即是说，在内政上实行“社会的正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正义”^①。1919年3月，他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德谟克拉西与基督教》一文。3月23日，在黎明会的第三次演讲会上，吉野作造提到朝鲜的“三一”运动问题，批判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政策。4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对外良心的发挥》一文。在文中，他强调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有必要向国民呼吁重视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外的良心”^②。4月，吉野作造还发表了《普通选举论》，为蓬勃发展的普选运动提供理论根据。6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民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激主义》一文，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同月，他还发表了《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和《关于北京大学学生的骚扰事件》，拥护“五四”运动。与此同时，他加强了与北京大学李大钊等人的交流。8月，他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确立中日国民友好之曙光》。1920年1月30日，吉野作造作为“森户事件”^③的特聘律师出席东京地方法院。1920年3月，吉野作造于《我等》杂志上发表《言论自由与国家的干涉》一文，对这一限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事件加

① 伊藤隆著：《大正期革新派的成立》，土高书房1978年版，第82—83页。

② 吉野作造著：《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 第四卷·世界和平主义论》，新纪元社1980年版，第88页。

③ “森户事件”，即对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森户辰男等人提起诉讼的事件。1920年，森户辰男发表了文章《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研究》，以上杉慎吉为首的“兴国同志会”的人认为该文宣传危险思想，并策动官方以违反《报刊法》、扰乱朝宪罪名，对森户辰男等人提起诉讼，并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这是限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事件。

以批判。5月，吉野作造邀请北京大学教授、学生团访日。11月，他发表了《新人于社会改造运动中之使命》。1921年9月17日，他与尾崎行雄等结成“裁减军备同志会”。同时，吉野作造正式着手明治文化研究。1922年2月13日至19日，他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关于所谓的帷幄上奏》一文，批判军部的独立。5月，撰文批判向西伯利亚出兵。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之际，为了使朝鲜学生免遭杀害，吉野作造庇护朝鲜学生，并于11月发表了《关于杀害朝鲜人事件》。1924年1月，第二次护宪运动之际，吉野作造发表了《贵族院改革问题》。2月8日，他辞去东京帝大教授职务，加入朝日新闻社。6月，他又退出朝日新闻社，以讲师的身份回到东京大学法律系。11月，他组织了“明治文化研究会”。1925年1月，吉野作造因病住院。同年《普通选举法》的颁布与1924年的政党内阁的产生，成为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最大政治实效。

（三）致力于“明治文化研究”

1926年1月，吉野作造参加“独立劳农协会”，并出版《现代政治讲话》。4月，他发表了《立志于明治文化研究的动机》一文。1927年7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文章《关于出兵中国》，批判日本政府对山东出兵。10月，他开始出版《明治文化全集》。1928年2月，发表《回顾鼓吹民本主义的时代》一文。7月，他在《中国的形势》一文中主张完全归还中国的权益。1930年7月，吉野作造将《明治文化全集》24卷全部出版发行。1932年1月，吉野作造发表《民族、阶级与战争》一文，批判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9月，他发表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一文。1933年3月18日，吉野作造在医院故去，结束了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生。

二、“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酝酿及独立人格的确立

关于知识分子对政治所采取的具体态度，英国的历史学家、社会政治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年）认为有两种。“一是脱离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埋头于纯学术研究，致力于探讨所谓‘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①。“二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关心”^②。但汤因比认为，“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全超脱现实问题，完全割断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各种问题的联系；同时，也不应完全陷于政治”^③。即就是说，知识分子既要关心政治及社会问题，又要具有自己的专业。关于这一点，在阐述知识分子的具体内涵时也曾有所提及。“不应完全陷于政治”，意在强调知识分子可以参与政治与关心政治，但不能被融入到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去，即应保持人格的独立。汤因比在寻找理想知识分子的代表时指出：“苏格拉底既不刻意参与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这种实践表明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④

在大正时期，吉野作造就是理想知识分子类型的代表人物。他热心地关注政治，但又远离政权。他在“政治体系”的内外环境中体验与考察，将内外“环境”中的大量行为综合整理为“要

① 叶立煌、蒋云根、张敏梁等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③ 同上。

④ 汤因比著：《展望二十一世纪》，转引自叶立煌、蒋云根、张敏梁等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第122页。

求”或“支持”，并通过“要求”或“支持”^①加以输送，从而对政治生活施加压力。关于“政治体系”的理论，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也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政治体系’，而政治体系是一个包括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部分的系统。所有的政治体系，为实现本身的目标，都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以及组成政治结构的政治角色。”^②他还认为：“政治体系是由国民、或选民同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这些相互作用的角色构成的。当每个人参加政治交流，组织政治利益集团，参加投票或缴纳捐税时，他就从非政治角色转为政治角色。因此我们不妨说，每个人都是出入于政治体系的。”^③关于“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阿尔蒙德强调指出：“一切政治体系与两种环境发生作用：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政治体系既影响也受影响于其国内的经济、自然环境和资源、教育和技术体系，以及其种族和文化体系。这样，政治体系通过各种完全不同的途径，程度不等地渗透于社会之中。……同样，政治体系及其所处的社会也同其国际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即通过同其他政治体系以及同国际机构的贸易、外交、战争、交通和文化交流而产生相互作用。”^④他还指出：“‘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成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输入和输出是

① (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伊斯顿是最先用“系统理论”对政治生活进行分析的政治学家。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对这一系统分析理论进一步加以扩充与完善，并将其引入到国际间“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上。

②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著，曹沛霖、郑世平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的话”，第2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同上。

体系同环境之间的交换。转换过程则是政治体系内部的。……输入种种要求和支持是从环境进入政治体系的。在政治体系的‘另一头’，这些要求会成为政策输出。这些输出会在环境中产生变化，这些就叫做结果，这些结果反过来还会影响政治体系。……这一过程称为‘反馈’。”^① 这就是阿尔蒙德对“政治体系”与“环境”关系理论的把握。本节将探讨 1900—1915 年，吉野作造在对国内外环境的认知基础上，如何代表民众的意向逐步构建了“民本主义”思想及如何确立了独立人格等问题。

（一）“民本主义”的酝酿及其主体框架的形成

1900 年 9 月，吉野作造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学习。以政治学为专业，决定了吉野作造对政治的关注及其对政治理论研究的兴趣。截至 1915 年，吉野作造曾在“政治体系”的内外环境中体验与考察，了解了欧美的普选状况。他在大学担任教授，向学生们传授有关政治史与政治学等内容。同时，他在杂志上发表社论，对民众的示威状况及国外的宪政发达状况进行评价。其目的在于，构建尊重民众意向、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相对合理的政治结构，并使其有利于发挥有效的政治统治。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酝酿及主体框架的形成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吉野作造在学生时代以政治学为专业，为他此后关心政治打下了基础。

如前所述，吉野作造在大学时代学习政治学。他跟从小野塚喜平次学习政治学，又专心听取一木喜德郎的法学。这为日后吉野作造研究政治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其研究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吉野作造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尊重多数人的利益与意

^①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前揭书：《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 10—11 页。

向”。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在大学时代形成的。

吉野作造，190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学习，1904年大学毕业。在学问上，吉野作造主要接受了他的老师小野塚喜平次的观点。例如，吉野作造在1928年2月发表的论文《回顾鼓吹民本主义的时代》一文中强调指出：“在对近代政治的理解上，使我大开眼界的第一恩人是小野塚教授。……他教给我们最初的政治学。在他的政治学讲义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否认政治是统治阶级的权术，将政治视为国民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先生经常使用‘众民主义（先生将德谟克拉西译为众民主义）’一词。”^①关于“众民政治”，小野塚教授在著作《政治学大纲》中将其定义为：“所谓的众民政治，是指政策决定的结果最终在于为民众的福利着想，同时政策的决定过程尊重民众的意向。”^②小野塚教授的政治学理论框架由吉野作造彻底地继承下来。因此，可以说大学时代的学习直接培养了吉野作造对政治的兴趣与对政治理论的关注。但是，他的政治理论与他的国家观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学是重视国家利益前提下的政治学及政治理论。他认为：“保护人民的利益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为了使国家生存与发达。”^③他还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就不能生存。这已经说明吉野作造受明治后期的主流意识“明治民族主义”的影响很深。

另外，吉野作造的思想来源是多元化的。他受到明治时期“政治体系”外部环境的影响，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在构建自

① 吉野作造著：《回顾鼓吹民本主义的时代》，收入松尾尊允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第431页。

② 小野塚喜平次著：《政治学大纲》，转引自松尾尊允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解说”，第461页。

③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 1·政治学与国家观》，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383页。

己的政治思想及政治理论时，使其政治思想及政治理论又增添了新的特点。其新特点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 “尊重多数人的利益与意向”。例如，1904年9月，吉野作造发表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基础》一文。在文中，吉野作造批判了古代的“国家万能主义”思想，但他将黑格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继承下来。并强调指出：“个人的生活，如果离开发源地及国家就不存在。”^①因此，吉野作造对“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为前提的“个人本位的国家观”提出了质疑。1905年1月，他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在文中，吉野作造分析了实行“善政”的条件，阐述了立宪制度的精神，提出了彻底实行立宪政治的两个必要条件。其一，“行使主权时以保护与推进整体人民的利益为目的”；其二，“立宪政治要求构成参与政治的人民应该具备高明的见识和健全的判断。如果人民缺少这样的见识和判断，就不能监督议会，立宪制度就难以发挥效用”^②。进而，吉野作造认为，“立宪制度的精髓实际在于责任内阁制度”^③。在对日本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时，吉野作造认为日本民众的政治能力相对低下，必须提高民众的“智德”。他指出：“教育一般民众，教给他们宪政运行时的一般知识与道德是第一急务。”^④如果选民“智德”很低的话，那么事实上选民就不具有监督议会的能力，最终将导致立宪制度流于形式。此外，从立宪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来讲，吉野作造认为立宪制度是“主民主义运动的结果”。他指出：“统治阶级担心承认民众的自由会削弱统治阶级的特权，

①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1·政治学与国家观》，第385页。

②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收入《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第7—8页。

③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第9页。

④ 同上书，第14—15页。

因而他们强制地压抑个人的发展。……民众则为了确立体现自己政治主张的制度，而不惜流血牺牲，发起运动，以催促实现立宪制度。即立宪制度的确立，实际是主民主义运动的结果。”^① 这就是吉野作造提倡的“主民主义”。这样，在吉野作造的政治思想中，由民众监督议会，由议会监督政府，由政府监督国家元首的立宪制度的大体框架就形成了。

其次，在信仰上和对外关系上，吉野作造受到牧师海老名弹正^②的影响很大。他信奉基督教，鼓吹“爱国心”。

如前所述，1898年7月，吉野作造在仙台的浸礼教会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入大学以后，他转入牧师海老名弹正的本乡教会。可以说，海老名弹正是他的信仰之师，他醉心于海老名弹正的“自由神学”。1905年1月，海老名弹正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日本魂之新意义》。在文中，海老名弹正将“日本魂”视为“国家魂”。他指出：“所谓的日本魂就是国家魂。日本民族就是受到它的启发，并在它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③ 综观全文，海老名弹正的“日本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以“神子的博爱”^④精神为基础，“神子魂”即是“国家魂”。（2）“日本魂”来自“国家魂”，进而可以转变为“世界魂”。“日本魂”来自“民族魂”，进而可以转变为“人类魂”。为了完成“国家魂”向

①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第12页。

② 海老名弹正（1856—1937年），筑后柳川藩士出身，基督教牧师，同志社大学校长。1872年就学于熊本洋学校，1876年接受洗礼，同年入同志社英语学校，师从新岛襄。1890年任日本传道会社社长。提倡与神道融合的日本式基督教。主编《新人》杂志，与正统派展开论战。

③ 海老名弹正著：《日本魂的新意义》，收入《吉野作造选集1》，第370页。

④ “神子的博爱”，即将日本的全体国民视为“神的子女”，然后再发扬基督教的博爱主义精神。

“世界魂”的转变，“首先必须要形成伟大的国家”^①。因此，他将“日俄战争”视为“国家自卫战”。并将战争视为完成“大日本魂”的手段。他指出：“大日本魂以世界和平、至少以东洋文化为旗帜，为主要目标，为动机。”^②（3）在“日本魂”指导下，实现“神子帝国”^③。很显然，海老名弹正在基督教博爱主义的幌子下主张实行对外战争。他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吉野作造，但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为了对老师的观点进行辩护，吉野作造在1905年2月发表了《何谓“国家魂”？》、3月发表了《答木下尚江君》等文章，同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非战论”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并阐述自己的国家观，鼓吹“爱国心”。在文中，吉野作造指出：“本来人类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决不能离开社会国家（当时吉野作造将社会与国家等同起来，认为社会即国家，国家即社会）而存在。即是说，个人作为社会国家团体的一员，常常受到团体意志的束缚与指导。这种‘团体意志’即是国家精神或国家魂。”^④但是，由于人类又具有独立的意志，因此具有强制统一力的“团体意志”必须以多数人认可的共同意志为基础。所以吉野作造指出，“个人的意志与国家魂相互影响”，“作为权力化的国家魂必须通过个人或团体的意志表现出来”^⑤。此外，吉野作造还指出：“我所说的国家魂实际是超越君主贵族意志的民族精神。……民族的伟大与否实际在于国家魂的伟大与否。为了帝国的精神文明，我们必须发扬国家魂，必须明确国家魂的意义，必须阐明大和魂并鼓吹大

① 海老名弹正前揭论文：《日本魂的新意义》，第37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73页。

④ 吉野作造著：《何谓国家魂》，收入《吉野作造选集1·政治与国家》，第78页。

⑤ 同上书，第78—80页。

和魂。”^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吉野作造的思想深受明治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影响。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宣传力量将每个人的意志与国家精神统一起来，以完成新时代的“国家魂”。那么吉野作造的“国家魂”的对外观如何呢？在文章《答木下尚江君》中，他认为，为了将高贵的“帝国精神”发展到全世界，必须借助战争手段^②。这样，在海老名弹正的影响下，吉野作造很自然地认为“日俄战争”是一场“义战”，并以此来鼓吹民众的“爱国心”。在对外政策上，吉野作造没能摆脱当时的“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思想束缚。至此，对内主张“尊重多数人的利益与意向”的“主民主义”政治制度，对外主张“实行帝国主义”的框架大体形成。

再次，1909年2月，吉野作造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专业副教授。1910年4月，为了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现实，吉野作造赴欧美留学，在“政治体系”的国外环境中体验与考察，认为“民众运动”已成为世界的大潮流，并提出了“两党制”与“普选制”两大要点。最终，在文章《欧美宪政的发达及现状》中明确地提出“民本主义”概念，以概括他所提出的政治原理。

1910年至1913年，吉野作造在国外感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民众运动，他实地观察到欧洲的工人游行和大罢工。他置身于日本“政治体系”的国外环境中，感到“民众运动的实力”不可忽视。1913年吉野作造回国以后，他又亲眼目睹了国内的护宪运动，桂内阁的倒台以及铃木文治等人领导的工人运动

^① 吉野作造著：《何谓国家魂》，收入《吉野作造选集1·政治与国家》，第80页。

^② 吉野作造著：《答木下尚江君》，收入《吉野作造选集1·政治与国家》，第89页。

等等。这更坚定了他对民众实力的看法。所以，吉野作造认为如何有秩序地、合理地发挥“民众运动的实力”才是自己的重要任务。因此，吉野作造以对“政治体系”的国外环境与国内环境的认知为基础，写下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

1914年4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评价了民众的势力，增强了对民众的信任感。在文中，吉野作造认为民众的示威运动实际是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但是仅就推动宪政的发展而言，它又是“令人欣喜的社会现象”^①。实际上，吉野作造感到欣喜的是民众已经觉醒。因为只有民众的自我意识增强，民众在政治运行的过程中才能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那么，针对民众运动，政府当局应该如何调整政策至关重要。吉野作造提出两点：第一，“完善宪政，使之更加圆滑。因为究其原因，民众运动的发生是由于宪政运作不完善。……所以，应该扩大选举权，公平地分配选区。然后，确立政党内阁，实行两党制”^②。第二，“政府要为民众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③。吉野作造认为，首先要让民众富裕起来，从物质上改善民众的生活。如果民众生活不够富裕，他们就容易“轻举妄动”，而且容易为“野心家”所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吉野作造主张制定社会政策，安顿下层民众的生活。其次从精神上来充实民众。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即“政党将着眼点放在对民众教育上，直接向民众说明自己的立场，以便在民众中寻找根据”；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即“伸张正义，让民众对之理解，并让他们

① 吉野作造著：《论民众的示威运动》，收入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3·从大战至战后的国内政治》，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③ 同上。

对此响应”^①。

由此可见，民众的社会运动本身即是环境对“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对这种要求，政府不应该熟视无睹，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对应措施满足民众的合理要求。这样才能保持政局的稳定，反之亦然。在文章中，吉野作造明确地提出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内阁制度和普选制度。这是他的“民本主义”思想的两个基本点。这种思想比起他在《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一文中提出的层层监督制度更加具体，这也说明吉野作造的认识有了提高，使模糊的立宪制度之设想在具体操作手段上更加清晰了。例如，吉野作造在1914年5月的《太阳》杂志上发表了《山本内阁的倒台与大隈内阁的成立》，对大隈内阁的出现表示欢迎。吉野作造认为，大隈内阁的成立是政党内阁的开始，并从事实上、法律上以及道德上论述了政党内阁成立的可能性^②。后来，吉野作造在1915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民本主义”概念，这也标志着“民本主义”理论的形成。

（二）独立人格的确立及其确立的途径

关于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前两章中有所触及。按英克尔斯的理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人格必须具备前述的四个条件。他的理论是判断知识分子人格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主要标准。但是，判断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否具有独立性，应该主要看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即许纪霖所强调的那种独立精神。从人格的角度讲，吉野作造的思想政治主张及其实际活动表明，1900年至

^①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论民众的示威运动》，第43页。

^② 吉野作造著：《山本内阁的倒台与大隈内阁的成立》，收入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3·从大战至战后的国内政治》，第59—71页。

1915年是其不断增强人格现代性的阶段。同时，也是其确立独立人格的阶段。其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在日本“政治体系”的国内外环境中，吉野作造保持着积极的参与热情，实地考察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际政治状况，接受了新思想、新经验。从而，增强了人格的现代性。

如前所述，吉野作造在大学时代接受了先进政治思想的影响，逐渐地将其政治学的主要着眼点确定为“尊重多数人的利益与意向”。并不断地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他在《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一文中，极力推崇英国式的立宪制度与责任内阁制度，并将当时比较流行的“德谟克拉西”一词译为“主民主义”。这为吉野作造确立现代性的人格奠定了基础。

另外，吉野作造到“政治体系”的国外环境中去考察，接受了国外的新思想、新经验。例如，吉野作造在《回顾鼓吹民本主义的时代》一文中，曾指出：“三年留学生活中的诸多见闻与后来确立我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点：（1）在英国亲眼目睹了缩小上院权限的过程；（2）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亲眼目睹了因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而发生的劳动党的运动，其秩序井然，一丝不乱，让人深感国民大众值得信赖，并让人佩服；（3）1912年比利时的工人同盟大罢工自准备阶段起就体现出秩序化及显示出力量，因而我痛感秩序化的民众运动相当必要。”^①回国后，吉野作造撰写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评价了民众的势力，论述了政府应该如何调整政策以免民众运动的发生等问题。这是吉野作造在接受了国外新经验的基础上，直接将其感受转化为效能所做的努力。这无疑证明了其人格现代性的增强。

但是，在国家观及战争观上，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性，吉野

^①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回顾鼓吹民本主义的时代》，第434页。

作造的国家观及战争观表现出相对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前文提及，吉野作造的国家观受到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大。他认为，应该以国家为本位来思考与观察问题。因而，他将“日俄战争”视为“义战”。并对大隈内阁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表示支持。这一阶段的吉野作造并没有依附政府，或是成为政府的帮凶。从以后吉野作造的国家观及战争观的变化（后面还将会谈到）而言，他对“日俄战争”的支持，纯属因为受到他的国家观的支配。他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是以独立自由之“言论人”的形象出现的。但针对吉野作造对帝国主义战争性质认识不足这一点，我们应该予以批判。

其次，吉野作造在“政治体系”的国内外环境中，远离政治权力，确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第二章曾提及，知识分子与政界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判明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吉野作造虽然关注政治及政治理论，但是，他未被融入到政治权力中去，他确立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是如何做到了既能关注政治，又能远离政治权力的呢？吉野作造确立独立人格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大学跟从名师学习政治学，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并主要以《新人》、《中央公论》、《太阳》等杂志为阵地来发表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

例如，《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何谓国家魂？》、《答木下尚江君》等文章发表在《新人》杂志上。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山本内阁的倒台与大隈内阁的成立》等等。吉野作造试图以这种方式进行舆论参政与舆论干政，从而保持着人格的独立。

吉野作造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专业副教授，致力于现代政治研究。并且，为了增长自己的见识，也为了提出更加符合

本国国情的政治思想，他赴欧美留学。从国外环境中汲取养分，来阐述民众示威运动的发生、意义及政府应该采取的对策。从而保持了与政界之间的距离。

吉野作造与他人创办团体组织“大学普及会”，试图以此将大学与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吉野作造埋头于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关注社会问题。

“大学普及会”，成立于1915年春。该团体提出了10条主张，其主要特色有以下两点：其一，主张“创办开放的自由国民大学（谁都可以进入）”；其二，创办以通俗易懂为宗旨的“平民学府（谁都能懂）”^①。其机关刊物为半月刊《国民讲坛》，主要刊载以启蒙国民教育为宗旨的通俗讲义。创办团体及刊物，说明吉野作造的思想主张逐渐地走向组织化。并在组织化的实际运动中，与权力保持着距离。

综上所述，如果从汤因比对知识分子分类标准来看，吉野作造就是日本大正时期理想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兼顾学问与政治，在“政治体系”的国内外环境中充实学问的同时，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寻找能够有效指导民众的思想武器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吉野作造不但确立了独立的人格，还保持了思想的独立性。

三、“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台与保持 人格的同一性

1914年吉野作造成为东京帝大法学系教授以后，始在论坛上为人所注意。1916年1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

^① 金原左门前揭书：《近代日本的轨迹——大正德谟克拉西》，第59页。

的《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以下简称《本义》)一文,使他一跃而成为新闻界的中心。他在这篇论文中,集中地论述了宪政及作为宪政精神基础的民本主义以及议会政治问题。并且,他将这一理论思想通过指导民众转换为行动的力量,凭借民众运动的力量将广大民众的要求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迫使“政治体系”对其要求进行综合整理,最终以新的政体形式——“政党内阁”和“普选制”的结果再输出到环境中去。从而,完成了一次“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转换”——“输出”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吉野作造始终保持了人格的“同一性”。本节将探讨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付诸实践的手段及保持人格“同一性”的手段等问题。

(一)“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民本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吉野作造的《本义》一文,标志着“民本主义”理论体系在内政方面的形成。其内容涉及到宪政、宪政的精神基础及议会政治等问题。在外交上,吉野作造发表了《关于对华外交根本政策之决定的日本政治家的混乱》一文,在文中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形势进行了预测。1916年3月27日至4月19日,吉野作造来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考察了日本在两地的殖民政策。6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考察满韩》一文,在文中对日本的殖民政策进行了批判。至此,“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政、外交框架形成。

首先,在“民本主义”的内政方面,吉野作造阐述了有关“宪政”、宪政的精神基础及议会政治等问题。

吉野在《本义》一文的《序言》中谈到:“宪政能否正常运行,一是制度及其运用问题,另一个实际是与一般国民智德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果国民智德的发达程度还很低的话,只

能实行依靠少数贤人即英雄的所谓专制政治或贵族政治。”^① 其意暗指，宪政是以国民智德的发达程度为基础而组建起来的政治结构。实施宪政就意味着“在宪法之下行使政治”、“依据宪法运营政治”。因此，实行宪政之时首先要求必须有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存在。至于宪政的内容，则必须包括：“保障人民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开设民选议院。”^② 但是，仅有内容上的规定还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单纯地颁布宪法，单纯地开设议会，也不能完全保障人民的权利自由，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得到十二分的幸福”^③。能为完成“宪政最终完美形态”提供支柱的是民本主义，换句话说，立宪政治是依宪法条文行使的政治，同时又必须是依其精神行使的政治，能够成为宪政精神基础的就是民本主义。

吉野作造认为，“民本主义”是宪政的精神基础。他巧妙地回避了“民主主义”一词。那么，他为什么要回避“民主主义”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吉野作造认为提倡“民主主义”就意味着提倡“主权在于人民”，这和明治宪法所规定的“主权在于天皇”是极端对立的。这样一来，就会招致可能争取到的权利化为泡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吉野作造提倡“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可以同时存在。只要“君主”在行使统治大权的时候，能够照顾到“民众意向”就可以了。如果将“国体”视为一种统治形式，将“政体”的运作视为实际内容的话，那么，吉野作造更

① 吉野作造著：《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收入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2·德谟克拉西与政治改革》，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5页。

②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第14页。

③ 吉野作造著：《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 第一卷·民本主义论》，新纪元社1982年版，第16页。

重视实际内容而不在于形式。这是涉及到政府的“有效统治程度”的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各国之间的最重要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范畴”^①。即是说，重点不在哪种统治形式，而在于统治的“有效程度”。吉野作造就是从从这个角度来提倡“民本主义”的。其思想主张大体如下：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②思想中的民主含义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国家法理上属于人民”，其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③。

吉野将第一种含义命名为民主主义。并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两层意义：“第一，仅就国家国体而言，民主主义主张主权在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绝对的或哲学上的民主主义”；“第二，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讲，在某些特定的国家，民主主义主张主权在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相对的或解释上的民主主义”^④。吉野认为这种民主主义在日本是难以通行的，而民本主义则可通行。在称谓上，二者虽然很相近，但由于民本主义回避了民主主义与君主主义在法理上的冲突，所以客观上缓和了两种政治派别的对立，为改革专制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① 塞缪尔·P.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页。

② 参见拙文：《大正民本主义辨析》，《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1期，第14—18页。

③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第24—25页。

④ 同上书，第26—27页。

吉野将第二种含义命名为“民本主义”。所谓民本主义，是不问法理上主权属于何人，只是在主权运用时，其主权者必须以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及意向为方针的主义。这样，民本主义和君主制就可以同时存在了。吉野又进一步阐释了民本主义的两个含义：第一，政权运用的目的即“政治目的”在于追求一般民众的福利；第二，政权运用的方针要求“政策的决定”要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吉野把这称为“民本主义要求的两大政纲”。

根据民本主义的要求，需要人们直接参政。因此，吉野主张完善代议政治，以达到使人们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他在阐述代议政治的作用时指出：“我认为最完善的政治就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只有贵族政治而没有民主政治是不行的，我国今天的政治弊端就在于此。……所以，受一个伟大的精神指导而行动，政治最大限度地体现其精神，即能够接受国民监督而运行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① 进而，吉野认为使代议政治能够付诸实际行动的唯有政党，而为了真正让政党担负起责任就必须做到：第一，彻底遵守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第二，实现以责任内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内阁；第三，限制上院和元老的各种超法律权力。要尽可能减少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对政治的介入，尽可能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因此，代议政治成为大多数人所抱有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在使之付诸行动上，他们仰赖于政党，因而力主政党内阁制。在尊重一般民众的情感上，自然地，他们提倡普选。

由此观之，吉野在不冲撞天皇国体论和明治宪法根本要旨的前提下，在逻辑上相当严密地提出了完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即他关于代议政治和政党内阁制的构想。所以，他的民本

^① 三谷太一郎编辑：《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第80页。

论主张自然就成了这一时期民众运动的理论指导。它反映了时代精神，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客观上，给政友会和宪政党对藩阀官僚势力的斗争以积极的支持。

其次，在外交上，吉野作造批判了日本的“殖民政策”。

1916年3月，吉野作造发表了《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混乱》一文。在文中，他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形势进行了预测，而且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1916年吉野作造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考察了日本在两地的殖民政策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考察满韩》一文，批判了日本的殖民政策。对中朝态度的改变，说明吉野作造的外交思想有了进步。同时，也标志着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外交政策大体形成。下面，以这两篇文章为主，考察吉野作造外交思想的变化。

在《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混乱》一文中，吉野作造强调指出：“（当时）日本的政客，在对华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与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政府相互合作；另一种认为，袁世凯不会与日本合作，应该抛弃与袁世凯政府相互合作的想法。……陆军省属于前者，外务省则属于后者。”^①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围绕着与袁世凯政府的外交关系，已经出现了上述的对立观点。而且，这对立的二者使得日本的外交政策陷入了混乱状态。另外，由于1915年大隈内阁对华提出了侵略性的《二十一条》要求，增长了袁世凯政府的排日情绪。吉野作造注意到这一点，并及时调整了想法，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日中亲善”无论对“东洋和

^① 吉野作造著：《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混乱》，收入松尾尊允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第128—129页。

平”还是对日本的经济的发展都是相当必要的。吉野作造从地区和平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已经说明其思想进步了。此外，就其思想的变化而言，吉野作造由一度支持大隈内阁的对华《二十一条》，到转而批判它，也说明其外交思想发展变化的进步性。同时，在文中，吉野作造还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预测。他指出：“袁世凯丧失了中国的几亿民心。至少今后的中国决不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国家。能够成为中国未来永久核心势力的是倡导国家改革的年轻一代。”^① 他还指出：“青年爱国者反抗旧习，发动革命，拯救濒于衰亡的祖国而满腔热血。……革命的本身不只是武力战争，还是思想力量的战争。只有废弃袁世凯一派的旧思想，中国的实际统治权力就会转入青年爱国者的手中。”^② 由此可见，吉野作造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抱乐观态度，并对“青年爱国者”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与此同时，他还批判了无视这种青年势力的日本政客们，主张重视中国的青年势力并同他们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在《考察满韩》一文中，吉野作造集中批判了日本在中朝两国实行的殖民政策。关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吉野作造感到“日本的国家威力通过朝鲜政府已经得到显著伸张”^③。日本在朝鲜实行的是“宪兵政治”^④，实行“同化政策”。正是由于“宪兵政治”及强制性的“同化政策”才招致了朝鲜人民的不满。因此，吉野作造批判日本的“宪兵政治”，主张在朝鲜实行“善政”。他批判“同化政策”，但又反对朝鲜独立。他认为，待朝鲜的国力

①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混乱》，第134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③ 吉野作造著：《考察满韩》，收入松尾尊允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解说”，第146页。

④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考察满韩》，第160页。

强大以后，实行“自治领化”^①。关于中国的东北问题，吉野作造批判政府的殖民统治。他认为，成功的殖民地统治必须是“一视同仁，忘掉国别的差异”^②。也就是说，吉野作造主张日本与中国东北相互“提携与调和”^③。

至此，在“政治体系”的国内环境方面，吉野作造提倡“民本主义”，努力将“以民为本”的要求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在“政治体系”的国外环境方面，吉野作造通过考察中国与朝鲜，开始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努力探索日本与中国、朝鲜的友好外交政策。通过这三篇文章，可以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论”所涉及到的对内对外的基本理念大体完成。

（二）“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性调整

1917—1918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2月、10月，俄国先后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吉野作造对此表示支持，并于1917年4月撰文《俄国的政变》，支持俄国的“二月革命”。1918年1月，吉野作造发表了《论民本主义的意义及再论完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一文。4月，发表了《所谓出兵论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吗？》等文章。随着对国内外形势认识的加深，吉野作造对“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外方面做了战略性的调整。最终，他将“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确定为：内政上彻底贯彻“民本主义”；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

首先，吉野作造对“民本主义”进行了再阐释。

吉野作造在舆论界提出“民本主义”思想以后，引起了广泛

① 松尾尊允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解说”，第470页。

②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考察满韩》，第181页。

③ 同上。

的影响。上杉慎吉、植原悦二郎、室伏高信等人，从不同侧面对吉野的主张加以评论，将民本主义论争推向高潮。虽然论点歧义很多，但吉野沉稳地予以反驳，同时更精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扩大了民本论的影响。1917年，反动派攻击吉野的“民本论”为“无用的误解”，是反“国体”的思想主张。同年，吉野作造还亲眼目睹了田川大吉郎因撰文指责元老任命首相是私议大权、紊乱朝宪而被判刑的事实。同时，友爱会组织的工人运动被寺内内阁严厉地镇压下去。对这种国内的现实保持清醒认识的吉野作造，在1918年1月撰写的文章《论民本主义的意义及再论完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中，对“民本主义”进行了再阐释。

前文曾提及了“民本主义”的两个基本内容：政权运用的目的即“政治目的”在于推进一般民众的福利；“政策决定”要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在这篇文章中，吉野作造将二者作为不同范畴的东西区分开来。他指出：“政权运用的目的在于推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政权运用的方法在于尊重民众的意向”。并且，吉野作造进一步将“政治的目的”解释为“相对的原则”；将“政权的运用”解释为“绝对的原则”^①。这是吉野作造为了追求真正的政治实效对“民本主义”所做的战略调整。实际上，吉野作造站在时代的高度清楚地认识到：与其高喊空洞的政治目的——即重视一般民众的福利，还莫如更加注重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必要条件——“政策决定”的过程中来体现一般民众的意向。吉野作造还认为，必须以最大的力气实现普选。所以，他极力主张实施广泛的“参政权”及彻底贯彻“民本主义”。

其次，吉野作造对外交认识的调整。

一战之际，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将其消灭在

^①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2·德谟克拉西与政治改革》，第113—114页。

萌芽状态，国际上形成了一股以“协约国”为首的“反共”势力。日本应国际要求也派出了“援兵”参与“剿共”。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理论记者大山郁夫，揭露了日军的侵略企图。《东洋经济新报》的主编石桥湛山也极力反对出兵西伯利亚。1918年3月25日，他以《援助过激派》为题发表社论，力主压制德国，援助俄国“布尔什维克”，使其彻底地完成革命。吉野作造在1918年4月发表了《所谓出兵论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吗？》一文，以批判日本对俄国的出兵。在文中，吉野作造分析了“出兵论”的目的。他认为，出兵的目的至少有三个，即“为了帝国的自卫；为了救援俄国；为了配合协约国并做其后援力量”^①。然后，吉野作造对这三种目的——进行了分析与驳斥，并认为三种目的都是牵强的、毫无说服力。从而，在理论上推翻了持有上述“目的”论者的见解，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予以支持。

1919年1月，吉野作造执笔撰写了《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顺应政策和对应政策》一文。在文中，吉野作造指出：“世界的进步推动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又是世界的发展，而且必须是推动世界发展的。”^②吉野作造还认为，为了日本帝国将来的发展，日本必须顺应世界的大潮流。那么所谓的世界“大潮流”究竟是什么呢？即“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③。为了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吉野作造强调：“第一，每个国家都具有特殊性，在推进整体世界的发展上都具有相

① 吉野作造著：《所谓出兵论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吗？》，收入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5·大战期的国际政治》，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301页。

② 吉野作造著：《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顺应政策和对应政策》，收入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6·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应的特殊使命。第二，应该顺应世界的大潮流。第三，不宜顺应世界潮流就忘掉本国的特殊性，而盲目模仿发达国家的一切”^①。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和平主义思潮对吉野作造的影响很大。而且，每个国家都应该为“国际和平主义”贡献力量。这充分地说明，吉野作造的外交认识已有明显进步。这种进步还体现在对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上。例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发表文章为中国学生辩护。他在《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一文中强调指出：“中华民族一般排日，不过是排斥官僚、军阀及财阀所代表的日本”，“邻邦的民众恐怕不知道我国存在着‘侵略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如果知道了，他们一定会立即隐忍反日声音的”^②。由此可见，吉野作造是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再如，关于对“五四”运动的认识问题，吉野作造批判了当时日本国内流行的“某国煽动论”及“盲目反日运动”的论调。他指出：“中国学生的运动全然是自发的，不被任何人煽动。”^③吉野作造还认为，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思想上得益于中国新文化运动^④。这样一来，吉野作造逐渐将其“民本主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确定为“国际和平主义”。

（三）“民本主义”的实践途径及确保人格“同一性”的手段

以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政治实效是政党内阁的出现和《普通选举法》的颁布。吉野

① 吉野作造前掲论文：《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顺应政策和对应政策》，第17页。

② 吉野作造著：《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收入松尾尊允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第317页。

③ 吉野作造著：《关于北京大学学生的骚扰事件》，收入三谷太一郎编辑《日本的名著48·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237页。

④ 同上书，第237—241页。

作造是通过思想指导运动的形式来完成“民本主义”的实践过程的。他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了人格的“同一性”。其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以“民本主义”指导民众，通过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

吉野作造所提倡的民本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在吉野及其活动的舞台《中央公论》的大力宣传下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同期，星岛二郎的《文学评论》、内藤民治的《中外》、长谷川如是闲主办的《我等》、岛居素川任主编的《大阪朝日新闻》等也为民本主义者发表议论提供了良好阵地。同时，他们自身也都成为民本主义阵营的一员。在1918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吉野作造对民本论思想做了再阐述，使其主张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思想，并在青年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勤劳的小市民阶层中产生了共鸣。

大正政变以来，民众要求“打破阀族、拥护宪政”，掀起了大正时期的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众通过运动将“要求”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迫使政府思考及寻找对策。一战结束以后，普选已成为大多数民众的要求。各地演讲会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工人、学生也都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1919年2月11日，即宪法颁布三十周年之际，东京各大学的辩论会、早大普选促进会、日本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同盟会、东大新人会等团体成员3000余人聚集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大会，向社会宣告：“看，德谟克拉西是世界大势所趋，民本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必须彻底地实行君民同治。”要求普选的青年学生们向众议院出发，举行了示威游行。1920年2月10日，日本劳农党、日本交通劳动大会、小石川劳动会等20个团体组成的全国劳动团体同盟主办的普选演说会、示威运动在芝公园举行。一致决议实施无限制工会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立即实行普选。2月11日。在上野公园，“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主办的普选促进大会

和立宪劳农党主办的获取参政权民众大会召开，宪政会议员大竹贯一、小泉又次郎、三木武吉等给以声援，大会再次一致决议实施普选和废除警察法第十七条。在舆论的支持下，在野的国民党率先在第42届议会上提出“普通选举法案”。宪政会的尾崎行雄、岛田三郎也热心地主张普选。诸如此类运动将大正时期的普选运动推向高潮。大正中后期，普选要求日益为广大民众所拥护，表明大正民主运动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而吉野作造所提倡的民本主义的本意，也充分实现了。在不反对或维持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国体即天皇制专制体制现状的前提下，实现民众的普选权，是对天皇制国家机器中军部官僚势力实行渐进改良的、特殊的战前日本民主主义运动。它的发展，使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继续得到加强，越来越成为官僚和军部难以对付的独立政治力量。这也是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政治效果之一。1924年加藤高明组织的政党内阁和1925年通过的《普通选举法》，不仅是大正民主运动的最大成果，而且充分地实现了吉野作造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就“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政党内阁与《普通选举法》就是“政治体系”对“环境”的输出。

上面的论述说明，在推进“普选”的历史过程中，吉野作造并没有将自己融入到“政治权力”中去。他是以“民本主义”思想指导民众运动，来实践“民本主义”思想的。不难看出，吉野作造并没有忘记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参加并指导运动也是吉野作造保持人格“同一性”的途径。

其次，举行“演讲会”，与不同政见的右翼势力斗争。

举行“演讲会”，不但是吉野作造宣传思想的手段之一，而且还是吉野作造保持人格“同一性”的途径之一。例如，吉野作造与“浪人会”之间的辩论就是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

如前所述，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同时，全国范围内

爆发了“米骚动”。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禁止报道有关“骚动”的消息，但全国各报社的社长们却挺身而出，率众与政府抗争。拥护言论自由、打倒寺内内阁的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因1918年8月26日《大阪朝日新闻》记载的“白虹贯日”言辞^①而招致的笔祸事件，迫使村山龙平社长辞职。这一事件，实际上是“浪人会”等右翼势力假“拥护国体”之名而进行的暴力迫害事件。1918年11月23日，在神田的南明俱乐部，吉野作造和“浪人会”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辩论。当天的报纸以“德谟克拉西论战”为题向社会宣传这场论战。东大、早大的进步学生和友爱会的工人们列席前排座位，热情地支持吉野作造。铃木文治则守候在场外，向广大群众时刻传递演说的情况。面对“浪人会”为阻止演说而施暴的威胁，吉野作造义正词严地表明：“论辩时，暴力本身就已经说明攻击者的败北和吾人见解、主张的正确性。”^②在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吉野获取了论战的胜利。吉野的演说，有力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深深打动了广大民众，使他们在提高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其组织性也明显增强。

再次，组织团体，使思想主张组织化。在思想—组织—运动的系列环节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吉野作造在参加运动、进行演讲的同时，还往往通过团体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转变为行动纲领，并在团体的行动中来提高民众的觉悟。黎明会、东大新人会、早大民人同盟就是他直接参与创办的团体。

^① 为中国史记中的故事，通常“白虹贯日”被视为“刺杀天子的前兆”。1918年8月26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引用了这一古语，从而引发了一场司法官司。

^② 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1》，法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黎明会”，1918年12月成立，是以吉野作造为中心而组织的。其纲领是：“第一，从理论上阐明日本国体，完成日本的使命。第二，扑灭与世界大势逆行的危险及顽固思想。第三，顺应战后的新形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充实。”^① 这个纲领，敲响了时代的警钟。

“东大新人会”，1918年12月5日诞生。后来，原本独立的赤松团体的青年学生如赤松克麿、宫崎龙介、石渡春雄等人参加进来并成为骨干，向渴望新知的广大民众展开宣传。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向人民进军”。新人会的目标是：“必须改革不合理的特权阶级社会，创造出以具有新型思想意识的人为基础的社会。要彻底地打破与改造社会的世界思潮逆行并对运动加以阻碍的羁绊。”其纲领是：“第一，应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人类解放的新形势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第二，应服从现代日本的正当改造活动。”^② 在这个团体中，虽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还处于摸索阶段，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较大。后来的新人会龟户分会就产生在工人中间。1919年2月11日，以东大新人会为中心的“全国学生促进普选同盟”成立。

“早大民人同盟会”，成立于1919年2月，是高津正道、浅沼稻次郎在大山郁夫等人的指导下，以早稻田大学左派为中心而发起的。不久，从中分裂出的建设者同盟，主张以劳动会和农民联合会为中心，依靠无产阶级的团结来建设新社会。分裂后的早大民人同盟逐渐地转向赞美俄国革命。1920年，高津正道以“普及社会主义，声援正义，培养革命战士”为目标，组织了晓民会。

这些团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各种思想逐渐“组织

① 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1》，第248页。

② 伊藤隆著：《大正期“革新派”的成立》，第15页。

化”。这种“组织化”的思想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其主流方向渐趋一致，从而形成了一个时期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吉野作造在思想—组织—运动的环节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同时保持其人格的独立性。另外，吉野作造还在1919年2月号、4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分别刊发《扩大选举权问题》、《普通选举论》两篇文章，从实践和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民本主义，并且给当时正处于高潮的普选运动以更有效的指导。

四、吉野作造的“明治文化研究”与人格的同一性

如果说吉野作造在前一时期更多关注的是政治，是偏重政治及社会运动的时期。那么，自1926年至生命的终结，吉野作造更加偏重学问。他着手“明治文化研究”，并以此确保人格的“同一性”。

（一）“明治文化研究”

1924年11月，吉野作造组织了“明治文化研究会”，开始了他的“明治文化研究”活动。吉野作造从事明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动机有两点。第一，了解明治文化史有助于加深对“德谟克拉西”的理解。因此，对于吉野作造来说，他认为有必要对明治文化进行纯学术研究。第二，了解明治文化史有助于培养年轻人“达观”^①的人生态度，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历史。所以，吉野作

^① 吉野作造著：《立志于明治文化研究的动机》，收入三谷太一郎编辑《日本的名著48·吉野作造》，第371页。

造强调指出：“明治文化研究决不是与时代相脱离的闲人事业。”^① 1930年7月，吉野作造将《明治文化全集》24卷全部出版，完成了他的学术使命。

（二）人格的“同一性”

吉野作造在进行明治文化研究的同时，同样保持着人格的“同一性”。在整个大正时期，可以说吉野作造是最为理想的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情怀和命运”，他们体现着“社会良心”，因此社会的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不言而喻，在大正知识分子中，吉野作造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收到的效果也最理想。未来社会的合理发展主要仰赖这一类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从今天的社会发展来看，“人类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乘着股票市场或核弹头直线奔向毁灭，恰是因为有许多被视为过激、空想、不合时宜的分子，不懈地质疑我们的处境，呼唤着情感和良知”^②。无论从人格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推动政治结构的合理发展来讲，吉野作造都堪称优秀的知识分子。

小 结

本章借助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原理分析了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具体过程。吉野作造巧妙地回避了与明治宪法体制的冲突，力主“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可以同时存在，通过民众运动将代议政治、政党内阁制、普选等要求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然后，吉野作造再通

① 吉野作造前揭论文：《立志于明治文化研究的动机》，第372页。

② 筱敏著：《知识分子的声音》，收入林贤治主编《读书之旅》，第298页。

过民众运动迫使“政治体系”内部进行综合整理。最后，“政治体系”向“环境”输出制度及政策，从而完成输入—转换—输出的交换过程。从大正民主运动的结果来看，可以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与政府势力较量及其同其他思想力量较量的胜利者。“民本主义”成了大正时期主要的整合力量。

吉野作造在大正知识分子中是最为理想的知识分子类型。他在舆论界自由地发表言论，真正起到了“舆论参政、舆论干政”的作用。他站在权力的外围对藩阀独裁政体进行批判，因而本书将吉野作造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称为“反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在大正社会转型期的作用如下：

第一，此类知识分子推动日本近代社会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他们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导日本“政治结构”的重新调整。他们注意到一个国家政府的有效统治程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第二，此类知识分子有力地推动了大正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知识阶层在对国内外环境认知的基础上，其政治意识逐渐增强并成为大正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政治文化，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强调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①亦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整个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构成的，它们都可能各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向。我们把这种特殊的倾向称为亚文化。”^②

拿大正时期的日本来说，正如第三节所提到的，知识分子及

①（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前揭书：《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知识阶层在提高了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其组织性明显加强。其表现就是黎明会、新人会、早大民人同盟等团体的产生，并且这些团体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纲领。可以认为，这些团体所信奉的纲领就是阿尔蒙德所说的“亚文化”倾向。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亚文化倾向，才赋予这些团体互相区别的特殊性。但是，伴随各地普选运动的高涨，以此为媒介，各不同团体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其主流政治倾向渐趋一致，这就构成了大正时期的政治文化——代议政治、政党内阁制、“普通选举制”。

作为大正政治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及其民众，在这一时期不仅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换即由政治体系的顺从者向参与者的转换。而且，他们凭借自身对政治的敏锐感觉，以《东洋经济新报》、《东洋时报》、《中央公论》等刊物为阵地来表白自己的政治意图，并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输入到政治体系中，依靠大正民主运动、普选运动、舆论导向来迫使政治体系对其要求进行综合整理，最终获取了他们在政治追求上的最大实效——政党内阁制的产生和《普通选举法》的颁布。他们的政治意识不仅构成了大正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侧面，而且也是日本社会在政治上趋向成熟的一个标记。

第三，此类知识分子自由地发表言论，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并且，大正民主为战后日本民主提供了基础。

由此可见，吉野作造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基本上都是积极的、正面的。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如下：

第一，在思想—组织—运动的系列环节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收到的效果也最好。

第二，借助媒体来表白自己的政治意图及政治主张。远离政治权力，自由地发表见解。

综上所述，在大正社会转型期，吉野作造所代表的一类知识

分子是最理想、最具“效能”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是推动社会顺利转型的核心力量，其思想及行为方式亦值得称道。



第四章

“超国家主义思潮”与北一辉

在大正时期多样化的政治思潮中，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思潮出现在一战以后。他的思想是在观察社会运动及审视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其一生中的三部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1906年5月自费出版）、《中国革命外史》（1916年出版）和《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19年8月撰写，1920年印刷出版）的思想内在关联性来看，《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是奠定其思想基础的著作，《中国革命外史》及《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是其思想基础的补充与完善。就其思想的完整性而言，可以说北一辉是在大正时期提出了最完备、最系统的“国家改造”方案的思想家。他是将日本放在东亚范围内，将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放在与繁荣的欧美相对立的层面上加以思考的。在这种意义上，北一辉的思想主张关系到日本及东亚地区的发展问题。在解决问题的顺序上，他首先谋求日本的内政改革，然后再依靠改革后的日本来帮助其他亚洲国家从西方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下摆脱出来。不言而喻，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在其解决问题所诉诸的手段上，他主张国内的改革要通过武装政变来完成，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解放要借助战争的手段来实现。因其思想带有明显的侵略性及扩张性，故将其思想称为“超国家主义”。在1919年日本国内兴起的“解放、改造”等时代形势的影

响下，北一辉的思想主张迎合了当时部分民众的社会心理并被军部势力所利用。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武装政变是在北一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政府以政变谋划者及挑唆者的名义将其逮捕，并于1937年将其处死。

在北一辉的思想中，“国体”与“国家改造”问题是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构建新的“国体”是“国家改造”的核心。那么，北一辉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其建设“国体”的手段及指导思想是什么？北一辉对中国革命抱有怎样的认识及其与日本外交政策的关系如何？其“国家改造”的思想迎合了哪部分人的社会心理？其“超国家主义”思想在哪些方面成了法西斯主义之源？在大正时期，北一辉及其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的作用及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本章将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北一辉的急进^① 人生历程

北一辉的思想及活动以急进为主要特色。他的三本著作所集中反映的思想以及北一辉为使其思想付诸实践所做的努力都证明了其整个人生历程的急进性。即是说，不管北一辉的思想是否具有进步意义，在他提出自己的主张之后，他便想使其思想主张在短时间内得到实践并欲获取成功。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他对日本传统“国体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具有明显进步意义的“天皇机关说”国体论及构建社会秩序的“社会民主主义”。他的著作公开出版发表后，遭到政府的查禁。随后，北一辉将目光投放到中国，为中国革命倾注心血。作为对中国问题的总结，也意

^① 急进，即是指不计后果而迅速行动之意。急进知识分子则是指那些在思想主张上不论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想使其思想在短时期内尽快付诸实践行动的知识分子。

欲对日本大正时期的外交进行指导，北一辉撰写了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革命外史》。到了1919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造”日本、“改造国家”成为时代的主要风潮。因此，北一辉又适时地出版了著作《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并且，他在《大纲》中提出了一整套国家改造方案，其中的思想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之源。根据其急进思想及行动的形成过程，可以将北一辉的急进人生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酝酿“纯正社会主义”

截至1906年，北一辉关注日本的传统“国体”问题，并对此作出自己的评论。他意欲成为一个政治评论家而以失败告终，不久他转而成为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此后，他不断地往返于故乡与东京之间，曾在东京做早稻田大学的旁听生，跟从当时著名的学术界人士有贺长雄、安部矶雄、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及浮田和民等学习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发展理论以及欧洲政治制度等课程，为其第一部著作奠定了基础。1905—1906年，年仅23岁的北一辉写成《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并自费出版。该书在出版不久即遭禁，北一辉失意之余加入宫崎滔天等人组织的“革命评论社”^①，将目光转向中国。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出生于新潟县佐渡郡湊町（现今新潟县两津市湊町）。父亲经营酿酒业及海产品批发。1888年，6岁的北一辉入湊寻常小学学习。1891年因患眼病休学一年多。1893年入加茂高等小学，并跟从父亲的好友若林玄益^②学习汉语。这为以后北一辉研究中国问题及参加中国革命奠定了相应的

^① “革命评论社”，关心社会主义，以支援中国革命为主要任务。主要由在野的一些激进人士组成的团体。

^② 若林玄益（1841—1895年），儒学家。

基础。1897年入佐渡中学，他阅读了宣传新思想的杂志，开始着眼于社会问题，并表现出一定的民主主义倾向。1898年10月，北一辉跳级升入3年级，并在《佐渡中学同学会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访彦成王墓记》。此后，他担任该杂志的编委。1899年，他眼病复发再次入院，兴趣点由撰文转向辩论，在校园里做了有关时弊的演讲。1900年11月，北一辉因5年级升学考试失败而退学，学生时代的生涯至此彻底结束。这一年，北一辉开始向《明星》杂志投稿。同时，他在地方报纸《佐渡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反传统“国体论”的文章。但是，因受到新潟县警察的追究，父亲令其停笔，致使北一辉最初的“政治评论家”愿望受挫^①。1901年2月，因眼病再次复发而住院的北一辉在病床上写好短歌投给《明星》杂志被录用。春天，北一辉出院并擅自赴东京。5月，日本“社会民主党”^②成立并旋即解散，北一辉巧遇此事。于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着手研究。11月，他从东京将《人道的大义》投给故乡的《佐渡新闻》并发表。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使得北一辉为日后提出“纯正社会主义”主张打下了基础。1903年6月，北一辉在《佐渡新闻》上发表《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观察》，政府以不敬的理由禁止其连载。北一辉愤而将其以短歌及汉诗的形式发表。10月，幸德秋水等非战论社会主义者创立“平民社”，发行《平民新闻》杂志。北一辉将数十份《平民新闻》分发给他的朋友。1904年4月，北一辉来到东京，作为早大的旁听生听取

^① 参考 G.M. 威尔逊著，冈本幸治译：《北一辉与日本的近代》，劲草书房 1989 年版，第 16 页。

^② 社会民主党，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1901 年 5 月 18 日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等申请建立该党。主张实行土地与资本国有、废除军备、保护工农权益等。两天以后即遭到伊藤内阁的禁止。

浮田和民的讲座，并去上野图书馆查找资料，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做准备。1905年9月，日本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日比谷骚动事件”。10月，他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并大体完成《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的草稿。1906年5月9日，他自费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5月14日该书被查禁。7月，出版《纯正社会主义哲学》，10月出版《纯正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些著作都频频遭禁，给北一辉以很大的打击。

（二）往返于中日之间

1906年11月至1919年6月，北一辉将其活动由日本扩展至中国，将自己的视野扩大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他通过与中国革命人士的接触及保持往来，积极地投入中国革命，并为中国革命筹措资金。但是，北一辉的一切活动又是以日本的对外政策为轴心而展开的。在他前一阶段宣传其思想受到阻碍时，便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到国外，想要通过曲线来达到其改善“国体”及确立“纯正社会主义”的目的。即是说，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中提出的思想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为“革命中国”寻找对策；其二，是从整体上为完善日本的“国体”而寻找“革命的对外政策”。二者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因此，北一辉提出了“俄中战争”、“日中同盟”，打破“日英同盟”，实现“亚洲门罗主义”^①的思想主张。其中，充满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色彩。

因著作遭禁，北一辉失意之余，接受了“革命评论社”的邀请，于11月参加其活动并成为其会员。12月，他发表了《自杀与暗杀》，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此后一段时间，他便开始研

^① 参考北一辉著：《中国革命外史》中的《俄中战争与日本的领土扩张》和《日中同盟及日美经济同盟》部分，收入《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三铃书房1975年版，第177—204页。

究中国问题。1907年，北一辉与宋教仁相识，并同以宋教仁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派合作。同年，“革命评论社”解散。1908年1月，北一辉出席幸德秋水主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与“金曜会”。10月，他到京都、大阪、神户及福冈等地，为中国革命筹措军用物资。1909年1月，北一辉回到东京，为了筹措中国革命所需资金，通过原“革命评论社”同仁和田三郎与板垣退助交涉。1910年因“大逆事件”^①被拘捕，后被释放。在这一时期，北一辉还在“黑龙会”^②帮忙。1911年9月，北一辉担任黑龙会发行刊物《时事月函》的编辑。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北一辉应宋教仁之邀赴上海。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北一辉参加葬礼。4月，北一辉接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命令，令其离开中国3年。5月，北一辉回国，过着孤独而贫困的生活，并再次与堺利彦等人交往。8月，中国“二次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们来日聚集在北一辉的周围。1914年4月，大隈内阁成立，北一辉向大隈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建议。同年，北一辉领养谭人凤的孙子。1915年12月，北一辉完成《中国革命党及革命之中国》（即《中国革命外史》的前8章），并将其印刷后分发给日本的朝野人士。这成了北一辉与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等人交往的契机。此后，北一辉便以“国家社会主义者中国革命顾问”而为人所熟知。

① 1910年5月，政府得知社会主义者要暗杀天皇，逮捕了幸德秋水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并且，政府凭秘密审讯捏造出所谓的“大逆事件”。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另12人被判无期徒刑。

② 1901年2月3日，以内田良平为中心创立的。其性质属于右翼团体。它的机关刊物是《黑龙》，对内抨击工人、民主运动，对外扩张，标榜“大亚细亚主义”，策划侵略中国，叫嚣对俄开战，把俄国从亚洲赶出去。1931年与其他反动团体结成法西斯政党“大日本生产党”。1946年盟军总司令部令其解散。

1916年4月，北一辉完成并刊发《中国革命外史》的后半部分。1917年7月，寺内正毅内阁对中国段祺瑞政府实行财政援助（即所谓的“西原借款”）。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1918年10月，以满川龟太郎为首，成立了日本右翼团体组织“老壮会”。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5月，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6月，北一辉将《凡尔赛会议的最高判决》邮寄给满川龟太郎。至此，可以说北一辉全部完成了《中国革命外史》。

（三）策动“国家改造”

1919年8月至1937年8月19日是北一辉策动“国家改造”的时期。由于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几次革命，且深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欧洲各国革命的影响，北一辉在上海就开始思考从整体上进行“日本国家改造”的方案。1919年8月，北一辉在上海着手写作《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来，国内的右翼团体在寻找团体行动的指导思想时，选中了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因此，他们将北一辉迎接回国。此后的北一辉在思想、组织及行动上保持相对的一致性，其思想被称为“超国家主义”。并且，北一辉的思想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源泉，其改造手段是急进的武装政变。昭和初年的一系列政变及暗杀活动，都与北一辉的思想密切相关。然而，最终为法西斯提供了思想渊源的北一辉却惨死在军部法西斯的手中，这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北一辉整体思想的形成及完善过程，说明当时的“社会存在”再次成为北一辉“国家改造”意识的源泉。

1919年8月1日，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成立了犹存社。在寻找合理的指导思想时，他们一致认为北一辉的思想主张最为适合。因而，8月23日，大川周明赴上海的长田医院访问并规劝北一辉回国。1920年1月5日，北一辉夫妇及养子北大辉

回国并加入犹存社。同月，由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将北一辉的手抄本《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用誊写钢板秘密印制47部，并在犹存社内部发行。3月，北一辉将《法华经》献给皇太子。1922年2月，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西田税初次拜访北一辉。后来，西田税成为北一辉的学生。1923年2月，由于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解散。5月，改造社对《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进行了部分删节出版，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关东大地震时，北一辉受到政府的监视。1926年5月，《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及补遗》由西田税编辑并公开发行。1931年10月，北一辉、西田税参加“十月事件”。1932年4月，北一辉写了《对外国策建议书》。5月，他初次与后来发动“二二六”事件的陆军青年将校们接触。1935年6月，北一辉发表《日美联合对华财团提议》。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发生。3月17日至21日，由警视厅对北一辉进行调查并做了详细记录。1937年8月19日，北一辉、西田税等被枪杀。北一辉结束了急进的一生。

二、北一辉的“国体观”与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

如前所述，北一辉在青少年时代便发表文章对传统的“国体论”^①提出挑战。在那些文章中，其“国体观”的基本内核大体成型。后来，他在其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将其“国体观”加以系统化。如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不难看出，北一辉的“国体观”是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本节将探

^① 所谓传统的“国体论”是指由明治宪法及教育敕语等所规定下来的天皇主权制国体。其特点是强调“一君万民”的统治体制，天皇具有神化的威权。北一辉将其批判为是“君臣一家”、“忠孝一致”、“天皇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虚伪性极强的“国体论”。

讨北一辉“国体观”的形成，其“国体”建设思想在社会秩序重建中的地位以及社会秩序重建的手段和指导思想等问题。

（一）“国体观”的形成

北一辉“国体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学时代的生活结束以后，北一辉就曾发表多篇论文论及“国体”问题。其中，有1901年11月发表的《人道之大义》和1903年6月发表的《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观察》。这些文章表露的“国体”认识由《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加以系统化。以下，根据上述两篇文章及一部著作来探讨北一辉“国体观”的主要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首先，建立基于“人道之大义”的、能够指导“世界万邦”的国体乃是理想的国体。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到北一辉撰写《人道之大义》这篇文章的时候，帝国主义各国对整个世界已基本瓜分完毕。熟知这一切的北一辉，在《人道之大义》的开篇便有所涉及。例如，他在文中说：“各国日新月异地向文明之域迈进。交通所到之处，万里若比邻。然带来便利之时，其带来弊害亦在所难免，交通便利反而助长各国之野心。利益冲突频生，权力之争纷起……”^①这是北一辉所看到的世界的大形势。他将目光转向社会生活实态方面，所观察到的是“人类生存之竞争”逐渐加剧。即人类为了生存，由不同种族的相互残杀到同一种族相互迫害的事件屡见不鲜。因而，北一辉呼唤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制裁”体制，制定各国善后处理的方针政策。其政策的实质是：创立新制度，管理“世界万国”，确保人类的和平与幸福，以求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政府”。作为建立“大政府”的

^① 北一辉著：《北一辉著作集》第三卷，三铃书房1976年版，第3页。

指导方针，北一辉提出了“人道之大义”。他认为，“率先提倡人道之大义指导各国并为达此目的而尽力，是属于社会公德范围内的行动，亦是我君子国日本的毕生任务”^①。作为建立“大政府”的顺序，北一辉强调指出：“首先要增强本国国力，确立文明的基础，上下一致，君民联合。而后，将其志向推广到全世界。”^②紧接着，北一辉针对国家建设的具体纲目指出了以下四点，即天皇与臣民间的关系；废除臣民间的阶级制度；使知识的分配平等化；修改议员选举法，实行广义的普选法；组织工会，限制资本家的垄断，使劳资相互救助。

自古以来，由于日本的天皇与国体是“二位一体”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谈论天皇就是在谈论日本的“国体”^③。“天皇宜亲近一般民众，赐予民众以拜谒资格”，这是北一辉所要解决的“紧急要务”之一。他指出：“天皇是民之父母，民是天皇之子女。此乃我立国之根本，万世不变之原则。此乃国情上与列强不同之所在。”^④不难看出，这是北一辉对古代父权制天皇观的继承。但是，他认为，当时日本国体制度的弊端在于臣民被分为许多等级，如果不是那些“有位有爵者”就不能拜谒天皇。因此，北一辉主张打破现有的国体制度，将拜谒“天皇”的权利赏赐给普通的老百姓。这样，既能进一步激发民众的忠诚心，又能体现天皇的“仁德”。从而，“上下融合，君臣一致，使充满一

① 北一辉前掲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三卷，第5页。

② 同上。

③ 据日本政治学家石田雄介绍，所谓的“国体”，在近代日本人的意识中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始建王朝的传说，创建了日本的神国国体；其二，日本国土本身的独立性与神圣性。这两种因素已经融入到作为国民惟一指导者的天皇的形象之中了。参考G.M. 威尔逊著：《北一辉与日本的近代》，第23页。

④ 北一辉前掲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三卷，第5页。

国之文明光辉照射四方。这是臣民的诚意。”^① 据此，北一辉在第二条纲目中提出要“废除臣民间的阶级制度”。即是说，要扫除天皇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障碍。那么，哪些人是北一辉眼中的“障碍”呢？很显然，即是指那些具有“华族”身份的人。

就北一辉从世界范围内的视角考虑问题的整体性而言，其思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例如，他想建立以“人道之大义”为指导思想的“世界之大政府”的构想就是佐证。这说明，北一辉已清楚地意识到国际组织对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但他本人万万没有想到，在近20年之后的1920年1月20日，国际联盟正式成立。虽然日本是国际联盟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它实际上是由英法所操纵的，并由美国支持的外交工具。这与北一辉1901年提出的“世界之大政府”的构想虽有相似之处，但又与北一辉的真实意愿相左。因为，北一辉的“世界之大政府”是由“君子国的日本”来做指导，来做统帅。这里包含着日本想做世界盟主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国际联盟那里并没有得到满足。另外，从上述文中所集中表述的“国体”思想来看，打破阶级制度，主张平等地拜见天皇的“平等思想”是应提倡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北一辉的“国体观”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因为，他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国体、天皇二位一体”思想的束缚。即是说，他的国体意识尚处于未分化状态，根本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体内容。甚至连一点现代的“国体”意识也不存在。

现代意义上的国体，即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一般为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不同阶级的专政形成不同的国体。现代意义上的政体，即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政体是与国体相适应的，北

^①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三卷，第5—6页。

一辉在《人道之大义》一文中所强调的“国体”就是“天皇”。为了维护作为“国民唯一指导者的天皇的形象”，北一辉主张将拜谒天皇的权利推广至普通民众中间。他没有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将国体与政体区分开来，所以他在《人道之大义》中的“国体”认识不具有现代的内涵。北一辉在《人道之大义》中，是为了确立全世界的“人道之大义”而展开论述并论及国体问题的。他对世界各国存有野心，而且他是将日本放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观察问题的，对日本国的盟主定位是不准确的，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他在对本国定位时出现了误差，所以他的基于“人道之大义”的国体建设难以实现。

其次，打破“迷惘虚伪”的“国体论”。

1903年6月，北一辉在《佐渡新闻》上发表了《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又称为《所谓国体论的打破》）一文。在文中，北一辉对日本的传统国体进行了批判。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北一辉所说的“传统国体”的内涵如何？在北一辉看来，“传统国体”的弊端在哪里？北一辉在这篇文章中表述了怎样的“国体认识”？

北一辉在文章的开篇便指出了传统“国体论”的具体内涵，即“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拥戴万世一系之皇统，此乃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所在。且，实乃国体论名义下之神圣。”^①可见，传统“国体论”的核心在于“天皇主权说”^②。北一辉所批判的“国体论”，是由明治政府的指导者们在《教育敕语》中所规定的对天皇的“忠孝心”及天皇主权的国体。即是说，日本国民的教

^① 北一辉著：《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收入《北一辉著作集》第三卷，第36页。

^② 参见朱庭光主编、李巨廉等副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

育已经受到“国体论”的影响。即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以向国民宣传“万世一系之天皇国体”的思想为主。北一辉认为，这种“国体论”是没有历史事实根据、没有考察祖先足迹的曲解歪说。

关于传统“国体”的弊端，北一辉强调指出：“极其迷惘虚伪的国体论之扩展，干犯学问之独立，束缚信仰之自由，腐化国民教育之根源。”^① 因此，北一辉力主打破这种虚伪的“国体论”。并且，他想代表黄种人立足于世界来观察问题，同时为国家的整体形象和前途着想。不难看出，北一辉想从根本上清除传统“国体论”对学问、信仰及国民教育的影响。

至于北一辉在这篇文章中所流露出的“国体认识”，主要是否定了天皇的神圣性。他说：“自建国以来至大化改新的1300年间的日本国，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国家，只是社会。皇室不是主权者，它只是在近畿数方里之地内受到尊敬、受到景仰的家族。”^② 这样，北一辉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皇的神圣性。同时，也否定了“天皇之万世一系”。他的“国体认识”企图使天皇家族化。他在文中进一步指出：“在那些时代，国民与天皇几乎都不痛不痒地生活着。”^③ 其意暗指，国民还没有将天皇当成神那样崇拜，天皇也没有将国民视为自己的子民。皇室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教育敕语》中所鼓吹的那样。紧接着，北一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皇室的地位。他认为，无论是杀掉苏我人鹿的中臣镰足的后代，还是平源之争的平氏及源氏，待他们执政后，都成了专横跋扈、提刀杀人的“典范”。以至于后来发展至足利义满被称为“日本国王”，德川家康将“皇位”驱逐出政治领域等等。如果按照现行国体论评判之，那么，日本人的祖先自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第3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古以来就有“乱臣”、“贼子”^①。通过这种历史的考察，北一辉还认为，“攻战斗伐”的群雄便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那些英雄人物，才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那些英雄人物的治国理念便成为日本的“国民精神”^②。

不难看出，北一辉从历史事实中归纳总结得出，日本的“国体”是“攻战斗伐”的群雄中的获胜者。因此，在不同时代，日本的国体应该有所不同。这是北一辉按照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历史地考察日本的“国体”时所得出的结论。他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日本的“国体”，与《明治宪法》及《教育敕语》中宣传的“国体”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他将高高在上的天皇拉下马来，将其视为构成“英雄群体”的一分子。当天皇在这个争斗群体中处于劣势，甚而失势的时候，那么，天皇的治国理念就成为历史，就成为过去。能够体现日本国民精神的东西，就是在英雄群体争斗的过程中，获胜者的“治国理念”。仅就这一点而言，北一辉的“国体认识”有所进步，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将国体与天皇、国体与将军、国体与“日本国王”等同划一，充分地表现出北一辉思想中的封建性。如所周知，在日本的中世纪，日本天皇的大权一度旁落，经过战国时代、足利义满时代，到德川幕府时代，国家主权转移到那些参与争斗的获胜者手中，这些获胜者又都表现出浓重的封建帝王色彩。因此，北一辉将日本的国体与这些群雄中的获胜者等同起来，充分表现出其思想中的封建性。在《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一文中，北一辉的“国体认识”仍然处于“国体政体”的不可分状态。他的“国体认识”的特点是“国体 = 群雄争斗中的获胜者”。

再次，北一辉“国体观”的出台。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第38页。

② 松本健一著：《北一辉论》，现代评论社1975年版，第107页。

上述论及的《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因触及了天皇及皇室的问题，所以政府以不敬的理由禁止其连载。1904年，北一辉在早稻田大学作旁听生，跟从有贺长雄、安部矶雄、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及浮田和民等人学习。不言而喻，北一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他对上述学界人士的思想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加以吸收的。这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的论述中。关于这一点，北一辉在著作的“序言”^①中已经指明。该著作的第一编《社会主义的经济正义》，论及了个人主义的旧派经济学，但更多的是批判金井延的《社会经济学》与田岛锦治的《最新经济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幸福”^②。第二编《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主要反驳了个人主义的刑法学，批驳了樋口堪次郎的犯罪论。第三编《生物进化论与社会哲学》主要批判地吸收了丘浅次郎的《社会进化论讲话》中的观点，并论及了社会进化的“理法与理想”。第四编《所谓国体论的复古的革命主义》排斥君主论者及国家主权论者的法理学，根据国家学及宪法解释来阐明国体与政体，进而从历史学的角度再对其加以进化式的解说。第五编《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主要论及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前提，论述了实现世界联邦的手段。在上述的五个部分当中，北一辉倾注心血最多的就是第四编。以下，拟以第四编为主来探讨北一辉的“国体论”的内涵及其对“所谓国体论”的批判。

1. 北一辉“国体观”的内涵。

在论及“国体”的具体内涵时，北一辉认为，“法学中的社

^① 参考北一辉著：《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三铃书房1978年版，“序言”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会主义就是国家主义”^①。他进一步解释说：“社会主义不只是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上的真理，它在法律学上也是真理。即主张主权存在于有一定地理限制的社会=国家。”^②在此，北一辉认为有一定地理界限的社会与国家是等同的。因而，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就是等同的。法律学上的“国体”就应该是“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而且，北一辉第一次将法学及政治学的“权利”与“义务”、“国体”与政体”^③等概念引进自己的论述中来。北一辉在对天皇及国民的权利及义务进行分析时指出：“所谓天皇与国民的权利义务并非契约上的对立。……国民承担的义务是国家要求的权利，君主主张的权利是国家承担的义务。……日本天皇与日本国民的权利义务并非对立，而是对大日本帝国的权利义务。例如，日本国民有义务重视天皇政权，天皇没有权利对国民提出要求。提要求的权利属于国家，国民在国家面前要尽义务。”^④可见，在北一辉的思想中，已经将日本国体的内容置换为“国家”，在权利义务的关系上也要以国家为重。

关于国体的问题即主权所在的问题，北一辉认为，君主与国民决不是主权的“本体”，“主权本体在于国家，为了国家独立自

① 参考北一辉著：《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三铃书房1978年版，第211页。

②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11页。

③ 在日本，对国体与政体最早加以区分的思想家是加藤弘之。他在1874年的《国体新论》中认为，近代国家的国体是立宪制国体，政体则是君主政体或民主政体。穗积八束则认为，“主权所在”决定一国的国体，与其相对应的“行动方式”是政体。穗积八束的观点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国体”与“政体”的内涵。

④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12—213页。

存的目的，国家主权或由君主、或由国民来行使”^①。由上文的君主及国民对国家尽权利义务，到国家是权力的主体，很自然地演绎出了国家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君主及国民是为使其人格得以生存、进化的机关。这就是北一辉所提出“天皇机关说”。即“通过说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使作为最高机关的天皇的地位相对化的天皇机关说。”^② 他的“天皇机关说”构成其“国体观”的核心。关于“天皇机关说”，北一辉主要是1904—1905年做旁听生时吸收了他的老师美浓部达吉的观点。美浓部达吉对“天皇机关说”进行系统论证是在1912年，即在《宪法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天皇机关说”。其大意是：“在立宪政治下，国家是统治的主体。天皇统治大权不是天皇的个人权力，行使统治权不是个人私事，而是作为国家元首，为了国家的公事。换言之，天皇即国家最高机关，其权力之行使必须遵循宪法条规。天皇行使立法权，按宪法规定必须有议会的协赞，而不是天皇个人力所能及。因此，议会也是参与统治的国家机关，而且是代表国民的国家机关。”^③ 北一辉的“天皇机关说”与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基本相同。

进而，北一辉还从进化论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了日本国体的进化情况。例如，北一辉认为，自古以来到中世，地理范围内的社会集团及土地都是君主的所有物，国家在法律上被“物格化”。那时，君主是主权的本体，国家只是其统治的客体。北一辉将国家“物格化”的时代称为“家长国家”，即中世的“国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体有了变化。君主已不

① 北一辉前掲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14页。

② 官本盛太郎著：《天皇机关说的周边——三个天皇机关说和昭和史的证词》，有斐阁1983年版，第5页。

③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526页。

再拥有国家，它只是国家的一个机关，国家成了主权的本体。北一辉将这种国家“人格化”的时代称为“公民国家”，即应该成为今天的“国体”。与这些国体相对应的政体，分别是：镰仓幕府以前是“家长国家”国体下的“君主制”政体；自镰仓幕府至明治维新是“家长国家”国体下的“贵族制”政体；明治维新以后是“公民国家”国体下的“法律上的民主制”政体。北一辉还认为，眼下应该为创立“公民国家”国体下的“完全的民主制”^①而努力。因此，按照“社会=国家”的逻辑推理，北一辉指出：“日本今天的国体与政体是社会民主主义。……主权在于国家，因而是社会主义；政权在于国民（广义的），因而是民主主义。”^②即北一辉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社会是主权的本体，在民主的政体下行使之”^③。

归纳起来，北一辉提出诸如“机关”、“公民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概念来阐述日本的国体，他认为最理想的国体是“社会主义”国体，最理想的政体是“民主主义”政体。他将穗积八束对“国体”与“政体”的理解吸纳过来，又对他的解释做了自己的补充。由此观之，北一辉已经将“国体”与“政体”准确地区分开来，并赋予其现代的解释。可以说，北一辉的“国体观”已经形成。其特点：“天皇机关说”是“国体观”的核心；主权在于国家，由于“国家=社会”，所以主权在于社会；日本今天的国体与政体是社会民主主义（纯正社会主义），即主权在于国家，因而是社会主义；政权在于国民（广义的），因而

① 参见北一辉著：《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43—245页；另参考冈本幸治著：《北一辉——转换期的思想构造》，ミネルウア书房1996年版，第129页。

② 北一辉前掲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47页。

③ 同上书，第246页。

是民主主义。

从上述北一辉“国体意识”的发展变化到“国体观”的出台，北一辉对国体的认识经历了由“国体政体”的模糊不可分状态到将其清楚地分开，并给“国体政体”以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解释。因此，北一辉的“国体观”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其现代意义还通过他对“所谓国体论”的批判表现出来。

2. 北一辉对“所谓国体论”的批判。

北一辉在第四编中集中批判了有贺长雄与穗积八束的“国体论”。北一辉认为，他们的“所谓国体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统治的主权在于万世一系的皇室，这是不变的国体”，“日本国民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只有这种事实才能构成天皇主权的基础”^①。由此观之，有贺长雄及穗积八束都信奉天皇主权说。即“君主即国家”，天皇是统治的主体而不是机关。另外，穗积八束认为“明治维新”就其性质来讲，是“恢复主权”。然而，北一辉却认为，既然“国体”是万世一系不变的，任何革命也不能改变的，那所谓的“恢复主权”就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与误解，是恢复诸侯的主权呢，还是恢复皇室的主权呢？因而容易使人不明了，使人不知穗积八束到底是“天皇主权论者还是诸侯主权论者”^②。北一辉还认为，这种“所谓国体论”的错误就在于它仍旧是静态地观察问题，不是动态地观察问题。即是说，他们没有采取进化论的思想来观察社会的发展，来阐述“国体”的演进，他们也没有按照古代、中世、近代这样的历史顺序来考察日本的国体与政体。因此，北一辉将穗积八束批判为不懂历史知识的学者，并将其批判为是“被万世一系的铁锤敲打了头盖骨的白痴”^③。他们的“所谓国体

①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16页。

② 同上书，第336页。

③ 同上书，第277页。

论”会将天皇重新拉回“土人部落的土偶”^①的地位。

（二）“国体观”与重建社会秩序的关系

以上，探讨了北一辉“国体观”的形成。实际上，北一辉的“国体观”是他在构建新的日本社会秩序时所提出的核心思想。即是说，“国体观”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②。“国体”是北一辉欲重建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体观”直接左右着将来的“国体”及“政体”模式。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国体”及“政体”模式与社会秩序其他部分之间彼此适应、彼此协调的。如果说“国体”是社会秩序其他部分的保障，那么，社会秩序的其他部分就是“国体”的有益及必要的补充。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可以推知，围绕“国体”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社会秩序建设的指导思想。下面，阐述北一辉重建社会秩序其他部分的构想。

首先，经济秩序的重建。

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的第一编中，北一辉主要论及了经济秩序问题。北一辉注意到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贫困与犯罪”现象。贫困的原因就在于“经济贵族”^③的掠夺。所以，他著书立说试图解决这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生的悲惨丑恶之两大事件”^④。社会秩序与国家的安宁幸福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为了解决“贫困”的问题，要从经

①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371页。

② 参考冈本幸治前揭书：《北一辉——转换期的思想构造》，第122页。

③ 参考官本盛太郎著：《北一辉研究》，有斐阁1976年版，第97页。

④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页。

济秩序着手，重新调整经济秩序。为了解决“犯罪”的问题，那就应该从“伦理道德”着手，重建“伦理”秩序与“道德”秩序。社会与国家必须真正在社会主义下追求真正的“秩序与安宁”^①。北一辉重建经济秩序的构想，大体如下：

将法理上的“平等思想”扩展到经济关系之中，这是“社会主义化”^②在经济秩序重建上的直接体现。这种“平等思想”首先体现于北一辉论述的“权利思想的变迁”中。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问题并认为，在古代中世纪，所有的民族在土地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凭借武力占有土地，即所谓的“占有说”。但是，到了欧洲大革命时期，以个人主义为名义的“劳动说”（即劳动的果实归劳动者所有）打破了“占有说”居于主流地位。北一辉按照这种推论进行推理，认为在社会劳动占统治地位时，“社会的所有权”即为“神圣”，即“社会主义主张社会的所有权神圣”^③。另外，从分配的角度体现“平等观念”。“分配的平等”即是指在人们的“购买力”^④上所体现出来的平等。

实行“土地及生产机构的公有化”。北一辉指出：“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的经营是社会主义的核心。”^⑤

重视个人的“生产权”。北一辉认为，社会主义的真髓在于“生产论”。如将个人的生产权视为为了国家的目的与利益的公权，通过个性的发展及强烈的公益心，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富裕得令人吃惊。实际上，北一辉重视个人的“生产权”就是在为资产阶级谋利益。

①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3页。

② 福井直秀著：《初期北一辉的变革论》，转引自松泽哲成编《人与思想·北一辉》，三一书房1977年版，第159页。

③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24—25页。

④ 同上书，第47页。

⑤ 同上书，第59—60页。

上述北一辉的有关经济秩序重建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欲消灭贫困、追求共同富有这一点，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应该奋力争取的。

其次，伦理道德秩序的重建。

建设伦理道德秩序，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的“犯罪”问题。这是属于精神建设的问题，它与上述的经济秩序建设（实际上属于物质建设）遥相呼应。

对于犯罪，北一辉也主要是用进化论来加以分析的。他认为，要想消灭犯罪，就要使一个社会的“社会良心”得到极大发展。所谓的“良心只是道德判断的自体，其内容除去那些遗传的因素外什么也没有。即判断的意识是先天的，但如何进行判断则是后天的”^①。也就是说，“良心”除了具有从母体中继承来的“判断意识”外别无他物，“如何判断”及“判断的具体内容”要根据社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法律时代，“刑法是道德良心的保护者”^②，即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来严格执行其道德规范，又可称“他律的道德时代”。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法律逐渐将其范围让位给道德，普通良心亦随同社会一起进化”^③。于是，法律时代就被道德时代所取代，即社会进化为“靠内部的强制力即良心受到谴责来维护道德”，又可称“自律的道德时代”^④。与上述的经济秩序相对应，“由对国家社会的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产生出对国家社会的献身的道德”。进而，“在献身的道德下实现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⑤。

①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74页。

③ 同上书，第77—78页。

④ 同上书，第80页。

⑤ 同上书，第92—93页。

从北一辉对“国体”的探讨到重建经济秩序及伦理道德秩序的主张观之，他对国家总体模式的设计大体形成。在这些方面，北一辉的思想所表现出的特点是“进化论+社会主义”。

（三）重建社会秩序的手段及指导思想

如何才能实现北一辉所主张的“国体”及所设想的经济秩序和伦理道德秩序？这是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手段及指导思想问题。其手段及指导思想大体如下：

首先，“法律上战争意义的经济维新革命”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手段。

北一辉认为，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需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即是为使新的社会势力变为国家的意志，使经济的阶级国家进化为经济的公民国家而进行的，具有法律上的战争意义的经济维新革命”^①。所谓的“法律上的战争意义”即是指将普通阶级通过普选的形式送到议会中去，同议会斗争以获取更大的发言权，占领“投票的弹药库”^②。然后，以投票的方式将“经济贵族”的资本与土地收归国有，并打破他们对政权的垄断，完成“经济维新革命”^③。

北一辉虽然注意到造成贫困的原因在于“阶级的掠夺”，在于“经济贵族”的存在，但是，他又没有以“彻底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社会加以分析。因此，他没能提出依靠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完成使命。他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只不过是温和的“议会斗争”的形式。

其次，“纯正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是重建社会秩序

①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411页。

② 同上书，第389页。

③ 同上书，第393页。

的指导思想。

“纯正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北一辉的行动指南。那么，“纯正社会主义”内涵如何？“纯正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以及与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如何？“纯正社会主义”的特点如何？以下分而述之。

“纯正社会主义”的内涵：“纯正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及生物学和哲学等学科基础上的。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公民国家”的国体，在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民主主义”政体，即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平等分配，废除少数阶级的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呼唤出人类的“社会良心”。前文曾指出，1903年10月，幸德秋水等非战论社会主义者创立“平民社”，发行《平民新闻》杂志。北一辉将数十份《平民新闻》分发给他的朋友，并从此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可以断言，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直接来自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学说。

综观北一辉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正义编”，可以发现，其中的论述与幸德秋水早在1903年6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阐述的“社会主义的主张”惊人的相似。就幸德秋水对北一辉的影响及其《社会主义神髓》成书又早于《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的成书而言，不难断定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直接引用了幸德秋水“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社会民主”成分。例如，幸德秋水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第一，“生产资料，即土地、资本的公有”；第二，“生产的公营”；第三，“实行收入的社会分配，即公平分配”；第

四，“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个人私有”^①。这些直接成为北一辉重建社会经济秩序的思想来源。

在对外关系方面，“纯正社会主义”以消灭国际间的竞争为目标。但是，北一辉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援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以分析国际间的争端。很显然，这种竞争带来的是“弱肉强食”的后果。北一辉用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弱肉强食”的表现形式，但它可以通过“自律的道德”伦理加以控制。在分析国际问题时，他认为，由于经济环境的不同，各国间的精神差异，短时间内决不可能杜绝国家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在北一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并不排除以战争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革命势力组织化”问题上，北一辉主张将“力”的重点放在军事的团结上。北一辉还主张在“经济维新革命”后，建立起“征兵的劳动组织”^②，以便发挥团结的力量。因此，北一辉认为“日俄战争是以尊王攘夷论之国民精神的要求”^③为前提而进行的战争。在这一点上，北一辉反对当时社会主义者的非战论。不言而喻，这是北一辉日后主张中国向中亚地区扩张及日本对英开战的思想基础，也是后来与青年将校相结合的依据。并且，他的“纯正社会主义”思想中孕育着法西斯主义的因子。

由此可见，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元并存的。在国体上，北一辉持“天皇机关说”，主张“社会主义国体与民主主义政体”。这是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与进化论的嫁接产物。在经济建设上，北一辉主张平等、生产资料公有、平均

① 幸德秋水著，马采译：《社会主义神髓》，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7页。

②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解说”，第442页。

③ 同上书，第433页。

分配等。这是对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直接引用。在对外关系上，北一辉信奉“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这样，在北一辉的学说中，战争思想成了“纯正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一个方面。归纳起来，“纯正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 + 进化论”。

“纯正社会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同时，其他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大量出现。下面，探讨“纯正社会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

“纯正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如前所述，北一辉的根本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广义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其特色在于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指导原理，国家国体只不过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政治上，他强调“议会至上主义”。这种温和的“议会至上主义”后来发展为依靠天皇的最高权力和青年将校的合力来改造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他承认“个人的生产权及产品的私人所有”，承认“营利主义及资本主义”^①。因此，在革命的手段上，他主张采取“议会斗争”。

与之相反，科学社会主义是真正为广大无产阶级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学说。如所周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开篇便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他们将社会划分为两个大的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包括：

① 参考《现代史资料 23·国家主义运动 3》，三铃书房 1996 年版，第 5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50 页。

科学地揭示和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客观规律；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手段与革命后的国体形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各国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但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可以说，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

因此，比较起来，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是虚假的社会主义学说。他没有一个清晰的阶级概念，根本没有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其“社会民主主义”在国体上的主张，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社会民主”的成分。在经济上，北一辉主张的“个人的生产权及个人产品的私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及产品公有、实行产品平均分配的原则相去甚远。北一辉的经济主张，后来由“经济结构改造”时所提倡的“大资本的国家统一”这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思想继承下来。在革命的手段上，北一辉幻想通过投票在议会中获取多数来完成“经济维新革命”。他根本不可能想到组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获取革命的胜利。在对外关系上，北一辉主张战争及对外扩张。这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是极端对立的。由此可见，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充其量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纯正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时候，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派别与思潮也大量地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它们划分为三个流派五种类型。三个流派分别是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反动的社会主义一派又分为三个类型，即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封建的社会主义”即封建贵族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声讨资产阶级，并装

模作样打出了“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①的招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即是指摇摆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替工人阶级说话”^②的学说主张。“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即是带有德国特色的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的社会主义^③。这些类型的社会主义都以反动性为特色，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将它们称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明显特征是，提倡社会主义的人想使历史的车轮倒退。在这方面，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要比它们进步。但是，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最显在的反动性在于主张对外侵略。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指“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④。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大体属于这一类型。北一辉注意到社会的贫困与犯罪问题而主张“经济维新革命”。他认为，“经济维新革命是以投票的方式将贵族的资本与土地收归国有，打破事实上的垄断”，“阶级斗争是下层想要进化为上层时而发生的斗争”^⑤。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体系。这一社会主义大体属于空想性的。它们的想法比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先进，但存在着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4页。

② 同上书，第276页。

③ 同上书，第278页。

④ 同上书，第280页。

⑤ 北一辉前揭书：《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第393页。

离实际的幻想。

“纯正社会主义”与当代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指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① 它是由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演变而来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②：第一阶段自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在概念上还称作社会民主主义，其内容包括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第二阶段从1899年伯恩斯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名词。第三阶段是指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将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它们强调“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特殊关系”，放弃改革生产资料的目标，重点改革“社会再分配”。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东欧各国纷纷改制，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新的探索。当前的“民主社会主义”则重视实用主义，纲领政策与右翼政党的政策趋同，重视“环保”、新社会运动等“后工业社会”^③的问题。

欧洲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源是多元化的，包括“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④。其主要思想内涵如下^⑤：

① 殷叙彝：《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收入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王捷、杨祖功著：《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绪论”第3—4页。

③ 同上书，“绪论”第5页。

④ 同上书，第15页。

⑤ 同上书，“绪论”第15—16页。

“主张和平与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反对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基本理论和意识形态上，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观点，思想理论趋向多元化。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政治上维护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

在国际关系上，一贯地反对战争，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有相同的思想渊源。例如，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社会学说做基础。并且，二者的思想来源都是多元化的。但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战争，而且至今仍为多数欧洲社会党所信奉。而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对外侵略，并孕育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因子。这使得北一辉“纯正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社会民主”成分大打折扣。

“纯正社会主义”与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前文曾提及，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直接引用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学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并组织了日本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北一辉则肯定日俄战争，并对幸德秋水等人的“反战论”进行批判。另外，在革命的手段上，幸德秋水提倡“和平过渡”，北一辉则主张“议会至上主义”的“议会斗争”。当遇到挫折时，幸德秋水在失望之余一变而为无政府主义者；北一辉则抛弃了“议会斗争”转而提倡“武装政变”。二者虽都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①的观点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进程，所不同的是北一辉还将其运用到解释国际战争的问题上。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中孕

^①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育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因子。

综上所述，北一辉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正是由于这种多元性，决定了北一辉的思想又是混乱的。这种混乱性，具体表现在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上。例如，他既标榜是社会主义者，又抨击日本的“反战论”，主张对外侵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只能将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视为沽名钓誉的社会主义学说。此后，北一辉主张中国向中亚地区扩张及日本对英开战，都可以在“纯正社会主义”中找到思想根源。

三、“革命的中国”与“革命的对外政策”

“革命的中国”与“革命的对外政策”，是北一辉在1916年撰写的《中国革命外史》中集中表露的思想的两个方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革命的中国”是认识的基础，“革命的对外政策”是认识的归宿。即是说，对“革命的中国”的认知是为了制定出理想的日本外交政策。如果从社会秩序重建的完整性来说，外交政策又是对上述秩序构建的有益的补充。一般说来，外交政策是主权在握的人根据时势分析加以制定的，“国体”体现的是“主权所在”，因而外交政策又与“国体”密切相关。可以说，外交政策是对“国体”的完善。本节将探讨北一辉的“思想亡命”、对“革命中国”的认识及其提出的“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实质等问题。

（一）北一辉的“思想亡命”

北一辉的第一部著作遭禁给他以很大的打击。之后，他受到宫崎滔天等“革命评论社”要员的邀请，成为其会员。但是，他的苦闷与愤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排解。从政治力学的角度

讲，“权威对自由”的压抑使渴望自由的人分化出两种倾向。其一，是由消极抵抗“权威压抑自由”这一残酷现实而来的绝望，这种绝望的表现即是想到了自杀（精神上或肉体上的自杀）。其二，是积极反抗这种压抑而企图凭借“暴力”打倒“权威”，因此而想到了“革命”或“暗杀”。这是“政治力学”上的表现。可以说，北一辉于1906年12月撰写的《自杀与暗杀》中，对日本社会现象的分析即是这种“政治力学”的验证。但是，从北一辉的具体行动来看，他既没有自杀也没有暗杀，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之中，以求有朝一日找到完成日本革命的出路。因此，他选择的是“思想亡命”^①。

从《自杀与暗杀》一文的内容，可以窥知北一辉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他在文中的开篇便指出：“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看到因烦闷而自杀的人频频出现，我担心这种暗杀出现的前兆。”^②即是说，在1906年至1907年的时候，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因精神的苦闷而自杀的现象。北一辉注意到这种情况，并撰写《自杀与暗杀》一文对此加以预测。北一辉所最担心的是“自杀”现象。他说：“我担心日本烦闷的自杀者”，但“所谓的烦闷究竟是什么？……拥戴万世一系之皇室，在万国无比之国体下生存，只要有忠君爱国的道德即足矣。还烦闷什么呢？”^③很显然，北一辉在文章中是以反语的形式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前文曾提及，北一辉是极力反对“万世一系天皇之国体”的，他是以反语的形式在嘲笑传统的国体及传统的道德。

关于“烦闷”，北一辉解释说：“我断言，所谓烦闷是个人企

① 参考松本健一著：《北一辉论》，第174页。

② 北一辉著：《自杀与暗杀》，收入近藤秀树编辑：《日本的名著45·宫崎滔天、北一辉》，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505页。

③ 同上。

图通过自己的主权，叛逆其他外来主权的内心的革命战争。”^①即是说，当个人在思索如何确保自己的自主权不受侵犯、不受压抑时，烦闷就产生了。因而，那些为自己“内心的革命”赴汤蹈火的人们正在苦斗。革命虽然结束但还未找到新的领域的人，眼前则是一片黑暗，进而走向绝路选择自杀。因此，北一辉主张“烦闷的自杀者应该一变而为革命的暗杀者”^②。以后，虽然北一辉并未直接参与暗杀活动，但是井上日昭等血盟团成员却非常信赖北一辉。

那么，北一辉选择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呢？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北一辉不赞同“自杀”。他同意将“烦闷的自杀者变为革命的暗杀者”，但是，他又没有选择“暗杀”。因为北一辉并不认为暗杀天皇就可以成就革命。他信奉“天皇机关说”，他主张应该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来完成“经济维新革命”。在遭遇挫折时，北一辉选择的是参与中国革命，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于北一辉来说，投身“中国革命”具有“亡命”^③的意味。北一辉的“亡命”属于“思想亡命”。

（二）北一辉对“革命中国”的认识

北一辉在1921年8月为《中国革命外史》写的《中国革命外史序》中认为，清末的辛亥革命是在日俄战争的胜利及“日本思想”的启蒙下发生的。北一辉还强调指出：“革命中国与革命的对外政策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议题。”^④也就是说，参与并研究

① 北一辉著：《自杀与暗杀》，收入近藤秀树编辑：《日本的名著45·官崎滔天、北一辉》，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506页。

② 同上书，第507页。

③ 松本健一前揭书：《北一辉论》，第190页。

④ 北一辉著：《中国革命外史序》，收入《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三铃书房1975年版，第2页。

中国革命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制定出有效的合理的日本对外政策才是终极目的。因此，北一辉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对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党的真正理解，对日本政府及国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① 北一辉在亲自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革命中国”的认识。那么，北一辉对“革命中国”的认识怎样？“革命中国”如何才能获取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民族性格的弱点在哪里？北一辉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并呼吁找回“成吉思汗”精神。北一辉认为“孔教”是带来中国民族性格柔弱的要因。因此，他对“孔教”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以下，就这三个问题做一探讨。

首先，批判地认识“中国革命党”，推动“革命中国”发展的对策。

北一辉认为，在“革命中国”的发展建设问题上，孙中山的“美国式理想”是没有根据的空想，谭人凤是顽固的“国粹主义”，黄兴的想法比较混乱。北一辉所赞同的是宋教仁的“立法”思想。

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批判几乎近于人身攻击。他攻击的主要出发点，是孙中山在选择“革命中国”的发展对策上采取了美国的“民主共和思想”。他指出：“如果在中国的建国及历史上没能发现拥护在野党自由的国民精神自由，那么，孙中山翻译美国总统政治乃至将其嫁接到中国反而会背叛其理想的民主自由。从逻辑上就可以推导出将会出现专制。而且，这种推想已经被他自己本身的实际情况所证实。孙中山在袁世凯帝制建立之后，被剥夺了在国内居住的自由而亡命他国就是很好的证明。”^② 其意暗指，在当时的中国，国民的自由精神并没有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1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下，急于将美国式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嫁接过来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实际上，在北一辉看来，美国是具有“自由建国精神”传统的国家，中国是具有“服从历史约束”传统的国家。因而，北一辉认为，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是“美国式理想”或“美国式梦想”^①。因此，按照北一辉的推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但是，北一辉对孙中山并不是一味地加以批判，他对孙中山的功绩也给予肯定。他认为，孙中山在推翻清末的腐朽统治、确立共和政体这一点上，建立了“百代不磨的功绩”。并且，北一辉认为，孙中山在建国之初宣布的未来共和政体的必然性带有“大宪章的精神”^②。他对孙中山进行的积极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与对孙中山的“美国式理想”政治的批判相反，北一辉将宋教仁所构想的“革命中国”的建设方案称为“东洋的共和政体”。北一辉认为，所谓的“东洋的共和政体”是与美国式的“共和政体”相区别而言的。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共和政体在总统选举上，不是通过选举活动或议员的投票活动来决定，它立足于天命与民意。因而，为了将二者区别开来，我将其命名为‘东洋的共和政体’。”^③北一辉将宋教仁视为爱国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并非常崇拜宋教仁。他认为，没有实行宋教仁的路线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政治模式由以下几部分构成：象征性的大总统；拥有掌握政治实权的首相的议院内阁制；中央集权的“单一国

① 久保田文次著：《“中国革命外史”的实证批判》，收入松泽哲成编辑：《人与思想·北一辉》，第184页。

②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57页。

③ 同上书，第158页。

制”^①。因为这种议院内阁制并没有丢掉国粹乃至民族的灵魂，所以北一辉将其命名为“东洋的共和政体”。

其次，“窝阔台汗”精神是“革命中国”发展的精神力量。

与“东洋的共和政体”相对的是“东洋的君主政体”。北一辉将统一日本 2500 年的信仰，拥护与扶植国民自由的“明治大皇帝”统治下的政体称为“东洋的君主政体”^②。在孙中山与宋教仁的路线都相继失败之后，北一辉在为中国革命寻找理想的途径时，他又返回到历史中。他认为，在中世的中国，类似于近代大总统身份的人就是元太宗窝阔台汗。他在位时的政体即是“东洋共和政体”的原型。如此一来，“明治大皇帝与窝阔台汗实际上成为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化身”^③。由此可见，他已经将窝阔台汗当作一种精神力量。北一辉认为，“窝阔台汗”精神即是“革命中国”发展的精神力量。

实际上，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中，前后虽然用的都是“东洋的共和政体”概念，但是，其内涵有所不同。前半部分的“东洋的共和政体”概念的内涵是指“东洋精神支配下的法国式议院内阁制”，后半部分的“东洋的共和政体”概念的内涵是指具有强大独裁政权的“终身大总统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北一辉所极力主张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东洋的共和政体”。他将“窝阔台汗与明治大皇帝”都看作是“自由与统一”的拥护者。这充分地说明，北一辉已将窝阔台汗看作“力”的象征。

再次，“孔教”对“革命中国”的毒害相当深刻。

北一辉崇尚“窝阔台汗”精神的同时，对“孔教”提出了批判。他强调指出：“孔教的毒害在于掩盖事物的真实情况，常常

① 久保田文次著：《“中国革命外史”的实证批判》，第 185 页。

②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 158 页。

③ 同上。

流于形式。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的谥号掩盖了蒙古共和国的大理想。”^① 其意暗指，“孔教”的最大弊端在只重虚名，不重实际。北一辉认为，若从国民精神的角度考察，“中国因文弱而带来的亡运在于孔教”，主张通过“共和政治抛弃以君臣之义为立国基础的孔教”^②。而且，“孔教与共和政体绝对难以同时存在”^③。正因为“孔教”的虚伪及文弱，所以它才成了真正的“亡国教”^④。

北一辉对“孔教”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文士制度”的批判。他对“孔教”的批判与他对“窝阔台汗”精神的崇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北一辉是“武力”的崇尚者。在他看来，“武力”对一个民族的自卫及发展至关重要，“孔教”的文弱会使得起码的民族自卫能力消失。

（三）“革命的对外政策”

在北一辉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中，不但对中国“革命党”的具体活动方案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对每一派别的建国方策都在《中国革命外史》中进行了评价。但是，如前所述，北一辉参加中国革命是“思想亡命”，他不是为了单纯地为评价中国革命而参加中国革命。实际上，他是将“革命中国”作为日本外交的一环来加以考虑的。因此，可以说，他关心“革命中国”及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制定出他认为合理的日本外交政策。北一辉以“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探索“革命的对外政策”的步骤如下：

首先，“帮助”中国以武力完成统一和摆脱西方国家的束缚，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160页。

② 同上书，第161页。

③ 同上书，第162页。

④ 同上书，第164页。

并鼓励中国向“中亚”扩张。

针对中国如何统一各省的混乱局面问题，北一辉主张采取“武力统一”。他认为，窝阔台汗的武力统一是理想的模式。这对于“革命的觉醒者”来说，是容易而且必须断然实行的。很显然，这种“武力统一”的对策会使得中华民国成为建筑在“军国主义”^①之上的国家。即是说，北一辉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进行“制度与信念的革命”，建成中世蒙古国那样的“尚武之大陆军事国”^②。

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北一辉认为，中国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权”，其先决问题是驱逐英国在华势力。当时中国在南北两面腹背受敌，即北有“俄罗斯侵略北亚的前门虎”，南有“英国经营南亚的后门狼”^③。北一辉还认为：“日英同盟是为了击退前门虎而引进的后门狼，在中国处于黑暗的时代，它是日本理应采取的唯一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④其意暗指，日本与英国缔结的“日英同盟”是为了帮助中国驱逐“前门虎”而采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然而，眼下为了保全中国革命，为了使“革命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北一辉主张放弃“日英同盟”转而对英国开战，以便从日本调整外交对策的角度来协助“革命中国”。

当时中国的存亡危机要求实现“举国一致”，“举国一致”意味着对封建官僚政治的否定。可以说，这是摆在“革命中国”面前的重任。随之而来的是“革命中国”要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手中收回“国家利权”。而这必然会遭到“北部前门虎的俄国及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168页。

② 同上书，第169页。

③ 同上书，第174页。

④ 同上。

南部后门狼英国”的反对，进而“革命中国”就会与它们发生冲突。对此早有察觉的北一辉主张由日本对英开战，同时他要求“革命中国”对俄国开战。北一辉要求中国向“中亚”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认为人口过剩的中国因缺少土地，所以应该将“中亚之沃野”当成“第二中国本部”^①。

北一辉主张将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在“革命中国”的发展及地区的协调发展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与此同时，北一辉又主张对外扩张，主张“武力统一”国家。主张以武力进行对外侵略的思想，反映了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其次，鼓励中国进行“中俄战争”，同时主张日本在“南北满洲的权利”^②。

为了鼓励中国向“中亚”扩张，北一辉将“对俄一战”视为“革命中国”求得发展的唯一对策。而且，它还是中国革命的对策。例如，北一辉强调指出：“中国对俄国一战，可以一举解决积压如山的革命问题。可以一扫封建的官僚阶级，可以解决财政问题，解决军政问题，解决郡县的统一问题，还可以确立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③ 主张“对俄开战”是北一辉根据他对“革命中国”的认识归纳出的最理想的对策。所以，北一辉认为“东洋共和制的大总统，必须是中俄战争的凯旋将军”^④。

北一辉主张“中俄战争”的同时，也积极主张日本向外扩张领土。他强调对“中俄战争”给予支持，但支持又是有条件的支持，其条件就是日本对领土的要求。例如，北一辉在文中强调：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序》，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③ 同上书，第187页。

④ 野村浩一著：《关于“中国革命外史”》，收入《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第414页。

“中国应该得到内外蒙古，日本应该得到南满洲与北满洲。内外蒙古对中国来说绝对必要。”^①

从北一辉主张进行“中俄战争”到对“南北满洲”领土要求来看，再次证明了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另外，还可以看出，北一辉也注意到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满蒙政策”，已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首要问题。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来看，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因此，北一辉的对外扩张思想是以后法西斯战争的根源，对此应该给予彻底的批判。

再次，建立“日中同盟”与“日美经济同盟”，击退“英德的元寇来袭”，完成“亚洲门罗主义的天启之使命”。

在中日两国的关系上，北一辉还主张建立“日中同盟”。实际上，在北一辉对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进行评价时，就已经表明了这种思想。例如，他在文中指出：“甲午战争是给予日本的天佑良机，避免了列强对日本的分裂。同时，它也是黄种人国家间争夺盟主地位的普奥战争。日俄战争是东洋的普鲁士（日本）为了保护亚细亚的奥地利（中国）而击退俄国侵略的战争。”^③由此可见，北一辉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涉及到的中日之间的关系类比为欧洲的“普奥”两国的关系。但不管北一辉的主观愿望及内在的真实想法如何，他对“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评价，在客观上都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美化。

他支持中俄战争的同时，主张日英战争，建立“日中同盟”。并幻想通过上述战争建立一个大的“以日中同盟为基础的两国共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 185 页。

② 俞辛焯著：《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4 页。

③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 101 页。

同使用的武器制造厂”^①。北一辉还认为，日中两国的关系等同于普奥两国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其同盟的主要性质是“军事同盟”。这一同盟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以“汉冶萍”的钢铁与煤炭为基础，组建一个大的公司。主要生产武器装备。其中三分之一归中国政府，另三分之一归日本政府，最后的三分之一归日中两国国民所有。以此建成“中日两国永远联合的、中日官民所有的一大武器制造公司”^②。（2）铺设铁路。北一辉指出：“孙中山提出的铺设 25 万里铁路的计划，应该在日本的保证下，大量地引进美国的资金来积极铺设铁路并完成计划。”^③关于引进美国资金这一点，北一辉强调“诸公不必担心我所提倡的将美国资金引入中国之事。自古以来美日之间没有什么宿怨，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就像现在这样。”^④由此，北一辉又提出建立“日美经济同盟”。

“日美经济同盟”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铁路铺设所需资金问题。另外，日本可以借此机会扩大贸易额。而且，这个同盟以美国事先交一定的保证金为前提。美国如果学习英国企图在经济上吞并中国，那么“日本与中国将没收其保证金”^⑤。从北一辉的上述主张来看，他企图以“中日同盟”为基础，以“日美经济同盟”为经济后援，彻底地击退“英德的元寇来袭”，让“日出处的太阳旗照亮全世界的黑暗”^⑥。最终实现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的愿望，并完成与西洋对抗的“亚洲门罗主义天启之使命”^⑦。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第 187 页。

② 同上书，第 191 页。

③ 同上书，第 192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 194 页。

⑥ 同上书，第 201 页。

⑦ 同上书，第 90 页。

最后，“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在于伸张“正义”与“立国安邦”。

如上所述，北一辉在文中提及的“革命中国的发展对策是制定日本的革命的对外政策”的一环。实际上，北一辉的“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又在于伸张“正义”与“立国安邦”。关于这一点，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序》中有所提及。他写此书的目的是力谏统治阶级警惕新时代的“元寇来袭”。因此，北一辉认为，可以将此书和当年日莲为了提醒统治阶级而写的《立正安国论》相比，将《中国革命外史》命名为《大正安国论》。意在论述“成就正义，立国安邦之道”^①。

从北一辉的两部著作的前后关联性（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对外侵略思想是主张中日进行武力侵略的思想基础）来看，北一辉的“革命的对外政策”是对其提出的“国体论”的完善，也是其社会秩序重建思想的有益的补充。但是，其著作的危险性就在于：“东亚盟主”的想法一直是统治阶级所追求的，北一辉的主张为统治阶级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思想依据。因此，北一辉同本书第二章所谈及的德富苏峰的“亚洲门罗主义”成为统治阶级有力的扩张依据。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批判。

四、“国家改造”方案与“超国家主义”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带来了世界性的“革命形势”。这种革命形势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因而，一战结束后，“改造、解放”等话语成为时代的流行语。并由具有“改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中国革命外史序》，第4页。

造、解放”思想的人们掀起了日本国内的改造及革命的风潮。其中大多数人不具有具体的“国家改造”方案。但是，北一辉却是一个例外。森岛通夫认为，从2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社会的思想界并没有一种对重建社会的清晰构想。“但北一辉是一个例外，他认为，对日本最合适的组织制度是以天皇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①。北一辉在其著作《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中，系统地阐述了“国家改造”的方案。北一辉是右翼思想家，他相信军队是改造国家的主要力量，他所走的道路是与青年军官相结合。这不但决定了改造后的社会类型，而且他的思想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在急进地推进其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运动中，使整个国家逐渐地滑向法西斯战争轨道。由此可见，北一辉在改造国家的实践中，因其主张对外战争，所以他自然地将军队作为改造国家的主力军。即是说，他不是依靠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绝对多数的工农大众，而是想依靠军人与天皇的力量来完成改造国家的构想。但是，天皇本身并不是一个傀儡的存在，他由明治宪法赋予了神格化权威，是权力的所有者。而且，这个权力的所有者与北一辉通过“改造国家”想要革除的那部分官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改造国家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只能是军事型国家的建立。本节将探讨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的具体构成、指导思想、手段及“超国家主义”思想怎样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等问题，以探明北一辉的思想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内在渊源关系。

（一）“国家改造”方案的构成、“国家改造”的手段及指导思想

1918年8月，当时在中国上海的北一辉着手撰写系统改造

^① 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国家的方案，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北一辉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序言中指出：“今，大日本帝国内忧外患，面临史无前例之国难。多数国民苦于生活之不安，纷纷效仿欧洲各国破败之举，而将政军财权据为己有者则竭力维持其不义。英美德俄无不背信弃义，恃日俄战争方得以保全之邻邦中国亦酬以排侮。真可谓东海粟岛之孤立。如若走错一步，则将招致祖宗建国伟业一扫而空之危机，再现幕末维新之内忧外患。”^①因而，北一辉主张：“奏请天皇发动大权，迅速完成国家改造之根基。”^②“国家改造”的手段是“武装政变”，“国家改造”的指导思想是“超国家主义”。下面，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首先，“国家改造”方案的构成。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主体部分共由8卷组成。外加“序言”与“结语”。“序言”阐述了时代背景及“国家改造”的必要性，“结语”明确了“国家改造”的目的。从8卷的具体内容来划分，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政治结构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停止宪法；进一步明确“国体”；废除华族制度；实行普选；恢复国民的自由；实施“国家改造议会”及将皇室财产收归国有。

一个国家大规模的改革能否顺利实现在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出发点、大前提”^③。因而，北一辉在文中首先主张对日本的政治结构进行“改造”。他指出：“天皇为达成与整体国民一同确定国家改造根基之目的，必须发动天皇大权，停

① 北一辉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序言》，收入《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第219页。

② 同上书，第219—220页。

③ 冈本幸治著：《北一辉——转换期的思想构造》，第206页。

宪3年，解散两院，发布全国戒严令。”^①

接下来，北一辉将天皇称为“国民之总代表”，并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国体”。北一辉认为，“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的支柱”^②。为了完善天皇的统治体制，北一辉主张废除枢密院和罢免枢密官，以顾问院取而代之。因天皇与日本的国体紧密相关，所以北一辉对日本“国体”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继承《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国体论”思想，以进化论的观点将日本的“国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天皇的地位也有三个阶段的进化。即第一期是“由藤原氏至平氏的过渡期的专制君主国时代”，天皇在理论上拥有日本全国的土地与人民。第二期是“由源氏到德川氏的贵族国时代”，天皇则成为类似于“罗马教皇”式的存在。第三期是始于明治维新的“民主国时代”，天皇是政治中心，是现代民主国的总代表并代表国家^③。由此可见，“国体”变化了，天皇的意义也随之变化了。因此，以前的“天皇的国民”、“天皇的日本”观念应该为“国民的天皇”及“国民的日本”^④观念所取代。

为了改造政治结构，北一辉还主张废除华族制度。原因就在于华族制度是国民与天皇之间的屏障，为了展示明治维新的精神，必须废止华族制度。他还主张废除“贵族院”，设置“审议院”来审议众议院的决议。众议院议员由普选出的男性国民担任，即“25岁以上的男性大日本国民权利平等，都有被选举权及选举权。女子有参政权”^⑤。这反映出北一辉思想的进步性。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第221页。

② 同上书，第222页。

③ 同上书，第222—223页。

④ 参考久野收、鹤见俊辅著：《现代日本的思想——其五个漩涡》，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126—139页

⑤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第224—225页。

而且，即使在今天的某些国家与地区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上述各项政策的基础上，应废除限制国民精神的诸法律，实行“国家改造内阁”。这个内阁的成立是以排斥“军阀吏阀财阀党阀”为前提的。与之相对应，须召开“国家改造议会”。还应将皇室的财产收归国有，每年给皇室 3000 万元的经费，必要的情况下经议会决定其经费的增额。这样一来，皇室的经费便全部由国家承担。

经济结构的“改造”。主要是限制私有财产，实行相应的土地政策，最终完成“大资本的国家统一”。

北一辉强调，日本国民每人所拥有的私有财产以 300 万元为限，超出的部分要上交国家。由在乡军人团负责调查与征集。与之相应，日本国民一家所拥有的私有土地限额以时价 3 万元为限，超出的部分上交国家，同样由在乡军人团监视并征集。同时，限制私人生产规模，以拥有资本 1000 万元为限，超出部分上交国家。其目的在于实现生产的高度集中，国家的统一经营。即完成“大资本的国家统一”^①。

北一辉“大资本的国家统一”的思想根据有以下两点：（1）“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等先哲们所重视”^②的“国有化至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③。（2）由“工业托拉斯和卡特尔组织对于资金短缺而落后于列强的日本是当务之急”^④的“私有企业至上的资本主义”^⑤。实际上，北一辉所主张的“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即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因此，为了完善国家垄断资本主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第 237 页。

② 同上。

③ 冈本幸治前揭书：《北一辉——转换期的思想构造》，第 201 页。

④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第 241 页。

⑤ 冈本幸治前揭书：《北一辉——转换期的思想构造》，第 201 页。

义经济体制，北一辉主张在生产结构上进行调整。即设立“银行部、航海部、矿业部、农业部、工业部、商业部、铁道部”^①等7个部门。可以想见，运用上述“国家改造”的手段来改造经济结构，必然会带来经济体制的强制统一。可以认为，这是战时“统制经济”的思想基础。

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造”。即保障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国民的教育权，拥护国民的人权。

其中“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具体包括：规定劳动时间为一天8小时，节假日实行带薪休息制；禁止15周岁以下的幼童劳动；妇女有与男子自由平等的劳动自由等等。

“保护国民的教育权”包括：5周岁至15周岁的男女一同接受教育，以培养身心健康充实的日本国民；学校免费提供教科书及免费提供学生午餐；废除英语，将世界语作为学生的第二外语等等。

“保护国民的人权”包括：保障国民平等自由地享受人权；保障私有财产的权利；保障创建重大功勋的人并授予勋章及相应数额的养老金等等。

上述的这些社会保障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是北一辉吸收社会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领土扩张及军事体制的“改造”。北一辉将朝鲜视为日本的郡县及日本的一个行政区。他把朝鲜当成“等同于北海道的西海道”^②。他主张将“国家改造三原则”^③逐步推行到朝鲜、中国台湾乃至“将来帝国之领土”。这些即将取得的新领土包括：“澳洲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第240—242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③ 三原则即前文提及的“限制私有财产”、“限制私有土地”、“限制私人产业”。

(今天的澳大利亚)及远东地区的西伯利亚等地”^①。为了能够顺利地完领土扩张，北一辉主张继续维持“征兵制”以完善日本的军事体制。他强调指出：“国家为了获取在国际间的生存权及发展权，应该永久地维持现时的征兵制。”^②他还主张国家有“积极对外开战的权力”。他认为：“国家除了具有保卫自己民族的权利之外，还有为了受不义之强大势力压迫的国家及民族而对外开战之权利。”^③即他所强调的，可以为“印度的独立及保全中国”而对外开战。这是与前文的国家的生存权相对应的。同时，北一辉还强调：“国家有权向不法占有大片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的国家开战。”^④即他所强调的“为了获取澳洲及远东西伯利亚而向其领有者开战”^⑤。由此可见，北一辉已经将印度与中国作为日本的绝对势力范围了，而且还企图将远东西伯利亚与南太平洋的澳洲纳入日本帝国的版图，以求完成“地球上唯一的大日本帝国”^⑥。这种对外领土的要求，与北一辉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密切相关。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结尾处，北一辉强调：“没有战争的和平不是通往天国之路。”^⑦实际上，他的对外思想是山县有朋“大陆政策”思想的继续，也是后来日本军部法西斯对外扩张的思想依据。

其次，“国家改造”的手段。

至于上述的“国家改造”计划，北一辉主张要通过“武装政变”来完成。北一辉对“武装政变”有独特的解释。他认为：

① 北一辉前揭论文：《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第266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266页。

⑦ 同上书，第281页。

“武装政变是直接发动国家权力即社会意志。……日本的改造必须由整体国民与元首的合作来完成。”^①

上述北一辉提出的“国家改造方案”有虚假的进步与合理成分（只是拉拢民众的策略），亦有非合理成分。例如，上文提到的废除华族制度、提倡普选、力主国民的自由、保护劳动者的权利、限制私有财产等等无疑都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北一辉在改造国家时采取的手段是非合理的。即是说，他在寻求改造国家的手段上出现了大的错误。他并不主张将占有国民大多数的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而是将目光转向青年军官与天皇，企图通过他们的合力来完成改造国家的使命。这种手段给日本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建立民族沙文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国家。森岛通夫也认为，一个以平民为主力而发动革命的国家，在革命后可能会产生基于资产阶级民主与国际主义原则的政府，一个由军队扮演主角而进行革命的国家，在革命后就可能建立起“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国家”^②。以这种手段改造国家，使其方案及构想黯然失色。因为这种手段会直接将一个民族引向歧途。

再次，“国家改造”方案的指导思想。

概括地说，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的指导思想是“超国家主义”。所谓的“超国家主义”，即“极端国家主义”，具有“帝国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提倡“露骨的对外侵略”，对内进行压制的思想主张。日本20年代的“国家主义”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带有“超”或“极端”^③的性格。其特征是：攻击与排斥外来的思想与体制；热衷于恐怖活动，以改造国家；鼓

① 北一辉前掲论文：《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第221—222页。

② 森岛通夫前掲书：《日本为什么成功》，第215页。

③ 丸山真男著：《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增补版，未来社1996年版，第12—13页。

吹民族至上主义、世界政府主义等。例如，北一辉的思想虽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社会民主的成分”^①，但是他又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中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竞争规则导入进来，逐渐地构筑起他的“超国家主义”思想。同时，北一辉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基本方面又加以排斥，这也是他自我标榜是社会主义者但又没有真正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根源。北一辉在前文所述的《自杀与暗杀》一文中，清楚地表明如果在两种革命的手段中进行选择时，他选择“暗杀”而不选择自杀。后来，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北一辉进而主张采取“武装政变”来完成“国家改造”。这种恐怖手段是“超国家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另外，北一辉信奉“天皇机关说”^②（原本在阐述“国体观”时，有一定的现代意义和进步意义。但是，在力主国家改造时，他将“天皇”视为一个具有最高及最大权力的国家机关。在国家必要的时候，天皇可以发挥最大限度的权力。^③这时，北一辉的“天皇机关说”虽然仍主张天皇是一国家机关，但已逐渐丧失了进步性），强调主权在于国家，并不断将“国家”的概念扩大。以至于强调建立“世界联盟”、“世界政府”，并主张将日本发展为“世界联盟”的盟主与“世界政府”的核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北一辉在“正义”的名义下提倡“积极地对外开战”。不难看出，北一辉以扩张色彩极为浓重的“超国家主义”为“国家改造”的指导原理，将国家引入法西斯战争轨道是必然的。

① 参考赵哲著：《北一辉思想及其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影响初探》，载于《日本研究》1985年第3期，第48页。

② 参考高桥正卫解说：《现代史资料23·国家主义运动3》，三铃书房1996年版，第56页。

③ 官本盛太郎前揭书：《天皇机关说的周边——三个天皇机关说和昭和史的证词》，第5页。

（二）“超国家主义”与“群体心理”

上述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出台有其深刻的国际大背景。一战的爆发，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天佑良机”，加速了垄断组织的出现。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结果。但是，一战又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状况。因为有的国家经济因此而萧条，有的国家经济却因此而得到迅速发展。日本当然属于后者。这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经济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迈进。北一辉在“国家改造”方案中提出的“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同时，国际上的人民解放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推动日本国内的普选运动及民本主义运动的发展，并迎来了日本国内的“改造、解放”的时代风潮。许许多多标榜“改造国家”的“革新”团体纷纷成立。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北一辉等人的“犹存会”是其中的团体之一。在诸团体的改革纲领中，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最具影响力。他的“超国家主义”思想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下面，探讨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怎样迎合了民众心理，以及为什么“青年将校”会将“超国家主义”视为“群体精神统一律”、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视为“圣经”等问题。

首先，“超国家主义”与“群体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①于19世纪末撰写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

^① 古斯塔夫·勒庞，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自1894年起，写了一系列心理学著作。如1894年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包括汉语版被译成17种语言），1894年的《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8年的《社会主义心理学》，1912年的《法国大革命和社会心理学》以及1916年的《战争心理学》等。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泰斗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评价勒庞说：“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

书。书中所阐述的“群体心理学”原理，适用于分析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与“群体心理”之间的关系。在该书“导言”中，作者首先提出了“群体的时代”这一概念。他认为，19世纪末是文明变革前的动荡期。在这一动荡期，“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并促使人类传统思维结构发生转型。“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是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植根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①。实际上，一战的爆发，使得人类不得不再次发生思维结构的转型。日本大正时期复杂的社会思想状况恰好是这种思维结构处于转型期的明证。

关于“群体”的概念，勒庞做了心理学上的解释。他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②从心理学角度观察，日本大正时期出现的诸多“革新团体”^③，实际上就是勒庞所强调指出的

^①（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导言”第5—6页。

^②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第一卷·群体心理》，第15—16页。

^③这些团体包括：新人会、黎明会、民人同盟和建设者同盟、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改造同盟、老壮会·犹存会、立宪青年党和北风会等等。参见伊藤隆著：《大正期革新派的成立》，土高书房1978年版。

“心理群体”。它们各自的行动纲领即是其“群体精神统一律”。这些团体中，直接关系到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体制建设的，是北一辉等人的“犹存会”及作为其“群体精神统一律”的“超国家主义”。

前文提及的“超国家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以恐怖活动来改造国家，北一辉所赞同并极力主张的改造国家的手段是“暗杀”或“武装政变”。当然，北一辉所强调的“暗杀”或“武装政变”都是集体性的活动。关于“群体”在行动上的特点，勒庞认为是“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①。勒庞在研究群体心理时发现，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集体中失去了效力。他强调指出：“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② 虽然这段文字的表述有些绝对，但其意在指出，在这样的群体中，个人的利益与目标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认为，大正末期至昭和年间的“青年将校”^③的“国家改造”运动及其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即是青年将校“群体”在“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而采取的冲动且急躁的行为方式。

北一辉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指出，“武装政变”的主要承担者就是这部分“青年将校”。因此，他的理论思想牢牢

① 勒庞前揭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第一卷·群体心理》，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青年将校”大多是在军队中与下层官兵同甘共苦的中队长（相当于连长）以下的军官，是各地驻军中年轻的大尉、中尉和少尉。但是决不包括那些任职军部中央而声名显赫的人。参见孙仁宗著：《日本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载于《世界历史》1986年9期，第42页。

地抓住了这部分人的心理，以至于这部分人自 1922 年起，以西田税为中心经常私下讨论“国家改造”的问题。他们特别热衷于传阅、讲读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有时登门求教北一辉（西田税就是一例）。在“国家改造”运动中，他们将北一辉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视为“国家改造”的“圣经”。正像勒庞所断言的，凡是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类似于宗教运动。他说：“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变为一种崇拜。”^①日本的“青年将校”对北一辉及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的深信不疑，就近乎一种宗教情感中的“偏执狂”。

其次，“青年将校”的生活实态与“超国家主义”。

从“青年将校”的具体活动中，可以找出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思想与“青年将校集团”的“群体心理”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什么会如此？这需要从“青年将校”的生活实态着手加以分析。

第一，“青年将校”中多数人的出身、地位有相近或相同之处^②，他们大多出身中间阶层（具体包括中小工商业者、自耕农、工薪生活者、自由职业者、学生及下级官吏）^③的下级军官。这有利于他们形成共同的政治心理与文化倾向。

第二，他们抱有军人特有的优越感，但他们的经济地位不稳

① 勒庞前揭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第一卷·群体心理》，第 57 页。

② 参考孙仁宗著：《日本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第 43 页。

③ 李玉著：《30 年代日本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收入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0 页。

定，经常发生分化。一战后的经济危机，使他们面临着同样的生活难、就业难等实际问题。这是他们寻求改变自己人生境遇的时代背景。

第三，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矛盾暴露无遗，国内的“革新”、“改造”、“解放”等时代潮流风起云涌。这为“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提供了契机。

第四，北一辉在寻找“国家改造”的手段时，找到了“青年将校”。这使得“青年将校”与北一辉一拍即合，由“青年将校”提供行动的力量，由北一辉提供“超国家主义”思想及具体的改造方案对其进行指导。以至于后来，“青年将校”们将北一辉的著作视为“圣经”。

可见，北一辉与“青年将校”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精神领袖”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群体与领袖的关系上，勒庞认为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①。在“国家改造”运动期间，北一辉在“日本青年将校”的精神层面就是一个“头羊”。

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已成为“青年将校”的“群体心理”的“群体精神统一律”，他成了“精神领袖”。因此，从“群体心理”的角度观察，就不难理解 20—30 年代的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的发生了。虽然北一辉在“二二六”事件以后，被掌权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所杀害，但实际上那是以北一辉为“精神领袖”的青年将校一派在与军部中枢势力较量失势而带来的直接后果。不过，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思想成为此后日本法西斯主义之源头，也是不争的事实。北一辉虽然被军部法西斯势力于 1937

^① 冯克利为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作的中译者序“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第 18 页。

年8月19日枪杀而结束了其急进的一生，但他的思想却被军部法西斯所继承下来。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小 结

勒庞在“群体心理学”中提出了心理学中的“群体”概念，并论证了“群体心理”的特点及“群体”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北一辉在“国家改造”运动中之所以能够抓住部分民众的心理，并被“青年将校”们视为“精神领袖”，主要是由于北一辉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比较敏感，并适时地变换自己的学说来蛊惑民心。例如，“国家改造”方案中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保障等方面合理的成分具有相当的蛊惑力。他提出的这些政策是拉拢民众的最好的“工具”。这与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上台前所做的大力宣传，企图拉拢人心的政策惊人地相似。他的“国家改造”方案是大正时期最为系统的“国家改造”计划，他的“超国家主义”思想是大正时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部分民众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主张。

北一辉属于急进型知识分子，其“超国家主义”思想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之源，因而本书将北一辉所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称为“急进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此类知识分子在日本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作用如下：

第一，此类知识分子推动日本社会向法西斯体制迈进。他们在“国家改造”的口号下展开活动，在“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谋求重建社会秩序，最终将日本引向法西斯战争轨道。

第二，虽然此类知识分子的“超国家主义”思想带有浓重的民族沙文主义及扩张主义色彩，但是在转移民众的视线，统合国民精神方面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前文所述的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在整合意识形态领域起到的作用大体相同。

第三，“超国家主义”思想最终将日本又拉回战争的轨道。因为，北一辉本身就强调“没有战争的和平不是通往天国之路”。

由此可见，这类知识分子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消极的、负面的。

这类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此类知识分子具有急进的特点。所谓“急进”，即是对时代的形势进行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并意欲使其想法于短期内迅速实现。

第二，此类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具有盲动的特点。他们在心态上更多地表现为躁动化倾向。正是这种心态倾向为法西斯主义的“滋生”准备了温床。

关于北一辉的思想来源、北一辉的“国体认识”、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及其“超国家主义”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就北一辉的思想来源而言，是多种思想的混合物。例如，1904年，北一辉在早稻田大学作旁听生，跟从有贺长雄、安部矶雄、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及浮田和民等人学习，但是，北一辉又不盲从他的老师们。他受到老师们的讲座启发的同时，对老师们的学说又提出质疑，最终提出了自己的“国体认识”及“纯正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纯正社会主义”思想是他的“根本指导思想”。其特色在于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指导原理，国家国体只不过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①。北一辉的“纯正社会主义”是“进化论”与“社会主义”嫁接的产物。

其次，就北一辉的“国体认识”而言，他已经赋予“国体”以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解释，已经将“国体”与“政体”区分开来，并将“天皇”作为国家的一个最高“机关”来处理。这无疑

^① 参考《现代史资料 23·国家主义运动 3》，三铃书房 1996 年版，第 56 页。

表明其本身的思想已经有所进步。

再次，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是大正时期最为清晰的“国家改造”构想。小林英夫将北一辉视为“构建新体制派”^①的代表人物。

最后，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的指导原理是“超国家主义”。这一思想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之源。丸山真男将北一辉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并将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②等同起来。丸山真男将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分为三个大阶段^③：准备期（一战结束至“九一八”事变）、成熟期（“九一八”事变至“二二六”事件）及完成期（“二二六”事件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北一辉的活动时期正好相当于准备期与成熟期，即由“民间右翼运动”向“军部法西斯运动”的过渡期。

综上所述，北一辉所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是将国家推向战争轨道的推动力之一。在当今国际关系又趋紧张的形势下，批判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对警惕当前日本的“右翼势力”的膨胀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① 小林英夫著：《昭和法西斯群像》，校仓书房1991年版，第33页。

② 丸山真男著：《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增补版，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32页。

第五章

“无政府主义思潮”与大杉荣

如所周知，在反体制的社会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运动也是其重要倾向之一。在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中，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它分裂了社会主义运动。但在反体制的知识分子中，大杉荣连同“大杉派”^①的其他知识分子是最具“叛逆性”^②的。大杉荣的叛逆，是对包括天皇制在内的整个时期与社会的叛逆。大杉荣的一生非常曲折，他多次入狱，并在监狱中锻炼了自我人格。他又有着与众不同的恋爱经历，与三个女人发生“四角关系”。他对监狱生活的安之若素以及他的恋爱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放荡不羁，都源于他对“生”的感悟与探求，以及对“生”与“恋爱”的独特诠释。1902年，大杉荣目睹了因足尾铜矿矿毒事件而发生的学生示威运动，由此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此后，他一直在理论与实践，体现着自己的“社会良心”。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及“无政府运动”的具体

① 由于大杉荣在大正时期的言论活动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并且，他是这类知识分子的领导人，因此，笔者将这类知识分子称为“大杉派”。

② “叛逆”即背叛、违逆。本书所说的“叛逆性”一般表现为对社会的不满，对社会抱有悲观态度，无道德观，主张“个人主义”及无政府主义。

实践，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恐惧，因而 1923 年被杀害，悲惨地结束了其叛逆的一生。大杉荣及他的社会运动实践，客观上推动或促进了社会整合。正如在前面所谈到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及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手段。大杉荣及他所领导的运动是站在与社会的一切制度体系相对立的一面上展开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被政府当局视为“异端”运动，因而，政府凭其势力对其镇压，甚至暗杀运动的重要的组织者，以确保社会一时的稳定，从而起到维护社会整合的作用。但这种方式的社会整合，是以政府强制取缔运动及使运动逐渐消亡为前提的，仅就大杉荣及“大杉派”其他知识分子的彻底革命精神而言，他们的运动被政府强制取缔，增强了他们自身的悲哀性。本章将探讨大杉荣叛逆性格的成因，大杉荣的叛逆思想——个人主义、工团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形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与其具体的实践过程，试图从中探明“大杉派”知识分子的作用及特征。

一、大杉荣的叛逆人生历程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人的哲学理论的形成更是如此，它不但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而且它的最终形成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即是说，还要看时代赋予他什么样的使命感。就大杉荣的主要思想而言，可以将其概括为“无政府主义”。其哲学理论的形成，是与大杉荣的勤奋好学分不开的。同时，也由于大杉荣易于接受国际新思潮、新思维的现代意识。但从其原初思想的萌芽来看，可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家庭环境给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大杉荣的哲学理论以“叛逆”为主要特色。其“叛逆”的思想源于他对自由的渴望及“想要生存下去”的人类的根本生存欲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

杉荣的哲学既是“叛逆哲学”，又可以说是“生的哲学”。他的整个愿望虽然是良好的，对未来的憧憬充满了玫瑰色彩，但在使其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运动中，又表现出美好愿望与现实相脱离的空想性。也就是说，以弱勢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反抗强势的天皇制政府，注定了其失败的悲哀命运。根据其“叛逆哲学”的形成及不断完善的具体过程，可以将大杉荣的叛逆人生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叛逆性格的形成

1885年至1911年是大杉荣的少年时代。少年时代的大杉荣就养成了叛逆的性情，他以憎恶的情感反抗学校与军队的权威，以“爱”的这种逆反心理（大杉荣明知母亲并不爱他，但他却深爱着母亲，并以这种爱的外在行动表现来反抗她）反抗来自父母的权威。当时，大杉荣还关注社会问题并参与社会运动，以至于多次入狱。他参与了1908年的“赤旗事件”，被捕入狱。1910年发生了充满血腥味的“大逆事件”，使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所谓的“严冬时代”。

大杉荣，1885年1月17日生于香川县丸龟市。1891年4月，在新发田的一所小学校就学。在学期间，大杉荣的学业超群，但品行恶劣。1899年4月，大杉荣入名古屋陆军地方学校，1901年4月因“男色事件”^①受到学校处分。1901年11月，因与同学打斗，被学校开除。1902年6月大杉荣的母亲去世，在失去母亲的悲伤、都市特有的孤独感及渴求先进思想的心理驱使下，大杉荣于10月在本乡教堂接受海老名弹正的洗礼入信基督教^②。

① 即同性恋事件。大杉荣因此而受到禁止外出30天的处分。

② 参考大泽正道著：《大杉荣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8页。

同年，他亲眼目睹了因足尾矿毒事件而引发的学生示威运动，引起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兴趣。1903年9月，大杉荣入东京外国语学校（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学习。这是大杉荣自主决定自己生活与行动的开始。他在回忆来东京时的情景时说：“我来到东京之后，很快忘掉一切，昼夜拼命地学习。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自由的生活。”^① 11月，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幸德秋水创刊《平民新闻》。12月，大杉荣受其文章影响，主动接近平民社，此后，与他们一直保持往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因海老名弹正对战争抱支持态度，大杉荣对此不满，遂放弃宗教。1905年7月，大杉荣从外语学校法语系毕业。1906年2月，大杉荣参加日本社会党^②。3月，参加反对电车车费涨价运动，被以聚集暴徒的罪名逮捕。4月，大杉荣的父亲探监时，严厉地斥责了大杉荣。但是，这一事件却使大杉荣产生了变革传统家庭的主张。他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基础是家庭，为了社会的变革，必须以变革家庭为突破口^③。保释后，与堀保子结婚。11月，翻译并发表克鲁泡特金的《告新兵诸君》，始向无政府主义靠近。1907年3月，因翻译发表克鲁泡特金的《敬告青年》一文被起诉，5月入东京巢鸭监狱，11月出狱。1908年1月，因“星期五屋顶演说事件”与堺利彦、山川均被捕入狱，3

① 大杉荣著：《自叙传——新生活（二）》，转引自秋山清著《大杉荣评传》，东京，思想科学社1976年版，第10页。

② 日本社会党，1906年2月由堺利彦组织成立。1906年1月7日成立的西园寺公望内阁，对社会主义政党采取承认并诱导的宽容政策。因此，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得以成立。例如，西川光二郎成立了“日本平民党”。后来，1906年2月末，日本社会党与日本平民党合并。

③ 参考镰田慧著：《大杉荣自由への疾走》，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10月版，第82页。

月出狱。1908年6月，发生了“赤旗事件”^①，大杉荣以主谋罪被捕入狱，被判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9月，转入千叶监狱。1910年发生了“大逆事件”^②，大杉荣当时正在狱中，因而免受牵连。后由千叶监狱转入东京监狱，接受审讯，11月出狱。12月，参加堺利彦的卖文社。1911年，幸德秋水等人被判处死刑。至此，明治末期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大杉荣其时借诗叙情：“阳春三月服绞刑，残花飘落”，表达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处境的失意与感伤。

（二）创办《近代思想》

可以认为，1912年创刊《近代思想》至1916年11月叶山日荫茶馆事件，是大杉荣活动的第二阶段。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出困境，大杉荣与荒畑寒村于1912年10月创办了《近代思想》。在此期间，大杉荣发表自己的观点，构筑他的叛逆哲学理论，并发表论文集《生的斗争》与《社会的个人主义》。

《近代思想》属于文艺、思想杂志，大杉荣以此打破了社会主义运动近于窒息的局面。他以频繁的言论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并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1913年，他与荒畑寒村创办“工团主义研究会”。7月，准备参与工人运动。10月，由于过度劳累肺结核病发入院。1914年9月，大杉荣认为应该参与实际运动，把《近代思想》自嘲为“知识的自渎”而自动停刊。转而创办被称为“大杉版”的《平民新闻》月刊，除第4号之外，其他

① 1908年6月22日，为了欢迎社会主义者山口义三出狱，堺利彦、山川均和大杉荣等人打着红旗上街示威游行，故被称为“赤旗事件”。

② 1910年5月，政府得知社会主义者要暗杀天皇，逮捕了幸德秋水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并且，政府凭秘密审讯捏造出所谓的“大逆事件”。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另12人被判无期徒刑。

均遭禁卖。大杉荣对这一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1914年与伊藤野枝相识是大杉荣的“恋爱体验的发端”。1914年8月出版论集《生的斗争》，并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1915年2月，“工团主义研究会”蜕变为“平民演讲会”。3月，自动停刊《平民新闻》。6月开办“法兰西文学研究会”，教授法语。神近市子参加了学习。10月，再次刊发《近代思想》月刊。12月，大杉荣与神近市子结合。1915年12月，出版论集《社会的个人主义》。由于《近代思想》不断遭禁，加之恋爱问题的影响，《近代思想》社处于混乱状态。1916年1月，停刊《近代思想》。2月，大杉荣与伊藤野枝结合，从此，陷入了“四角恋爱”的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大杉荣叛逆伦理道德的表现。1916年3月，大杉荣为了调节他与三个女人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三条件”，即“经济上互相独立；彼此分住；尊重彼此的自由（包括性自由）”^①。1916年11月，在叶山日荫茶馆，神近市子用短刀刺伤了大杉荣的左颈部。后来，神近市子自首，大杉荣住进千叶医院，10天后出院回到东京。这就是所谓的“日荫茶馆事件”。实际上，大杉荣的“恋爱体验”也是处于其叛逆哲学理论的延长线上。这一时期，大杉荣的叛逆哲学可以概括为“本能+个人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1915年10月发表译文《男女关系的进化》，1916年1月出版论集《工人运动的哲学》。

（三）“无政府主义”实践

1917年向龟户工人区转移至1923年9月被杀，是大杉荣的叛逆哲学理论的完善期及付诸行动的实践期，也是大杉荣成熟的

^① 大泽正道编辑解说：《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20·大杉荣集》，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423页。

理性思索期。在具体的实践运动中，他与工人结合，参加工人运动，并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社会主义者大会及世界无政府主义大会。

为了使自已从所谓的“谷底时代”及孤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大杉荣与伊藤野枝向工人区转移。向劳动者接近，也是大杉荣“恋爱体验”之后的“转生”的起点。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大杉荣给以全面支持。1917年翻译了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论》及克鲁泡特金的《相互扶助论》。1918年1月，大杉荣与伊藤野枝共同创办了《文明批评》，这是他们“转生”的第一步。同时，他们出席在上野樱木町开设的“劳动问题讲谈会”，开始与工人接触。5月，创办《劳动新闻》，参与工人运动，并在大阪参加“米骚动”。1919年3月，组织革命的工人运动家团体——“北风会”^①。此后，“北风会”成为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工团主义运动的据点。5月，发生了殴打警察事件，大杉荣于7月被起诉。10月，大杉荣与伊藤野枝、和田久太郎及近藤宪二创办第一次《工人运动》月刊，并提倡“白纸主义”^②，真正致力于工人运动。12月由于前此的殴打警察事件，被捕入丰多摩监狱。其间，撰写了《狱中记》。1920年3月出狱。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1919年日本国内的“解放”与“改

^① 北风会，1919年3月组建。这是渡边政太郎的“研究会”与大杉荣等人的“劳动问题讲谈会”（即“无政府主义研究会”与“平民演讲会”的后身）合并而成的。其名称是取渡边政太郎的号“北风”而定名为“北风会”。9月，又改称为“东京工人运动同盟会”。“北风会”的成立，标志着“对内相互依存，对外进行反抗”的“大杉派”的形成。虽然其存在的时间很短，却迎来了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史上的全盛期。

^② 大杉荣提出的主要思想之一，也是第一次《工人运动》的主要基调之一。其主要思想为：人生就是一本没有书写的空白的书。它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实践活动去认真填写。这就是所谓的“白纸主义”。

造”的时代风潮)，大杉荣重返舆论界，介绍克鲁泡特金。6月，《工人运动》第6号成为废刊。8月，大杉荣成为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发起人。10月，为了出席远东社会主义者大会，大杉荣冒险偷渡上海，主张日本社会主义独立。1921年1月，大杉荣同近藤宪二、高津正道等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合作创办第二次《工人运动》周刊。4月，由于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思想分歧，大杉荣深受伤害。6月，《工人运动》13号成为废刊。此后，大杉荣潜心研究巴枯宁。12月，他与伊藤野枝、和田久太郎及近藤宪二第三次恢复《工人运动》月刊，开始批判布尔什维主义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揭开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论争的序幕。1922年2月，赴北九州在八幡钢铁厂大罢工2周年纪念大会上做了演讲。9月，赴大阪支援“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成立大会。12月，大杉荣为了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日本奔赴法国。1923年2月，到达法国。5月，参加巴黎郊外的“五一”节集会，并发表演讲，被捕入狱，7月回国。9月，在关东大地震的混乱状态下被杀害，悲惨地结束了其叛逆的一生。

二、大杉荣的叛逆性格及其叛逆行动

大杉荣是大正时期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行动以叛逆为主要特色。他的叛逆性格，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逐渐形成了。即是说，大杉荣的性情是具有叛逆性的。本节将以青少年期大杉荣生存的社会环境及家庭环境为主，考察大杉荣叛逆性格的成因及叛逆行动的外在表现。

（一）大杉荣叛逆性格的成因

大杉荣叛逆性格的形成，可以说与大杉荣的童年心理所受

到的影响密不可分。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在构建他的“个体心理学”时,提出了所谓的“自卑情结”与“优越情结”的概念。他认为:“自卑感是人类奋斗和成功的基础。”^①但同时,他又认为:“自卑感又是一切心理顺应不良的原因。沉重的自卑感能摧毁一个人,使他终生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就成为阻碍个人积极成长的障碍和破坏力量。”^②这就是阿德勒所提出的“自卑情结”,即“当一个人找不到一个适当而具体的优越目标时,自卑情结就出现了”。对这种“自卑情结”进行回避的欲望就是他所强调的“优越情结”。在自卑感的刺激下,人们都试图追求优越。阿德勒将每个人试图获得优越的手段称为“生活风格”。他的所谓的“个体心理学”就是以分析生活风格的原因为己任的。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在4—5岁时就完全定型了。并且,他以一定的环境为条件来看待生活风格。其中他尤为重视家庭环境,他认为家庭对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影响很大。例如,一个备受冷落的儿童的生活风格总是想寻求对社会的报复,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社会的叛逆。大杉荣的叛逆性格的形成过程就是阿德勒“自卑情结”及“生活风格”理论的验证过程。

首先,孤独、恐惧与极度的不安占据了大杉荣的幼小心灵。

如所周知,良好的家庭环境会使孩子的心理健康地发展。反之,则会带来孩子身心非健康发展或畸形发展。表现在行动上,常常是利己的及攻击性的异常行动。

家本应是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极大放松或感到温暖的场所,但大杉荣记忆中的家也许并未给他带来这样的感觉。这一点,可从

① 阿德勒著:《生活的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

② 引自武斌著:《现代西方人格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大杉荣的《自叙传》中了解到。“我每天在学校中都受到老师的批评和惩罚，在家中又要受到母亲的责骂与体罚。好像母亲每天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打骂我。”^① 幼儿园及小学时期的委屈经历及他在家庭中挨打受骂的地位，使之意识到家庭及社会权威是可恨的。即是说，来自家庭与社会的权威，极大地伤害了大杉荣的幼小心灵。大杉荣采取的反抗手段是制造“恶作剧”，并企图以此获取“生命之自由”。家本应是集体的象征，却反而让大杉荣感到孤独。家本应是温暖的场所，却反而让大杉荣感到冷漠。例如，在幼年大杉荣的记忆（当时大杉荣只有5岁）中，曾记载由于父亲由东京调转至新发田，举家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大杉荣在无助的情况下深感恐惧的回忆。“在我们乘坐的马车上，父母各抱着一个妹妹。我一个人拼命地想抱住什么。有时马车摇晃得像要翻倒。向下一看，在不知有几十丈深的谷底，浓雾弥漫。我几次要吓破胆。”^② 以上是杉荣在4—5岁时所经历的事情，也是他幼年时代的最初记忆。关于人的“回忆”，大泽正道在其著作《大杉荣研究》中强调指出：“人类，无论是谁都有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且还有回忆。既有值得怀念的、美好的回忆，也有痛苦的、想要忘却的回忆。那是人过去所走过的路程的反映，也是他目前所处状态的反映。经历过幸福的幼年及少年时代、现在身处逆境中的人，往往在回忆时，容易将过去的幸福超出实际程度而加以美化与扩大。反之，有痛苦的幼年及少年时代而现在身处顺境中的人，往往将过去的不幸超出实际程度加以追想。所谓回忆就是这类的东西。”^③ 其意暗指，在大杉荣的童年回忆中，

① 《大杉荣全集3·自叙传·狱中记》，世界文库版1975年2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大泽正道著：《大杉荣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7页。

也有夸大回忆的成分。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无论是对经历过的往事夸大回忆到何种程度，都说明那件事情给他的心理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并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否则，他的记忆中就不会有此事而是彼事了。大杉荣在本来重视“家庭一体感”的社会中，并没有得到父母的呵护与拥抱，而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精神上的恐惧与极度的不安，并感到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随之而来，出于生存的本能要求，大杉荣又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超越精神上的恐惧与不安，欲求自立。大杉荣在马车上想拼命地抓住什么，就是欲求自立的心理反应。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恐惧与不安构成了大杉荣的幼年期的精神生活。为了超越恐惧与不安，在大杉荣的性情中逐渐滋生了叛逆性因素。也就是说，幼年期大杉荣在精神上的孤独、恐惧与不安是其叛逆性格形成的精神要因。

其次，大杉荣的自身缺陷（口吃）带来少年期的理想破灭，并进一步推动了大杉荣叛逆性格的形成。

人在少年时期憧憬未来时，都会确定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其理想目标的确定过程往往又不是单纯的过程。可以将人类确立理想目标视为人类解决自我的发展问题。自我发展涉及追求的具体目标及追求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等问题。人类解决自我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往往直接关系到对其解决的程度。个人的自身是否具有缺陷也直接与自我发展相关。有时，它甚至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少年时期的大杉荣就是一个具体实例。可以说，他的生理缺陷（口吃）是带来其理想破灭的决定性因素。大杉荣在确立自己的目标时，是按一般人们认为的所谓的社会规律行事，祈求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陆军大元帅”。然而，当大杉荣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时，他便放弃了原来设定的理想目标，跑到其对立面并对其进行反抗。从此，大杉荣的性格向叛逆整个社会体制及规律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说大杉荣的口吃带来了其少年理想的破灭？如所周知，军队进行军事训练时，要经常喊口号。然而，对于患有严重口吃的人来说，喊出简洁而响亮的口号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当别人能做到而自己恰恰难以做到时，大杉荣意识到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随之，在大杉荣的内心深处滋生了羞耻感与自卑感。对于内心的羞耻感与自卑感，大杉荣并非被动地接受它，而是欲积极地超越它。然而，他越是急于超越自己的羞耻与自卑心理，口吃反而越加严重。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使得口吃给大杉荣带来的痛苦是没有口吃经验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在大杉荣确立自己的理想时，他在心理上对父亲“威严”的崇拜直接影响其目标的确定。大杉荣的父亲大杉东是陆军少尉。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父亲大杉东出征立功获金鸡勋章，并被称为作战勇猛的“精神家”。这对当时只有9岁的大杉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895年4月，大杉荣入新发田高级小学。这时的大杉荣还是一个朴素的“国家主义者”^①，具体表现在他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反应上。他在与同学们举办的“读书会”上，就辽东半岛问题做了题为“卧薪尝胆论”的演讲。同学们都流下了眼泪，并发誓要“卧薪尝胆”，有朝一日“夺回”辽东半岛。另外，大杉荣的亲戚中有陆军中尉，也有陆军大尉。这也增强了其成为军人的意欲。况且，在新发田的农村，将校是最高阶级，成为一名将校也是青少年的理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大杉荣在确立理想时，很自然地想成为“将军大元帅”^②。

至于大杉荣在追求目标时采取何种手段，父亲大杉东的意见

① 松下芳男著：《裸の大杉荣》，载于《历史与人物》1959年9月号，第175页。

②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88页。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杉荣在《自叙传》中，强调指出：“父亲好像没有什么学历。”^① 大杉东首先进入的是培养下级军官的教导团，待成为一名下级军官后，通过学习才进入了军官学校。即是说，大杉东并没有受过正规陆军将校的训练，他希望儿子能够受到自己所不曾接受过的正规军校教育。因而，在大杉荣追求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上，大杉东自然让其选择投考幼年陆军军官学校。结果，大杉荣经历两次考试，终于以第三期学生的身份被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录取。后来，大杉荣自身的生理缺陷与军校的严格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直接增强了大杉荣的自卑心理。当时，作为家长的大杉东对孩子的自卑心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及时对其自卑心理正确疏导，而是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从而使大杉荣在人生的道路上跌了重重的一跤。这正如阿德勒所强调的，家庭是人的性格发展上的一个因素。身心不健全的儿童是一种失败，但通过补偿和明白事理的父母帮助能够把他的自卑变为刚强^②。与之相反，大杉荣的性格没有得到父母的正确引导，他是通过叛逆及其攻击性的行动来超越其自卑心理的。

另外，在幼年陆军军官学校就读期间，大杉荣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这种伤害使大杉荣由崇拜“军威”转而反抗“军威”。其主要原因亦在于大杉荣的口吃。可以说，大杉荣的口吃不仅使他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并使其产生自卑心理，而且，他的口吃还受到他人的嘲笑与侮辱。这样，大杉荣的口吃成为伤害其自尊的心理根源，客观上亦推动其叛逆“军威”。例如，大杉荣在《自叙传》中曾记载了敌视大杉荣的陆军上尉（具体姓名不详）利用大杉荣的口吃当众取笑他，甚而对其进行侮辱的情景。其中，有一段陆军上尉与大杉荣的一问一答的对话，直接反映了大

①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11页。

② 武斌前揭书：《现代西方人格理论》，第294页。

杉荣受侮辱的具体情况。陆军上尉明明知道当天的月亮是下弦月，他亦十分清楚“下弦”一词中的“か”与“げ”音对于患有严重口吃的人是禁忌。他却当众要大杉荣回答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目的即在于取笑、耍弄大杉荣。对于陆军上尉的此种用意亦有察觉的大杉荣，则巧妙地对其提问进行了回答并回避了“下弦月”的日语发音。大杉荣回答道：“不是上弦月”。大尉接着问道：“那么，是什么？”大杉荣仍旧回答“不是上弦月”。最终，大杉荣的回答惹怒了陆军上尉，陆军上尉则以“明天禁止大杉荣外出”来惩罚大杉荣^①。执拗的大杉荣虽没有使陆军大尉的阴谋得逞，但自己却受到了惩罚与伤害。这一事件严重地伤害了大杉荣的自尊，并使其走上反抗军队之不合理的统治与服从的道路。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大杉荣的口吃是带来其青少年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由此，大杉荣从一个朴素的国家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反国家主义、反军威、反秩序的青少年。另外，在大杉荣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军人典型。因而他的反军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反抗父亲权威的一个表现。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他对父亲安排自己命运的反叛。

由此观之，在追求人生目标上，有大杉荣自青少年时期的理想与父亲对他的期待。在采取的手段上，大杉荣则企图通过进幼年军官学校及名古屋陆军军官学校来达到目标。但是，大杉荣本身的缺陷（口吃）不但直接带来其理想的破灭并影响了其对自我问题的解决，还造就了其叛逆心理及叛逆性格。

再次，被迫退学后的大杉荣赴京目睹学生示威运动，使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大杉荣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攻读法语及与堺利彦、幸德秋水等“平民社”成员频繁接触后，逐渐找到了其叛逆

^①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122页。

性格的具体发展方向。

大杉荣在幼年陆军军官学校受到侮辱以后，不但培养了其强烈的逆反心理，而且他还通过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行动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当其再次受到权力者的压制时，他对权力的反感程度则进一步加深。例如，1901年4月，大杉荣因“同性恋事件”受到学校禁止外出30日的处分。这件事给大杉荣以很大的打击。他在《自叙传》中回忆时，说：“我不知道这种惩罚为什么会给我那样大的打击。就受到打击的程度而言，我想这是有生以来空前绝后的，实在令人后悔。我在默默思考中度过了30天，而且，我下决心改变以前的生活。”^①大杉荣从这件事中切实感到权力的霸道，他认为自己就是败在“权力”面前。他在冥想与反省之余，认为自己所要的就是“生命”的自由。因此，他想起了在新发田度过的少年时代（那时，大杉荣为了逃避老师的权威，逃避父母的监视，可以在新发田附近的练兵场一带游玩）。大杉荣在受到这样的重创与挫折之后，第一次把少年时代的新发田的生活称为“自由空间”^②。原本新发田的少年时代生活带给大杉荣的是恐惧与不安，但大杉荣受到禁止外出的惩罚后却把那一时期的生活称为“自由空间”，这足以说明军校对大杉荣的处罚给大杉荣的心理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在追求自由与严酷的现实矛盾状态中，大杉荣与学友的打斗事件成为其获取自由的手段之一。因之，1901年10月，大杉荣被名古屋幼年陆军军官学校开除。此后，大杉荣便踏上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旅途，亦即他在寻找其叛逆性格及与叛逆性格相称的行为方式。

由于种种原因，大杉荣开始放眼社会以寻求其叛逆性格的发展方向。前文曾提及的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

①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127页。

② 同上书，第129页。

还告诉我们，在人的一生中有三个问题与其密切相关。这三个问题是社会问题、职业问题及婚姻问题。其中，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社会兴趣”问题。大杉荣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始于他来到东京以后。其具体过程如下。

1902年1月，大杉荣来到东京。10月，他亲眼目睹的因足尾铜矿矿毒事件而引发的早大学生的示威运动，引起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此后，他关注新闻报道并购买最便宜的《万朝报》阅读。《万朝报》之自由、奔放的风格及其记者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的社论无不吸引着大杉荣。大杉荣尤其为幸德秋水的反战论文（对军国主义及军队毫不留情的抨击）所折服。即是说，大杉荣读了幸德秋水的文章后，勇气与信心倍增。而且，读了幸德秋水的文章，大杉荣大开眼界。可以说，他对幸德秋水的论文的反应经历了“开眼”、震惊，进而心醉的过程。同时，一向诅咒“服从”与“规律”的大杉荣，初次感到了从权威、权力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轻松与愉悦。在思索社会问题之余，大杉荣在思想上所做的努力之一便是1902年10月入信基督教。可以认为，这是大杉荣寻找思想归属而迷茫的反映。也就是说，他想从基督教中获得争取自由的力量。

1903年9月，大杉荣入东京外语学校法语系学习。与此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访问“平民社”，与社会主义者接触。在初访平民社的晚会上，大杉荣做自我介绍时说：“我生于军人家庭，成长于军人之间，受教于培养军人之学校，深感军人生活的虚伪、愚昧与拙劣。所以，我想为社会主义奉献一生。”^①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他与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保持往来，终于成为平民社的一员。并且，大杉荣在学期间，除学习法语之外，他还涉猎哲学、宗教、生物学及人类进化理论方面的著作。1904年，

^① 大泽正道前揭书：《大杉荣研究》，第30页。

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一书出版。这本书为大杉荣向社会主义靠近提供了理论根据，并使大杉荣坚信不管什么样的权威、权力都将灭亡。例如，大杉荣在《自叙传》中说：“在阅读《进化论讲话》期间，我的精神不断高涨，眼界亦逐渐拓宽。至今未知的世界，一一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一人独享其快乐，而是规劝进而强迫朋友读此书（《进化论讲话》）。通读这本书，我初次注意到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同时，进化论所强调的一切事物都在发生变化的理论，打破了我对自己心目中的权威——社会制度的看法。并且，很自然地使我接受了主张变革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旧事物被消灭，新事物必然会产生，现在的权威势力将很快被埋葬’。”^①由此可见，进化论是大杉荣接受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在接受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不断进化的观点后，大杉荣才有可能打破其头脑中的“作为权威而存留下来的各种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旧有观念，他才有可能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大杉荣已经逐渐地关注社会问题，并接受了变革社会的思想。

1906年2月，大杉荣参加社会党。3月，大杉荣在找工作的途中参加反对电车车费涨价运动而被捕入狱。这是大杉荣直接参加社会运动的开始。此后，参加社会运动与入狱似乎成了大杉荣的生活定式。而且，在社会运动中，大杉荣逐渐萌生了变革传统家庭的想法。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变革社会必须以变革家庭为突破口。由此，大杉荣在提倡变革社会制度上，将构成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及家族制度也包容进来。至此，大杉荣已经找到了其叛逆性格的发展方向。

^①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192页。

（二）大杉荣叛逆行动的外在表现

与大杉荣的叛逆性格相适应，他的行动或是以依赖性行为来排除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或是以异常行为表现来反抗“权威”；或是参与社会运动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首先，幼年时期的大杉荣，渴望拥抱他人和被他人拥抱，以求超越其内心的孤独、恐惧与不安。

前文曾提及，在举家前往新发田途中的马车上，大杉荣想拼命地抱住什么东西来排除恐惧与不安。他在马车上企图找到可以拥抱和被拥抱的存在物，以求得到安全保障。因此，拼命地抱住车子的某一部位即是大杉荣的行动表现。另外，由于大杉荣在家庭中经常被孤独与寂寞包围着，所以，他经常到父亲大杉东的练兵场寻找他，并祈求从父亲那里得到安慰。在大杉荣的幼年回忆中，曾记载在家中寂寞的大杉荣，与邻居女孩一起跑到练兵场寻找父亲，中途由于军犬的狂吠而深感恐惧的二人互相拥抱并放声哭泣的记忆^①。那时，大杉荣排除恐惧的方法是拥抱邻居的女孩和被邻居的女孩拥抱。此外放声哭泣也成为其消除恐惧的手段之一。由此可见，幼年时期的大杉荣是通过“拥抱”而抗拒幼小心灵中的孤独、恐惧与不安的。

其次，大杉荣以异常的行动反抗与违逆来自学校的“权威”，以更加深爱着母亲的逆反心理反抗来自家庭的“权威”。

在赴新发田以前，大杉荣曾在东京的一所幼儿园学习。其间，大杉荣被女教师批评后，为了对其反抗，他采取的行动是向女教师的脸上吐口水。此类事件，在大杉荣读小学时又发生一次。大杉荣就是以此种异常的举动反抗来自学校的权威的。当时，年幼的大杉荣视学校的教师为“权威”的象征。确切地说，他把女教师看成权威的“化身”。因而，为了自由，也为了自己

^①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14页。

的自尊，大杉荣采取了上述的异常举动。后来，教师（也包括男教师）们惩罚大杉荣，将其关进黑暗的仓库中，令其闭门思过。针对此，大杉荣则经常在仓库中大便，以反抗对其惩罚。例如，他在《自叙传》中解释说：“由于长时间被关在仓库中而深感无聊，所以，我经常在那里大便。”^① 幼年大杉荣的这两种反抗方式，就其性质^②而言，是相同的。可以将其行动的性质确定为异常性。如果将学校视为大杉荣所接触的最早的社会环境，那么，大杉荣就是通过上述的行动与社会环境抗争的。

在家庭中，大杉荣是长子。待其妹妹与弟弟出生后，可以想见，大杉荣在父母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按阿德勒的说法，当一个孩子的原有地位受到威胁时，他的心理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其行动会相应地表现出异常性。如上文谈到，大杉荣在家中感到寂寞而去青山训练场寻找父亲就是例证。另外，据大杉荣的《自叙传》记载，其母大山丰性格粗暴、急躁。她整日地体罚与责骂大杉荣，也是大杉荣叛逆性格形成的要因之一。与之相对，大杉荣则以一种更为特殊的方式叛逆母亲及家庭的权威。母亲越是打骂他，他越对母亲表现出深深的爱。可以说，大杉荣是在越遭母亲毒打越深“爱”母亲的逆反心理的支配下，反抗家庭权威的^③。这可以从大杉荣的母亲对他的一次体罚得到印证。一次，大杉荣的母亲令其将笞帚拿给她。当时，大杉荣亦十分清楚笞帚是母亲用来惩罚他的工具。可是，他还是按照母亲的吩咐做了。当母亲用笞帚抽打他时，大杉荣却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大杉荣的忍耐，令母亲感到吃惊，也让母亲感到气愤。在《自叙传》中，

①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20页。

② 参考竹山护夫著：《大杉荣》，收入和田守等人著《近代日本的思想（2）·德富苏峰、大杉荣、尾崎行雄》，第210页。

③ 大泽正道前揭书：《大杉荣研究》，第16页。

大杉荣记载了一段母亲与邻居女主人的谈话。“这个孩子真是愚蠢，他明明知道让其拿笞帚是要打他，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照办。如果他早早地逃掉也就罢了，可是，他呆立在那里等着挨打，那我就只好打他。”^①可以看出，大杉荣的母亲也认为，按照常规，将要挨打的孩子马上逃跑没什么不好。相反，执拗的大杉荣等着挨打，一气之下的母亲会更加生气，那就会对其必打无疑。但越是这样，大杉荣反而越爱他的母亲。例如，大杉荣强调说：“我记得母亲与仆人曾用粗绳索把我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然后，狠狠地打我”，“但是，我仍爱着母亲”^②。大多数情况下，大山丰惩罚大杉荣的原因在于大杉荣的口吃。当母亲发觉大杉荣说话发生口吃现象时，母亲就会说“又来了”，继而开始打骂大杉荣。由此观之，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大杉荣养成叛逆的性格及叛逆的行动方式是必然的。即是说，在大杉荣性格的形成上，大杉荣的母亲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再次，大杉荣在参加反对电车涨价运动以后，逐渐以参与社会运动的形式反抗当时的社会。此后，参与社会运动便成为大杉荣叛逆社会的主要行动表现。

1906年3月，大杉荣因参加社会运动而被捕入狱。以后，参加运动与被捕入狱成为大杉荣的固定生活模式。但是，大杉荣并不以入狱为耻。相反，他很得意。并且，他将监狱当成学习语言及其他科学知识的“大学”。同时，大杉荣也将监狱视为培养真正“人类”的良好场所。例如，在《续狱中记》里，大杉荣认为监狱生活是广大社会生活的缩影，并且是广大社会生活的重要之处的缩影，是“真人类”的培养地与训练场所。可以说，监狱生活为其人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大杉荣也非常珍惜他的监

① 大杉荣前揭书：《大杉荣全集3》，第22页。

② 多田道太郎前揭书：《大杉荣》，第328页。

狱生活。他在《续狱中记》中说：“最后，我从千叶监狱出来之时，才感觉自己成为真正的人了。我还感到来到社会的任何地方，都能毫无顾忌地发挥自我。因此，我对我的牢狱生活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与崇敬之情。因为，它是神赐予我的锻炼，神赐予我的恩惠。”^① 大杉荣以其特有的心理接受监狱生活，并在经历每一段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便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新的社会运动中去。可以认为，他参与社会运动与多次的被捕入狱就是其叛逆行动的外在表现。在1906年3月18日至1910年11月（即大杉荣21—26岁的青春期）这段时间，大杉荣有3年4个月的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另2年多的时间是在狱外参与社会运动。纵观此期，按大杉荣每次入狱的先后顺序，可将其入狱的时间、原因、地点等列表如下^②：

表 5-1 大杉荣 1906—1910 年入狱情况简表

入狱时间	监狱名称	入狱原因	入狱罪名
1906年3月至6月	市谷监狱	反对电车车费加价	聚集暴徒罪
1907年5月至11月	巢鸭监狱	《敬告青年》事件	违反新闻条例罪
1908年1月至3月	巢鸭监狱	屋上演说事件	违反治安条例罪
1908年6月至1910年11月	千叶监狱	赤旗事件	违反治安条例罪

由上表所示的大杉荣之入狱罪名可以得知，大杉荣的行动是反现行制度体系中的有关条文规定的。同时，也说明在明治末年

① 大杉荣著：《续狱中记》，收入大泽正道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20·大杉荣集》，第42页。

② 根据大泽正道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20·大杉荣集》、《大杉荣全集 3》、秋山清《大杉荣评传》、多田道太郎著《大杉荣》等著作制成。

的日本社会，虽然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发展，但它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中。例如，1907年5月，由于大杉荣的《敬告青年》的译文中有鼓吹无政府主义和宣扬幸德秋水所主张的“直接行动论”^①的内容而深陷囹圄。尽管如此，大杉荣却由此而找到了思想的归属与行动的发展方向。他力争权利与自由（包括争取言论、结社及参与社会运动的权利与自由），其行动必然与现行体制相抵触。再如，1908年1月，大杉荣在星期五屋顶演讲会上，向过往的行人宣传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直接行动论”思想而被政府以违反治安条例罪逮捕入狱。可以将后来的“赤旗事件”视为大杉荣等人演讲活动的继续，只不过不同的是，“赤旗事件”带有明显的直接行动的色彩。他们打着红旗走上街头，红旗上写着“无政府共产”、“无政府”^②等标语，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的口号。综上所述，大杉荣在叛逆性情形成的同时，其行动是叛逆社会的。此后，大杉荣的行动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大杉荣在社会运动与入狱的具体实践中，其叛逆的理论思想酝酿成熟。并在大正时期的特殊氛围下，直接开花结果。

① 参考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0页。持“直接行动论”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团结工人，采取罢工或暴动的形式与政府当局斗争。1907年以幸德秋水为中心，形成了“直接行动派”（包括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与之相对，持“议会政策论”的社会主义者主张靠议会调整政策来改善工人的境遇。1907年以片山潜为中心，形成了“议会政策派”。至此，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两派形成了。后来，片山潜组成“社会主义同志会”，直接行动派组成“金曜会”，双方发展到感情上的对立。

② 秋山清前揭书：《大杉荣评传》，第83页。

三、大杉荣的叛逆哲学思想与无政府主义

1912年，大杉荣与荒畑寒村创办的《近代思想》杂志，标志着大杉荣的叛逆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受“大逆事件”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所谓的“严冬时代”，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界也陷入沉闷、尴尬的境地。大杉荣以文艺形式创刊的《近代思想》，的确为打破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尴尬局面开了先河。大杉荣开始撰文发表在《近代思想》杂志上，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并企图以其思想阐述其社会组建原理。同时，在大正民主运动、部落民解放运动及各种劳资争议运动蓬勃发展的的大正时期，大杉荣的叛逆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即是说，大正时期的社会氛围为大杉荣的性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

那么，大正时期的社会氛围究竟如何？简单说来，大正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价值观也逐渐多样化，人际关系中出现了冷漠现象。明治时代的国家目标完成之后，大正时期的新的国家目标尚未确定，原有的社会规范、人们所尊奉的信仰已不再具有相应的约束力，民众的“自我认同”意识普遍增强。国际上，法西斯主义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共产主义这两股对立的思潮出现。与之相对，日本国内亦出现了“法西斯势力”及“改造社会”、“解放社会”等其他思潮^①。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大杉荣宣传“无政府主义”，企图以此改造社会并重建日本的社会秩序。

大杉荣的叛逆哲学思想虽然是在监狱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他公开发表其思想却是在创刊《近代思想》以后。而且，大杉荣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从人类最基本的能力——“生”着手

^① 参考竹山护夫前揭书：《大杉荣》，第81—84页。

的。即从“生存下去”这一人类的本能要求出发，来阐述其叛逆哲学思想的。也就是说，大杉荣特别重视所谓的“生存问题”，人们如何生存的问题。进而，大杉荣由生存问题而提倡“自我”，提倡“个人主义”。在进一步完善“个人主义”时，他又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此后，大杉荣的“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上述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本节将探讨大杉荣的叛逆哲学思想——个人主义、工团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一）“个人主义”与“社会的个人主义”

在整个大正时期，大杉荣一切思想主张的精神内核是重视基于人道主义的“自我”。他的一切主张的最终目的，在于唤起人们“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意识。针对社会主义运动所遭遇的“严冬时代”，大杉荣以文学的风格撰文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当时的日本社会，他形象地将当时的日本社会比喻为“锁工场”^①。意在指出，日本社会已成为生产“铁锁”的工场。所有的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已成为生产束缚自己亦束缚他人的“锁链”的工具。而且，在大杉荣的眼中，“锁工场”的主人就是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铁锁”的生产是伴随统治阶级征服被统治阶级来完成的。例如，他在《征服的事实》一文中指出：“过去、现在及不久的将来之数千、数百万年间，人类社会的根本事实”是“统治阶级征服被统治阶级”。在那样的社会中，“政治、法律、宗教、教育、道德、军队、警察、审判、议会、科学、文艺等其他一切社会制度”，都是统治

^① 大杉荣著：《锁工场》，收入秋山清、大泽正道、久保田芳太郎、小松隆二、中村完编辑：《大杉荣选·无政府主义的哲学I》，现代思潮社1976年版，第37页。

阶级用来“征服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为了反抗这种社会现实，大杉荣主张“个人权威至上”，提倡“憎恶征服的现实”，叛逆“征服的现实”。^① 大杉荣在探讨人类的“生存问题”时，高扬“自我”精神，构筑其个人主义的理论。以下围绕“生”与“自我”、“个人主义”与“社会的个人主义”的关系展开论述。

首先，追求“自我”乃“生”之本义。

大杉荣在《生的扩充》一文中，强调指出：“生及生的扩充是《近代思想》杂志论及的主要问题，并贯穿《近代思想》的始终。”^② 不难看出，他之所以把“生”的问题确定为《近代思想》的主要论调，在于“生”对人类的重要性。他想通过文艺的形式发表见解，在“闭塞”时代教给人们“生”的真知与本义。他说：“生有广义、狭义之分。我采取狭义的个人的生之本义。狭义的生之神髓便是自我，并且，自我是一种力，即依据力学法则的一种力。”^③ 在此，大杉荣将“生之本义”定位为单个人的“生”，将“生”的精神实质规定为“自我”。这样，他很自然地便将“生”的问题与其所主倡的“个人主义”衔接起来。在此基础上，大杉荣将“生”、“自我”、“个人主义”相融通。即是说，在大杉荣看来，“自我”不仅是“生”之神髓，而且，它还是“个人主义”的神髓。因此，可以说，大杉荣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表现了他的思想内核即“尊重自我”。他还认为，“自我”是一种“力”，“力”又是以具体活动为外在表现形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杉荣认为“力”与具体活动具有相同意义。因而，他又将“自我”与具体实践活动连接起来。由此观之，大杉荣的

① 大杉荣著：《征服的事实》，收入《大杉荣全集1》，世界文库版1975年版，第32—33页。

② 大杉荣著：《生的扩充》，收入《大杉荣全集1》，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35页。

“自我”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精神层面的“自我”；其二是行为表现中的“自我”。换句话说，大杉荣不仅要求人们头脑中要时时具备清醒的“自我”意识，而且，还要求人们将“自我”意识转化为外在的力量（行动）表现出来。因此，他的“自我”概念实际是“精神”与“行动”的统一体。

在文中，大杉荣还强调：“生的扩充是生的根本性质。”^① 为了扩充一己之“生”，人不可避免要与周围的人们发生相互斗争与利用。当相互斗争与利用的双方采取的方法不够得当时，便产生了“征服者”（统治阶级）与“被征服者”（被统治阶级）这一对立的两极。因而，在“征服者”的控制下，“被征服者”的“生”之扩充与完善几乎中断。其结果，“被征服者”逐渐丧失了“自我”。被征服者必须按征服者的意图行事，因而他们变成了奴隶与机器。这样，被征服者们消极地丧失了扩充与完善“生”的机会，与之相反，那些征服者们则积极地损坏了自己的“生”。当二者的生命接近尾声，处于中间地位的阶级便会以解放被征服者的名义，发动革命并完成夺权的目的。以上，便是大杉荣演绎的社会阶级斗争学说与社会变革理论。

前文曾提及“生”的神髓是“自我”，“生的扩充是生的根本性质”。按三段论推断，可以得知，“自我”的扩充就是生的根本特质。因而，在文中大杉荣再次强调，为了生存下去，人类必须憎恶与叛逆“征服的现实”^②，必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此，大杉荣将“憎恶”的情感与“叛逆”的行动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大杉荣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叛逆与破坏之中，才可发现生之至美。”^③ 其意暗指，只有打破现行的制度体系，才可发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生的扩充》，第36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③ 同上书，第39页。

现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美，亦即大杉荣所强调的“美与真都存在于失序（乱调）之中”^①。由此可以断言，这篇文章中已经包含了无政府主义的萌芽。作为行动方式，大杉荣主张以叛逆行动来创建新生活与新社会，从而获取人类的极大自由。不难看出，大杉荣的叛逆是对包括天皇制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的叛逆。很显然，其思想中的“自由”观念，对于造就近代的自由人类无疑是进步的，是应力争的。

关于“生”与“自我”的关系，大杉荣还在1913年9月发表的论文《锁工场》中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在人生旅途中有许多未知的部分，那些未知的部分就是有关“生之发展”、“生之能力”的问题。详细说来，就是人的“自我能力”、“自我权威”问题及人类为了解相关情况而努力及斗争的问题。他还认为，与社会抗争是“自我能力”的实践，是“自我权威”^②的试金石。在与社会抗争的具体实践中，会产生理想。即是说，人类要想真正获得“生之发展”，要想使“自我能力”得到锻炼，必须以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的“锁工场”制度。可见，“生”与“自我”的关系，可概括为“自我”是“生”之内核，“生”则是“自我”之前提。“自我”问题解决得好，自然“生”的问题解决得就好。

那么，大杉荣的“自我”概念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大杉荣在1914年1月发表的《生的创造》一文中，有所阐述。他在文中指出：“如尼采所说，自我就是自由思考、自由行动、向往彼岸的渴望之箭。吾人宜首先捕捉自我，继而使其生根发芽。”^③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生的扩充》，第39页。

② 大杉荣前揭论文：《锁工场》，第39页。

③ 大杉荣前揭论文：《生的创造》，收入《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0·大杉荣集》，第85页。

因此，大杉荣的“自我”包括现实的思想、行动及未来的理想。至于未来的理想，当然是渴望自由生活。例如，大杉荣在文中还指出：“自由的生活以及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的具有创造力的新生活”，实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目标”^①。这段话预示了，只要实现社会主义也就实现了“自我”。很明显，大杉荣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很大。可以想见，大杉荣强调尊重“自我”，也有想在日本社会造就出尼采所强调的“超人”^②的目的。眼下的任务，则在于唤出民众的“自我”意识及扩充“自我”。因而，大杉荣亦多次强调为扩充自我而打破现行体制的重要性。如在该文中，大杉荣还说：“如今所有社会制度都压迫与破坏自我。为了扩充自我，只能背叛这些社会制度。”^③另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些抱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观念与工团主义思想的人，才是最富有战斗精神、最有可能将“自我”精神付诸实践活动的人。换句话说，大杉荣认为，只有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工团主义者才能达到“自我”的两方面要求。可以认为，大杉荣把创造“超人”的具体目标暂时确定为将更多的人培养为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并且，围绕创造与扩张“自我”精神之问题，大杉荣首先探讨了社会组织中的个人及“个人主义”。

其次，“社会的个人主义”乃“个人主义”之真谛。

大杉荣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博学的青年。他涉猎的范围很广，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生的创造》，第82页。

② “超人”是尼采理想中的人类形象。超人克服了人类本性，是人类自身的超越。超人要为新价值立法，文化的更新要由超人承担和实现，超人要成为创造者。尼采的超人不仅有发掘个人创造潜能的能动一面，更有反对继承人类文化的虚无主义的一面。参考《超越挑战与应战·现代西方文化十二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③ 大杉荣前揭论文：《生的创造》，第82页。

有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他在构筑其“个人主义”理论时，就是以上述学科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大杉荣在《狱中记》中曾记载过。他说：“为了解社会构成中之人类的根本性质，我想学生物学；为了解人类的具体社会生活方式，我想学人类学，尤其想学比较人类学。然后，我想在这两门学科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社会学。”^① 大杉荣的个人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其内容应该包括：（1）找回自我。“扩充自我”的“生”之基本欲求是其“个人主义”的立足点。追求人在社会中的根本属性及人类的生活途径是“个人主义”的目标。（2）恢复人的本能。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本能（其中亦包括人类的性冲动）。大杉荣受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② 的影响，也认为本能是创造性进化的原动力^③。（3）把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使“个人主义”带有社会之特色。作为实践的手段，大杉荣走上与下层的工人阶级接触的道路。

由于人亦是生物界的物种之一，所以大杉荣欲通过研读生物学来追寻人的根本属性，即人的天生属性。人的天生属性与其他动物有共同的侧面，那就是人们习惯上称作的动物属性或自然属性。但是，人类还具有依据自己的思维来进行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并在这一具体活动中，人更多地表现出相应的社会属性。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人的这种社会属性往往将其自然属性掩盖起来。人类学是探讨人的社会属性及社会生活的科学。因而，大杉荣在

^① 大杉荣著：《狱中记》，收入《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20·大杉荣集》，第 28 页。

^② 柏格森，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创造进化论的提出者。192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等。

^③ 大杉荣著：《本能与创造》，收入《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20·大杉荣集》，第 61 页。

分析人类时，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人类学。这样，为了找回真实的人类属性，大杉荣接触了生物学；为了寻找合理的途径来连接个人与社会，大杉荣选择研读人类学。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其独特的社会学理论阐释——“社会的个人主义”。即充分地发挥人的本能、人的天性，不惜违背现存的社会道德及社会伦理；将“个人主义”普及到广大的社会中去，争取社会的大多数，以便使其“社会的个人主义”成为重建社会秩序的归宿。如果将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视为大杉荣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那么“无政府”的社会秩序最终目的就是使“社会的个人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

那么，大杉荣是如何界定其“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概念的呢？大杉荣在《社会的个人主义》自序中，指出：“所谓社会的个人主义是一门社会学。它主张每个人的个性之自由发展是社会组织的首要条件，是社会进化的首要因素。”^①即是说，社会组织应该是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的，社会进化亦应以人的个性发展为目标。可以说，他的“社会的个人主义”是解决社会与个人、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学问。大杉荣在1914年4月发表的《叛逆者的心理》一文中，就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从心理学的角度将社会人分为满足者与叛逆者。他认为，满足者属于凡人类型。他们没有权力意志，没有大的欲望，没有大的渴望，没有热情。他们对社会抱有乐观的态度，属于柔顺的动物类型，对社会不会有危害。他们接受当权者的恩惠，是一个很好的服从者。满足者的情绪特点是恐惧与不安，即“贱人的不安”^②，他们的命运由他人掌握。与满足者相对的就是叛逆者。大杉荣将叛逆者分为两

① 大杉荣著：《社会的个人主义》自序，收入《大杉荣选·无政府主义哲学Ⅱ》，现代思潮社1976年版，第3页。

② 大杉荣前揭论文：《叛逆者的心理》，收入《大杉荣全集1》，第161页。

类，其一是虚假的或模仿的叛逆者，其二是“本能的、气质的、生活意志的叛逆者”^①。在叛逆者的眼中，社会就像监狱、社会就像刑场，就像胆小者与说谎者的候诊室，就像伪善与懦弱的汇集地。叛逆者的真理，“是彻底浸透了生的真理，并且是充满精力与活动的活跃的真理”^②。他们是精悍者，是反抗社会制度的强者。因而，只有这样的叛逆者才是伟大的叛逆者。他们只希求将“生”之新形式变为现实，详细说来，即渴望理想地充实自我人格并获得成功，从而以此反抗现存的社会制度。同时，他们又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真理与正义的建设者”^③。他们往往带有明显的紧迫感，总希望能促成社会发生跳跃式前进。实际上，这也是大杉荣本身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大杉荣想在社会中培养出更多的叛逆的个人主义者，追求其社会性的“生”之完善与真实，亦即追求真实的“自我”。他在论文《近代个人主义诸相》一文中，完成了“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理论阐述。

1915年10月，大杉荣发表了论文《近代个人主义诸相》。在文中，大杉荣将个人主义划分为三种类型。近代个人主义的第一时期，是“个人想要统治社会，并依据自己的梦想改造社会，依据自己的力量叛逆社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个人主义者，对改造社会抱有乐观的态度。与之相反，近代个人主义的第二时期，虽然对社会的约定俗成及桎梏抱有敌意，但由于认为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因而决心放弃与之斗争。所以，第二时期的个人主义者则是“永久的不服从”、“永久的失败者”^④。他们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叛逆者的心理》，第162页。

② 同上书，第166页。

③ 同上书，第168页。

④ 大杉荣前揭论文：《近代个人主义诸相》，收入《大杉荣全集1》，第94页。

对改造社会抱有悲观态度。大杉荣认为，第二时期的个人主义是近代思想界的原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还认为，当时正在来临的第三时期个人主义是“第一时期与第二时期个人主义的调和物”。即是说，高扬二者的优点，摒弃其缺点。以上是大杉荣按历史的发展脉络，对近代个人主义所做的分期。与此同时，大杉荣又从心理及情感的层面，对近代个人主义做了进一步的划分。即大杉荣将那些根据自己的内在心理进行判断，缺少对社会认识的客观知识，否认一切社会组织的悲观论者称为“心理的个人主义”者。大杉荣将那些主张个人与社会调和发展，承认社会组织而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良的乐观主义者称为“社会的个人主义”者。大杉荣的“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真意既重视个人的内在精神，又重视变革社会。换句话说，大杉荣后来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属于“社会的个人主义”。但是，从个人的感受性来说，又带有浓厚的“心理的个人主义”^①的色彩。不难看出，大杉荣所强调的“个人主义”的真谛就在于“社会的个人主义”，而“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真谛则在于将“自我”的极大发展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工团主义”

如前文所述，大正时期的日本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资纠纷不断增加。在大杉荣创办《近代思想》的同时，以铃木文治^②为首的15人组成了日本最初的工会组织——“友爱会”。其纲领的主要内容：“（1）吾等和睦相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近代个人主义诸相》，第105页。

^② 铃木文治（1885—1946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受吉野作造等人影响，对劳工问题感兴趣，研究社会政策，尤其是产业工人问题。后任“友爱会”的会长。

处，共同努力，相互扶助。(2) 吾等确立共同理想，开拓眼界，培养道德品性，提高技术。”^① 其性质是“共济组合”，其任务是调节劳资纠纷。在“友爱会”的鼓励与感召下，大杉荣等人于1913年7月，成立了“工团主义研究会”。其后身为“平民演讲会”，活动一直持续到1915年中期。在1915年大杉荣撰写的论文中，集中阐述了工人运动与工团主义的思想。工团主义首先出现在法国，以“劳动总同盟”为主体来推进工人运动。大杉荣在论文《工人运动与实用主义》(1915年9月发表)一文中认为，“工团主义”是工人“依据自己本身生活的经验与直觉，经过不断的实践而创造的”^② 东西。那些工团主义者们，最初不具有理想，亦不具有固定的运动方法。可以说，他们完全根据自己的生存本能之欲求而行动。大杉荣在1915年10月发表的论文《工人运动与个人主义》中，指出：“工团主义者们如信徒一样行动，如怀疑论者一样思考。他们根据强烈的生活本能行动的同时，也热衷于对自己行为的最终结果进行思索与判断。他们的思想是其行动与判断之果实的积累。”^③ 大杉荣认为，其中之一便是“个人主义”。这样，大杉荣巧妙地将其“工团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了。

从工团主义者们创建组织的目的来看，他们是“个人主义”的。即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必要的生活与斗争，创建了新组织，并在新的组织中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创造力。因而，又可以将这些新组织视为“新社会的萌芽”。大杉荣认为，创建工团组织以一

① 岸本英太郎、小山弘健编著：《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青木书店1959年版，第156页。

② 大杉荣著：《工人运动与实用主义》，收入《大杉荣全集1》，第389页。

③ 同上书，第396页。

致的经济利益为根本原则。他们企图在生存竞技场上增强自我，也增强同伴。“工团组织内的成员，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一切生活上全是自由人。并且，由此产生了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根本思想。即所有人在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关系中合作；在稳定的个人生活的基础上，期待充分的个人自由。”^①可见，“个人主义”贯穿始终。工团主义者是完成“自我”要求的合适人选。在谈及劳动总同盟组织的时候，大杉荣还认为，它不是由上及下，由复杂到简单而组建起来的。正相反，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组建过程（即先是工会，其次是地方同盟或全国同盟，最后是总同盟）。每一阶段，自由的个人创意起着重要作用。即是说，“劳动总同盟”是根据自由与联合的“社会的个人主义”之根本原则组建的。不难看出，工团主义者的工会组织，也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组建的。按“自我”乃“生”之本义的逻辑关系推导，很显然可以得出注重“自我”即是“工团主义”的思想核心。

（三）“无政府主义”

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大正时期社会运动的主要类型之一。提及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来源，竹山护夫在其撰写的《大杉荣》一文中指出：“据大杉荣说无政府主义是一门社会学说。其主张始于 W. 葛德文（William Godwin）^②，由蒲鲁东系统化，经巴枯宁到克鲁泡特金，其理论出台，并作为团体性的国际运动出现。”^③1915年3月，大杉荣发表了《个人主义者与政治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工人运动与个人主义》，第399页。

^② 威廉·葛德文（1756—1836年）是英国政治哲学家和著名作家。早年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一生主要从事著述，撰有政治理论、历史和小说等多方面的著作。一般认为，《政治正义论》是其最光辉、最精辟的政论。其思想不仅影响了英国浪漫主义者雪莱，还影响了日本的大杉荣。

^③ 竹山护夫前揭书：《大杉荣》，第140页。

运动》一文。他在文中，将葛德文视为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指出，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①。很显然，大杉荣的思想受葛德文的影响很大。例如，葛德文在其名著《政治正义论》一书中，强调指出：“政权的目的是安全。政权所使用的手段是限制，是对于个人独立性的剥夺。自我赞赏的快乐以及我们一切快乐的正确培养，都要求有个人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人们是不能变得聪明、有用或者幸福的。因此，人类所最理想的境界是在尽量少侵犯个人独立性的情况下维持集体的安全。”^②不难看出，在政权问题上葛德文认为，要保全个人的极大自由，实行无政府的管理方式是最为理想的。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在小公社制度下，每个人都过着既不贫困也不想发财的简朴生活，彼此自由地、友爱地共同生产，共同享受劳动所得。葛德文的思想主张是美好的，但是其思想又具有相当多的空想性。另外，他的思想主张与当时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因而又具有一定的落后性。

从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形成的具体过程来看，葛德文的思想给予大杉荣的影响的确很大。葛德文是最初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仅就大杉荣一切思想主张的最后归宿在于充分地发展个人主义及自我来看，就可以看到葛德文思想的影子。关于大杉荣的个人主义及自我观念，前文已多次提及，在此笔者不想赘述。在与幸德秋水等平民社成员接触后，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前所述，1907年3月，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敬告青年》一文并发表

^① 大杉荣著：《个人主义者与政治运动》，收入《大杉荣全集1》，第357页。

^② （英）威廉·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第一卷中的“在本书中确立的和论述的各项原则的概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在《平民新闻》上。后来，大杉荣又相继翻译了《相互扶助论》及《获取面包》等文章。可以说，大杉荣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1912年的《近代思想》创刊时，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基本形成。大杉荣认为，“无政府主义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论，是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学说。可是，无政府主义与运动相比更倾向于理论，与现实相比更倾向于理想。因而，事实上其理论很抽象。”^①即是说，按大杉荣的理解，无政府主义是介于运动与理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思想主张。其实，这也正包含了大杉荣的政治理想。在谈及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大杉荣强调指出：“我的政治理想是自治联合制度。其中，每个人并非意见相左，而是意见一致。并且，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各团体也一样，即各团体之间的意见也并非相互抵触，而是容易达成一致。这种理想，并非高远或难以实现。实际上它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中实现了。而且，它就是真实的生活。”^②大杉荣意在指出，自治联合制度的基本核心仍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自治联合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与政治上的自治联合制度相适应，大杉荣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共产制度，即人们在一起共同生产，对其产品进行平均分配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的经济制度。

1912年至1916年，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处于初期的形成与表述阶段。尽管如此，其思想已经对统治阶级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因为，（1）“个人主义”的思想与“一君万民”的天皇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2）其提倡的政治上的自治联合制度与经济上的共产制度是瓦解天皇制基础的制度体系；（3）道德上的自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个人主义者与政治运动》，第368页。

② 同上书，第366页。

由选择是对传统伦理制度的极大挑战。在此，需要做进一步解释的是第（3）点。如本章第一节已有所涉及，自1914年至1916年，大杉荣在个人的情感上陷入了“四角恋爱”的漩涡，这是大杉荣叛逆传统伦理道德的集中表现。例如，1913年4月，大杉荣发表了论文《超人之恋》。在文中，大杉荣指出：“恋爱是权利。……恋爱是为了一种永远至上的目的而确定下来的法则。”^①实际上，大杉荣的这篇文章是对叔本华的剧作《人与超人》所做的评论。叔本华剧作中的主人公是“超人”的原型，而且是为了思想、活动与力的意志而生存的超人。“他（超人）具有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的伦理学。他将社会的原始事实视为生之源泉的恋爱。”^②从大杉荣的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既然“恋爱”是社会事实，是社会存在，那么“恋爱”理所当然要时时刻刻地缠绕在我们人类的周围。因而，阻止“恋爱”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应该被打破。大杉荣将受感情支配、服从传统、盲从社会、对婚姻制度毫无抵抗就轻易投降的人称作“凡人”。与之相反，“超人”则在个性权利的名义下，对上述之服从进行叛逆。“超人之恋”就是大杉荣的恋爱观。从大杉荣的具体活动看，“四角关系”的“恋爱体验”即是其“超人之恋”的恋爱观的具体发挥。

综上所述，《近代思想》时期的大杉荣的思想主张，都是以“生”、“自我”、“个人主义”为核心而发展开来的。不言而喻，其“个人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处于“生”及“自我”观念的延长线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由于其思想内核在于人道主义的“自我”，“自我”又是“生之神髓”，因而其哲学思想是“生的哲学”。由于其哲学的明显特征在于叛逆一切社会制度，因而又将

① 大杉荣著：《超人之恋》，收入《大杉荣全集1》，第332页。

② 同上书，第335页。

其哲学思想规定为“叛逆哲学”。但其哲学思想的最终归宿，是前文已经提及与论述的“社会的个人主义”。

四、大杉荣叛逆哲学的实践与悲哀

1916年的叶山日荫茶馆事件标志着大杉荣“恋爱体验”的结束。他和伊藤野枝在朋友疏远他们的情况下，开始向龟户工人区转移，接近工人阶级。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战后日本国内的“解放”与“改造”的时代风潮都深刻地影响着大杉荣。因而，在时代的感召下，大杉荣致力于完善其叛逆的哲学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具体的实践运动中去。他还成立了工人运动家团体——“北风会”，领导无政府运动与工团运动，显示了一定的组织性。然而，“一个投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其最初的动力，也许来自仇恨和正义的激情，但最终的态度应该是超越仇恨、也超越正义的。正义是社会层面的情感，而从事社会改造的最根本的精神力量，一定是超社会的，一定是来自某种终极理想的”^①。就大杉荣的情况而言，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其改造社会的根本精神力量。本节将探讨大杉荣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完善及其思想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中分析大杉荣对生命追求的悲哀性。

（一）“白纸主义”

1918年1月，转移至龟户工人区的大杉荣与伊藤野枝共同创办了《文明批评》^②。大杉荣将这一举动称为“转生”。即是

^① 《读书》2000年第4期，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第64页。

^② 《文明批评》，1918年1月创刊于龟户的月刊。主要的执笔者有大杉荣、伊藤野枝、荒畑寒村、山川均、山川均夫人等5人。第3号时成为废刊。

说，大杉荣由“恋爱体验”而带来的烦恼与朋友对其疏远而产生的孤寂心境中摆脱出来而获取新生。实际上，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这是大杉荣幼年心理“依赖性”的再次表现。只不过是，这一次大杉荣将依赖的对象转向了工人区的工人。另外，当时正值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大杉荣为了防止民本主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所以，他们在《文明批评》上发表的文章多半是针对“民本主义”思想的^①。大杉荣将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视为“愚弄”民众的工具，并为了避免“民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大杉荣一再强调保持工人阶级的同一性。至于采取的手段，包括与工人接触，参加工人运动，组建工人运动团体，创办与工人最为贴近的报刊。例如，大杉荣于1918年参与“劳工问题讲谈会”直接与工人接触，1919年3月成立的“北风会”是革命的工人运动家团体，1918年5月创办《劳动新闻》、1919年10月创刊第一次《工人运动》月刊是借以发表主张的阵地。由此观之，“转生”后的大杉荣在思想——组织——运动的相关互动上做了非凡的努力。

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大杉荣的确进入了理性的思索期。例如，大杉荣在谈到第一次《工人运动》时，指出：“一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问题实际成了决定全世界命运的问题”，“忠实地介绍各方面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际情况”^②应该成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立场。再如，大杉荣在1919年10月发表的论文《工人运动的精神》中，就工人运动的灵魂及工人运动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都做了说明。他认为，生活问题不仅是人类的第一要求，而且是一切生物的第一要求。因而，“任何国家的工人，都

^① 参考竹山护夫前揭书：《大杉荣》，第151页。

^② 太田哲男著：《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水脉》，东京，同时代社1987年版，第67页。

必须首先提出增加工资与缩短工时的要求。这至少是初期工人运动的两大纲领”^①。但是，大杉荣还认为，工人也是人，所以也应该具有人类的要求。即近代的自我意识已波及到工人阶级，所以，“工人运动也是获得自主自治的生活的运动，是人类运动，是人格运动”^②。这样，大杉荣自然地将“生物之要求”与“人类之要求”结合起来。这是他赋予工人运动的现代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近现代的工人运动的目标，既要“增加工资与缩短工时”，又要保持人格的独立，还要具备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主意识。由此观之，大杉荣巧妙地将《近代思想》的核心主张“个人主义”及“自我观念”继承下来。只不过是，这一次大杉荣真正地从工人及普通大众着手，力图唤起他们的自主性，意欲完成在社会构成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主义”。就其传播思想的主要出发点而言，大杉荣是以长期以来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人生的终极关怀”为切入点，来探讨问题的。

1920年6月，大杉荣发表了论文《社会的理想论》。在文中，大杉荣将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工人阶级的“人生意义”与理想社会范式的选择结合起来。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经常说，工人首先对自己想要建设的未来社会，抱有清楚观念。没有牢牢掌握这种观念的工人，虽然会成为革命的工具，但不会成为革命的主人。”^③那么，工人阶级如何才能成为革命的主人呢？大杉荣认为，只要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打破旧社会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建设新社会，那么，他就成了革命的主

① 大杉荣著：《工人运动的精神》，收入《大杉荣全集2》，世界文库1973年版，第608页。

② 同上书，第611页。

③ 大杉荣著：《社会的理想论》，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624页。

人。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自主精神”是相当必要的。至于建设新社会的理想，大杉荣列举了很多，诸如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①等。工人阶级对新社会组织应抱有的观念，也可以说应在上述的几种观念中选择。怎样选择？如何选择？那要看工人阶级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是什么。大杉荣还认为，当时劳资关系中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劳动者如何获取自由精神的问题。而且，自由精神对劳动阶级来说是关系到其人生的重大问题。

所谓的人生是什么？如何才能使人生过得有意义？针对这一哲学史上的重大命题，大杉荣有其独特的诠释。“人生决不是事先固定下来的、书写整齐而存放在那里的一本书。它是需要每个人逐字逐句填写的一本空白的书。活下去的本身就是人生。”^②对于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来说，由于他们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所以劳动问题就是其人生问题。大杉荣认为，劳动问题也是一本空白的书，劳动者是通过其运动在这本书中一字一句、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填写内容。这就是大杉荣所提出的“白纸主义”。然而，劳动者参加运动，填写人生内容，应该根据观念与理想。大杉荣指出：“观念与理想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种光明。……其力量与光明为了保持其强度，它必须是从自己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书写的文字中产生的。”^③其意暗指，观念与理想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它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也不是照搬照抄他人的，它是从现实中归纳出来的。这与辩证唯

①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作“行会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主张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中间散布不通过阶级斗争可以摆脱剥削的幻想。主张“和平地”用基尔特（行会）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② 大杉荣前揭论文：《社会的理想论》，第627页。

③ 同上书，第627—628页。

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相吻合。由此表明，大杉荣的“白纸主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大杉荣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日本的劳动者必须根据自身的气质与周边的状况，求得与之相应的观念与理想。在文章的结尾处，大杉荣告诫日本的劳动者，“如信徒一样行动，如怀疑者一样思索”^①。也就是说，你若是相信某种理念，就要像宗教信徒那样去信奉它，并采取行动。反之，你若是怀疑它，就应该对其加以思索，以求加深对其认识。由此可见，“白纸主义”是大杉荣对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所做的回答，也是工人阶级发动工人运动的真谛所在。但是，大杉荣的“白纸主义”是有条件的。首先，强调人的自主性。其次，强调根据自己周边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观念与理想”。这样往往容易造成工人阶级思想的分散性，革命路线的多样性。因为如果真正让工人阶级自主地选择，由于每个人对周围情况的认识不可能是水平划一的，那么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肯定会有差距。因而，他们对“观念与理想”的选择也会是多样性的，对革命路线的选择也是多样性的。实际上，就大杉荣将无政府主义思想灌输给工人阶级来说，这里存在着大杉荣的思想与“白纸主义”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人阶级成了大杉荣思想上的奴隶。虽然如此，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大杉荣引导工人阶级争取人权、争取人格“自主独立”的先进性，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无政府主义实践性的增强

大杉荣在撰文发表见解、创建组织、领导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了其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时期大杉荣的思想主张，不仅表明他进入了一个成熟的理性思索期，而且，他还赋予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社会的理想论》，第628页。

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实践的真实意义。

如果说大杉荣吸收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更重视理论，那么，他引进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则更重视实践。他潜心研究巴枯宁的思想，是在1921年第二次《工人运动》成为废刊以后。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人运动》创刊时的主要目标，是为日本革命做舆论宣传，将日本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并完成其革命。日本革命的方式是以强调劳动者的主体性为显在特征^①。那时，还能实现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协作与共同努力。例如，以大杉荣与山川均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于1920年12月组成“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其进步作用可以概述为：“社会主义同盟是作为无产者在思想上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并从思想上为建立本阶级的先锋政党所做的尝试。就其作为一个走向人员构成纯洁化过程的历史阶段而言，它是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的。不过，这个阶段很快就完结了。”^② 由于这个组织的人员庞杂，各种要求与立场并存，所以没能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因而，同盟内部的对立经常发生。尤其，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对立最为明显。1921年12月，大杉荣等创刊的第三次《工人运动》月刊，是大杉荣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与布尔什维克论战的舆论工具。其中，大杉荣完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来源，可以说主要来自巴枯宁的思想。

1922年6月15日，大杉荣在《巴枯宁研究》一文中指出：“巴枯宁是乱世时期的人，是生活在封建旧制度被打破，而资本新制度尚未确立的乱世时期的人。克鲁泡特金则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万岁的太平时期的人。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

① 参考大泽正道著：《大杉荣研究》，第248页。

②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10页。

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再度将目前的世界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向新的正义与自由的制度，因而再度出现了乱世。”^①由此可见，大杉荣研究巴枯宁的一个主要的契机是“世界乱世局面的再度出现”。若按大杉荣的思维模式思考的话，乱世就应该有与乱世相适应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所以，世界的新局势与日本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是催促大杉荣研究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原因。例如，大杉荣在文中戏称：“克鲁泡特金的魅力直接催促我，长期以来紧紧地抱住我。然而，最近数年间，我又返老还童，再一次受到往昔巴枯宁热的挑唆。”^②这可以说是大杉荣研究巴枯宁的大背景。

大杉荣将巴枯宁视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也承认，是克鲁泡特金完成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但是，他又认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完成，只不过是巴枯宁所构筑起来的精神披上了近代科学的“外衣”^③。那么，巴枯宁所构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什么？第一，要依据自由的本能，进行真正的革命，重建社会组织机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巴枯宁认为，马克思不具有“自由之本能”，亦不具有“革命家的真本事”，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强权主义者”^④。第二，不要政府。大杉荣接受巴枯宁的思想主张，并努力把它移植到日本。其具体表现如下：

大杉荣更加重视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性。

大杉荣重视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大杉荣将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运动或者集会的形式，传达给工人阶级。例如，

① 大杉荣著：《巴枯宁研究》，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188页。

② 同上书，第188页。

③ 大杉荣著：《无政府主义之父》，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189页。

④ 大杉荣著：《巴枯宁的生涯》，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247页。

1922年2月，正值八幡钢铁厂工人大罢工两周年之际，大杉荣赶赴北九州参加了工人集会。在集会上，大杉荣对听众说：“十年前，我与朋友路过此地时，从车窗看到数百个巨大的烟囱。当时，我对朋友说过，如果能使工厂的烟通过工人的手停下来一天，那我死也就满足了。前年，我在狱中挨冷受冻时，突然得知八幡钢铁厂的烟停止了，同盟罢工爆发了。五年前，工人运动还不太受重视，还很受限制。大家在五年前，恐怕也不会想到大罢工吧！……这就证明运动已有所发展。”^①另外，大杉荣也注意到，日本的工人运动以“米骚动”为一新的纪元，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逐渐向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在组织上，如何将工人运动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大杉荣也认为，实现工会组织之间的总联合是最佳途径。也就是说，在实践运动中，每个工人在接受了自由与联合的自我锻炼之后，逐渐形成为反权力的民众基础。然后，再经过不同职业、不同产业的联合，形成与权力相对立的更大的组织力量。因此，这才有了1922年9月的联合大会的召开。

为了发挥人的“自由之本能”，进行“真正的革命”，大杉荣将“自由联合主义”奉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合并主义”。

例如，大杉荣在《无政府主义与组织》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首先指出，那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破坏性的，是反组织的”观点是错误的。只要其组织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就无可非议。因为，以自由为基础而创建的组织，它是为了获取对人类有益的诸种结果，由各种各样的力量自发聚集在一起的团体。其次，大杉荣批判了“组织不能助长个人自由的发

^① 秋山清前揭书：《大杉荣评传》，第272页。

展，它意味着个性的衰退”^①的荒谬论调。实际上，组织的真正效用在于帮助人类开发其人格。它不是无用人的结合，它是有自觉能力、有智力的个人的组合。无政府主义反对的是一切压迫性的组织，主张建立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新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萌芽，已在某些工会中显露出来。在文中的最后，大杉荣指出：“工会正在废除中央集权主义、官僚政治和纪律，鼓励工会的每位会员采取独立的直接行动。”^②此后，主张“直接行动论”的大杉荣，便与其他派别展开争斗、论争。其中，位居争论核心地位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

1922年9月30日，在大阪天王寺工会堂召开的全国工会总联合成立大会上，二者之间的对立达到顶点，由此二者走上了决裂的道路。与会代表共有106人^③，分自由联合派（工团主义派）与总同盟派（劳资协调派）对峙的两派。在旁听席上，有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等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此外，还有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精锐。在大会上，双方提出了水火不相容的提案。布尔什维主义者一方提出了“中央集权合并论”；工会同盟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自由联合论”。这涉及到组织原则的问题。这次大会最终以总联合计划的流产而告终。关于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两派的领导人过于强调构建组织应具有的原则性问题，而忽略了为达到与权力对抗的目的所必备的灵活性问题。例如，大杉荣认为，工人运动有其自然的顺序，即首先是以“改善”劳动条件为目的，其次是

① 大杉荣著：《无政府主义与组织》，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522页。

② 同上书，第523页。

③ 参见秋山清前揭书：《大杉荣评传》，第269页。

“打破”旧秩序，最后是“建设”新秩序。这个顺序在大杉荣看来是最为正确的，并将其称为“工人运动的理想的现实主义”^①。在联合问题上，大杉荣主张“自由联合”。他认为，各工会联合的基本前提是尊重各工会的“自主自治”，在工人自身中培育理想社会的因子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自由联合论”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批判。例如，山川均认为，“自由联合”就是工会间极为松散的联络机构，而“合并主义”是指整顿眼下的工会，先按产业加以合并，然后将其推向全国，合并为一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针对此论，大杉荣进行了辩驳。他首先强调“自由联合论者”还是主张工会的产业上的联合，但是其联合决不是“极为松散的联络机构”，而是紧密相关的。这种联合，自然要从同一地区的同一产业的工会开始。然后，才逐渐地向全国扩展。“总工会面临的共同问题由各组成部分共同协商解决，其组成部分的自身问题由它们自身凭其觉悟与能力来解决。这才是我们所真正希望的联合形态。”大杉荣进一步指责山川均：“曾经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我等所尊敬的山川，恐怕不会不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初级知识吧！那是他的曲解，是恶意的曲解。”^②从上述两派之间的争论，我们可以得知，大杉荣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本能的发挥”；山川均则强调的是组织的团结性与一致性以及战斗性。从客观实践的有效性来看，山川均的想法应该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单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单是社会主义者都难以与强大的政府势力相抗衡。可见，合并是运动发展的大趋势。但关于合并的具体方式，山川均主张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合并”方式。据山川均解释：“所谓集中即是最准确、最敏捷地反映一般工会

① 大杉荣著：《工人运动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507页。

② 同上书，第511页。

成员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力的东西。”^① 从山川均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推知，要充分反映“一般工会成员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力”，首先应该具备一个民主的过程。即是说，首先需要每个工会成员都自由发言，然后大家在一起综合讨论，从而找出“最准确、最敏捷”的东西。这个寻找的过程，我认为就是山川均所说的“集中”的过程。其主张的确可以避免大杉荣的“个人本位的团体主义”可能带来的松散性与分裂性。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与智力存在着差异，所以过分地强调“个人本能的自由发挥”，难免会造成意见难以调和与统一。但是，两派都忽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都没有摆正强大的政府势力与仍处于弱势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敌对位置关系。因而，正当争论的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日本的官宪便以会场紊乱为借口解散了会议。双方成立总工会的愿望没能实现。不仅如此，“这次会议还说明已经在实践中破产了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失去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②。他们的失败，归纳起来，还存在着双方在斗争策略选择上的错误。双方应该打破头脑中的条条框框，从中走出来，求同存异，尽可能争取可能争取的大多数以完成日本的革命。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也是双方的战略失策。就大杉荣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而言，他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带有空想的色彩，因而其运动的逐渐衰退是必然的。这也是大杉荣等人的悲哀。

大杉荣主张依靠自由精神创建新的社会秩序，并将“直接行动论”奉为行动纲领。

大杉荣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大正时期众多的社会运动的基本类型之一。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终极目的在于社会的个人主义

① 大杉荣前揭论文：《工人运动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第514页。

②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三卷，第10页。

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为了使社会的个人主义得到发展，又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社会秩序。即是说，这个新的社会秩序是有利于个人主义发展的。因此，大杉荣在其论文《新秩序的创造》中，强调指出：“我们不是为了随着新的音乐跳舞，才聚集到演讲会（当然也包括其他活动）的。我们是为了锻炼提议与达成意见的一致而聚集的。即便还有其他目的，那也不过是利用多种机会锻炼新生活。……并且，在所到之处，发挥自由创意及完成自由意志，因此在现实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构筑起新的生活。”^① 其意暗指，自由精神应该成为构建新社会的基本前提。未来社会的新制度将在新生活逐渐确立的过程中生根发芽。反过来，又要求新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保障自由与体现正义的。在此，大杉荣明显接受了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的思想主张。葛德文认为，无论任何形式的政权，总是侵犯个人的独立见解与良知的。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必须实现政治正义。实现政治正义的前提是，“人类生而平等”。因而，葛德文认为：“人是根据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而行动的，自觉的行动取决于理智的判断。只有当理性与道德的原则在社会管理制度中占统治地位时，这个社会才能称作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政治上的公正。”^② 因此，不难看出，葛德文也是要理性，要道德，而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可见，大杉荣所强调的“自由创意”、“自由意志”就是葛德文思想的日本式的翻版。再加上他又吸取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践性，更增强了其创建不要政府的社会秩序的热情。作为实践的手段，大杉荣主张“直接行动论”。

“直接行动论”是与“议会政策论”对立的革命论调。“直接行动论”反对“议会政策论”的劳资协调的温和主张，建议采取

① 大杉荣著：《新秩序的创造》，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684页。

② 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第一卷，“出版说明”第2页。

直接行动的方式解救自己并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直接行动论”由幸德秋水最先提出，他认为：“要想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有依靠团结一致的个人的直接行动。”^①大杉荣将“直接行动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完善。他不仅将其奉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还将其作为建设新的社会秩序与自我保护的工具。例如，大杉荣在其论文《直接行动论》中，就有关处女如何保护其贞操问题，提出了“直接行动论”。他在文中指出，有关处女的贞操并未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自己的贞操必须由自己来保护。因而，我们将这件事情向社会申诉，以促使女性的自觉。大杉荣给她们的建议是：“当遭遇强暴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吵闹。虽然很微弱，但它毕竟是一种力。如果参加吵闹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谁都将束手无策。”^②因此，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是比较重要的。

由此观之，大杉荣的“直接行动论”也是非常重视“自主力”的。即是说，“独立自主”始终是大杉荣的思想内核。一个人要想获取自由，要想自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来完成。所以，“直接行动论”与“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大杉荣在《直接行动论》的结尾处，告诫妇女们：“即便有法律，即便有警察，即便有法院，当处女的贞操受到侵犯时，除了她自身的力量外，没有什么能防止它发生。”^③

（三）无政府主义实践的悲哀结局

前文曾提及，1922年9月30日，在大阪召开的“日本工会

①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第77页。

② 大杉荣著：《直接行动论》，收入《大杉荣全集2》，第728页。

③ 同上。

总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流产标志着无政府主义运动走上衰退的道路。然而，大杉荣却推卸责任。他再三强调“既要面包，又要自由”的恢复人格运动是工人阶级的当务之急。这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存在着重大理论分歧。此后，虽然大杉荣逐渐丧失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他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展，企图实践自己的理想，并幻想找到重振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力量源泉。例如，1922年11月下旬，大杉荣收到法国朋友的来信，邀请其参加1923年1月至2月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1922年12月，大杉荣动身离开日本前往法国。1923年2月到达法国，5月大杉荣参加巴黎郊外的“五一”集会。当他目睹工人们穿着讲究到处乱走时，大杉荣非常生气。他便问道：“今天难道不是五一吗？他们这是往哪去？”“啊，那是托五一的福，大家在放松休息。那是到郊外去玩。”^①于是，大杉荣在巴黎北郊对放松的群众做了演讲。他说：“日本的五一并不是节日，而是示威运动。”^②他对法国的“五一”做了批判，因此而被捕。7月，被释放回国。实际，大杉荣的欧洲之行也以失败告终。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爆发。趁地震混乱之际，日本的警察以朝鲜人、社会主义者放火及发动暴动为借口，杀害了大批朝鲜人。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平泽计七也被杀害。这就是所谓的“龟户事件”。9月16日，大杉荣等3人在归途中被埋伏好的宪兵枪杀，其叛逆的人生结束。

大杉荣是最为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死，不仅是其肉体的消失，而且也是思想原动力的突然消失。可以说，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大杉荣都是被日本的天皇制国家所抹杀的。从大杉荣叛逆包括天皇制在内的社会制度到最终被天皇制国家所杀害的

① 多田道太郎前掲书：《大杉荣》，第394页。

② 同上。

具体过程来看，大杉荣及其领导的相对弱势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注定了悲哀的命运。就大杉荣个人而言，其悲哀色彩尤为浓重。

小 结

前文提及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生的三大问题是社会问题、婚姻问题以及职业问题。就大杉荣的具体生活实践来看，社会问题几乎是其生活的全部。他的婚姻问题与职业问题完全是围绕其社会问题而展开的。比如说，正是由于大杉荣对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所以就其职业的种类而言，应将其称为社会活动家。由于他强调“自我”，强调“本能”，强调“社会的个人主义”，因而在婚姻问题上，他主张婚恋的极大自由并亲自实践之。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大正时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显然，大杉荣在大正时期的活动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由于这类知识分子的过激行动与叛逆行动，可以将这类知识分子称为“反体制的叛逆型知识分子”。其在日本社会近代转型期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杉派知识分子的具体活动给近代日本天皇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他们的活动是叛逆整个社会体制的。他们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动摇了天皇制在普通民众内心中的原有地位。

第二，大杉派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及“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对国家至上主义思想^①的反抗。大杉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在大正时期特有的时代氛围下进一步培育起来的，同时其思

^①（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第174页。

想亦成为大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的思想为造就日本的大众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大杉派知识分子创建新社会秩序的构想，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理想主义对人们在憧憬未来时是必要的。

第四，大杉派知识分子的行动方式，即直接行动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被政府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行动，因而，政府当局以强势镇压弱势，客观上维护了社会整合。

关于大杉派知识分子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具有叛逆的性情与叛逆的行为方式。如本章第二节借用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具体分析了大杉荣的叛逆性情的形成要因及叛逆行动的具体表现。

第二，过于恪守原则，而缺少应有的灵活性。例如，本章第四节谈到了日本工会总联合大会中的“自主联合派”与“中央集权合并派”之间的盲目争斗，丧失了两派合作的可能性，也丧失了进行彻底革命的大好时机。关于这一点，当时站在“中央集权派”的荒畑寒村在其自传中，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他说：“如果更现实、更具体地，并真正地理解了工人阶级面临的重要问题，应该求同存异。可恰恰相反，两派却固执己见，争论不休。因此，总联合会的失败，应该说是必然的。这个问题的经过，至今在我的心中，仍残留着自责的情感。”^①

另外，从大杉荣本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同心圆的不断向外扩展过程。

首先，同心圆的圆心就是“自我”。

其次，围绕圆心的第一个圆是“个人主义”。

再次，“个人主义”外围的同心圆是“工团主义”。

^① 多田道太郎著：《大杉荣》，第391页。

第四，“工团主义”外围的同心圆是“无政府主义”。

最后，最外围的同心圆是“社会的个人主义”。

这个“同心圆理论”也正好说明了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即它们只有一个精神内核——“自我”，它们的终极目标是完成“社会的个人主义”。

尽管大杉派知识分子有上述的作用与特点，尽管大杉荣的思想之间有如此的关联。但如果理想的东西过于高远与宏大，并与现实相脱离，那么理想也就变成了空想。即是说，大杉派知识分子设计的未来社会虽然美好，但也只是一个玫瑰梦想。所以，能正确引导社会转型的并不是大杉派知识分子。



第六章

“理想主义思潮”与 武者小路实笃

在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中，“白桦派”的作家们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他们是“理想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以《白桦》杂志为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独霸大正时期的文坛，直截了当地代表了“大正的文化概念”^①。其中，武者小路实笃处于核心地位。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激情，对当时的文艺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初期，武者小路实笃抱有顽强的“自我”信念，狂热地吸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成了“白桦派”的“精神领袖”。就其领导的“白桦派”在文坛的地位及其个人的作用而言，武者小路实笃居于文坛核心位置。但是，就其与政治体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而言，武者小路实笃是处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就其思想方式与行动方式而言，他是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他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来观察与思考社会问题，并体现其“社会良心”。他提出了理想的社会模式“新村建设”，并亲自实践之。他的“新村建设”实际就是一个“理想国”，最终则以失败告终。昭和军事法西斯主义时期，武者小路实笃曾一度趋附军国主义，表现出落后及倒退倾向。他不但由

^① 《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8页。

体制外知识分子一变而为体制内知识分子，他的相对独立人格也转变为依附的人格。二战结束以后，他仍旧从事文学创作与书画创作，直至1976年4月9日故去，结束了其丰富多彩的一生。

本章将围绕武者小路实笃在大正时期的思想与活动，来探讨为什么说他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是边缘化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及行动怎样表现出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特点以及这类知识分子在大正时期的作用等问题。

一、武者小路实笃的多彩人生历程

武者小路实笃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他的作品与活动的范围比同时代的作家们要宽泛得多。其作品的体裁有小说、戏剧、诗歌、游记、书画、随笔、人生哲学等等。因而，有人认为，说武者小路实笃是作家又不像作家，说他是画家又不能概括其全貌，同时他还有宗教家的特点^①。根据其思想、作品及行动的相关性，可以将其多彩的人生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为创办《白桦》做准备

1885年至1909年，是武者小路实笃受到生活在农村的舅父的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影响，狂热地吸收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并为其倾倒的时期。

武者小路实笃，1885年5月12日出生于东京市麦町区元园町（现今千代田区麦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

^① 本多秋武著：《武者小路实笃入门》，收入伊藤整、龟井圣一郎等编辑：《日本现代文学全集47·武者小路实笃集》，讲谈社1980年版，第457页。

世是子爵。1891年入学习院^①接受初等教育，与木下利玄是同级。后来，二人成为好友并参与创办《白桦》杂志。1895年夏天，武者小路实笃拜访舅父勘解由小路资承。他过着半农的隐居生活，自己耕田，自己施肥，吃的也是靠自己双手做的麦饭。目睹这一切的武者小路实笃受到很大的启发，后来他在建设“新村”时，没有任何不安与心理障碍也是由于受到了舅父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舅父勘解由小路资承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武者小路实笃受到舅父的最大影响是从他那里接受了“托尔斯泰主义”。1897年，武者小路实笃从学习院初等教育毕业，进入中等教育阶段。1900年4月，进入初恋的年代，著有短篇小说《初恋》。1902年，武者小路实笃升为中等教育6年级时，与志贺直哉为同级。1903年，武者小路实笃完成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阶段。3月，武者小路实笃因失恋而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武者小路实笃立志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最初接触到托尔斯泰的著作，阅读了《我的宗教》和《我的忏悔》。1906年4月，武者小路实笃与志贺直哉一同徒步旅行。7月，从学习院高等教育3年级毕业。9月，新学期开始，武者小路实笃入东京大学文学社会学系学习，志贺直哉入英语系学习，木下利玄入国语系学习。1907年4月14日，武者小路实笃、木下利玄、志贺直哉、正亲町公和等4人，在志贺直哉的房间举办第一次集会，每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在会上宣读。这是“白桦”的源流。第三次集会时，武者小路实笃朗读了《他》，受到一致好评。1908年4月3日，武者小路实笃的第一部著作集《荒野》出版。6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族子弟的教育机构。1877年10月在东京成立学习院，作为华族学校。1884年移归官内省直辖，成为皇族也可进入的特殊学校。有初等、中等、高等科，1894年又设大学科。战败后改组为私立学校，1949年改为私立学习院大学。

月，赴北海道访问有岛武郎。1909年3月，得到21人响应，为创办《白桦》杂志做准备，决定每人每月出资2元储存起来，作为出版资金。

（二）“自我中心主义”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交替

从武者小路实笃的精神状况而言，1910年至1927年是“自我中心主义”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交替期。从其著作方面来看，这是事业的辉煌期及作品的成熟期。从武者小路实笃的行动来讲，这是“新村建设”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1910年至1914年。这是武者小路实笃极力提倡“自我中心主义”的阶段。即是说，《白桦》杂志创刊后，武者小路实笃从托尔斯泰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充分地肯定“自我”与“利己”。

1910年2月，武者小路实笃写完中篇小说《天真的人》。4月，他与有岛武郎等人创刊《白桦》杂志。在创刊号上，武者小路实笃为夏目漱石的《从今以后》写了评语。11月，他在《白桦》杂志上发表了随笔《罗丹与人生》和《梦》。1911年2月，由洛阳堂出版发行了他的小说集《天真的人》。5月，武者小路实笃再次赴北海道访问有岛武郎。8月，他在《白桦》杂志上发表了感想文《个人主义者的感谢》。1912年11月，由洛阳堂出版发行了他的中篇小说《不谙世故》。1913年4月，他在《白桦》杂志上发表了现代剧《某日的一休》。12月，武者小路实笃的感想文集《生长》和创作文集《心与心》由洛阳堂出版发行。1914年1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现代剧《我也不知道》。后来，在《白桦》杂志上发表了现代剧《28岁的耶稣》和《无罪之罪》。

以上这些作品或是要求尊重个性、肯定个人主义；或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来阐发作者的人生哲学。这一阶段主要反映了《白

桦》杂志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尊重“个人主义”，提倡“自我主义”。

第二，1914年至1927年。这是武者小路实笃重新回归“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武者小路实笃为了将人道主义付诸实践，开始购买土地进行所谓的“新村建设”。他带领一些人在新村居住长达8年。这一阶段，又是其作品的成熟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武者小路实笃以很大的影响。这是他回归“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时代背景。他反对战争，提倡人道主义。1914年11月，他在《白桦》杂志上发表了《他30岁的时候》。这篇文章成为武者小路实笃由极力主张“自我中心主义”转而重新提倡“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分界线。1915年3月，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杂志上发表了现代剧《他的妹妹》，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反战情绪和人道主义思想。1916年3月至11月，武者小路实笃的又一反战体裁的现代剧《一个青年的梦》在《白桦》杂志上陆续发表。作品主要宣扬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幻想以“人类之爱”阻止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这主要表现了武者小路实笃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①的立场。1918年5月、6月、7月，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杂志上分别发表了《新生活之路（一）》、《新生活之路（二）》和《关于新村》，以此倡导新村运动。7月，创办了《新村》月刊杂志。8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关于新村的最初论集《新村的生活》。1918年11月14日，武者小路实笃在宫崎县儿汤郡木城村字城着

^① 所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般以不触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前提。主张不分敌友，宣传超阶级的“人类之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诉诸人性、人的理性，诉诸全人类，诉诸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善心，鼓吹“勿抗恶”，反对革命暴力。与之相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参考靳辉明、罗文东著：《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手建设新村。他企图以完善个人的道德来谋求拯救人类、调和
社会矛盾，从而建立一个“不愁吃穿住”、“不依赖金钱”、“自由愉
快，发展个性”的理想社会。

武者小路实笃在新村居住长达8年，其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杂
文、评论及小说。例如，1919年6月，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幸
福者》。8月，他开始在《新村》杂志上连载小说《耶稣》。10
月，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小说《友情》。1920年4月，他
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纪实文学《土地》。1922年完成长篇小
说《第三隐士的命运》。1923年11月，完成长篇小说《一个男
人》。其中，《幸福者》、《耶稣》和《第三隐士的命运》被称为三
部曲。1922年9月，武者小路实笃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梦幻
剧《人类万岁》。这些作品集中表现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人道主义
思想。1923年8月，《白桦》杂志停刊。9月，他的戏剧《在桃
园》发表在《改造》杂志上。1926年1月，武者小路实笃离开
新村，住到奈良市，成为村外会员。1927年1月，武者小路实
笃的随想集《人类的意志》由岩波书店出版。4月1日，由春秋
社创办月刊杂志《大调和》，武者小路实笃任编辑。6月，在新
宿举办第一次“新村展”。这一阶段集中表现出了《白桦》杂志
的另一鲜明特征是“人道主义”。

整个第二时期，武者小路实笃在精神层面处于“自我中心主
义”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交替期。1914年以前是“自我
主义”时期，即否定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确立“自我”。
1914年1月以后，是回归“人道主义”并使之付诸实践的阶段。
但“自我”与“人道主义”之间并非极端对立，二者是相互影响
的。它包含了以下两层思想：首先，要管好自己的事情，确立自
我精神，完成自我独立，培养关注社会问题的“良心”。其次，
将独立的自我精神及关注社会问题的热情普及到整个人类社会
中去，从而确立“人道主义”精神。即是说，就武者小路实笃的情

况而言，“自我”是“人道主义”的基础。但是，后来武者小路实笃极力强调“自我”精神，离开了“新村”。他的重视“自我”在法西斯战争期间又直接转化为侵略战争辩护的思想武器。

（三）“失业时代”与“自我抛弃”

1928年至1936年，用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话来说，是所谓的“失业时代”与“自我抛弃”的时期。1928年1月，武者小路实笃搬到麦町区。从2月起，在有乐町的“东京新村会场”每月举办美术展览会、演讲会及座谈会等。由于这个时期的经济处于不景气状况，所以能继续接受他的书稿并给予出版的出版社已很少。因此，武者小路实笃慨叹“失业时代”^①来临。他丧失了新村运动时的“自我主张”的热情，转而“自我抛弃”。1936年4月27日，武者小路实笃启程前往欧洲旅游，写下了许多见闻和杂记。

（四）“自我再生”与丧失人格独立

1937年至1946年是“自我再生”期，趋附军国主义时期，也是丧失人格独立性的时期。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武者小路实笃回归“自我”，不过，这次他趋附军国主义，以便找回“自我”。例如，1942年5月，他被任命为“日本文学报国会剧文学部长”。他的人格由相对独立的人格转变为依附的人格。1946年3月，武者小路实笃被任命为敕选议员。7月，被解除公职，他辞去敕选议员的职务。

（五）平静的创作期

1947年至1976年，是平静的创作期直至故去。1949年1月，

^① 本多秋武著：《武者小路实笃入门》，第462页。

他的长篇小说《真理先生》在杂志《心》上连载。1950年12月，彻底完成《真理先生》。1951年11月，他被授予文化勋章。此后，武者小路实笃进入了平静的创作期直至1976年4月9日去世，结束了其丰富多彩的一生。

二、边缘化知识分子的类型与武者小路实笃

萨义德在其名著《知识分子论》中将知识分子中的“流亡者”视为“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代表类型。实际上，除了“流亡者”之外，“边缘化”知识分子还具有其他类型。以下，将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边缘化知识分子理论”及边缘化知识分子的类型

萨义德认为，“流亡”是知识分子的最悲惨命运之一。“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①。概括说来，其主要特点如下：第一，“因为流亡而不能适应，或者更中肯地说，不愿适应的知识分子，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第二，“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乐，因而有一种近乎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②。也就是说，在萨义德看来，只要具备了上述的两个特点，就可以判断知识分子为边缘化知识分子。但是，这两个特点不仅适合于“流亡者”，它还适合于另两类知识分子。例如，由于不满当时的社会

① 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收入林贤治主编：《读书之旅》，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03—204页。

现实，想要将自己隐居起来的“隐士”或在隐居地创建“理想国”是属于一种类型。由于不满现实而自杀的人则属于另外一种。关于“隐士”及创建“理想国”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他们不能适应社会现实才宁可居于主流之外而不被收编。因此，反映在行动上，或是甘心过着“隐士”的生活，或是创建“理想国”，从而找到自己理想的“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那些自杀者之所以选择自杀，也是由于难以适应社会现实，又不肯被体制化，因此他们认为自杀是“自我解决”的最好方式。所以，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自杀者最理想的“安身立命”方式。

（二）判明边缘化知识分子的指标

基于上述的分析，萨义德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理论”中的两个特点，即是判断是否为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两个标准与尺度。那么，将上述的两个特点进一步加以演绎的话，就可以得出判明“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一般指标。其一，由于不愿意适应而宁愿居于主流之外。因而，他们不肯被纳入，不肯被收编。其二，对现实社会不满，并对之抱有别别扭扭、难以相处的心态。而且，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从知识分子的外在行动来看，“流亡”他乡、过着“隐士”的生活或创建“理想国”以及“自杀”都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表现形式。

就日本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状况而言，在“白桦派”的作家中，武者小路实笃和有岛武郎就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两个代表类型。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的影响下，有岛武郎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在苦闷之余，于1922年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指出：“今后，无论我的生活怎样变化，我都是以前统治阶级的产物。这就像黑人无论怎样用肥皂清洗都是黑人一样，我的阶级出身也不会有太

大的改观。因而，我的工作只能是为第四阶级以外的人服务。”^①由此可见，有岛武郎在思想意识上没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出身^②，他完全囿于这种阶级出身而对自己抱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他虽然注意到当时正在兴起的“第四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逐渐壮大，但自己在思想上又将自己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因而，可以说在有岛武郎的思想中仍然残存着贵族阶级意识。例如，1922年7月，有岛武郎将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北海道农场下放给佃农，并和佃农告别后便离开了农场。可以认为，这是有岛武郎贵族意识的直接表露。大约一年以后，1923年6月，有岛武郎在轻井泽自杀。关于自杀的思想要因，矶贝英夫强调指出：“主要在于有岛武郎发表了《一个宣言》以后受自我否定与虚无情感的支配。”^③但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有岛武郎的自杀恰好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代表类型之一。

武者小路实笃也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类型之一。前文曾提及，武者小路实笃亲眼目睹了舅父勘解由小路资承的半农式的隐居生活。在其生活方式的感染下，武者小路实笃做好了日后边缘化的心理准备。另外，武者小路实笃还从勘解由小路资承那里接受了“托尔斯泰主义”。他阅读了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我的忏悔》等大量著作，在社会观及人生观方面接受了托尔斯泰的观点。对此，武者小路实笃曾强调指出：“事实上，我

① 有岛武郎著：《一个宣言》，收入《有岛武郎集——现代文学大系22》，筑摩书房1964年版，第470页。

② 实际上，“白桦派”的主要成员们大部分都出身于贵族阶层。例如，武者小路实笃出身于子爵武者小路实世家；有岛武郎的父亲曾任大藏省税务官员，因而有岛武郎曾在学习院与众多的贵族子弟一同学习。

③ 矶贝英夫著：《有岛武郎的悲剧》，收入桥川文三、鹿野政直、平冈敏夫编辑：《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基础知识》，东京有斐阁1975年版，第303页。

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我虽然不是托尔斯泰的最好学员，但我却将他视为我的最早、最大的恩师。”^① 确切地说，武者小路实笃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整个白桦运动的始终。例如，关于白桦运动，他提出了如下的主张：“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为了使个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工作尽力做好。……为了人类的成长，人类就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在这种人类意志的支配下工作的人，我就把他叫作天才。”^② 他的这段表述说明，白桦派的主旨就在于提倡“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因而，可以说白桦派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将近代的“人道主义”引进日本的文学界，并把它树立起来。作为白桦派的思想领导人，武者小路实笃是“人道主义”的极力倡导者，他鼓吹超越国家和阶级的“人类爱”。武者小路实笃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是以“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武者小路实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这种残酷的战争现实更加不满，并对发动战争的政府抱有一种别别扭扭、难以相处的心态。这种心态集中表现在《他的妹妹》（1915年）和

① 白井吉见著：《白桦派的文学》，岩波书店1958年版，转引自孟庆枢主编：《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② 武者小路实笃著：《“白桦”的运动》，转引自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324页。

《一个青年的梦》(1916年)两部现代剧中。

五幕剧《他的妹妹》流露出作者的反战情绪及心态，同时，作者在剧中表达了对“自由意志”的渴望和对西岛(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自我牺牲”的否定性思考。“这些无不源于作者的人道主义文学观”^①。

主人公野村广次因战争双目失明，被迫放弃绘画。后来，在其妹妹的帮助下转向文学创作。野村与妹妹寄住在叔父家里，成为叔父家的食客。在叔父所在公司经理的金钱与权力的压力下，叔父逼妹妹嫁给经理的儿子相川。相川是一个品行不端、厚颜无耻、丑恶淫乱之徒。兄妹如果不从，就无法再寄食叔父家。为了帮助兄妹离开叔父家，好友作家西岛卖掉自己十分需要的书籍，以便充当兄妹的生活费。但是，这时社会舆论纷起，谣传西岛要纳野村的漂亮妹妹静子为妾，这直接导致了西岛与妻子之间的不和。后来，在谣言的蛊惑下，西岛与野村的妹妹之间的确由友情发展到恋情。在第四幕剧中，西岛认识到：“我已经没有供养野村兄妹的力量了。半年的时间也许还行，可是半年以上就难以维持了。到目前为止，我也被自己弄丢了饭碗。……最近，我的创作常常中途而废。我和野村为了活出自我，都需要牺牲者。那是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或是我的妻子，或是野村的妹妹。野村的妹妹也有同感。”^②即是说，妹妹静子要为哥哥野村广次的继续写作做牺牲，西岛的妻子要为西岛与静子之间恋情的发展做牺牲。只有这样，两个男人才能获得“自由意志”，才能达到完成“自我”。最后，妹妹为了哥哥，为了西岛的家庭，嫁给了相川。从

① 参考刘立善著：《论武者小路的“妹妹”》，载于《日本研究》2000年2期，第82页。

② 武者小路实笃著：《他的妹妹》，收入《日本文学全集15·武者小路实笃》，河出书房1967年版，第299页。

这一点来看，妹妹静子成了整个时代及社会现实的牺牲品。

在剧本中，武者小路实笃宣传反战思想，提倡人道主义，渴望“自由意志”。在心态上，他与当时社会现实别别扭扭、难以相处。因此，可以认为，剧本《他的妹妹》中的思想，恰好证明了武者小路实笃即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代表类型。1939年，《他的妹妹》遭日本警视厅的严格审查后，被认为剧中有抨击战争的“反动言论”，并被迫做了部分删除。这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悲哀。

武者小路实笃在其另一部剧作《一个青年的梦》中，再次以非战思想和人道主义为武器批判了战争与暴力。在剧本的第一幕中，作者借助一段青年与陌生人之间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青年：“我非常讨厌战争。一想到战争，就会想到人类已变得没有人情味了。……”

陌生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呢？”

青年：“我认为，是由于存在许多国家的缘故。”

陌生人：“如此说来，如果没有国家的话，就能避免战争了。”

青年：“是的。”

陌生人：“你认为，应该使国家消亡？”

青年：“曾经想过。但是，人类还没有前进到那一步。”

……①

由此可见，武者小路实笃崇尚的人道主义是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他所鼓吹的是全人类的爱。他从“战争” = “相互杀

① 武者小路实笃著：《一个青年的梦》，收入《现代日本文学全集 72·武者小路实笃集（二）》，筑摩书房 1957 年版，第 311 页。

戮”的命题出发，提出了人类应该如何避免残酷的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作者在作品中宣扬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企图以超越国家的“人类之爱”阻止战争的发生，从而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他认为，战争如能避免的话最好避免。将人类的相互残杀转变为相互帮助，将人类的互憎转变为互爱，将仇敌变为朋友，这才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①。

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武者小路实笃在建设新村的实践运动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日本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们认为，俄国革命“把生存的希望带来了”^②。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逐渐表面化的形势下，武者小路实笃开始将边缘化的思想付诸边缘化的实践行动，即以下将探讨的“新村建设”活动。

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

前节主要以两个剧本所体现的思想与心态为根据，分析了武者小路实笃思想意识及心态的边缘化。反映在具体行动上，武者小路实笃于1918年进行了“新村建设”。同时，他的“新村建设”是“理想主义”思想的行动表现。他由于不愿意适应而宁愿居于主流之外。他不肯被纳入，也不肯被收编。因此，1918年5—6月，他在《白桦》杂志上撰文，发起“新村建设”运动。同年11月，他在九州地区购置土地建设新村。本节探讨“新村建设”的相关问题。

① 参考武者小路实笃著：《一个青年的梦》，第366—393页。

② 参考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598页。

（一）“新村建设”即是创建“理想国”

与有岛武郎所代表的自杀类边缘化知识分子相反，武者小路实笃则将创建乌托邦式的“新村”作为“安身立命”的最佳方式。“新村建设”既是武者小路实笃的“理想王国”，又是武者小路实笃边缘化的行动表现。

1918年5月、6月、7月，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杂志上分别发表了《新生活之路（一）》、《新生活之路（二）》和《关于新村》，以此倡导新村运动。7月，创办了《新村》月刊杂志。8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关于新村的最初论集《新村的生活》。1918年11月14日，武者小路实笃在宫崎县儿汤郡木城村字城着手建设新村。

在文章《新生活之路》中，作者强调指出：“我们相信人类。……我熟知必须使利己观念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只有这样，那才是与爱一致的。”^①也就是说，作者无条件地肯定人类，充分地相信人类，企图创建一个能自由伸展人类个性的“新生活”。关于这种新生活实现的可能性，他指出：“我相信，只要有五六十人，哪怕是二三十人的话，（新生活）就一定能实现。这些人必须具有充分地相信自己、具有想要真正创建新世界的坚强精神。同时，他们的热情还要不断地高涨。大家越是认为不可能，越是笑我空想与幼稚，我就越相信它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且，我想一定做出来让别人看看。……我认为，那只是时机的问题。”^②

那么，武者小路实笃所提倡的“新生活”究竟包括哪些因素

^① 武者小路实笃著：《新生活之路（一）》，载于1918年5月的《白桦》杂志，第50页。

^② 同上。

呢？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①：

第一，参加新生活的人要有一技之长。

第二，人们共同存钱，一起购买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生产工具）。

第三，大家共同劳动，过着不愁吃、穿、住的理想生活。

第四，充分地伸展人类的个性。

第五，以消灭阶级差别为指导思想。他指出：“劳动者是绅士，绅士也是劳动者。平民是贵族，贵族也是平民。大家以一个精神为指导。”^②可见，“一个精神”的实质就是“超阶级的人类爱”。

不难看出，在当时日本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武者小路实笃提倡的“新生活”充满了玫瑰色彩。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理想国”。另外，“新村建设”活动，恰好显示了武者小路实笃在行动上边缘化的具体过程。

1918年11月14日，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宫崎县的日向地区购买了一块土地，着手创建“新村”。最初的村内成员由二十多人组成。武者小路实笃原计划创办养蚕业，生产棉花，建纺织厂，开采矿山，建立钢铁厂和发电厂^③。在各地（包括中国的北京和大连等地）建立了23个支部。鼎盛期村外会员多达500人，村内会员达60余人^④。“新村建设”之后，他在那里生活了8年。在离开新村以后，他还惦念着要将新村建成2000人（10年

① 参考岸本英太郎、小山弘健著：《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青木书店1959年版，第147页。

② 武者小路实笃前揭论文：《新生活之路（一）》，第39页。

③ 武者小路实笃著：《关于新村的对话》，收入伊藤整、龟井圣一郎等编辑：《日本现代文学全集47·武者小路实笃集》，第400页。

④ 张福贵著：《日本白桦派与周作人》，收入孟庆枢主编：《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第133页。

内的计划)，几万人（20年时的计划）甚而包括所有进步青年（30年时的计划）的新村^①。他的思想及行动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色彩。

（二）“新村建设”的反响及评价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日本国内，其反响以批评或怀疑“新村建设”活动为主。与之相反，在中国，则以赞赏并试图效仿“新村建设”为主。以下，探讨“新村建设”的反响及评价问题。

“新村”创建之初，就受到有岛武郎、加藤一夫、山川均、大杉荣等人的批判。“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在《致武者小路兄》一文中强调指出：“恕我直言，我认为你的计划无论考虑得多么周密，实行起来都将以失败告终。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从外围对你的小社会构成包围的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怎么说还会发狂地动用暴力对你的社会进行围攻。……即便新村内部成员的觉悟很高，如果不曾经过训练，那他们将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②可见，在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把握上，有岛武郎更加准确。但是，他对武者小路实笃又心存敬佩。例如，在文中，他还指出：“无论（计划）失败也好，成功也罢，你的企图是成功的。因为它为应该到来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这种计划，与其偏离了初衷而获得成功，还不如失败。我祈祷这种失败的到来。……我也想尝试一下你所做的尝试，也想失败一次你的失败。”^③其意暗指，武者小路实笃是“应该到来的新时代”的奠基人；“新村建设”一

① 本多秋五前揭论文：《武者小路实笃入门》，第460页。

② 有岛武郎著：《致武者小路兄》，收入《有岛武郎集——现代文学大系22》，第466页。

③ 同上书，第466页。

定会失败，但虽败犹荣。可见，有岛武郎对“新村建设”事业抱有批判、赞赏以及羡慕的态度。

另外，作家加藤一夫发表文章《对“新村”的疑义》，以表白对“新村事业”的看法。他将文章分六次连载于1919年3月25日至3月30日的《时事新报》上。在文中，加藤一夫集中批判了“新村”的排他性与非可行性。

他也认为，武者小路实笃断然抛弃旧生活而创建新生活的尝试值得赞赏。但与此同时，他在文中对“新村”提出了疑义。他说：“武者小路君想建立合理的、人们相互合作的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受金钱势力的支配，并达到心心相通。”^①即是说，武者小路实笃建设“新村”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让人们过上“万人皆兄弟”般的生活。既然“万人皆兄弟”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那么在边缘地区建立一个与主流社会隔绝的“新村”就很难产生社会效应。因此，加藤一夫认为：“（想建立）万人皆兄弟般的世界，就没有必要脱离现实社会，没有必要（在偏远地区）占领一席之地。”^②可以说，要想达到真正的“万人皆兄弟”，必须立足于现实社会，从现实社会内部寻找理想的途径。在偏远地区建立孤立的“新村”，实际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就这点而言，“新村”与“万人皆兄弟”的理想之间存在着相悖性。

在“新村”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加藤一夫持否定的观点。“新村”是人们“不受金钱支配的村庄”。针对这一点，加藤一夫进行了批判。他说：“恐怕新村成员们耕作时使用的工具，必须从其他社会购买吧！眼下，米及衣物也必须从其他社会购买

① 加藤一夫著：《对“新村”的疑义》，收入稻垣达郎、祖父江昭二编辑：《近代文学评论大系5·大正期Ⅱ》，角川书店1979年版，第115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吧！……新村的成员和一般社会中的人们断绝往来，孤立地生活，不仅违背了万人同胞之精神，而且，他们自身也会感到非常寂寞吧！”^①也就是说，“新村”的成员没有金钱的支持是难以生存的，不与外界往来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可见，“新村建设”的指导精神与现实（“万人同胞”与孤立发展，“拒绝金钱支配”与生活实态）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活动，在中国高层知识分子之间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周作人及李大钊等。在“新村”建立之初，周作人马上撰文在《新青年》上加以介绍。他曾于1919年7月特意东游日本，拜访“日向新村”，与“村民”一同生活。回国后，周作人在北京设立了“新村北京支部”^②。李大钊对“新村”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新村”的评价多以赞赏为主。周作人对“新村”进行宣传所投入的热情最大。他在访问新村之后，曾住在武者小路实笃的家中，与武者小路实笃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并一同参加了半天的新村劳动。他在回国后撰写的《访日本新村记》中，对当时的感觉描述如下：“感觉30多年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这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知‘人的生活’之幸福，真是一件极大的喜悦。还有一种理想，平时多为人笑为梦想，不能实现，就经验上说，却并非‘不可能’，这就是人类同胞理想。……倘能明白人类共同存在的道理，独乐与孤立是人间最大的不幸。以同类的互助，与异类争存，才是正当的办法。并耕合作，苦乐相共，无论哪一处的人，即便是邻人，便是

① 加藤一夫前揭论文：《对“新村”的疑义》，第116—117页。

② 野村浩一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研文出版1998年版，第90页。

兄弟。”^① 周作人对“新村”及“人道主义”的大力宣传，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共鸣。同时，为中国的新道德建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属于建立“理想国”。他意在以道德力量来感化或改造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与19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创举如出一辙。他们的共同之处，即充满了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因而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评价时指出：“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② 可以说，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脱离实际。但从道德上来说，他的“新村”运动又具有鞭挞资本主义社会世俗道德的进步意义。同时，也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

从思想上看，“人道主义”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建设”提供了思想动力。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我”本位的“人道主义”观念，又是带来武者小路实笃失败的思想要因。他提倡个人主义，肯定自我价值，主张充实自我，不赞成“自我牺牲”。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由来已久。他在文章《个人主义的道德》一文中，详尽阐述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是个人主义者。我与他人都是社会上的一个人。……我也许

^① 周作人著：《访日本新村记》，转引自张福贵著：《日本白桦派与周作人》，第134页。

^②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2页。

会为他人尽力，但这只限于不给自己添麻烦的范围内。当然，我为别人尽了力，不求回报。我讨厌蒙受恩惠，也讨厌自己让别人蒙受恩惠。”^①他离开“新村”即是不想牺牲自我的行动表现。在国际关系紧张时，他的“自我”观念没有任何障碍便转化为肯定与支持对外侵略的观念。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彻底的批判。进入昭和初期，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小 结

综上所述，武者小路实笃在大正时期的思想及行动，证明他就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他领导的白桦派“打开了文坛的天窗，让清新的空气流通进来”^②，并开创了近代新理想主义文学。武者小路实笃所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在大正社会转型期的作用如下：

第一，他们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将“人道主义”思想引进日本的文学界，以“理想主义”推动文化结构适应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

第二，此类知识分子将理想与社会追求结合起来，采取了边缘化的改造社会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社会性实验事业却构成了大正时期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

第三，此类知识分子创建的“理想国”，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对“新村”的整体设计是美好的，但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和非可行性。因而只能以失败告终。

就思想及行动表现而言，武者小路实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 武者小路实笃著：《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10卷，艺术社1923年版，第38页。

^② 参见西乡信纲前揭书：《日本文学史》，第324页。

第一，思想与行动的边缘化。

第二，武者小路实笃所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特色在于：以“自我”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这种主张宣扬“超阶级的人类爱”，抹杀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反映出武者小路实笃的局限性。

由此观之，这类知识分子虽然有美好的愿望和设想，但脱离实际的行动表现并不能正确引导社会的转型。



终 章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在大正时期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的争斗与较量中，近代日本社会传统政治文化往往选择能为其服务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镇压反对其统治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

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它涉及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心态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传统政治文化是历史上形成的政治观念的文化结晶或凝固状态（如政治观念范式与情感信仰，成俗性的政治心理定式，无明确意识的政治行为准则，无须论证的当然前提，公认的政治形式，框框、套套等等）^①。

近代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是指由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固定下来的近代天皇制的权威主义价值观，以及由 1890 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所确定的家族制国家观等。其核心内容，包括“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国国体观”，“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厥济斯美”^②的“忠孝”观及道德观。此外，还包括由《军人敕谕》

^① 张分田著：《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刘泽华“序”，第 2 页。

^②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9 页。

(1882年)规定的“以尽忠节为本分”、“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以质朴为宗”^①等军人的行为规范。这些在近代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无须论证的政治心理定式。从日本大正时期的新思潮与旧有观念的争斗来看，传统政治文化势力的根深蒂固及其过于强大虽不能将“欧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全部抹杀，但它却成为进一步“欧化”的绊脚石。例如，它可以发挥其效能让文化结构转型的结果发生畸变——让部分知识分子丧失“现代性的心理结构”；限制文化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甚至对教育机构的教育内容也横加干涉。再如，它会使社会结构三角形内部的实际内容发生转换，即由大正时期的结构转换为昭和前期的天皇制法西斯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皇室中心主义、超国家主义”。另外，它还会选择某种思潮与运动，当然它也会扼杀某种思潮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无政府主义思潮及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及运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精神要因。

通过分析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及知识分子，可以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概括为超前性与滞后性。而且，知识分子的思想又具有前瞻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具有潜在的危险倾向。据此，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进行概述。此外，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尤其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今天，也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未来使命加以探讨。

一、知识分子的总特征

如前所述，在大正时期，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潮之间存在着竞

^①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争。其竞争的目标是争做时代的主流思潮。竞争的显性特征，是围绕“欧化”（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与“反欧化”而展开的。这直接表现为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交锋及某些思想被“淘汰”的过程。一般说来，就文化思想与时代经济及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言，文化思想具有超前性与滞后性的特点。就文化思想指导国民精神的发展方向而言，它又具有先进性与危险性的特点。那么，根据文化思想的上述特点，可以将作为文化思想主要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概括如下：

1. 知识分子的前瞻性。

在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中，首先应该指出知识分子的前瞻性。日本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在推动文化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前瞻性的特点。

例如，前野良泽（1723—1803年）、杉田玄白（1733—1817年）以及他们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年），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上，都体现出了极强的预见力及前瞻性。

再如，在大正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巧妙地回避了与现存天皇制及政府势力的正面冲突，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并且，他的思想主张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民主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他所提倡的政党内阁制也得以实现。这都是知识分子前瞻性的有力佐证。

2. 部分知识分子潜在的危险性。

除了知识分子具有前瞻性外，我们一定要警惕部分知识分子的潜在危险性。本应采取舆论监督政府、舆论干预政治姿态的知识分子，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部分人会失去原来的使命，一变而为政府的御用文人或帮凶。在近代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的危险性表现得最为突出。

例如，前文提及的德富苏峰就是一例。在大正时期，他始终

坚持“皇室中心主义”，为整合大正时期的国民精神，并为推动全体国民走向战争进行舆论宣传。而且，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影响犹存。

如所周知，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美国及其他盟国政府高级官员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审理。然而，在这个法庭上，天皇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被追究战争的责任。但是，天皇是应该负有战争责任的。这似乎已成了没有给予肯定的事实。当时主持国际审判的审判长威廉·福拉德·卫伯（澳大利亚代表）曾指出：“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起诉，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①实际上，对天皇免于起诉，主要是为了盟国的最高利益。其中，又以美国利益为重。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在其新著《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一书中，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在裕仁的责任问题上蓄意蒙蔽了本国人民和世界上其它国家”，“裕仁最终成为日本人民隐瞒战争往事的最高象征”，“因为只要不追究他在战争中的核心作用，他们就无需自责。”^②即是说，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将日本变成反共的前沿阵地，安排裕仁继续当天皇，从而帮助日本继续维护了“国体”。正因为日本的“国体”得到了维护，日本的“皇室”继续存在下来，所以“皇室中心主义”思想仍然占据着大部分日本人的心理。另外，盟国之所以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意识形态来讲，他们也注意到“皇室中心主义”仍是位居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仍然具有强大的整合力，这也成为天皇没有

① 井上清著，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② 2000年9月6日《参考消息》增刊13版的《裕仁天皇应当对侵略战争承担责任》一文介绍了这部新著。

被追究战争责任的思想要因。因此，可以说“皇室中心主义”一直左右着战后日本的国民精神。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可为印证。

首先，战前的强大意识形态的“皇室中心主义”在战后的继续存留，仍然深深地作用着日本国民的深层心理，说明“皇室中心主义”的影响犹存。这种状态，可以说至今也没有明显的改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国民是最具“依赖”心理的。他们往往通过这种依赖心理来寻找自己的归属，寻找自己的具体发展方向。在日本民族的归属上，日本国的具体发展方向上，“天皇”则成为人们继续依赖的对象。在国际法庭对战犯审理的过程中，天皇轻易地逃脱了应负战争责任。既然作为日本国民精神象征的天皇没有战争责任，那么，作为其臣下的日本国民也就可以千方百计地为整个日本民族开脱罪责和掩盖历史真相。就好像父母犯了错误拒不认错，孩子则极力地为父母掩盖错误事实一样。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战后许多荒谬的历史事件频频发生。诸如，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等等。只要了解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荒唐事件发生的原因了。因此，追究已故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消除“皇室中心主义”在国民心中的影响仍然是日本的进步人士及东亚其他各国人民的艰巨任务。

其次，战后日本的有些政治家的言论与举动，再次证明了“皇室中心主义”的影响犹存。某日本前首相曾经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就连他也对天皇制念念不忘，并将“皇室中心主义”存于内心。例如，他谈到自己对天皇及天皇制的态度时，强调指出：“我虽然被称为庶民政治家，而我本身却十分尊敬皇室贵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排除千难万苦，其根基就包含着统一民族、团结之核心的天皇家族和世袭的天皇制度。……二战结束后，天皇陛

下为安慰和鼓励在战争中受到创伤和疲惫不堪的人，走遍了全国各地。”^① 其意暗指，天皇及皇室仍是日本的核心，“皇室中心主义”仍有很大的影响。这段言论，简直就是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的现代翻版。另外，近年来日本某些政治家，有的公开发表反华言论，有的甚而露骨地宣称日本的国体是“神国”及“皇国”，毫无顾忌地为天皇歌功颂德，鼓吹天皇制，充分说明日本的政治家们的言论错误并非偶然为之，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简言之，这与“皇室中心主义”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

此外，在行动上，日本的某些政治家不顾东亚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参拜靖国神社（招魂社）亦是“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外在表现。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说在行动上迈出了一大步。这理所当然激怒了东亚其他各国人民，增强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战后影响犹存的“皇室中心主义”，东亚其他各国人民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再次，日本右翼势力的中坚分子与“皇室中心主义”相结合，大肆鼓吹国家主义，并提倡改宪与扩军。而且，目前“改宪与扩军的风潮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日本列岛”^②。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在其论文《国家主义的抬头与改宪、扩军潮流》中认为，以中曾根康弘内阁为分界线，之前日本的国家主义尚未如此泛滥。此后，这种倾向逐渐抬头。中曾根康弘以“教育革命”为理由，企图将“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理念强加入日本教育基本

①（日）早坂茂三著：《田中角荣秘闻》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65—166页。

②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在其撰写的《国家主义の抬头と改宪・军扩潮流》一文中的见解。2000年9月9日至9月12日，由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了“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文是作者与会提交并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

法之中，但没有成功。后来设置了教育改革国民会议这种可笑的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如所周知，“忠君爱国”理念是“皇室中心主义”的主要精神内核，因此，提倡“忠君爱国”就是明目张胆地强调“皇室中心主义”。进而，中曾根康弘首相继承裕仁天皇的遗愿，加紧扩军并追求军事大国的目标。日本战败后，天皇虽然已经不是大元帅了，但他在鼓励防卫厅长官时说：“要抛弃旧军队的缺点，继承其优点，努力干吧！”^① 这充分地体现出，裕仁天皇仍抱有有朝一日能再次恢复往日军威的幻想。中曾根康弘正是实践天皇此志愿的内阁总理大臣，此后的某些政治家们也沿着中曾根康弘路线前行。他们巧妙地利用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的形势一步一步地运作着改宪与扩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本泽二郎先生将某些政权视为中曾根康弘的傀儡政权的主张是恰如其分的。那么，中曾根康弘政权又是谁的傀儡政权呢？可以说它是“皇室中心主义”及裕仁天皇的傀儡政权。

由此观之，不难看出，战后日本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的影响不但没有消除，而且还有逐步复兴的势头。很明显，这种势头已经再次构成对东亚其他国家的显在的威胁。因此，彻底地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根除“皇室中心主义”仍是摆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与东亚各国人民面前的重任。

再如，北一辉是知识分子中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又一例证。他与德富苏峰有所不同，德富苏峰趋近政治权力，北一辉则远离政治权力。但是，二者的思想都成为军部法西斯利用的工具。今天日本的右翼思想，都是对二者思想的继承。

^① 井上清前揭书：《天皇的战争责任》，第8页。

二、对知识分子的展望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在这一过渡期，知识分子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因为，所谓“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主要特征：“（1）科学和技术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2）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3）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4）人力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的先决条件。”^①其中，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因为人是知识的载体，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和应用知识的主体。因而，理所当然，知识分子将在知识经济时代承担历史重任。所以，不但应该对知识分子进行国别研究，而且还应该进行国别间的比较研究。

尤其，对处于同一地域文化圈的知识分子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有利于正确地引导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中国与日本都地处东亚，具有同样的东方文化背景——儒学传统。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具有儒学传统的中日两国，能否顺利地完成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成为两国的重大课题。作为推动转型的核心力量的知识分子，能否完成自身的角色转换，将关系到两国的人力资源、企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命运。对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进行展望，对国家及地区的人文精神的建设将有所贡献。又由于知识经济时代是无疆界经济时代，因此对当代知识分子进行展望具有普遍意义。

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将是一个“文化资本”取代“货币资本”

^① 李廉水著：《知识经济究竟是什么》，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 页。

而成为社会统治基础的时代，作为“文化资本”之占有者的知识分子也将取代原有的统治阶级而成为新统治阶级。因此，探讨“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可以进一步明确当代社会中“知识与经济”、“知识与权力”的直接关系。但涉及到具体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状况，还需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与分析。



参考书目

一、中文部分（按在引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1.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
2.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
3.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
5. 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7.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
8. 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9. （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2. 张分田：《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 (美) 约翰·惠特尼·霍尔著：《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16. 有泽广巳主编：《日本的崛起——昭和和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 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18. 米庆余：《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9. 杨栋梁：《日本历届首相小传》，新华出版社，1987年
20. 周蔚、许克谦编译：《人类文化启示录》，学林出版社，1999年
21. 武安隆：《大正至昭和初年日本大众文化的形成与生活方式的演变》，《日本研究论集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 邵道生：《转型社会国民心态探析》，载于《社会学》1995年第2期
23.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24. 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25.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26.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 依田熹家著，卞立强等译：《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8. 巴特摩尔著，尤卫军译：《平等还是精英》，辽宁教育出

版社，1998年

2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 (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31. 李永炽：《日本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

32. (美)萨依德：《知识分子论（节选）》，《读书之旅》，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33. 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载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34. 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35. 京极纯一：《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洋化》，载于中国日本关系史学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合编《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6. 今井清一：《日本近代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

37.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8.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39. 铃木正、卞崇道著：《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0. 鹿野政直著，卞崇道译：《福泽谕吉》，三联书店，1987年

41.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

42. 富永健一著，严立贤等译：《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43. 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44. 范伟达、朱红生：《多元化的社会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4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
46.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1991年
47. (美)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48. (美) 罗博特·贝拉著，王晓山、戴茸译：《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49. 俞辛焞：《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近代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50. 李玉：《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与大正民主运动》，《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1期
51. 李玉：《试论日本的大正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52. 叶立焯、蒋云根、张敏梁：《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
53. (美) 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
54.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著，曹沛霖、郑世平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55. 塞缪尔·P.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
56. 筱敏：《知识分子的声音》，林贤治主编《读书之旅》，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57.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58.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商务印书馆，1997年

59. 李兴耕：《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60. 王捷、杨祖功：《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61. 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62. 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63. 赵哲：《北一辉思想及其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影响初探》，《日本研究》1985年第3期
64.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
65.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6.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67. 孙仁宗：《日本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世界历史》1986年9期
68. 阿德勒：《生活的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
69. 武斌：《现代西方人格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70. (英) 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
71.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
72. 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73. 孟庆枢：《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

74. 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75. 刘立善：《论武者小路的“妹妹”》，《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
76. 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
77. (日) 早坂茂三：《田中角荣秘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
78. 李廉水：《知识经济究竟是什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二、日文部分（按引文的先后顺序）

1. 松尾尊允：《大正德谟克拉西》，岩波书店，1974年
2. 加藤周一、久野收：《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4·知识分子的产生与作用》，筑摩书房，1959年
3. 坂本多加雄：《知识分子——大正昭和和精神史断章》，读卖新闻社，1996年
4. 松田道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筑摩书房，1965年
5. 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知的状况》，中央公论社，1974年
6. 江口圭一：《大正德谟克拉西》，学生社，1976年
7. 坂野润治：《大正政变》，密涅瓦书房，1994年
8. 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河出书房，1955年
9. 中野久夫：《大正的日本人》，ペリかん社，1981年
10. 隅谷三喜男：《日本社会思想的坐标轴》，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11. 今井清一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3·大正思想集1》，筑摩书房，1978年
12. 山崎正和：《日本文化与个人主义》，中央公论社，1991年

13. 松本三之介：《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0·学问与知识分子》，岩波书店，1996 年
14. 野田又夫：《近代日本思想的轨迹——与西洋相遇》，北树出版，1982 年
15. 《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4·陆羯南》，筑摩书房，1987 年
16. 田中彰：《迈向近代天皇制的路程》，吉川弘文馆，1986 年
17. 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比较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研究》，前野书店，1963 年
18. 小田实著：《日本的知识分子》，筑摩书房，1985 年
19. 《体系日本史丛书 9·社会史 2》，山川出版社，1965 年
20. 朝尾直弘、鹿野政直：《岩波讲座·日本通史 第 18 卷·近代 3》，岩波书店，1994 年
21. 《现代文学大系 14·夏目漱石集（二）》，筑摩书房，1964 年
22. 南博：《大正文化》，劲草书房，1965 年
23. 古川哲史、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讲座 8·近代的思想 3》，雄山阁，1976 年
24. 德富苏峰：《苏峰自传》，中央公论社，1935 年
25. 山住正己：《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6·教育的体系》，岩波书店，1996 年
26. 石田雄：《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2·福泽谕吉集》，筑摩书房，1975 年
27. 金原左门：《近代日本的轨迹 4·大正德谟克拉西》，吉川弘文馆，1994 年
28.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63 年
29. 杉井六郎：《德富苏峰研究》，法政大学出版局，1977 年
30. 隅谷三喜男：《日本的名著 40·德富苏峰、山路爱山》，

中央公论社，1983年

31. 神岛二郎：《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8·德富苏峰集》，筑摩书房，1978年

32. 宫本盛太郎：《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坐标》，有斐阁，1987年

33. 和田守、竹山护夫、荣泽幸二：《近代日本的思想(2)》，有斐阁，1979年

34. 大久保利谦、儿玉幸多：《史料による日本の歩み·近代编》，吉川弘文馆，1979年

35. 宫川透、中村雄二郎、古田光：《近代日本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63年

36. 滨口晴彦：《日本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时潮社，1980年

37. 似田贝香门、福冈安则：《日本的社会学 10·社会运动》，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

38. 花立三郎：《德富苏峰与大江义塾》，ぺりかん社，1982年

39. 植手通有：《德富苏峰集》，筑摩书房，1974年

40. 坂本多加雄：《市场、道德、秩序》，创文社，1991年

41. 有山辉雄：《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吉川弘文馆，1992年

42. 柴崎力荣：《德富苏峰与京城日报》，收入《日本历史》1983年10月号

43. 酒田正敏、坂野润治：《近代日本史料选书 7—2·德富苏峰关系文书》，山川出版社，1985年

44.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岩波书店，1969年

45. 清泽冽：《黯黑日记》，桥川文三编辑、解说，评论社，1995年

46. 松尾尊允：《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吉野作造集》，筑摩书房，1976 年
47. 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与政治》，思文阁，1993 年
48. 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的战争与政治》，岩波书店，1997 年
49. 三谷太一郎：《新版大正德谟克拉西论——吉野作造的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年
50. 《讲座日本历史 9·近代 3》，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
51. 吉野作造：《中国革命小史》，收入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太三编辑：《吉野作造选集 7·中国论（一）》，岩波书店，1995 年
52. 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的成立》，土高书房，1978 年
53. 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 第四卷·世界和平主义论》，新纪元社，1980 年
54.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吉野作造选集 1·政治学与国家观》，岩波书店，1995 年
55.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吉野作造选集 3·从大战至战后的国内政治》，岩波书店，1995 年
56.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吉野作造选集 2·德谟克拉西与政治改革》，岩波书店，1996 年
57.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吉野作造选集 8·中国论（二）》，岩波书店，1996 年
58.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吉野作造选集 4·大战后的国内政治》，岩波书店，1996 年
59. 井出武三郎：《吉野作造及其时代》，日本评论社，1988 年
60. 冈义武编：《吉野作造评论集》，岩波书店，1975 年
61. 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 第一卷·民本

主义论》，新纪元社，1982年

62. 三谷太一郎：《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5年

63.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吉野作造选集 5·大战期的国际政治》，岩波书店，1995年

64. 松尾尊允、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吉野作造选集 6·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岩波书店，1996年

65. 三谷太一郎：《日本的名著 48·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2年

66. 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 1》，法政大学出版社，1982年

67. G.M. 威尔逊著，冈本幸治译：《北一辉与日本的近代》，劲草书房，1989年

68. 冈本幸治：《北一辉》，密涅瓦书房，1996年

69. 长谷川义记：《北一辉》，纪伊国屋书店，1981年

70. 岩濑昌登：《北一辉与超国家主义》，雄山阁，1974年

71. 北一辉：《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三铃书房，1975年

72. 北一辉：《北一辉著作集》第三卷，三铃书房，1976年

73. 松本健一：《北一辉论》，现代评论社，1975年

74. 北一辉：《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三铃书房，1978年

75. 宫本盛太郎：《天皇机关说的周边——三个天皇机关说和昭和史的证词》，有斐阁，1983年

76. 冈本幸治：《北一辉——转换期的思想构造》，ミネルウア书房，1996年

77. 宫本盛太郎：《北一辉研究》，有斐阁，1976年

78. 松泽哲成：《人与思想·北一辉》，三一书房，1977年

79. 《现代史资料 23·国家主义运动 3》，三铃书房，1996年

80. 近藤秀树：《日本的名著 45·宫崎滔天、北一辉》，中央公论社，1982年

81. 久野收、鹤见俊辅：《现代日本的思想——其五个漩涡》，岩波书店，1963年
82. 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群像》，校仓书房，1991年
83. 丸山真男：《增补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96年
84. 大泽正道：《大杉荣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1977年
85. 秋山清：《大杉荣评传》，思想科学社，1976年
86. 镰田慧：《大杉荣自由への疾走》，岩波书店，1997年
87. 大泽正道：《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20·大杉荣集》，筑摩书房，1974年
88. 《大杉荣全集 3·自叙传、狱中记》，世界文库，1975年
89. 松下芳男：《裸の大杉荣》，《历史与人物》1959年9月
90. 多田道太郎：《大杉荣》，桑原武夫编《近代日本的思想家 2·动摇 20 世纪的人们》，讲谈社，1982年
91. 秋山清、大泽正道、久保田芳太郎、小松隆二、中村完：《大杉荣选·无政府主义的哲学 I》，现代思潮社，1976年
92. 大杉荣著：《大杉荣全集 1》，世界文库，1975年
93. 大杉荣著：《大杉荣选·无政府主义哲学 II》，现代思潮社，1976年
94. 岸本英太郎、小山弘健编著：《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青木书店，1959年
95. 太田哲男：《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水脉》，同时代社，1987年
96. 大杉荣：《大杉荣全集 2》，世界文库，1973年
97. 伊藤整、龟井圣一郎：《日本现代文学全集 47·武者小路实笃集》，讲谈社，1980年
98. 有岛武郎：《有岛武郎集——现代文学大系 22》，筑摩书房，1964年

99. 桥川文三、鹿野政直、平冈敏夫：《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基础知识》，有斐阁，1975年
100. 白井吉见：《白桦派的文学》，岩波书店，1958年
101. 《日本文学全集 15·武者小路实笃》，河出书房，1967年
102. 《现代日本文学全集 72·武者小路实笃集（二）》，筑摩书房，1957年
103. 稻垣达郎、祖父江昭二：《近代文学评论大系 5·大正期Ⅱ》，角川书店，1979年
104.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研文出版，1998年
105. 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十卷，艺术社，1923年

三、其他参考书目

1.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3.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4. 刘福森：《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尼采文选·上帝死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6. 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
7. 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8. 《托尔斯泰文集·天国在你们心中》，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9.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92年
10.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
11. 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北京出版

社，1992年

12.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3.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

14.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

15. 马丁：《权力社会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16. 厉以宁：《经济、文化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7. 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8.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

19. 胡令远：《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



后 记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的基础上修改成稿的。2001年5月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给予赞誉的同时，也对论文的日后修改与完善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对作者将论文充实成书帮助很大。

本书能够成书并出版，与我的两位导师王家骅教授、杨栋梁教授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从论文的选题、写作到定稿，两位导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给予了精心的指导，并在细微之处还耐心地给予圈圈点点，从而打下了本书的坚实基础。因此，我首先向尊敬的两位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米庆余教授就个案与整体的关系、理论指南等问题也给予了指导。在此，向米教授深表谢意。

在本书的撰写与修改过程中，曾有许多先生给予我直接或间接的关怀与帮助。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汤重南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宋成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宁一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周启乾教授、吕万和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周维宏教授，我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指导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李世安教授等。还有，学业的艰难时期对我慷慨解囊相助的东北师范大学中古所的李小白女士，曾给予我热情关怀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宋志勇先生。在此，谨向这几位先生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争取图书出版基金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尚侠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刘建军教授给予了热情关怀。在本书的出版经费上，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投入了相当大的力度，并慷慨资助。在此，也向两位教授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和辛劳的责任编辑罗莉女士。如果没有罗莉女士的真诚帮助与推荐，本书的出版则是不可能的。在此，向罗莉女士付出的一切辛劳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付梓之际，我还要借机向我的慈母和爱妻表示谢意。1998年7月18日，即在我走进南开大学校门的一个多月前，慈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长逝。母亲临终前得知我考取了南开大学博士生，为我高兴，为我骄傲，嘱我无论如何要把书读下来。至今，母亲临终前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每当我意志消沉之时，母亲的叮嘱总能唤起我的信心和勇气，激励我向前迈进。几年来，我的妻子李海鸥女士一直在默默地为我奉献，独自撑起抚养孩子的重担，还时时给我鼓励，给予我无穷的精神动力。那段岁月的“缺憾”，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了。

另外，我的学兄孙立祥教授非常关注我，并曾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也向他表示感谢。

本书至今成书，历时数载。但由于作者才疏学浅，文中一定有疏漏与欠妥之处，敬请学界专家拨冗赐教。

陈秀武

2004年2月12日

于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

此书出版承蒙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资助

陈秀武 著

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 与知识分子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秀武 著

日本大正时期 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

RIBEN DAZHENG SHIQI
ZHENGZHI SICHAO YU ZHISHI FENZ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093.135
C47

ISBN 7-5004-4198-3



9 787500 441984

ISBN 7-5004-4198-3/D·498 定价：25.00元

序

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年）虽然短暂，但在日本历史上却是个剧烈动荡、充满变数的社会转型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战败国耿耿于怀、伺机东山再起，战胜国分赃不均、明争暗斗，世界蕴含着新的危机。与此同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出现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使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战后日本国内矛盾的发展，使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皇国主义、超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理想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纷纷涌现。在这场思想大论战中，知识分子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力欲让社会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以此来引导未来日本的发展道路。然而，进入昭和时期后，大正时期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很快结束，随着经济危机的频发，日本政治急剧右转，最终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

思想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并作用于社会，某种政治思潮一旦成为主流并左右社会，势必给社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近代日本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大正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什么其结果是反动、落后的政治思想占了上风？知识分子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的日本研究中，有关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及思想状况的著述并不乏见，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某一事件、运动或某一思想家，以整个思想界的状况为对象进行关联性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秀武撰写的《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一书弥补了有关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按照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思路，对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进行了分类，并运用翔实资料对各种政治思潮产生的背景、内容、特点等进行了实证考察。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体现了学科交叉研究特点，难度大、跨度大，有新意。例如，本书参照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功能理论”、政治学中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转换—输出的关系理论、心理学中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中萨义德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理论，引经据典地对各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分析，体现了作者对史学理论具有很高水平的驾驭能力。

从挖掘新观点的视角来看，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文化转型三指标”的判断标准、“知识分子具有以社会运动为依托推动社会整合的功能”、“社会结构三角形理论”、“知识分子思想变异的双刃剑效用”、“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是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精神要因”等新观点。这些观点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和创意，将有关研究深入了一步。

当然，作为第一次系统研究大正时期政治思潮及其知识分子作用的一部专著，其中还有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之处。对一些思想流派，如对边缘化思想家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同时由于同一流派的思想家之间也存在着个别差异，这就需要做更加周密的个

体研究，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当时思想界的一般状况。另外，作者对“社会结构三角形理论”的分析，读完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如能进一步展开论述则会显得更加完满。作者还年轻，相信他会在学界同仁的指导和爱护下，励精图治，取得新的进步。

杨栋梁

2004年3月3日于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陈秀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4

ISBN 7-5004-4198-3

I. 日… II. 陈… III. ①政治—思潮—研究—日本—大正时代 (1912~1926) ②知识分子—研究—日本—大正时代 (1912~1926) IV. ①D093.135②D731.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8269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